

民族純血的脈動

日據時期台灣學生運動

(一九三三—一九四五)

藍博洲 編著

1913年，台灣醫學生蔣渭水、翁俊明與杜聰明等，以暗殺袁世凱的行動，揭開近代台灣學生運動的序幕。此後，台灣學生運動便跨越台灣、日本、大陸三地，在貫穿卅年的歷史舞台上，展開一幕幕性質不一的反帝民族解放運動。本書第一次完整且系統地重新編寫了這段在歷史迷霧中荒湮多年的日據時代的台灣學生運動。

ISBN 986-7359-49-6



9 789867 359490

00350



定價：350 元

藍博洲 編著

民族純血的脈動

日據時期台灣學生運動

(一九一三—一九四五)

民族純血的脈動

——日據時期台灣學生運動（一九二一—一九四五）

編者 藍博洲

發行人 黃溪南

出版者 海峽學術出版社

登記證 局版台業字第 五九六三號

地址 (一一六) 台北市景興路一九三號四樓之七

電話：(〇二) 八六六三二五五九 傳真：(〇二) 八六六三二四六六

電子信箱 review@ms47.hinet.net

台灣總經理 問津堂書局

地址 (一〇〇) 台北市師大路一六五號

電話：(〇二) 二二六七七七八 傳真：(〇二) 二二六七七四三二

書局門市批發 成信文化事業有限公司

地址 (二三五) 台北縣中和市中山路二段三六六巷十號十樓

電話：(〇二) 二二四九六一〇八 傳真：(〇二) 二二四九六一〇三

澳門總經理 一書齋 澳門高地烏街三七—二九號地下

電話：(八五三) 五八一四一八 傳真：(八五三) 五八一四二五

排版所 偉旭資訊工作室 (〇二) 二九三一九六四七

印刷所 輪速印刷有限公司 (〇二) 二二二六四七九六

初版 二〇〇六年八月二十日

定價 三五〇元

劃撥帳號 一九三八九五三四 海峽學術出版社

ISBN 13: 978-986-7359-49-0

ISBN 10: 986-7359-49-6

※缺頁或裝訂錯誤，請寄回更換

序

藍博洲

一九八七年春天，我有機會加入〈人間〉雜誌報告文學的工作隊伍，並且在第一件事即幸運地採集了光復前後台灣學生領袖郭琇琮的生命史。通過郭琇琮，我初步認識了從日據末期到五〇年代白色恐怖期間波瀾壯闊的台灣學生運動。

在台灣，國民政府對「學生運動」一直懷有聞之色變的恐懼，因而在教育政策上一貫壓制學生的思想活動，更不用說是實際的運動了。我還記得，在我就讀國中期間，台大教授陳鼓應「開放學生運動」的文章在〈大學〉雜誌發表後，害得我們這些對世事一知半解的國中生，也不得不在題為「〈一個小市民的心聲〉讀後感」的作文裡頭，按照反共八股的格式，大肆批判「學運」的「禍國殃民」。

在戰後台灣成長的我們這代人，似乎一直不知道，早在日據時期台灣就曾經有過轟轟烈烈的學生運動。因此，自己一旦觸及了被歷史湮滅的學生運動之後，就忍不住想要更加深入地知道當年學運的實況了。於是，我又在郭琇琮的基礎上，採集了日據末期犧牲的學運領袖蔡忠恕與雷燦南的生命史，並且更進一步地掌握了當時北部學生反日運動的實況與人脈關係。而這一時期的學生抗日運動，事實上並沒有多少文字資料可尋，除了尋找歷史見證人，進行口述採訪之外，似乎別無他法。

一九八七年冬天起，林書揚等五〇年代白色恐怖時期的政治受難人，向分散全省各地的難友籌集了一筆資金，然後以近三年的集體作業完成了日據時代台灣總督府整編的《警察沿革誌——台灣社會運動史》的中譯。我有幸參與了這套一百三十數萬言鉅作的編輯工作，並且在編輯這套書期間，已經詳細閱讀了至少兩遍以上的內文。因此，對於日據時代台灣的抗日社會運動大體也能夠掌握其脈絡了。

就在這樣的採訪與編輯過程中，我才認識到，原來，早在日據時代，殖民地台灣就有過一波又一波的反日學生運動。只是這段歷史在政治的禁制下卻湮滅了四十幾年。

到了八〇年代中葉以後，隨著黨外民主運動的發展，台灣各大學的校園民主運動也逐漸蓬勃，儼然有星火燎原之勢。這時候，早已不具學生身分的我在與許多所謂「革命青年」交談之後，深刻覺得有必要把過去的歷史整理出來，讓那些正在現實的路上為「改造社會」而前進的年輕朋友們，可以在歇歇腳時，看看前人的腳步是怎麼走的。因此，在跨過一九九〇年所謂「三月學運」的最高峰之後，我特意把同年春天到北京採集的光復初期台灣學運的材料，加以整理，寫成《在歷史荒煙中消逝的野百合》一文發表；其時正值三月學運之後的五月學運。

在計劃中，我原本是要以這篇三萬多字的報導為主幹，搭配其他有關光復前後台灣學運的文章，與《幌馬車之歌》及《沉屍·流亡·二二八》同時在一九九一年六月出版。當時，時報出版公司的總編輯吳繼文兄建議我：不妨把日據時期的台灣學運也一併整理出來，同時出版；以補全這段斷裂的歷史。

我答應了。

怎知，因為諸事繁忙，這個工作竟然拖了兩年之後才能完稿！其間，我還幾次因為史料的不足想停筆不寫。

後來，因為篇幅的關係，原先計劃中自一九一〇年到一九五〇年，跨越日據時期與光復初期台灣學運的這本書，還是要分成兩本來出版，並於一九九三年月先行出版《日據時期台灣學生運動（一九一三—一九四五）》一書。

這本日據時期的學運，基本上是以《警察沿革誌——台灣社會運動史》為基本材料，並參考諸如《台灣民報》、《台灣大眾時報》、《新台灣大眾時報》等其他相關史料逐漸編寫完成的。為了更恰當地反映當時學生的思想狀況與運動性質，本書大量地引用了當時各學運團體的運動檄文，以供參考！

當然，這本書並不是我個人的著作，也談不上什麼「學術」價值！只因為從前的人該作沒作，我就扛起來作了。如此而已！我希望，以後自己或者其他年輕朋友能夠在這本書的基礎上，寫出更具社會科學的分析的台灣學生運動史。

在該書的〈後記〉中我曾經這樣寫道。

因為這樣，儘管時隔十三年後，此書早已在書市上絕版多時，我也一直無意再版此書。但是，目睹了經歷過「三月學運」的所謂「學運世代」入朝為官後的猙獰面目之後，為了將來的真正學運的再起，我於是在海峽學術出版社洪宜勇主編力邀之下，決定重新出版這本沒有什麼「學術」價值的書。也因為「學術」價值不是寫作此書時的考慮重點，因此，除了略做力所能及的修訂工作之外，在抽不出足夠時間的客觀限制下，一直想做卻沒有時

間做的註解工作，就只好再次「從缺」了。這是必須說明並向讀者致歉的。

最後，我還要再次聲明，如果沒有林書揚等五〇年代白色恐怖時期政治受難人中譯《警察沿革誌》的貢獻，這段荒澀的台灣學運史仍然無法全面出土的。謹此致謝！

二〇〇六年七月廿五日於台北

※《日據時期台灣學生運動（一九一三—一九四五）》一書，原由時報文化出版公司於一九九三年四月印行。

目錄

序／藍博洲／一

序曲 台灣醫學生的暗殺行動／1

第一章 台灣本島的學潮／7

第一節 師範學校的騷擾事件／14

一、日據初期的師範教育／14

二、台北師範學校第一次騷擾事件／19

三、台北師範學校第二次騷擾事件／22

四、台中師範學校騷擾事件／34

第二節 台北商工學校學生的同盟罷課／44

第三節 台中第一中學學生罷課事件／52

一、台中第一中學的沿革／52

二、台中一中學生罷課事件／53

第二章 東京留學生的文化啟蒙運動 / 73

第一節 民族主義的啟蒙運動 / 75

一、 響應會 / 81

二、 從啟發會到新民會 / 82

三、 東京台灣青年會 / 83

四、 其他派系的學生團體 / 97

第二節 共產主義的文化運動 / 103

一、 台灣青年會的社會科學研究活動 / 104

二、 台共東京特別支部指導下的學運 / 111

三、 合法性的文化運動 / 130

四、 日共系統的赤色救援運動 / 140

五、 日本、朝鮮與台灣無產階級的文化統一戰線 / 142

第三章 在中國各大城市的台灣學運 / 149

第一節 在上海 / 152

一、 上海台灣青年會 / 154

- 二、旅滬台灣同鄉會／157
 - 三、上海台灣學生聯合會／158
 - 四、上海台灣青年團／168
 - 五、上海台灣反帝同盟／192
 - 六、平社／217
 - 七、台灣自治協會／225
 - 八、台韓同志會／234
- 第二節 在北京／241
- 一、北京台灣青年會／243
 - 二、韓台革命同志會／250
 - 三、新台灣安社／251
 - 四、《少年台灣》月刊／260
- 第三節 在閩南／263
- 一、台灣尚志社／263
 - 二、廈門中國台灣同志會／265
 - 三、閩南台灣學生聯合會／269
 - 四、漳州台灣解放運動犧牲者救援會／276

五、閩南學生聯合會 / 282

六、廈門反帝同盟台灣分盟 / 292

第四節 在南京 / 300

中台同志會 / 300

第五節 在廣州 / 322

一、廣東台灣學生聯合會 / 330

二、廣東台灣革命青年團 / 34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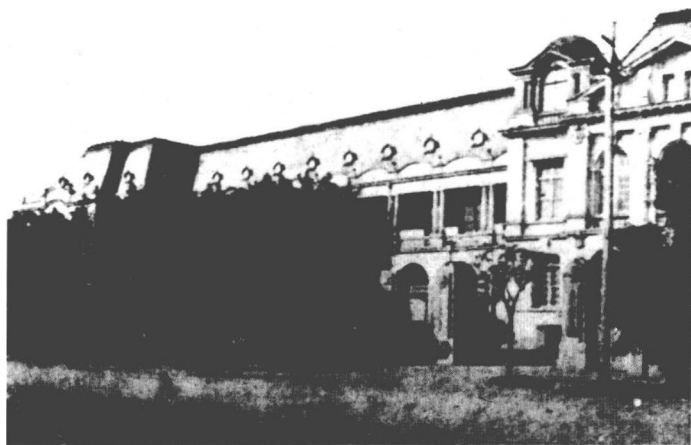
尾聲 日據末期北部學生大檢舉 / 363

一、台北二中學生抗日思漢事件 / 367

二、台北二中學生與謝娥的反日事件 / 370

三、台北帝大蔡忠恕抗日事件 / 371

三、台北商校雷燦南抗日事件 / 376



● 台灣學生運動的發源地——台灣總督府醫學專門學校。

序曲 台灣醫學生的暗殺行動



- 一九一三年，醫專學生蔣渭水提出暗殺袁世凱的計劃，並由杜聰明與翁俊明赴京執行，揭開近代台灣學運的序幕。

一八九五年十一月，在日本台灣總督宣告「台灣本島全歸平定」，日本近衛師團「凱旋」回國後，台灣漢族系人民又紛紛揭竿而起，前仆後繼，勇往直前地掀起轟轟烈烈、席捲全島的抗日武裝鬥爭。此一長達七年的抗日游擊戰爭，以一九〇二年的「林少貓事件」為最後，台灣的抗日武鬥也就暫時平靜下去。然而，台灣人民要求推翻日本殖民統治，復歸祖國的意志和決心，並不因此而稍有絲毫的削弱或動搖。在祖國辛亥革命蓬勃發展期間，不少愛國同胞間關萬里，潛回大陸，投入了推翻我國最後一個封建王朝——清王朝的革命。在辛亥革命勝利的前後（一九〇七年十一月至一九一五年四月），台灣島內先後爆發了十二次抗日起義事件，其中至少有十次都是在辛亥革命勝利的影響和鼓舞下發動起來的。

就在這樣的歷史階段，日本殖民者以赤裸裸的差別教育制度與強迫同化政策培育出來的殖民地台灣的學生，也在辛亥革命的影響下展開反帝、反封建的民族民主運動。其先驅者為以蔣渭水、杜聰明、翁俊明等為主的總督府醫學校的學生們。

一八九九年（明治三十二年）三月三十一日，台灣總督府第九十五號敕令公佈台灣總督府醫學校官制。同年四月，醫學校正式成立，最初祇招收台灣人；以培養台灣人醫師與公醫候補者，並利用台灣的地理環境，研究熱帶醫學為目的。

一九一一年，祖國大陸武昌起義的槍聲震動了全國，辛亥革命隨即出現了全國性起義的大好局面，革命的迅猛發展形成一股巨大的洪流，衝擊著封建、腐敗的清王朝。這股巨大的革命洪流，也衝擊著殖民地台灣，大大地影響了醫學校的台灣學生。一般稍有民族意識的學生，沒有不對辛亥革命的發展寄與重大關切者，其中尤以第一名成績通過入學考試的宜蘭籍學生蔣渭水特別興奮；他不但關心革命而且躍躍欲試。由於在校內談論革命問

題諸多不便，醫學校的台灣學生們常常為此傷腦筋。蔣渭水於是就在今重慶南路東方出版社對面的東榮（瀛）商會，租下該雜貨店的二樓，充作同志們的集會場所。事實上，雜貨店不過是掩護作用，因為他們都嚮往祖國的革命運動，自然所談的都是關於革命後的建設問題。為此，以蔣渭水為首，翁俊明、杜聰明、蘇樵山、黃調清、林錦生、曾慶福等熱心的醫學生，募集了一筆資金，託漳州的留學生王兆培，捐給國民黨。

一九一二年（民國元年）三月十日，袁世凱在北京就任中華民國臨時大總統，北洋軍閥統治開始。一九一三年（民國二年）三月二十日，袁世凱派人在上海暗殺實際掌管國民黨黨務的宋教仁；二十一日，宋教仁傷重身死。七月十二日，李烈鈞在江西湖口宣布獨立，二次革命開始。

殖民地台灣醫學校的學生們對袁世凱的登台早已憤憤不平，一旦「二次革命」開始，蔣渭水就提出暗殺袁世凱的計畫；當時總督府醫學校恰好開始講授細菌學，大家便想到利用傳染病作為暗殺手段。同時，因為杜聰明（當時係四年生）向來對細菌學一門特別感興趣，自二年生時代起便常到中央研究所，實習製造細菌培養器，以及培養細菌；不但成績最好，也有實務經驗。蔣渭水於是決定細菌便交由杜聰明培養，並派他偕同翁俊明（四年生）一起執行暗殺袁世凱的任務。臨行前，蔣渭水特別交代杜、翁兩人：「如果能夠用這些細菌病死袁世凱，那麼，北京人民即使有再多的犧牲，也是值得的！但是，如果你們沒有辦法進入水源地，切記，決不可以將這些病原菌污染街上。你們兩個應該立即束裝歸台……」

杜聰明和翁俊明兩人因為沒有護照（渡華旅行券），不能自基隆直赴上海。他們兩人

於是將霍亂菌（一說是傷寒菌）藏於溫水瓶內，搭乘日台間班輪信濃丸往神戶，然後轉往大阪；因為他們對於北京的地理一無所知，且係頭一次到大陸旅行，因而先在大阪蒐購北京導遊一類的書籍，結果購得一本北京的地理書及一幅北京市街圖（另有一說則謂係在大連購得，見葉榮鐘〈革命家蔣渭水〉）；這樣，才算對北京的交通情形得到一點預備知識。兩人然後自神戶往大連，經由奉天、山海關入北京。

杜聰明和翁俊明兩人起程後，又有一名醫學校的學生邱鳳翔，跟著來到神戶。當他得知杜、翁兩人已經前赴大陸後，便轉道長崎，搭船往上海。在上海，他因拜訪台灣出身的革命家許又銘而被當時的政府拘捕；後來雖蒙釋放，但一直都行蹤不明。

到北京，已經是七月下旬了。杜聰明和翁俊明投宿一間日本人經營的旅社，隨即到北京自來水廠探視地形、地物。他們原以為，北京自來水的水源地大概與台北的水源地一樣，有開放的蓄水池，容易投入霍亂細菌於其中，使袁世凱患霍亂症而死。然而，到了現場，他們才發現北京自來水廠的戒備森嚴，無從下手，不得不織羽而歸。

蔣渭水並沒有因為策動暗殺袁世凱不成而矢志。為了喚起台灣學生的民族意識，推動文化啟蒙運動，他又把醫學校之外的國語學校、農事試驗場及工業講習所的學生團結起來，加以組織化，利用課餘時間，在魁艸的金和盛菜館（餐廳），或在和尚洲（今蘆洲）水滴庄的柑園裡頭，秘密集會。會上，由蔣渭水向這些學生報告中國革命的進展情形，痛斥日本帝國主義的壓迫，鼓吹革命精神。

到了秋天，蔣渭水又發動暗殺日本皇室及高官的計畫。

當時，麻豆的文旦柚據說極受日本皇室喜好。因此，台灣總督府在每年中秋節前後一

定要挑選最好的文旦柚去進貢。不但生產貢品的柚子樹要特別管理，採果後送到台北，又要經過嚴密的檢查才算合格。那一年，總督府不知道為什麼竟派醫學校的上級生擔任檢查工作。蔣渭水於是就動起腦筋來，指揮同班的核心幹部，用注射針將傷寒病菌注入柚子的蒂頭，企圖用病菌來傳染日皇宮廷。然而，學醫的他們對於細菌學雖然略有心得，對植物學卻似乎並不內行。柚子是含有酸性的，酸是細菌的剋星，所以這個計畫還是失敗了。

儘管蔣渭水及其他醫學校學生們的兩次暗殺行動都告失敗，它卻揭開了日據時代台灣學生運動的序幕。

第一章 台灣本島の學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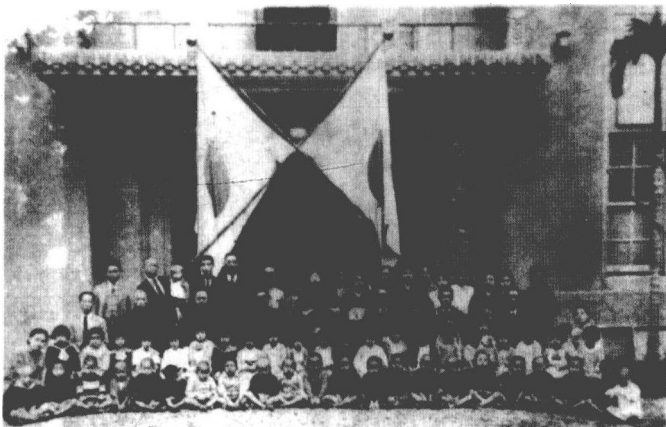
教育勅語

朕惟フニ我カ皇祖皇宗國ヲ肇ムルコト宏遠ニ徳ヲ樹ツルコト深厚ナリ我カ臣民克ク忠ニ克ク孝ニ億兆心ヲ一ニシテ世世厥ノ美ヲ濟セルハ此レ我カ國體ノ精華ニシテ教育ノ淵源亦實ニ此ニ存ス爾臣民父母ニ孝ニ兄弟ニ友ニ夫婦相和シ朋友相信シ恭儉己レヲ持シ博愛衆ニ及ホシ學ヲ修ノ業ヲ習ヒ以テ智能ヲ啓發シ德器ヲ成就シ進テ公益ヲ廣ク世務ヲ開キ常ニ國憲ヲ重シ國法ニ違ヒ一旦緩急アレバ義勇公ニ奉シ以テ天壤無窮ノ皇運ヲ扶翼スヘシ是ノ如キハ獨リ朕力忠良ノ臣民タルノミナラス又以テ爾祖先ノ遺風ヲ顯彰スルニ足ラ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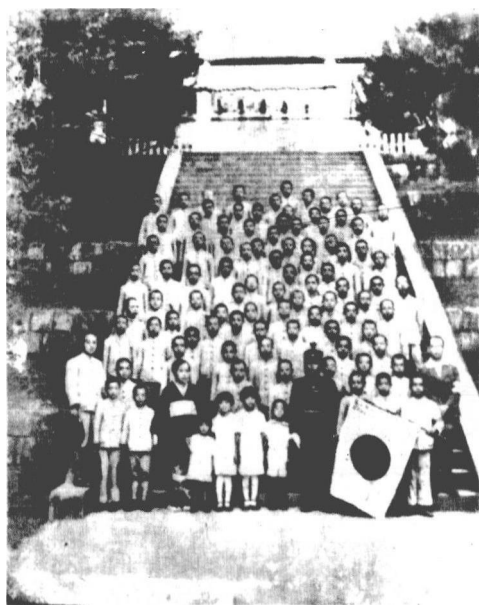
斯ノ道ハ實ニ我カ皇祖皇宗ノ遺訓ニシテ子孫臣民ノ俱ニ遵守スヘキ所之ヲ古今ニ通シテ謬ラス之ヲ中外ニ施シテ悖ラス朕爾臣民ト俱ニ拳拳服膺シテ成其德チ一ニセンコトヲ庶幾フ

御名 御璽

明治二十三年十月三十日



立板橋幼稚園第八回保育式紀念



日據時代，台灣總督府教育政策的演變，大致可以概括為三個時期。

第一期 推行日語

第一個時期，從一八九五年（明治二十八年）六月到一九一九年（大正八年）三月。在這個歷史階段，台灣人民抵死不肯接受清廷將台灣割讓日本的《馬關條約》，始而有官紳階級組成「台灣民主國」的抵抗，繼而有全省義軍蜂起抗日的行動，一直要到一九一五年的西來庵事件之後，台灣漢族系人民的武裝抗日運動才告結束。當時，佔領伊始的日本帝國不但自感國力有限，而且認為台灣難於統治，竟有將台灣轉賣英國之議。正因為日本帝國沒有將台灣永遠併吞下去的絕對把握，所以它對台灣的文物制度完全抱著一種研究的態度，並沒有什麼明顯的政策與理想。

在教育政策上，它對「本島人」（台灣人）的教育也沒有什麼久遠的打算，主要只是辦理國語學校、國語傳習所（此處「國語」乃指日本的國語），推行日語，希望台灣民眾能夠接受日本的語文教育，建立日本帝國主義文化侵略的橋樑。為此，它還特別標榜我國的封建文化與道德，加以誘勸。一八九七年（明治三十年）日本明治天皇的一道訓令，具體地表現了這個統治態度。他說：

朕惟我皇祖宗宏遠樹德深厚我臣民克忠克孝億兆一心世濟厥美此我國體之精華而教育之淵源亦實存乎此爾臣民孝於父母友於兄弟夫婦相和朋友相信恭儉持己博愛及眾修學習業以啟發智能成就德器進廣公益開世務常重國憲遵國法一旦緩急則義勇

奉公以扶翼天壤無窮之皇運如是不獨為朕之忠良亦足以顯彰爾祖先之遺風矣。

一九〇三年（明治三十六年）總督府民政長官後藤新平在學事諮問會上致詞說：「這個會議是以普及國（日）語為目的，只要討論如何去普及國（日）語就夠了。……對於智育開發，我們必須防止陷入荷蘭及印度之弊害，……只道教育是好事，未經深思熟慮，便貿然開設學校，乃是貽誤殖民政策的作法。」

後藤新平的這段話，可以看作是日本殖民當局對於台灣教育的指導思想。

第二期 致力初普教育

第二期，從一九一九年（大正八年）四月到一九三一年（昭和六年）九月。在這個時期，台灣人民的抗日武裝雖然已在日本帝國血的洗禮之下平靜下去了，但是由於土地的掠奪和苛捐雜稅的加重，台灣人民對日帝的仇恨之心卻無日稍減；另一方面，此時正當第一次世界大戰之後，日帝擬以台灣為侵略基地，乘機對中國及南洋擴張勢力，正需要利用台灣人。因此，它開始對台灣人民採取懷柔政策，在政治、經濟、社會、文化、教育各方面，都採取了一種改良主義。

在教育方面，由明石元二郎（一九一八年七月至一九一九年十月）與田健治郎（一九一九年十一月至一九二三年十月）兩位總督先後發布《台灣教育令》（一九一九年）和《新台灣教育令》（一九二二年），確立對「本島人」教育的學制及方針，廣設中等及專門學校；嗣後，台灣的初等普通教育始普遍發達。但日人之所以致力於普及實業和科學教育，

不過是培養中、下級的工商業幹部，以助長其對台灣的經濟榨取與永久佔領。

第三期 培養南進人才與皇民

第三個時期則是從一九三一年（昭和六年）九月至一九四五年（昭和二十年）八月為止，也就是從「九·一八」事變以後至日本戰敗投降為止。

自從「九·一八」事變以後，日本帝國已走上法西斯的道路，積極準備侵華戰爭，並且打算向東南亞方面求發展。因此，它對「皇國南方鎖鑰」的台灣的殖民政策，也進入了新的階段。在軍事上，台灣變成了帝國南進的基地；在教育上，台灣更成了日本南進人才的培養所。為了配合南進政策，台灣總督府積極地充實台灣高等教育的內容，尤其注重熱帶醫學、商業、農業的研究，以及華南、南洋一帶資源與語言的調查。

相應於這樣的政策需要，它提出了「島民皇民化」的口號，積極推廣麻醉教育的「皇民化運動」。首先，於一九三七年（昭和十二年）廢止漢文，強迫推行「國語普及運動」，並從一九四三年（昭和十八年）起，實施義務教育制度；遍設青年學校、皇民練成所，獎勵「改姓氏」、「國語家庭」等，以求達到台灣人民「皇民化」的目的。

一句話，這個時期的台灣教育是為日本帝國的「南進」與「皇民化」政策服務的。

「啟民」與「愚民」的矛盾

就社會科學的理解，近代資本帝國主義的殖民地教育具有互相矛盾的雙重目的。一方面，殖民者為了殖民統治的方便，必須在一定程度上培養殖民地生產及行政方面的初級人才與基層幹部，做為「建設」殖民地的補助性人力；因此，它必須把落後的殖民地住民，教育成具有一定水平的、近代範式的行為能力者；而一定程度的生產科技教育和國民教育也就不可缺少了。但另一方面，為了鞏固殖民支配的制度，它又必須消除被殖民住民的民族自覺，貶低其原有文化的價值，使其認同、誠服於殖民者，因此，它又必須實施另一套歪曲的人文教育或「精神」教育。

也就是說，殖民者基於統治的需要，必須一方面「啟民」，另一方面「愚民」。在理論上，殖民地的教育當局是不可能在這兩種不同的教育實施中有所偏廢的。尤其是如果因一時的功利主義，急圖殖民地經濟的效率化而偏重「啟民」教育，那麼，受啟發的民智必然也會使反抗運動的方法論和工具更為進步，進而動搖殖民者的支配體制。只這一點，往往就使殖民地教育變成殖民地統治體制的軟腹地帶。就歷史事實而言，幾乎所有的近代殖民地反抗運動，都是以受過殖民地教育者為主要推動力，而且往往以教育領域中的「反歧視、反愚民」口號，作為運動開展的啟端因素。

反歧視、反愚民的台灣學潮

日據時期台灣的學生運動也沒有脫離這個規律。

台灣人民抗日運動最初的、全島規模的組織——台灣文化協會，在籌備期間便以學校工作為其重點項目。因此，當其創立大會在一九二一年十月十七日於台北市大稻埕靜修女學校召開之際，參加者以總督府醫學校（一九一九年改稱為台北醫學專門學校）、師範學校、商工學校、工業學校等校的學生為主。據《警察沿革誌》所載當日紀錄，學生與會者有：台北醫學專門學校四十九名、中央研究所農業部（後來的高等農林學校）三十名、台北師範學校一百三十六名、台北工業學校三名、台中商業學校六十一名，共計二百七十九名。

嗣後，以各校學生為基幹的演講會、讀書會、研究會等，更是文化協會的工作重點。文化協會的學生會員數也逐年增加，各學校中的運動風氣於是逐漸轉盛，其中尤以台北師範學校最盛。然而，島內學生活動風氣的增高也引起當局的注意了，各州警察課中擔當思想運動的特高組，於是在各校暗中佈檮，並且對學校當局施加壓力，促其加強管束學生的活動。再加上，時值日本國內的學生運動急速膨脹，左右兩翼思潮在社會運動中的衝突已經相當劇烈，由日本本土赴台灣任教的教員中，因而也不乏左右兩翼的同路者。一時之間，這些因素使台灣的校園情勢日趨緊張，於是以一九二二年（大正十一年）二月間引發的台北師範學校第一次騷擾事件為星火（在此之前，台中商校學生在一九二〇年十一月曾經展開規模較小的罷課行動），點燃了島內各地不同學校、規模不一的學潮事件。

第一節 師範學校的騷擾事件

一、日據初期的師範教育

就日本殖民統治者而言，「心性同化」是他們以為統治台灣最好的方法。因此，佔領之初，即在台北市近郊士林芝山巖學務部（掌理全台灣教育行政的機構，隸屬民政局）裡頭設立學堂，先後招收二十一名「本島人」（台灣人）為日本語練習生，分為甲、乙、丙三組授課。這所學校可以說是台灣國民教育的濫觴。第二年，又在全島各重要城市設「國語傳習所」；積極推行日語教育。為了配合這樣的需要，總督府很早就建立教員養成的機構——教員講習所（一八九六年四月十五日在芝山巖開訓，係速成班）與國語學校師範部（一八九六年五月設置，修業時間較長）。然而，日本殖民統治者又認為，師範教育是一切教育的根本；因此，自始至終，它都緊緊掌握著這一個部門，不輕易讓「本島人」接受師範教育。

國語學校師範部

據統計，國語傳習所，從一八九六年起施行到一九〇一年三月停辦，六年期間，先後一共辦理七屆的教員養成班，畢業生一共是二百六十二人；但全都是日本人。另外，國語學校師範部起初招收對象也限定是日本人；然而，因為當時旅台的日人不多，學生來源頗

感困難。到了一九〇二年（明治三十五年）七月，才將師範部改設為甲、乙兩科。甲科仍然招收日本人。乙科則開始招收公學校畢業或具有同學學歷的「本島人」；修業年限為三年。一九〇五年（明治三十八年）十二月，改為四年。一九一〇年（明治四十三年）五月，因為來台日子弟逐年增加，總督府專為造就日子弟就讀的小學校教員，再將師範部甲科改組為小學師範部與公學師範部甲科；原有的師範部乙科則改為公學師範部乙科。一九一八年（大正七年）七月，總督府為適應公學校大量教員的需要，又在台南設立國語學校分校，專收公學師範部乙科的學生。

除了附屬於國語學校之內的師範部，總督府亦曾於一八九九年（明治三十二年），在台北大稻埕，設立台北師範；在彰化文廟內，設立台中師範；以及台南三山國王廟內，設立台南師範。然而，因為財政、國民教育尚不普及、學生來源……等種種客觀因素，到了一九〇二年三月，台北、台中兩校旋即停辦；台南師範亦僅能維持到一九〇四年（明治三十七年）。

台灣教育令下的師範教育

一九一九年（大正八年）一月四日，日本帝國台灣總督明石元二郎，以第一號敕令公佈台灣教育令。其中，明文規定，以師範學校為師範教育的場所。三月三十一日，又以第二十三號府令公佈師範學校規則。四月一日，再以第六十五號敕令公佈台灣總督府師範學校官制；並將具有多年歷史的國語學校（一八九六年五月設立），改設為台北師範學校（今台北女子師專）；同時也將國語學校台商分校改為台南師範學校。

當時，師範學校按規定設置預科及本科。凡在六年制公學校畢業或具有同等學歷者，得入預科；修業年限為一年。預科修畢者或具有同等學歷者，得入本科；修業四年。

新台灣教育令下的師範教育

一九一九年十月二十四日，明石元二郎總督病歿。十一月十一日，田健治郎繼明石之後上任。田健治郎係文人出身，他的施政也在某種程度上相對地開明。他認為：「台灣是日本領土的一部份，不能用英、法各國一般，只以殖民地為本國政治之策源地，或經濟上之利源地。因此，統治台灣須使台灣住民成為完完全全的日本臣民，效忠日本朝廷；加以教化善導，以涵養其對國家之義務觀念。」在這樣的統治觀指導下，田總督於是採取「漸進的內地延長主義」。在政治上，改革地方制度，設州、市、街、庄協議會，以為地方政府的諮詢機關（一九二〇年七月）。在教育上，則嘗試日、台人共學的制度，頒布新台灣教育令（一九二二年），規定中等學校以上，內、台一致。至此，日據台灣的師範教育，在表面上已無日、台差別。

同年四月，總督府又修正師範學校規則，其要點為：

第一，每一師範學校以設置小學師範部或公學師範部之一為原則；並規定小學師範部為訓練小學教員者，公學師範部訓練公學校教員。

第二，取消原有的預科與本科，改設普通科與演習科。普通科的入學資格為尋常小學校畢業；修業年限，男子五年，女子四年。演習科的入學資格為普通科畢業或中學校及修業四年的高等女學校畢業者；修業年限定為一年。

第三，得設置研究科，培養初等教育的中堅人物；以及為在職教師之進修而設講習科。自從新台灣教育令公佈以後，台灣的國民教育發展很快，第二年（一九二三年）四月，總督府於是又在台中增設一所師範學校，招考公學師範部普通科的學生兩班。

日據師範的兩種作用

日據時代的師範學校屬於高等教育的系統，由總督府直接轄辦，位居州立與公立學校之上。因此，它能密切配合國民教育的狀況，作有計畫的發展。例如，總督府在「九·一八」事變以後，為了達到台灣人民「皇民化」的目的，而決定實施兒童義務教育的時候，就預先添設新竹、屏東兩所師範學校的分部，以備來日的需要。

在教學上，它非常重視技能與實業科目。各師範學校有關音樂、美術、勞作、書法（日人稱書道）、體育、家事學科的教學設備都頗為齊全；儘管這些科目上課的時數不多，但訓練卻相當嚴格。因此，日據時代師範學校的畢業生，大體上都能彈（琴）、能唱、能畫、能寫，也能舞（兒童舞蹈）。除此之外，它還另設有農業、工業、商業、水產等項實業科目，以便適應多方面的需要。

一句話，當時的師範教育完全以配合殖民者的經濟政策為目的，它是整體教育政策的一個關鍵部門。因此，當時師範生的待遇也相對地優厚。除了膳、宿免費之外，並有以下幾項的優待：每年冬夏供給制服一套，外發毛巾、鞋襪，以及書籍、文具、簿本；甚至小如雨傘和草紙，也由學校代備。零用金，每月十八元（當時師範生的菜金每月只三元）。畢業旅行的費用由政府負擔；同時，旅行的地點往往遠達南洋、日本一帶。另外，假期返

鄉及派往服務地點的旅費，也全由政府負擔。畢業後，師範生的待遇（月支四十四元）也比一般中學校畢業者（二十八元至三十八元）為高。因此，它也吸收了不少家境清寒，但成績優秀的「本島人」學生。

然而，從另一個角度來看，日據時代師範教育的帝國主義色彩濃厚，也是不爭的事實。據一九三三年（昭和八年）修正的台灣總督府師範學校規則，第一章「生徒教養要旨」第一條即開宗明義說明，培養「忠君愛國之志氣」與振起「國民志操」的目的。在歷史的教授方針上更赤裸裸地宣稱，應「基於皇國發展之系統，把握各時代之意義，敬仰歷代天皇之偉業，彰明忠良賢哲之德行，並徹底明瞭敬神奉公之真義。」同時還強調：「應使學生明瞭以皇國為主之東亞及世界之情勢。」在地理學的教授方針上也脫離不了「以皇國為主」的範疇，要學生知道「東亞及世界之趨勢與皇國對東亞及世界之使命」，並特別規定應注重「南支那與南洋之研究」。

台灣學運份子的養成所

事實上，就日本殖民者而言，神聖的師範教育所培育出來的畢業生，扮演的角色卻是日本帝國向外侵略的尖兵。儘管這樣，台灣總督府卻始終以獨佔的姿態來辦理殖民地台灣的師範教育。在一九二二年的新台灣教育令公佈以前，「本島人」始終是被排斥在師範學校受教場之外的。新教育令公佈以後，表面上對「本島人」的入學已不加限制了，但事實上，能進入師範學校的普通科或演習科就讀的「本島人」，仍然不多。而且，在形式上平等的「日台共學」制度下，民族之間的尖銳矛盾並沒有因此緩和下來，「本島人」學生與

「內地人」學生之間的衝突、摩擦是司空見慣的！其中，台北師範學校一九二二年與一九二四年先後兩次的騷擾事件，以及台中師範學校一九二八年的騷擾事件，便是日據時期較為重要的幾次學潮；而日本師範教育培養出來的學生就成為發動學潮的主要角色！

二、台北師範學校第一次騷擾事件

一九二二年（大正十一年）二月三日，台北大稻埕新街（太平町）派出所的值勤巡查（警員）在指揮交通的時候，指責幾名台籍的北師學生「故意」在他的面前靠右行走（當時規定靠左行走）。由於這名巡查的態度凶蠻，口出惡言，當場便遭到學生們的頂撞和反詰。這名巡查於是以恐嚇的口氣逼問學生們的姓名，因為恐懼，有些學生不敢報以真實姓名。這些學生回到北師第二學生宿舍後就把剛剛的遭遇告訴其他同學。他們說，日本巡查的態度非常惡劣，並且威脅說：「北師的學生裡頭有很多『不逞分子』，有一天將對他們『施以斷然處置』。」其他同學推測，這名巡查所說的「不逞分子」，指的是那些參加文化協會，並且常在文協幹部蔣渭水那裡出入的主要分子；這樣，一種恐懼與憤怒夾雜的心理便被激發了。

日本巡查與台灣學生的衝突

二月五日下午五點，當北師學生杜榮輝等數十人經過東門街派出所前時，他們就走在右側的人行道上，「故意」不遵守交通規定。東門街派出所的值勤巡查栗生山於是厲言警告這些學生，要他們靠左行走；學生們則反唇相稽殖民地警察的惡劣作風，然後離開現場。

當天下午六點，栗生山巡查交班後就自己一個人前往台北師範學校，向該校生徒監（日本文部省直轄學校的職員，受校長指揮，掌理學生的訓育工作，多由薦任教官擔任）說明不久前發生的事情，要求校方訓誡那些學生。然後他又向第二學生宿舍的舍監瀧田和三郎指控這些學生，並要求瀧田嚴厲處分這些惹事的學生。然而，正當他和瀧田談話時，恰好被一名學生看到，這名學生立刻向第二宿舍的學生通報；宿舍裡的全體學生立刻群集舍監室周圍，齊聲抗議警察橫暴侮辱學生的惡行。栗生山巡查不得不走出舍監室，想要脫身離去。可當他一走出舍監室，學生們就圍繞在他四周，或者喊口號，或者責備他刻意羅織、亂扣帽子；許多學生還趁勢踩響地板，以示抗議，一時喧嘩不已。舍監也無法有效地制止這種情況。

接著，學生們進而把學校大門關閉，聲言除非栗生山巡查表明無意懲罰學生，否則將不放他出去。這時候，學校門口已經聚集了三百多名台灣學生。

總督府學務課長的保證

就在這時，恰好有一名消防隊員從北師門前經過，目睹了現場的情況，並且向東門街派出所報急。該派出所立刻轉報南警察署。南署於是就派一名叫姉齒的日籍警部補，帶一名刑事專務巡查，急忙趕往台北師範學校。當他們趕到北師門口時，現場的學生大約已增到六百多人了。學生們守住校門，阻斷通路，不讓姉齒兩人進入校區，並且有人向他們兩個丟石頭，打熄了他們手上的提燈。儘管這樣，姉齒等人還是強行入內，會見栗生山巡查與瀧田舍監，聽取情況報告。然後，他就向學生提出解散的建議；但學生們不予理會。姉

齒於是就把現場的情況急報南署署長岡野。岡野只好又帶了三名特務巡查，親自趕到北師，想要鎮壓住學生；但也沒有什麼效果。後來，總督府學務課長也接到急報而趕抵現場，他向學生們保證：同學們即使違反交通規則，所受的處罰也不過是申斥、罰金；但是，如果巡查有侮辱學生的言行，一定會受譴責，乃至免職的處分；至於有人憂心巡查是要藉機為難參加文化協會的學生，那根本是沒有根據的謠言……。

這樣，學生們才漸漸散去。

四十五名學生的被捕與釋放

不料，第二天，官方竟然發動司法權，一舉逮捕了關連本事件的主要學生四十五名，並於二月十六日及十八日兩天，由檢察官提訊。

這些被捕的學生大多是文化協會的會員，平日即積極參加文協所主辦的各種活動，其中的主要分子更是經常出入文協幹部蔣渭水處，受其指導，進行研究，並在校內組織研究小組的人。然而，騷動當天，這些學生並不曾有過特別突出的煽動行為。由此可見，這次逮捕是日警當局根據手中的「黑名單」而逕行逮捕的政治迫害。

事件後，文化協會立即與被捕學生的家長取得聯繫，在其會報上提出緊急訴求，並向總督提議取消逮捕令，妥善處理。海外台灣留學生團體亦有聲援活動。總督府鑑於台灣人社會間的輿論反應劇烈，乃於二月二十一日，以「起訴猶豫」釋放了這四十五名學生。然而，官方嗣後卻動員在台日人輿論，及部份親日派台人士紳，同聲斥責「學生背後之文化協會」。尤其《台灣日日新報》更以長篇社論大事攻擊文化協會，指其專志煽起民族反感，

誤導未來負訓導責任之師範學生，釀成如此嚴重的社會問題。

官方種下另一次學潮的火苗

總督府學務課乃趁機下令各學校，強迫各校在學學生之參加文協者脫會。各校當局於此類施壓力，至五月間，部分學生及家長經不起恐嚇而申請脫離文協者計有：台北師範學生二百零五名、台中商業學生七十三名，而此一學生退會風氣竟然連帶影響了普通會員，計有：台北州三十七名，新竹州三十三名，台中州六十五名，台南州十二名。蔣渭水等文協主要幹部認為這是官方對文化協會的不當壓迫，除了極力反對之外，並煞費苦心地理會退會者。由此可見，當時文協初建，思想與紀律教育仍未上軌，致有此一挫折。但當總督府官員慶幸這次「勝利」的時候，受挫的學生們卻義憤難平。官方的詭詐作風也已種下了另一次學潮爆發的火苗。

三、台北師範學校第二次騷擾事件

一九二二年台北師範學校第一次騷擾事件之後，雖然有兩百多個學生在校方的壓力下退出了文化協會，但不平之氣卻更加深沉地瀰漫於全校台灣人學生之間。日本警方當然也風聞了北師台灣人學生的「民族反感」仍然非常濃厚的現象，因而就密切地注意著北師台灣人學生的動靜。嗣後，北師校內經常發生日本人與台灣人學生之間的各種糾紛，每一次，校方都還是以抑壓台灣人學生的「不逞氣焰」為處分原則，台灣人學生因而一次又一次地受到委屈。

旅行事件

一九二四年（大正十三年）十一月，學校按往年舊例計畫寒假的休業旅行。然而，在不久前，台灣人學生與日本人學生之間才因敬禮問題而發生過爭執；同時，因為校方的處理明顯地偏向日本人學生，台灣人學生曾經聯名向校方提出抗議書。這件不愉快的事才剛過去，兩派學生又因為對旅行目的地的意見不同而形成對立。享有公費的日本人學生主張到宜蘭，但必須自己負擔旅費的台灣人學生則希望到南部。在人數上，日本人學生雖然是少數，但校方卻採納他們的意見，決定到宜蘭旅行。

然而，公學師範部普通科三年級的台灣人學生卻認為，師範學校的旅行一直有它的順序，通常上級生多到日本內地旅行，現在，因為學制的修改，師範生比以往要多一年的授業時間，那麼，旅行之地應當也要擴大才是。基於這樣的認知，這些台灣人學生以為，到中南部旅行比到宜蘭更合乎順序，也更有助於學習。他們於是推出八名代表，向學校當局傳達台灣人學生的心意，並請求校方改變旅行計畫。不料，學校當局卻責罵這些學生違背學校命令，並要這八名學生代表寫「感想文」（悔過書）；同時逐一召訊對這項旅行計畫持反對態度的台灣人學生，以恐嚇性的口氣詰問他們：「為什麼要反對學校的旅行計畫？」其中一名叫許吉的三年生回答說：「我並不是有意反對學校命令，只是不願意服從舍監個人的命令而已！」不料，校方部認為許吉的「態度不遜」。一時之間，台灣人學生又被恐怖籠罩，人人自危。

儘管這樣，台灣人學生還是服從校方的決定，三年級的學生也於十一月十七日決定隨

同學校教官到宜蘭旅行。不料，當天下午，校方卻突然召回「態度不遜」的許吉，打算給予退學處分。台灣人學生對此大表憤慨。他們認為，日本人以少數壓制多數的決定已經不公了，而「我們台灣人連表示反對意見都要受處罰嗎？」大家因為不忍讓許吉受到這種酷罰而竭力向校方陳情。但學校當局不但全然不予理會，反而像警察捉犯人一般，以武力將許吉驅出學校。

同盟罷課

因為這樣，台灣人學生更加堅信許吉是旅行事件的犧牲者。然而，變更旅行地點原本就是全體台灣人學生的意思，並不是許吉一人教唆的；校方把責任歸給許吉一人實在是不能令人接受的無理處置。因此，其他三年級的台灣人學生約一百二十三人便於十一月十八日，也就是計畫中出發旅行的當天，採取不起床、不參加旅行的共同行動。這些三年級的台灣人學生一方面以全部同盟休業的方式抗爭，另一方面也通過四年級的學長居中向學校當局尋找雙方圓滿解決之道，不料，學校當局還是強硬不理。這樣，四年級的學生也被激怒了，於是加入罷課的行列。這時候，北師已經全校罷課了。

志保田校長眼見風潮不穩，於是連夜以電報召集學生父兄到學校來。第二天（十九日）早上，台灣人學生的父兄紛紛面帶憂色地趕到學校。志保田校長於是向他們舉發三年級學生的惡點，要他們各自帶回自己的子弟。這些學生家長起先採低姿態，百般替學生謝罪，求學校方面息事復原；但校長峻拒，堅持不許。這些家長於是懷著不平之心各自離校。

台灣人學生約七百餘名則簽名聯署，作成〈陳情書〉、〈事件經過〉、〈學校內容之

腐敗》……等傳單，向學校的內務局長提出。不料，午後三點，學校當局竟下令全校休學，全部學生離開宿舍回家。

學校全面停課之後，一些有心的北師畢業校友便出面查問學校當局與學生們的意思，想要居間斡旋，希望能夠圓滿解決這次事件；但學校當局卻表現出想要嚴加處分這些學生的態度；這些有心的校友覺得事件似乎已到了沒什麼好談的地步，只好放棄。

文協支援

另一方面，文化協會在休校期間即緊急指派蔣渭水等幹部多人，和學生中的積極份子商議抗爭的對策。十一月二十六日，也就是休校期限的最後一天，蔣渭水等人與學生幹部們除了向在家休息的同學們發出「犧牲者眾，勿歸校」的電報之外，並進一步散發攻擊統治當局歧視台灣學生傳單，呼籲全體台灣學生，在當局沒有改善對台歧視政策以前，一定要共同抵制學校復課。

這時候，學校當局警覺到整個學潮已有趨向組織性抗爭的可能，於是企圖以兩手策略在學生之間進行分化。十一月二十八日，學校當局以「性行不良」之名處分了一群學生。其中，退學者三十名，停學者六十四名。同時，一方面通知這些被處分的學生在沒有接到進一步的通知前不必返校；另一方面則命令其餘學生於二十九日起返校上課。這些受到處分的學生們收到學校通知後，立刻與文化協會取得聯繫，並在文協的支援下，向全體台灣學生發出題為《吾人之決意》的電報，表明以下五點決議：

一、吾人所為者正義之道也。

二、吾人促求當局速速改革學校根本方針。

三、若不改變方針，吾等雖死亦不回校。

四、使當局有所察覺本島之將來而解決此事件。

五、希望志保田校長及無資格之教官，一齊自恥引咎辭職。

然後，一方面由其中積極份子巡迴各地，勸阻台灣人學生返校上課；另一方面則派出糾察隊，分赴台北車站及其他交通要道，勸阻學生返校。結果，台中、彰化、大甲等地的學生，全體接受勸告，沒有一個人返校。

總體而言，因為學校當局處分的學生過多，一般學生都對被處分的同學深表同情；再加上學校當局不但沒有改革的誠意，反而把這次學潮的過失都推給學生；因此，二十九日當天，並沒有幾個人返校上課。大多數的學生都因為「學校猶未能忘怨」而留在家裡，或在台北友人處，或借居蔣渭水家，等候進一步的發展。

善後處理

北師校長志保田於是拜託各公學校教師，勸誘這些學生返校。這些公學校教師，有人對師範學校深表厚意而婉拒，也有人親自帶領昔日的學生返校。另外，師範學校的教員也展開工作，或者在車站等候，或者到旅館查詢。這樣，學生返校的人數稍有增加。學校當局於是從十二月一日起，開始授課。然而，大多數的學生仍然繼續進行「罷課」鬥爭。全省各地的警吏與公學校教員於是繼續，向學生的父兄施壓，要這些父兄儘速迫使學生返校

上課。

十二月二日，這些學生家長為謀「善後」，於是在文化協會彰化支部的支持下，在彰化召開父兄大會。當天，總共有五十餘名學生家長從各地與會。會中決議：

- 一、學校內容之腐敗，一任當局改革。
- 二、被命停學者六十四名，要求其從速復校。
- 三、被命退學者三十名，要求其取消前處分，使其復校或轉入他校。
- 四、臨時休校期間滿了而堅持不歸校之生徒（學生），當講最善方法，使其安心入學勉勵。

五、若得達上記之目的，而生徒果有過失，即使不受處分之生徒為之分苦，受相當之謹慎，亦無不可。

會後並推員林糊氏、清水阮烏瓊氏、板橋徐朝鳳氏三人為父兄代表，於三日拜訪志保田校長。但志保田表示，對退學者的處分雖可「反省」，「奈因經發表決定，似難自決」；至於停學者，他對學生家長的要求甚表同感，只要這些學生在父兄及公學校校長監督下，寫一份「感想文」（悔過書），證明確有悔悟之意時，就應當讓他們在二十天之內儘速返校。

三名父兄代表則說：「校長既有如是主見，我等率其歸校如何？若命寫感想文，恐有流於形式。」

志保田不但不肯，而且再次拜託父兄代表，設法讓那些還沒返校的學生儘速返校。

十二月四日，三名父兄代表轉謁總督府學務課長。學務課長雖然也認為北師有許多要改善的地方，但對學生家長取消退學者處分的要求，卻以「事關重大不能明答」而推諉；另外，對停學者及未歸校者學生的處置，他的意見也與志保田一致。

當天下午，三名父兄代表於是再謁內務局長及總務長官；並向總務長官後藤文夫提出陳情書。

陳情書

這回關於台北師範學校的騷擾事件，為其善後策，我們代表父兄大會，在這裡所要謹陳於閣下。

我們想我們的子弟，多年受教養於台北師範學校之下，如今精神身體兩兩發達，於將來不久，將為一個完全的人踏入社會，——我們正在慶喜此事，而且對於學校從衷心在感謝著。然而料不到這次勃發學生的騷擾事件於同校，而衝動了社會的耳目，實在遺憾得很！在學中的學生弄起這樣的事來，不消說是由其不謹慎所致，不但學生的恥辱，為父兄的我們，也痛切地感覺得應大大地負其責任。再則從學校方面看起來，也不能辭其責任。第一、校長和教師的一部常不留意於人格教育，不但不尊重學生的個性，反而偏重形式，為不適當的處置，以使學生懷不平不滿。我們以為這回事件的動機雖說在旅行問題，但實際上是基因於歷來學校的缺陷之多。第二、學校本年十一月十七日並不聲明其理由，突然對第三學年生許吉命其歸鄉，及見其未歸，校長以下其他教官多數把他圍上，好像對待盜賊的一樣，連拖帶推的把他趕出，這樣的事是人

情所不忍，尤其是所不當有於師長的。倘若他——許吉，有當斥之事，應該指明其理由，處罰之以警他人。然而不但不聲明其理由，由別的學生質其處罰的事由與程度，尚還不聲明之，而使一般的學生感了萬分的不安和危險，這不可不說完全是學校的責任。第三、試探這次的騷擾事件的真因，不消說是胚胎於學生目睹學校當局之對於許吉的不當的處罰，同情於許吉的身上，同時感知了各自的前途的危險和不安的。所以試看他們學生的行動，不過是在乎無所作為的消極行為，和在途中奪回被命歸省的許吉。論其情狀是極其輕微，不能認為可惡到那步的行為，然而學校卻故意小事大弄，把事件視為重大，對於學生生命退學的多至三十人，命停學的多至六十四人。這樣看來學校的處置之失於過酷，這不消說了。我們以為師弟之間，是應互相繫之以溫情的，所以做學生的錯了，則應以善來誘導之，然而學校對這則賜之以嚴罰，像這樣背違師道的，實在大有反省的必要。第四、事件發生當日，公普三年生和校長之間，陷於不好意思的狀態，所以本科第四學年生的幾個人，怕生起事端，進而欲執周旋鎮壓之勞，以期息事，而校長不但說：「沒有學校的命令無為那種事的必要！」斷然把這拒絕下去，甚而對於那些以滿腔的熱誠欲執周旋之勞的學生八名，處以退學，這實在是沒天沒理的處置了！第五、同十九日召集公普三年生的父兄於學校，命其各引領各的子弟回家，於是父兄等都以為無庸如此，說一切欲信憑學校，倘有當斥之點，願請假以二小時的寬限，親自訓誨子弟，然而校長頑固地不聽許，斷然下臨時休校之命，使全校的生徒歸鄉，這樣的，當初就沒有平和的解決的誠意了。如此，學校方面的處置，實在也有不善之處，我們當此之時，欲求學校反省，而切望其對於學生已行的處罰變更如下：

第一、使停學者急速復校。

第二、對於退學者要考慮其前途，已改後的急速使其復校。

第三、目下還未歸校的生徒，與（宜）以寬大的處置，使其安心歸校。

然而學校不以我們的苦衷為諒，推三托四的不見其有講究善後策的誠意，然則那些受了停學退學的處置的九十四名的前途，是非常之黑暗，而且是可哀的了！所望閣下憐憫那些學生的將來，與他們以宏大的同情，使台北師範學校為那些停學退學的學生謀適當的辦法，再則對於學校內容的改善，也希望特地留意！

右敬陳的旨趣，請察納之，並求什麼一個辦法。陳情如右。

大正十三年十二月四日

右父兄代表者

林 糊

阮烏瓊

徐朝鳳

總務長官 後藤文夫殿

也許是因為北師台灣人學生二、三百人，從今天起展開「同盟斷食」的鬥爭策略之故，三名父兄代表的陳情甚得總務長官的「同情」，並獲致四點承諾：

- 一、第一項因著任匆匆，諸事未詳，當使屬僚調查要改革處，自應留心改革。
- 二、停學者之復校，局長亦不喜諸事流於形式，待與校長商議，得使迅速復校。

三、三十名退學者之前途，長官局長皆為費心考慮，欲講究善法，使其有立身之途徑。

四、未歸校者宜使其全部從速歸校，學校自應體諒。

三名父兄代表對總務長官的「誠意」感到可以接受，於是就拍發急電，催促尚未返校的台灣人學生歸校；然後到大安醫院拜訪蔣渭水及文協的其他幹部，感謝他們對被退學的學生的種種同情，以及對師範教育的留意。這樣，二十幾個遵守誓約、堅持到最後的彰化、員林、南投的同情休校生，才接受父兄代表的勸告，決定第二天（十二月五日）一齊歸校。他們說：「奔而殿，非敢後也，良心不過也！」最後，在蔣渭水宅前合影留念。至此，鬥爭暫時告一段落。

秋後算帳

然而，二十天後的十二月二十八日，台北師範學校忽然由級主任發函給公學校校長，要他們告知六名停學者之父兄：他們必須自己提出退學自願書，以免玷污校譽，如果自己不出提出，那麼學校當局也必定會命令他們退學。

「我們曾經審察自己的子弟，」這六名父兄不服學校的處置而向學校當局辯詢：「他們都已經知道謹慎、志於學業，不知道校方為何還作這樣的處分？」

學校當局的回答是，當休校滿期的學生返校的時候，校方發現他們有人向學校窺探，有人則在車站附近徘徊，意存不善；所以不願讓這種學生返校。

這六名父兄聽了後，雖然按捺著憤慨向學校懇求，但仍然徒勞。他們於是通知父兄代表，要求他們儘速北上，向監督官廳陳情。林糊氏與阮烏瓊氏於是聯袂拜訪內務局長，向他陳述：學校當局的屢次處置都太過苛酷，而在校內的學生也經常被威嚇。另外，據傳對牽連騷擾事件者也將逐一處置，以致學生們都非常不安。他們希望當局設法監督這種現象，以免再生事端。

內務局長則官腔官調地回答說：「予本不欲干涉學校，以其學校自有權限可以處置，此回有另處置退學之事，猶未聞及，故無可知其理由，料學校應無再行此事，若有之者恐別含有他理由。」

父兄代表不死心，仍然懇請他留意，說：「此回事件實大關係教育之進步，三十名退學者之前途，希望同情設法考慮，無使貽惡影響於社會，停學者全部得使復校，始適合一般之希望。」

然而，學校當局卻認為：三年前第一次事件時，因為無人被退學，才使學生「不知利害，如此猖獗」。為了達到鎮懾目的，校方仍然堅持採行強硬政策。同時，為了掩飾手段的刻薄，而以行政方法分做四回來處分。此一空前的集體退學處分，雖然引來了輿論與學生家長的激烈抗爭，終因當年投考師範學校者多屬清寒家庭子弟，一身進退立刻影響家庭的未來生計，其餘學生及家長因而不得不隱忍一時。這樣，台北師範學校的第二次學潮終以三十幾名的退學犧牲而落幕了。

留學海外

第二年（一九二五年）的一月十六日，三十名被處分退學的學生中的林懋貴、郭華洲、呂江水、廖興家、何火炎、賴萬得、王榮華、王連、林朝宗等人，在文協的安排下，搭乘蓬萊丸出發，到東京留學。一月十九日及二十一日兩天，又有兩批學生在社會有心人援助下，奔赴日本。二十三日，紀清山、曾新發、陳圻圻、陳慶等，搭信濃丸，到日本留學。以上這些人，有的再轉赴廈門、上海等地留學。

這樣，大部份被北師退學的學生都到海外繼續求學了，其餘十幾人，因為家境較窮而遲遲未行，一直要到二月一日，這些學生才又在文協的資助下，一同搭乘蓬萊丸，奔赴東京。臨行當天，文協特地在台北市太平阿大安醫院樓上開送別茶話會。會從正午起，施至善、王敏川、蔣渭水等文協的重要幹部相繼陳述他們對學生的希望，祈勉他們完成學業，加入啟發台灣文化的隊伍，以革新文運。學生代表陳植棋則對各地有志之士致謝詞，並「決心力求學業成就，以期努力啟發桑梓文化之向上。」茶話會結束後，文協的有志之士又送這批學生到碼頭搭船。日後，這批被退學的北師學生果然有不少成為台灣社會運動中的鬥士。其中，出身台北南港富豪之家的陳植棋，進入東京美術學校西洋畫科，並在吉村畫塾接受吉村芳松的指導。此外，他還經常寫信給台北師範的後期生（李石樵、洪瑞麟、張萬傳、陳德旺等），向他們介紹西洋藝術的思潮，並鼓勵他們到東京習畫。他的作品不但幾度入選「帝展」，而且先後參與創立「七星畫壇」和「赤島社」；是日據時代台灣美術運動的一名健將。可惜一九三一年不幸病逝，年僅二十六歲。

四、台中師範學校騷擾事件

一九二八年（昭和三年）十一月九日晚上九點多，剛剛兼任舍監職務才十幾天的台中師範體操教員小山重郎，在就寢前巡視學生寢室的時候，聽見演習科二年級的學生黃成與另外兩名學生，在寢室裡頭用「台灣話」聊天。因為學校校規中有一條規定是「絕對不許說台灣話」，所以小山舍監就以他們三人故意違反校規之由，當場給予嚴厲而侮辱性的責罵，並且以野蠻的體罰方式毆打學生。被打的學生們雖然吃虧，但因自己違反校規，也不敢和他計較。

小山暴言事件

第二天，也就是十一月十日，小山在晨間巡視中又發現普通科一年級學生陳調元和楊賜欽用台灣話交談，當場就毆打他們兩人。然後利用朝會時間登上講台，當著全校師生的面前，以狂悖而暴戾的訓辭責罵台灣人學生。他大發狂言說：「台灣話是清國奴話！」又說：「誰要喜歡講台灣話就滾回支那去！」他甚至遷怒日本人學生，責備他們沒有勇氣檢舉說台灣話的同學，他要他們以後「聽到有人講台灣話就揍他」……。

由於當天是日本天皇即位的「御大典」奉祝之日，絕大多數的學生們雖然受了小山舍監的大侮辱之後，心理憤慨得似噴火口一般，還是決定隱忍持重，不在「御大典」的奉祝中輕舉妄動。但是，朝會解散後，仍然有十餘名台灣人學生沉不住氣地尾隨小山之後，意圖詰問；一時之間，情況顯得有點緊張。目睹這種情況的另一名舍監段證於是詢問台灣人

學生事情的緣由，並且好言撫慰憤怒的台灣人學生，情勢才暫時平靜下來。

另一方面，平常看待學生如同自己的兒子一般，尤其對於內台人的學生絲毫不存任何差別的念頭，因而被全校學生尊為「第一人格者」的同校演習科（六年生）的教育主事——三木教官，因為聽到屬於自己管教範圍的演習科學生被小山舍監毆打而心中不平，所以，朝會一結束，他就跑到學生宿舍向舍監長追問責任。小山面對三木的質問仍然狂妄不堪地自承是他。三木教官當場氣得目眦欲裂，緊緊抓住小山的手說：「你再這樣亂來，我就把制服脫掉來和你算帳。」面對公平無私的三木教官，剛剛從朝會上吐了暴言回來的小山舍監部發不出任何暴戾性了。

然而，當小山看見學生們在自修室聚集討論的時候，他又走上前去，以暴戾的言辭恐嚇學生們。學生間隱忍已久的激憤於是陡然增高，並且隨即展開自力救濟的行動。台灣人學生中的上級生們一方面極力開導下級生，以防他們做出過激的行動；一方面則把小山舍監在朝會上的暴言紀錄（僅「清國奴」一語就用了十五、六次），發送給校長以下的各教官，要求他們冷靜的批評和嚴正的處置；同時選出學生代表，向校長陳情，要求他公平處置。但學校當局對學生的回答卻是：「等到御大典的各種慶祝活動過了，大概在十天之內一定會有一個處置。」另一方面，中師學生中的積極份子，在事件發生後便經常與「新文協」（一九二一年十月成立的「台灣文化協會」於一九二七年一月分裂。舊文協幹部另組「台灣民眾黨」，以要求地方自治為主要目標。以連溫卿為首的新文協則以解放台灣最大多數的無產階級為目的，並且主張階級鬥爭。同年三月，新文協本部移至台中。）的成員接觸，與他們交換意見並徵求鬥爭的指導。十一月十一日，中師五年生盧題與台中商校學

生二人，及彰化郡阿美公學校分教場（分校）訓導鄭安等四人，在彰化女子公學校訓導柯紹埔的默許下，利用該校的鋼板油印機，印成題為〈中師狗官小山的暴言〉的傳單三百份，廣泛在民間散布。另外，文化協會、農民組合、台中店員會等五個團體共組的「台灣解放運動團體台中協議會」也印刷及頒佈了聲援學生鬥爭的檄文。

關於中師暴行事件，告全台灣被壓迫學生諸君：

全台灣被壓迫學生諸君！我們長年來在「嚴禁使用台灣話」、「民族差別待遇」、「限制讀書」、「剝奪接見及外出的自由」、「剝奪言論集會結社之自由」等等強制規定下，失去了人類應具的自由權。北師事件、台中一中事件（一九二七年）、南師事件（一九二四年）……這些都是學生大眾反抗當局彈壓的激憤的爆發！

全台灣被壓迫學生諸君！現在又發生了一件對台灣人學生的暴行事件了。十一月九日夜，台中師範的流氓教員小山羊，喝足了大典喜酒後闖入學生的自習室，以「內務不整」為理由打了幾個學生的耳光，又以使用台灣話為藉口，揍了另外幾位學生。大家都惱於其淫威，忍聲吞氣不曾反抗。不料翌日朝會時間，那個流氓教員小山羊，集合了所有台日人學生全體，大叫大吼說：「台灣是大日本帝國的領土，誰要講『清國奴話』（台灣話），就滾回那個沒有法律的『支那』去！我是奉小原大佐命令來的，我是帝國主義者！誰不服氣，站出來！我用這雙鐵拳揍他個半死！你們這些內地人學生（日本人學生）也不爭氣。有人在自己的面前講台語，還視若無睹！以後你們只要看到有人講『清國奴話』，就揍他一頓，我負全責！大日本帝國政府出了八十萬圓創立了這個學校，可不是培養『清國奴』的地方！」

全台灣被壓迫學生諸君！所謂的「一視同仁」、「內台融和」、「共學制」等等，我們能相信這些美麗的謊言嗎？那些日本教員，口說「沒有差別待遇」，卻經常對我們肆行差別待遇，現在竟然更進一步拋棄了文化的外皮，公然表明其日本帝國主義走狗的身分，不僅自己肆行暴力，更慫恿日本人學生向台灣人學生施行暴力。現在有三百餘名台灣人學生，忍無可忍而包圍了舍監宿舍，要求小山出面謝罪，要求將其罷免，準備斷然發動同盟罷課，以貫徹主張。

全台灣被壓迫學生諸君！問題其實不限於台中師範的一個流氓教員小山，而是日本帝國主義的政策表現，是所有在台日本教員的共同本質！請看台北師範、台南師範、台中一中的幾次事件吧！日本金融資產階級為了確立、維持、鞏固本身的支配地位，他們不但要彈壓本國的勞動者和農民，對殖民地的工農大眾，也需要徹底下手彈壓，對於學生大眾，更需要施行軍國主義的奴隸教育！

對於日本當局的如此的暴壓，日本內地和朝鮮的學生大眾，已經不止一次地站起來，發動過勇敢的同盟罷課了！

全台灣被壓迫學生諸君！我們在台灣，也發動幾次的罷課，但每次我們都慘敗了。為什麼？那是因為我們的力量不足。只有一個年級、兩個年級的結合鬥爭，是不夠的。我們必須學校一致鬥爭，否則得不到勝利，不！只有一個學校，還是不夠的，除非全台灣學生一致團結共同鬥爭，否則還是達不到勝利的目的！

我們的勇敢的中師弟兄們已經站起來了，同盟罷課已然揭開序幕了！這正是我們報仇的時候了！請各學校立刻召開學生大會，各校提出各自的要求，擲向學校當局吧！

這也是我們響應中師弟兄們的義務！

——打倒流氓教員小山！

——絕對反對奴隸教育！

——絕對反對民族差別待遇！

——使用台語應絕對自由！

——打倒日本帝國主義！

「台灣解放運動團體台中協議會」是代表文協、農組和店員會等五個團體的臨時聯合爭議機關。它的檄文內容，不僅突出了殖民地被壓迫民族的激憤，也表露出被剝削階級群眾的反抗情緒。

三月十五日，「台灣解放運動團體台中協議會」為了擴大學生抗爭的聯合戰線，又草擬了一份〈為台中事件告全島工人、農人、小商人及所有被壓迫民眾〉的檄文，廣為散發。為台中事件，告全島工人、農人、小商人及所有被壓迫民眾：

我們不幸生息在淪為帝國主義鐵蹄下的台灣三十餘年，受盡了摧殘、屠殺、掠奪、榨取的恐怖至於體無完膚的地步，可說上天無路入地無門。狼肺虎心的支配階級，在政策上如何地壓迫我們，經濟上如何地剝削我們，凡有眼者無人不見。尤其利用奴隸教育扼殺我們社會的未來改革的毒辣手段最為苛酷，彼等搬弄名詞，誣稱過激分子、危險思想等，意圖磨滅青年人的反抗心理，欺瞞青年使其垂手掩耳，永遠屈服於支配階級腳下，變成其忠實奴隸馴服走狗。

他們處心積慮，等待機會。驚心動魄的台中師範事件，於此爆發了。只聽其言辭中之一二句便已足夠察其居心，曰「清國奴」，曰「罪大惡極」，更曰「滾出台灣！」辱罵！毆打！腳踢！連一旁觀看的學友們也遭一場辱打！此一喪心病狂的流氓，更在朝會中進行挑撥，公然自稱帝國主義者！謂帝國主義者不能寬容「清國奴」，且唆使日本人學生遇見使用台語者揮拳勿赦！如此禽獸不如的野蠻狂言，終於激起學友們的義憤，起而責問。這流氓更厲聲答曰：「你們不服氣嗎，我更不服氣，非殺你們幾十萬不可！」現在已手持凶刃，準備屠殺！

噫！大難已臨頭！大家勿再旁觀，大家一致奮起，撲滅此一惡徒以救學生！

我們深知，此非一單純的教育界問題，亦非一偶發事件。乃帝國主義下、總督專制下，在壓迫民族與被壓迫民族之間所必然導致的問題。過去的經驗告訴我們，對被壓迫的學生運動，支配階級絕不採公平的處斷態度，而只以陷害的殘酷手段對待。因此我們全體被壓迫民眾，需要一致奮起，擁護學生利益，保障學生勝利，堅持終極目標。

台中師範的學友們為正義而奮不顧身，轟轟烈烈地起而宣戰了。誰沒有兄弟，誰沒有子女，我們不僅為本身利益計，亦為子孫將來計，為學生前途計，唯有急起、直追，喚起眾論，結合一切力量，剷除此一惡勢力！讓我們高呼下列口號：

打倒暴行教員小山！

反對奴隸教育！

要求學生自由權！

打倒總督專制政治！

被壓迫民眾解放萬歲！

據云當日總督府非常重視此一檄文，秘命台中州特高組深入調查執筆者，並囑留意其散布管道和民間反響。那是因為這一年（一九二八年）初在日本發生了三·一五共產黨大檢舉事件，餘波仍然激盪不已，而日共的所謂一九二七年的綱領中，不僅強調人民統一戰線，更有一條主張完全放棄殖民地，因而總督府對台灣的文協、農組等組織的爭議策略非常敏感。

校方改採息事之策

由於台中師範的小山暴言事件有擴大為台灣農、工、商、學及所有被壓迫民眾的反日解放運動的跡象；再加上小山舍監在上一個學期初把一名台籍的演習科三年生鄧德忠毆打成精神異常而回故鄉東勢角靜養的事件也暴露出來了；唯恐事件擴大的學校當局於是就由大岩校長出面，親自勸導小山舍監，要他公開向學生謝罪，以期息事。但小山不但不聽校長之勸，反而更加激烈地辱罵台灣人學生為「清國奴」……大岩校長看他鬧得太不成樣子了，於是命令他待在宿舍裡頭，不准再到學生宿舍鬧事。另外又派學生宿舍的舍監長，於十一月十五日晚上，代表校方向全體學生說：「御大典當天在朝會上的問題，校方決定以命令小山舍監向學生們承認失言，作為圓滿解決的方法。你們如果贊成的話就請鼓掌。」這時候，那些與事件無關的日本人學生馬上熱烈鼓掌，表示贊成；而有一部份怕事的台灣學生也抱著息事寧人的心理，以鼓掌表示諒解。但是，絕大部份的台灣人學生卻對校方的姑息手段，一點也不妥協。當天晚上，當他們提燈遊行回來之後便全體在舍監室前集合，

並推派代表質問舍監長：「究竟校方要用什麼方法解決？」舍監長的回答是用晚上講過的方法，也就是由小山承認失言來解決。學生們對這個辦法不滿意，於是就繼續待在那裡，不肯解散。不久，四、五名舍監、教官及教師聞訊趕來，向學生下達解散命令；但學生仍然不肯解散。舍監長只好問學生：「那麼，你們有什麼意見？」

「我們要求小山退職！」學生回答說。

最後，舍監長答應會好好考慮這個要求，學生們才一同解散。

東京留學生的聲援

這時候，遠在東京的台灣人留學生團體——東京台灣學術研究會，也隔海寄來聲援抗爭的檄文，鼓勵台中師範的學生為反對帝國主義的奴隸教育而堅決抗爭。這份題為〈告中師學生同胞們〉的檄文呼籲：

中師學生諸君：

流氓教員小山毆打諸位的事情，我們大家已經知道。

清國奴！是的！那傢伙確實對使用台灣話的兄弟們，叫罵著清國奴並毆打他們。那個奴才在朝會土又侮辱諸位，且唆使內地人學生，那是想要他們和你們打架的鬼計。

中師學生諸君！

勇敢的諸位，團結去包圍舍監室，使大言不慚的小山這個混蛋傢伙喪膽的經過，我們在東京的同胞們都知道了。這樣才是我們的兄弟啦，怎麼可以讓那種流氓侮辱呢？

我們大家只要團結起來，也可以打倒蕃狗奴的。

中師學生諸君！

不要受學校當局溫情主義的欺騙吧！諸位所信賴而委任解決的老師們，到底做了什麼事呢？不但小山沒有受到處罰，連諸位的最後一點言論自由也剝奪了呀！

中師學生諸君！

對暴言暴行、台灣話禁止使用、民族差別待遇，這些荒誕的壓迫保持沉默是一種恥辱噢！如果讓小山這傢伙平安無事過關，你們要如何向全台弟兄們交代呢？

不要怕！你們背後有我們全台灣被壓迫學生站著。對諸位的侮辱就是對我們全台灣被壓迫的學生的挑戰！我們在東京的全體同胞們絕不會袖手旁觀。我們已經向總督文教局和直接虐待你們的台中師範學校當局，斷然擲交抗議文了。

勇敢的弟兄們。

拜託你們，請把我們的恨一起清償吧。把流氓小山踢出去吧！

迫使學校當局謝罪吧！

絕對反對帝國主義的奴隸教育！

騷擾事件無力擴大

十一月二十日，台中師範當局終於在學生的壓力下，將小山舍監「踢出去」，調往台北第一師範學校。（一九二七年五月，台北師範分為台北第一師範學校，設小學師範部，只收日人學生；台北第二師範學校，設公學師範部，日、台籍學生均收。）這樣的調職，

事實上，是一種明顯的「榮陞」而非「貶降」，以致引起台灣人學生的不滿，他們一致認為：「身為教職者，辱罵台灣人為清國奴而竟能升宮，簡直太欺負我們台灣人了！」

然而，不滿歸不滿，台中師範的學生們終因小山的不在與自保心理的主客觀因素而無力擴大此次的騷擾事件。

總而言之，這次的台中師範事件，除了頭一天有幾十個學生似有欲對小山採取直接行動的跡象之外，在校方強令小山承認失言的應付措施下，大家都暫時隱忍下來。此外，學生們對校外組織的抗議活動都表現得很謹慎；因此，在整個事件過程中沒有學生公開受到退學處分。學生們的自我約束，可能還受到去歲（一九三七年）台中一中事件（詳見「台中第一中學學生罷課事件」部份）中有近四十名學生被勒令退學的悲劇性結局的心理影響。畢竟，當年的師範生大都家庭清寒，生計壓力很大，顧慮自然不得不比一般中學生要多一點。另外，就校方來說，小山的言行也的確過份狂妄，即使以殖民地教育的特殊範式來論，亦屬無益有害的挑撥，而且似乎具有右翼背景，校方唯恐事態複雜化不易收拾，因而也不便無條件支持。

第二節 台北商工學校學生的同盟罷課

一九二六年(大正十五年)十月七日，午後六點多鐘，台北商工學校的台灣人學生陳清池、陳慶仁、梁阿茂三人，一同到下奎府町大和湯浴室洗澡。當時，同在池中的還有一名日本人澀川久吉。沐浴中，有一名學生嫌水太熱，便拍手要冷水。澀川卻不滿地對他們說：「混蛋東西！這樣的水還嫌熱。」陳清池三人聽了這話也就不甘示弱地回他說：「混蛋東西是怎麼說？真是無禮的東西！」澀川立即還嘴說：「怎麼了！你們台灣人被我們看不起是當然。」雙方於是大起口角。

大和浴室的民族衝突

過了一會，陳清池洗完澡就先回宿舍，將剛剛發生的事說給其他同學聽。他的同學們都非常憤慨，立刻和陳清池到大和浴室，想要質問澀川。當澀川也洗完澡，要從更衣場離去的時候，六、七個學生便從門口一擁而入，大聲嚷著：「出來！出來……」澀川看他們來勢洶洶，一時懼怕，急忙將木造的屏風塞住脫衣場的入口，不讓學生進來。雙方於是僵持在那裡，學生既進不去，澀川也出不來。後來，澀川便大聲叫嚷，要外頭的行人報警；警官不久也趕來了。學生們於是將澀川侮辱他們的事申訴一番，巡警便招呼澀川出來，把他們一齊帶往北警察署。

到了北署，日本巡查使用訓諭的口吻，滔滔不絕地大聲斥罵站在前面的台灣人學生，

偶爾有學生打斷他而回話時，他更聲嘶力竭地嚴厲斥罵。可是，當北署行政主任接著訊問澀川的時候，卻以平常說話的態度應酬幾句就完畢了。

當天晚上，與陳清池等一同住在下奎府町三丁目新興商店樓上的商工學校學生王沃金、蔡定國、蔡懷澤、林孫濱、陳水淡等也被檢束，並且被留置在北署。

在這期間，台灣的幾家御用報紙、法院和總督府的要人都異口同聲地主張嚴辦。他們的理由是：「近來台灣人學生道德觀念頹廢，不該對長老者以如是的對待。」甚至有家報紙還說：「學生即使被日本人澀川唾於臉上也不得做如斯的舉動。」檢察當局的三好檢察官則在十月九日的《北報》公開發表他對這個事件的意見。他認為，這個事件「很適合以本島最近施行的《暴力行為取締法》辦理」。

北署方面因此一連慌忙了一個禮拜的偵訊工作。但該署所傳訊的證人卻以日本人居多，其中大和浴室主人的母親也被傳訊作證，她因為誠實地說沒有看見他們打架而被行政主任賞了幾個耳光，然後被留置了五、六個鐘頭。

十月十四日下午，北署才以「暴力行為取締法違反」及「傷害罪被疑者」的名目，將陳清池等八名學生押送台北地方法院檢察局。

同盟罷課的心理因素

陳清池等被捕後，警方懷疑他們和文化協會有關，於是向校方調取學生們的考核資料，怎知校方不但沒有謀求救援學生的措施，反而向警方提供不實的紀錄，誣指這些「惹事」的學生全部都是素行不良、學課低等者。校方的這種舉措，其用意實與替澀川驗傷的日人

相同，目的在於將這批膽敢反抗日本人的台灣學生入罪。因此，該校的台灣人學生雖然三番五次地要求學校當局替這八名被起訴的同學奔走，但學校當局都採取置之度外的冷淡態度；既不願意調查真相，更不願意向統治當局積極交涉。學生們對校方的態度都非常憤慨。

因為這樣，十月二十三日，當檢察當局決定將陳清池、蔡定國與王沃金三人起訴，另外三人起訴猶豫，兩人不起訴而讓他們假釋出來後，在校的台灣人學生立刻與他們八人聚會。陳清池等人告訴其他學生：「只因為我們是台灣人，即使有理也變成無理，官方並且故意把事態小題大做。」其他學生也讓他們知悉，校方在他們被捕後不但不出面援救，反而把不實的考核資料提供警方。針對校方這種落井下石的作法，陳清池等人感到憤慨不已。因此，大家一致決議，從二十五日起，發動全校三百餘名台灣人學生一齊同盟罷課；同時也向文化協會尋求支援。

第二天，也就是十月二十四日，他們便以全體台灣人學生之名義，擬了一份告學生父兄的罷課聲明書，並在文協的協助下印發。

同盟罷課聲明書

商工學生徒父兄諸位英鑒：茲因十月七日日本學校台灣人學生數名在市内湯屋偶與一內地人口角此無非為感情衝突互相爭論而已而警察當局竟小題大做拘引學生八名繼又送過檢察局留置計其間有十數日間甚至於現場檢證之時將穿制服學生細縛由刑務所遊行街上種種侮辱學生體面一方面學校當局置若罔聞昔日一內地人學生為竊盜嫌疑事件被拘引而學校當局奔走警署數十日間而對此次事件之態度則甚冷淡甚至父兄到校訪問亦全不與之接洽且警察當局有謂此若內地人間或台灣人間之事則全無問題因是內台

人間之事故視為重大云云吾人綜合以上諸情況可以明白是警察及學校當局偏於民族感情以至於此是故本校台灣人學生三百名全體為對被虧學生同情起見舉行罷學凡我父兄諸位體貼學生等之苦衷而加以聲援而對於歸省學生祈勿加以干涉使其全體一致如有外異之時父兄諸位之壓迫恐喝亦望善為排除勿被其迷亂則學生幸甚台灣幸甚

大正十五年十月二十四日

學生一同拜

同盟罷課的初步勝利

二十四日當天恰好是星期日，所有在外住宿的學生於是就各自整束行裝，三五成群地結隊返鄉。

第二天（二十五日），台灣人學生果然沒有一個人來上學。整所學校只剩下二百來名日本人學生照常上課。因為日本北白川宮大妃即將在二十七日到台灣，所以學校當局及監督官廳的台北州都大為恐慌，於是特地邀集台北商工學校同窗會的幹事們研究如何善後，並懇求這些校友們居中斡旋。

二十六日，台北商工學校的主事者憂心忡忡地對《台灣民報》的記者表達了他對這次學生罷課的意見。他說：

「自學生被拘後，我即託人與澀川久吉妥協，但北署謂若與澀川妥協，學生的罪雖可以多少減輕，然決不能夠以無罪了事，所以兩方的交涉也就不能圓滑，遂成破裂

了。學生痛責我沒有誠心誠意為被拘學生奔走，這老實冤枉呵！祇是我對於該事件沒有嚴密的去辦理，沒有實地去調查事實或對法院的實地檢證，縛著穿著制服的學生遊街示眾的事，沒有應在校學生之請，向當局抗議等事，怕要被學生認為怠慢也未可知。但這回學生能奮起同盟罷課，若由他們的動機說來，並不能夠認為輕舉，所以對罷課的學生決定稍不加嚴責，至於對無罪的學生也打算不處分……」

顯然，同盟罷課的行動已經初步取得勝利了。其後，台北商工學校代理校長中瀨及畢業校友也都極力奔走，出面勸誘學生早日上課。這樣，到了二十九日，事態的發展才有一點轉圜；同盟罷課學生向學校當局提出回校上課的三個條件：

- 一、罷免學校主事。
- 二、學校須釋明這次事件的真相。
- 三、不得處分復校的學生。

由於學生方面堅決主張：如果沒有確實擔保這三個條件，誓不復校。最後，只好由畢業校友出來作擔保人，談判才圓滿結束。學生們決定從三十日起照常上課。檢察局方面也透露，對陳清池等三人將不以《暴力取締法》而改以「家宅侵入」及「傷害罪被疑者」起訴。

開庭公判的論辯實況

十一月十日早上，台北地方法院以「家宅侵入」及「傷害罪」為陳清池等三人開庭公判。由於這是一個日台人衝突的案件，並曾惹起三百餘名台灣人學生同盟罷課的抗爭，社會各界都非常注意，當天的旁聽席因此座無虛席。

庭訊首先由花城裁判長問陳清池：「你為什麼打澀川久吉？並且沒有大和浴室主人的同意就聚集群眾，擅入堂裡打人呢？」

穿著黑色的學生制服的陳清池答說：「那天，澀川辱罵我『御前馬鹿』，我受到這種侮辱當然非常氣忿；洗完澡，回到宿舍，我就把這種情形講給其他同學聽，同學們聽了也都抱不平，剛好到華南館吃晚餐的時候到了，所以大夥就一同去澡堂，想要質問澀川怎麼可以無緣無故破口辱罵人家！大家並且決定，倘若他不肯謝罪，就要他和我一同到派出所，讓警官評判，到底誰是誰非？因為大和浴室是我們常去的地方，從來也沒有說要有主人的同意才能去洗澡，所以我們進入浴室質問澀川時也沒有想到事先要徵求主人的同意。但是，當主人勸我們出去時，我們都順從他的話，一齊離去。我們的去意不過是要質問澀川而已！至於誰打他？我那裡曉得。我祇能憑良心說話，說我們決沒有打他。當我們退出門外時，有許多觀眾在裡面譁鬧，我正要進去時，警官也已經來了，我於是就再跑出來，這時，澀川也跟著出來了……」

當陳清池敘述完畢時，花城裁判長卻以袒護澀川的口吻說：「按日本人的習慣，對人家稱『御前』，並不是什麼壞話，也不是罵人；況且澀川是勞動者，說話總會粗野一點，你們學生只以『御前』一句就要打人，未免太不穩當了！」

接著是王沃金與蔡定國的事實審理。他們兩人的回答大體與陳清池所說的大同小異，除了極力否認毆打澀川之外，並且強調不知道澀川究竟是被誰打的。當時他們只看到有一個穿白綢短褂的觀眾比較接近澀川，至於是不是那個人打的？他們實在不敢妄加論斷。

審訊完畢後，花城裁判長問陳清池等被告：「要不要申請證人？」陳清池等立刻申請

傳訊兩名證人。但松村檢察官卻說：「申請證人的必要棄切。」接著他就發表論告說：「本官對被告三人非常的同情，因他們是將來有為的學生，故諸事都以很鄭重的態度去處理，斷沒偏要陷害於他們哪！被告人在法院皆否認毆打澀川，欲逃避其責任，真是遺憾的事！但侵入住宅、共謀暴行是個很明白的事實，現時卻毫無掩飾的餘地了。澀川是個筋肉勞動者，說話怕要粗野一點也未可知，但被告人還有許多的方法可去追究，不必出於如斯的舉動。澀川雖有些過失也不該以手足交加去毆他去蹴他。澀川的左胸部的打撲傷很重，大概是陳清池毆打的罷！動機尤其是含著民族的反感，其情誠實難赦！在學校當局對於本事件老不從早講究和解或處治之策，一味須待法律把它解決了以後，才要想對付的方策，是種很卑劣的態度，猶給被告人許多不利之處。倘若學校當局趁早採取和解或處治的方針，則事件也不至於今日的田地，或者可得平穩息事。但是學生既違犯法律，也不能夠因他們是學生而放輕，去襲從來的惡慣例。故對陳清池求刑懲役四個月，王沃金、蔡定國各懲役四個月一個年執行猶豫。」

最後，花城裁判長宣布將於十一月十七日判決，然後閉庭。

黯然慘敗的同盟罷課

十一月十七日，陳清池等三人在大和浴室與澀川久吉衝突一案，由花城裁判長在台北地方法院宣判：

陳清池懲役四個月。

王沃金、蔡定國懲役四個月，緩刑一年。

後來，台北商工學校的日本人學生又硬要學校當局懲戒罷課的台灣人學生，否則將以罷課威脅。學校當局立刻就忘了先前與台灣人學生所訂的復校條件，對復校的學生一律加以懲戒，並且將陳清池三人退學。

台北商工學校台灣人學生的同盟罷課事件，就在日本帝國主義的暴力壓迫下，黯然慘敗！

第三節 台中第一中學學生罷學事件

一、台中第一中學的沿革

日據時代台灣男子的中學教育，可以說始於一八九七年（明治三十年）四月成立的國語學校語學部的國語（日語）科。但是，在修業年限上，起初只有三年，後來延為四年；相對於日本人所進的尋常中學校則少了一年。

台中公立中學校

一九一四年，林獻堂為了爭取台灣子弟教育機會之均等，於是與從兄林烈堂暨中部士紳聯名，請求為台灣青年單獨設置一所中學校，以示公允。在台灣的日本當局勉強接受了台灣士紳的要求。於是，台中的公立中學校就在林獻堂等人發起捐款下，於一九一五年（大正四年）正式成立。

儘管台中中學校是專為台灣子弟而設的一所中學校，但是，相對於日本入子弟所進的中學校，它在內容上仍是另外一套。譬如：一、修業年限僅四年，較總督府中學校少一年；二、入學資格的規定是：十三歲以上，公學校修滿四年或同等學力者；較諸總督府中學校則嫌寬濫；三、日語及實業科目的時數過多。……

台中公立高等普通學校

到了一九一九年（大正八年）台灣教育令公佈時，有關台灣人的中學教育也同時作了以下幾種改變：一、為了與日本人的中學校有所區別，台中的公立中學校改稱為「高等普通學校」；二、入學資格提高為六年制公學校卒業或同年以上學力者；三、得設一年制的師範科，以培養公學校的師資。然而，修業年限的規定與課程的安排，仍然不變。

台中州立台中第一中學校

一九二二年（大正十一年），台灣總督田健治郎頒布新台灣教育令，規定中等以上學校實行「日台共學」制，大致撤除日台人之間在教育形式上的差別。台中的公立高等普通學校於是改稱為「台中州立台中第一中學校」。同時，在形式上，修業年限與一切內容也與日本人所進的學校沒什麼差別。

二、台中一中學生罷學事件

在台灣的日本當局非常注意對台籍中學校學生的生活管理與同化。它規定全部學生必須住校，並由學校提供純日本式的飯菜——早餐為味噌汁（米醬湯），中午為燒魚，晚餐則為醬油煮魚；同時，它也規定台灣學生穿著和服，學習日本的生活禮儀。台灣學生對這樣的生活方式不能習慣，每天只好望飯興嘆，想家懷鄉。因為這樣，有一些學生甚至以「父

病母危」的不實電報，請假返鄉。

一九三七年（昭和二年）的台中一中學生罷學事件即起因於台灣人學生要罷免一個日人炊事員中村，然而學校當局不但拒絕學生的要求，反而命令五年生退住宿舍；因此惹起罷學的風潮。

罷免日人炊事員中村

根據〈台灣民報〉記者的調查，台中一中學生宿舍的炊事長中村，是在三年前到學生宿舍做工的。當時，中村在外頭有個妻子，學校舍監同情她很窮，所以就與學生商量，結果，以下列三條件讓中村的妻子也跟著住進學生宿舍：

- 一、以無賃作工換三餐飯吃。
- 二、但要吃學生所吃的殘飯。
- 三、若與學生意見不合時，隨時可得趕出。

然而，中村的妻子住進宿舍以後卻完全違反原先的三條約束。首先，她不但沒有「以無賃做工換三餐飯吃」，反而每月要從學生繳交的費用中支領六圓工資；第二，她不但不要吃學生的剩飯，而且每天都要另外煮好飯才吃；第三，她還帶四、五個兒女住進宿舍，不但不衛生，而且很吵鬧。因此，中村的妻子時常和學生發生衝突。

一九二七年四月二十九日。中村的妻子明明知道廚房裡的片栗粉（太白粉）內有老鼠屎，但她卻故意不告知不知情的台灣人炊事員，等到台灣人炊事員把它混入菜內後，她才

告訴學生們這道菜不可以吃。學生們認為她不事先告訴台灣人炊事員，卻在事後才通知學生，顯然存心不良，再加上她一直以來都違反三條件的約束，所以學生們就要以這個理由把她趕出去，同時罷免中村炊事長。但是，台灣學生的這個要求並沒有被當晚的舍監秀島接受。後來，學生們轉而向舍監頭鹿股提出這個要求。不料，鹿股不但拒絕學生的請求，並且警告學生：「你們若要鬧事，只管去鬧，與我卻無相干。」

投訴無效反被申斥

住校的學生們因為投訴無效，反被申斥，全體都非常憤慨。五月四日，那些當室長、宿舍長的五年生們，針對舍監頭不負責任的暴言，連署提出辭呈，以示抗議。怎知，該校校長下村不但沒有一言半句的慰留，而且連他們辭職的理由也不過問，立刻就簽字許可。原來，校長認為這些五年生總是帶頭在宿舍內鬧事，老早就想命令五年生退舍了，現在他們既然自己提出辭呈，他當然就立刻簽字了；他同時決定另外以四年生代理室長、宿舍長等職務。因此，他又召集全體住校生，傳達以下三點訓示：

- 一、自本日起停止學寮（學生宿舍）的自治。
- 二、不問任何理由，停止學生的一切發言權。
- 三、本日以後，寮生要絕對服從舍監動作。

五月六日，下村再度召集台灣人學生訓話，責備學生們的舉動太不近人情。他說：「在我的任內，絕對不會把中村炊事長辭掉，你們也休想把中村的妻子趕出去。你們最好謹慎注意一點，倘若不服的話，你們只管自由地鬧，總之我手中擁有處罰的寶劍，決心要與你

們徹底決勝負。」中村以這樣高壓的言辭來挑撥學生，正如同火上加油一般，於是乎，學生們的憤慨之心也被激到極點了。

五月七日，下村更搬到學生宿舍去住，親自監督學生們的行動，以致更加惹起學生對學校當局與舍監的反感。

宿舍燃爆勒令退舍

五月八日晚上，住校的學生們調皮地在宿舍裡頭燃放爆竹，展開抗議行動。日人舍監秀島當場被嚇得躲到床下。

五月九日，下村校長立刻把學生召集起來訓話，並對全體住校生施行隔離盤問：「為什麼燃放爆竹？」「誰是煽動者？」同時，校方決定對平日被認為與文化協會有關係的五十多名五年生勒令退出學生宿舍，並要學生寫悔過書。下村恐嚇學生：「如果不服學校的處分而再喧鬧，就要不客氣地用警察權對付。」

五月十一日，校方通過警察力，用文書召喚散居各地的「鬧事」的學生家長們，到學校開緊急會議。午後三時，下村校長向這些學生家長宣告：「你們的子弟在學校作出非法行為，所以限你們在五點以前各自帶回自己的子弟。」以學生家長身分出席的文化協會幹部張信義、農民組合幹部趙港和廣東革命青年團員張深切等則一致要求校方，明示對學生的處分方式。但校方的態度卻是既不容家長發言，也不採聽家長的意見。張信義等因而與校方發生激烈的爭辯。

這時候，有一部份家長就起來打圓場，他們表示：希望將學生留在宿舍裡，不必領回；

而校方可以按規處理，使學生可在宿舍裡頭謹慎行事，以後如果再有不法行動，家長們要全部負責。此外，他們也說家長們願意與學生一同向校方謝罪。但是，學校當局不肯接受這樣的建議，還是以強硬的态度要求這些五年生，在下午六點半前全部退出宿舍。學生家長們於是又提出種種建議，但校方依舊是一點也不接受。最後，全體學生家長們就在對學校當局不誠意的態度的憤慨下離開會場。所有住校生也群集會場外，大聲抗議。一時之間，氣氛非常緊張。校方因而不敢立刻執行退舍命令。

當天晚上，台中一中附近忽然變為恐怖地帶。在校內，有蒙面的教官隊隱躲在樹蔭處警戒；在校外更有警察和憲兵的重重包圍；整個態勢彷如包抄土匪窟一般。

校友斡旋反被懷疑

五月十二日，住在台中附近的一中畢業生，有感於學校與學生間鬧出的風潮有愈演愈烈之勢，因而特派代表到學校面會下村村長，一方面對學校當局表示遺憾，另一方面也希望校長對五年生的退出宿舍寬限三天，等到他們這些畢業的校友替他們尋租好房子後再命他們退舍。但是下村並沒有答應。下村不但無視於畢業校友的誠意，反而懷疑這些校友是要回來煽動在校生罷學的；因此又禁止住在宿舍的學生與畢業校友見面。另外，每次畢業校友的代表們到學校拜訪時，學校裡的教員對他們的態度都非常無禮不雅；彷彿他們都是仇敵似的。這樣，畢業校友們也對學校當局憤慨不滿了，他們終於不再坐視事態的發展，決定介入這次的學生退舍事件。台中附近的幹事張汝燥、張煥奎、張奎三、魏坎、林朝杰等人於是發信通知全島的畢業校友，於十六日在台中公會堂開大會，謀求善後的辦法。

夜半退舍同盟罷學

五月十二日晚上，下村校長再一次命令五年生，限定他們最遲在明天早上（十三日）五點以前一定要退舍；如果不自己退舍就要藉警察權強制執行。下村並且強調，如果這樣還不能讓他們搬出宿舍的話，他就要行使校長的職權，把他們統統退學；而他自己也有覺悟，願意辭職不幹來陪學生玩。因為下村的態度不僅不近人情，甚至是非常暴亂了，那些五年生被逼到這個地步也不得不有退舍的覺悟了。

然而，其他三年級、四年級的住宿生卻認為，這回的爭議並不僅僅是五年生單獨的責任，而是全體住宿生的事；但學校當局卻偏要把責任推給五年生，由此可見學校當局的存心不良。因此，他們因為不忍五年生單獨受罰而誓願一同行動，以期喚醒學校當局的反省。五月十三日凌晨兩點左右，一百七十餘名（包括三年級、四年級、五年級）住校生於是在暗夜裡忍淚吞聲地一齊退出宿舍，並且展開同盟罷學的鬥爭。學校方面則毫不退讓地以「無期停學」來處分這些罷學的學生。

當天早晨，住在宿舍的二年生對這些學長們的行動與所受的處罰也起了同情心。他們並且為此召開特別會議，討論應對之策。學校當局深恐這些二年生也加入罷學的行列，因此宿舍內的警戒就更加嚴密了；幾乎每個學生隨時都被監視著，以防止他們的串連。然而，到了十四日半夜十二點左右，住在宿舍的二年生也全部退出宿舍，加入同盟罷學的鬥爭隊伍。

其後，這些住校生並一同對外發表了一份題為〈台中第一中學校寮生之宣言〉的罷學聲明：

吾等二百六十餘名學生，受過曠世之奇辱，此恨未報，永不能相離。夫殮膳混以鼠糞，猶強挽留廚夫者何哉！及見全寮生之公憤，乃率兵隊以威嚇。嗚呼！其狂態若是，我敬愛之良師，對於教育事業前途，將作如何感想乎？

如召我父兄以警官，其暴戾非道，可謂極矣！

魂血既鬱勃，吾等終不能沉默，惟有群起而彈劾之！

市民有志善後奔走

台中一中二百六十餘名住宿生的同盟罷學，立即引起社會各界的重視。當天（十四日）午後，台中市的有志者：長岡、吳泗滄、鄭松筠、陳朔方、盧安等十幾人，作為市民有志的代表前往拜訪學校當局，陳述他們希望儘速圓滿解決這次事件的意思。但是學校當局卻回答他們說：「為了保持學校的威嚴，這件事絕對不能輕易就解決。」對此，市民有志的代表們都認為，學校與學生的關係又不是警察與人民，有什麼威嚴需要保持呢？因此，他們對學校的誠意也就不能不懷疑了。

正因為學校當局的態度過於缺乏誠意，所以連通學生也對那些退舍生起了同情。他們於十五日的課後開會決定：

- 一、無條件使寮生歸舍。
- 二、決不可出犧牲者。
- 三、要求學校承認通學生會。

當天晚上十點左右，他們向學校提出這三點決議，並要求校方在十六日中午以前確實回答，不然就要同情罷學。然而，十六日當天，學校當局仍然沒有回答通學生。絕大多數的通學生於是展開同盟罷學的鬥爭。當天，只有三十名通學生出席上課而已！

校友大會聲援學生

十六日午後三點，由台中地區的校友召集的卒業生大會在公會堂召開。出席者五、六十名，電報四、五十通。會中決定以下三點決議文：

- 一、以這回母校學生的同盟罷校為遺憾。
- 二、問使事件惡化的學校當局的責任，期其引責。
- 三、認生徒全體的迅速的復校為正當。

同時，推選張聘三、魏崧、李茂炎等十一人為執行委員，將這份決議文面呈內務部長，但被拒絕受理。

當天，學生「父兄會」接著移至佛教會場內舉行，由張信義任議長，再度達成如前的決議。另外，文化協會也向東京的「台灣青年會」提出緊急呼籲；東京台灣青年會於是舉行臨時會議，研究聲援的對策，並發出檄文激勵學生。事態的發展至此已經更加複雜了。

壓迫懷柔雙管齊下

學校當局面對十六日起幾乎是完全罷學的事態，也開始感到憂愁和恐慌了。然而，就

在窮急之際，學校當局再度重施舊計，一方面委託各地的警察到學生家裡，以種種手段壓迫家長，命他們帶學生返校；另一方面又託各地公學校的校長，以種種懷柔的言詞勸誘家長命令自己的孩子回去上學。有一部份學生家長在這種壓迫和懷柔之下，似乎也打算逼迫自己的子弟回學校上課；為此，學生方面大為恐慌，立刻派代表到各地向那些動搖的學生家長們遊說，一連三、四日廢寢忘食地活動。

學校當局與警察壓迫兼懷柔的行動一直繼續到二十日，並且在一定程度內奏效。五月二十二日，有二、三位學生家長遍訪台中市內的有志如林烈堂、林耀亭等，然後在林耀亭家裡集會，討論善後之策。最後，全體與會者決定採納盧安、賴墩二位學生家長所提的意見：為了讓全部的學生許可復校，應當對學校當局表示，無妨有最低限度的犧牲者。會後，同時委託二、三位畢業校友找學生商量，徵求學生的意見。

第二天（二十三日），當這幾名校友和學生商量的時候，學生卻回答說：「豈有這樣的愚策？說什麼要請求學校復學即使有幾名犧牲者也無妨！我們決不願復歸那種非正義的學校。總而言之，無論事態發展到什麼田地，我們都願意共生死來努力貫徹初志。」因為學生們這麼爽快地拒絕，所以部份家長們這個妥協性的提議也就自然破裂。

盧安的提議被學生拒絕之後，他又立刻邀集所謂「穩健派」的家長三十餘人，聚集在他家開秘密會議。在會議中，盧安再次提議說：「為了儘可能讓學生們早一點復校而犧牲幾人是無可奈何之事。現在，既然學生不接受這種提議，不如由我們自己選擇幾名主謀者來犧牲，向學校提出來，作為復校的條件；而對這些犧牲者，因為他們是全體學生的恩人，所以我們要募集相當的資金，贈給他們，作為他們到島外留學的費用。」

所有與會者都很贊成盧安的提議，於是就開始進行。然而一般市民和學生卻認為，所謂「穩健派」的父兄團體都與這回的事件沒有什麼關係。如盧安的兒子不過是個新生而已！與罷學一點關係也沒有。其他人也都一樣；甚至有人根本就不是學生家長。由此可見，所謂「穩健派」的父兄團體是很有問題的組織。

第一回的退學處分

五月二十五日，學校當局採納盧安的建議，並且與「父兄會」中非文化協會會員者個別談和，以分化策略破壞學生的團結。當天午後三點，內務部長、教育課長等與盧安等所謂「穩健派」的家長代表在台中廳內協議的結果，決定處分以下十名「主謀者」退學。

第五學年 鄭連續 王火炎 林伯澧 陳水波 林煥然 吳萬來 鍾添福

第四學年 吳右第 鄧錫明

第三學年 陳為政

另外，學校當局還通過御用媒體宣布：其餘的學生只要由家長陪同，向學校謝罪，並且被學校當局認為有悔改之意者，就可以復學。因此，校方仍然繼續通過警察與公學校校長的威脅勸誘，要家長們帶學生回學校謝罪、復學。

留京校友隔海聲援

五月二十六日午後六點，台中一中出身的留學東京的學生一百多人，為了對這次台中

一中的罷學風潮謀求善後之策並表示態度，而在東京明治神宮外苑日本青年會館召開台中第一中學校出身者大會。會中除了報告罷學經過之外，全體與會者都以悲壯的態度熱烈討論，提出種種對策。大會在晚上十點宣告結束前通過了決議文，並於當晚電告台中市民大會和台中一中學校當局。該決議文聲明：

這回惹起母校的罷學事件，實為遺憾。但認學校當局對此所執的處置為不當，並要求左記事項：

一、使受退學處分和停學中的生徒全部無條件復校。

二、學校當局的責任者宜要引責。

三、須認生徒的自治並應其正當的要求。

另外，大會也公選出黃清棟、陳呈雲、陳端明、蔡拱南、鄭昌言、林旭屏、沈榮等八名執行委員；並由鄭昌言、黃清棟、陳端明三人為代表，於六月一日往訪台灣總督府東京出張所，陳述這次台中一中罷學的真相，然後呈交決議文給上山總督和後藤長官。

罷學學生兩派分裂

在警察與公學校校長壓迫與勸誘的雙重逼迫下，有些比較怯懦的學生家長終於強迫自己的子弟復校而破壞了學生的團結。

五月二十七日早上，首先是家住員林的罷學學生林大炯，在家長的陪同下，到學校謝罪。接著，有些畏事者就陸陸續續的復校了。到了五月二十九日時，總計已有三、四十名

學生復校。針對這種逆流，那些無畏於學校的退學處分而繼續罷學的學生就召開中央委員會，以謀求對策。當天，出席會議的委員與列席的學生共約三十名；並且就對策主張的不同而分裂為二派。

一派是主張復校的陳淑琛與何集雲兩名委員。他們主張：六月一日午後三點在台中公園集合，然後以團體的形式回去學校；但決不向學校方面謝罪。他們認為，先回學校，等待適當的時機，再起來鬥爭。

另外一派則是居多數的反對復校者。他們認為，如果不向學校當局謝罪的話，絕對不可能回去學校上課。因此，他們主張：事至於今，不必通知其他同學以團體行動，只要單純地向他們報告事件發展的經過，然後讓各人自由行動。

由於兩派的意見分歧而沒有達成一致的決議，但據說後來兩派的主張者都私自以委員會的名義發出決議文，通知各地的罷學學生。

六月一日，午後三點，約有五、六十名學生聚集在台中公園，準備以團體的形式復校。但提議兼發信通知的田中籍的復校主倡者陳淑琛卻不見人影。原來，他已經違背約定，於早上十點左右，在家長陪同下，包乘汽車向學校當局叩謝復校了。這五、六十名學生等到五點左右還不見陳淑琛的人影，於是就按照約定，整隊向學校前行；但他們到了校門口時卻被把守校門的教師喝令擋住，不讓他們進入校園；最後只好各自解散。相對地，其他向學校當局鄭重謝罪的學生都被准許返校；員林地區的部份家長們甚至是高舉白旗、包車返校的。

復校學生不准入舍

六月一日部份學生復校的當天，為了一名叫吳馬牛的三年生的復校問題而引發了一場級主任與舍監打架的掃帚。三年生吳馬牛是六月一日當天集體返校者之一，因為獲得教頭小柳的許可而進入校園；可他走到學生宿舍時卻被當天的舍監茅野拒絕。不論吳馬牛怎麼解釋與質問，茅野的答覆都只是「不許」兩個字。吳馬牛不得已而請級主任堀內來交涉，但茅野仍然頑固不許。這樣，連堀內也被茅野的無理搞火了，兩人先是吵了起來，然後又在許多教員的旁觀下打了起來。最後，堀內級主任在無法壓制舍監的權勢下只好悻悻離去。由此可見，台中一中舍監的橫暴。而吳馬牛也因為引發舍監與級主任間的衝突，在沒有什麼根據之下被命令一個禮拜的「家庭謹慎」，並且在六月十四日的第三波退學處分中被退學。

東京文運革新會的檄文

六月三日，以台北師範第二次學潮（一九二四年）被退學者為主在東京組成的「台灣文運革新會」，針對台中一中的罷學事件召開大會，同時擬了一份聲援書，題為〈關於台中一中總罷校事件告全台灣學生大眾書〉：

各位！日本帝國主義已經和世界資本主義的強烈侵略政策合流，且已達成其國家資本主義托拉斯的最高型態，它在殖民地台灣的教育，究竟要帶給我們同胞什麼呢？是要帶領我們去探求真理嗎？非也！自從台灣被迫隸屬於日本帝國主義以來，以充實人格為主旨的教育早已失去了蹤影，現時的教育只不過為了養成甘於隸屬甘於屈從的奴隸劣根性，這不就是台灣教育的全盤目的嗎？我們所要求的是長肉增血的滋養物，

而他們給我們的，卻是石頭和糞尿！

全體被壓迫的台灣學生大眾諸君！此次台中一中的同盟罷課，正是身為支配階級代理人的學校當局，對台灣學生大眾所肆行的絕對專制，遭受到台灣學生大眾的憤怒反擊！身為支配階級最佳看門狗的一中校長，破壞先前所做諾言，翻臉不承認學生有要求解雇炊事長的權利，由支配者的民族優越感出發，庇護一日人炊事長利益，竟然命令全體台灣人學生退出學寮。更運用警察，對停學中的學生施加威嚇利誘，極盡壓迫愚弄能事。

全體被壓迫的台灣學生諸君！擊在一中同學們身上的鐵槌，意味著什麼？那一無情鐵槌，明天也將擊在我們大家的身上！站起來！站起來！大家來支持全體被壓迫台灣學生大眾解放戰的里程碑的一中全體學生的徹底鬥爭！請大家奮起！打破封建絕對專制政治的爪牙的奴隸教育制度！吾人揭揚左列口號，以之向支配階級最佳看門狗進行徹底鬥爭！

——學校當局應採納一中全體學生的正當要求！

——讓被退學學生無條件復校！

——廢止奴隸性教育制度！

——爭取校內自由權！

——抵制內地延長主義的教育制度！

讓我們聚在全體一中解放鬥爭隊的旗幟底下，死守全一中生的同盟罷課！

騷鬧與罷課的再起

儘管原先參與罷學的學生已在六月一日前陸續復校了，但學生之間的氣氛仍然非常緊張，一有動靜，騷鬧便可能再起。吳馬牛事件更讓學生再一次對校方的處理方式大為不滿。可在教師當中，大多數人都認為這次復校意謂著學生的鬥爭失敗，於是對待學生的態度就更加趾高氣昂了，大部份的老師不但沒有因為這個事件而有所反省，反而以更加傲慢的態度壓迫學生。這樣，學生的抗爭性便一而再，再而三地被激起。另一方面，在宿舍內，舍監的態度也比從前更加暴虐。所以，學生們的憤慨心很快又達到忍耐的頂點了。

六月六日晚上，學生們在促使教師們反省無功之下，當著教師們嚴密監督的自修時間，再次起來喧鬧。

六月七日，晚點名後，學生們又到舍監室騷鬧。

六月八日，四年生針對平時最輕視台灣人學生，慣說台灣人是非的代數老師大庭的課，展開罷課的鬥爭。當天午後，學校校長為了偵查主謀者而召集四年生，訊問罷課的原因，並讓他們一一陳述意見。晚上，學生們繼續在宿舍騷鬧。

六月九日，二年生也針對大庭的代數課發動罷課。另外，三年生在上英語課時也起來響應罷課。當天晚上，宿舍裡頭的騷動最為激烈。學校方面於是隨便抓出五名學生，指控他們是首謀者，命令他們搬出宿舍，改為通學；企圖以此鎮壓將起的學潮。

六月十日，罷課與騷鬧仍然繼續著。正常的授課已經完全停擺。舍監每天都只辦公到下午五點而已。入夜後，舍監便不在宿舍裡頭，整棟宿舍處於無人監督的狀態。當天晚上，

學生們發現平日惡言惡行的舍監已經將舍監室閉鎖，將事務移到學校辦公室辦理。這樣，宿舍裡頭完全變成無政府狀態了。

第二、第三回的退學

事實上，學校方面之所以放任學生的騷鬧與罷課，主要還是為了從中追查事件的主謀者。果然，到了六月十三日，學校當局揮出了殘酷的鐵拳，又公布了二十一名退學者的名單：

第五學年 洪 才 張 火 胡萬立 趙有才

第四學年 吳 祈 黃萬生 陳金標 葉敏池 呂江漢 何集雲 林樹枝

第三學年 洪 樟 張土城 林滋培 黃三木 吳慶昌 林三桂

第二學年 陳老石 唐嘉材 黃慶賢 王廷珪

然而，學生們並不因此而畏縮。第二天（十四日），第三學年生仍然繼續罷課。當天午後，針對這些罷課的三年生，校方又再宣布第三批被處退學的學生名單：

第三學年 許媽聯 周貽壽 張文澍 葉有坤 吳馬牛

強迫停學者自己退學

除了上述三十六名被處退學之外，學生當中還有許多是被命「無期停學」的人，校方因為所發的退學命令太多了，所以就強迫這些被命「無期停學」的人自己退學。

六月二十一日，一名被命「無期停學」的五年生王克義率先向學校當局聲請自動退學。

但是，因為他在聲請書上表明：他是因為認定學校的處置不當，對被退學者同情，再加上學生的要求不被採納，所以才憤而自願退學。因為這樣，學校方面竟始終不肯接受他「自由退學」的聲請，最後改以學校的處分命令退學。林呼爐等被處「無期停學」的五年生，不久以後也都受到同樣的退學處分。為此，有十幾名學生因為對學校這種過於橫暴殘酷的處分感到憤慨而「自由退學」，以示抗議。

這樣，台中一中的台灣學生突然就減少了六十多人。這些被退學的學生及「自由退學」的學生，日後也都全部志願前往日本內地或中國大陸留學，成為台灣社會運動的重要份子。而學校裡頭的其他學生，終於被校方的嚴厲處置所懾，一場學潮終於結束。

放尿混砂不能作堆

台中一中罷學事件結束後，《台灣民報》的記者特別約了十幾名一中學生，其中有退學生，也有在學生，請他們就罷學的經過發表感想。據該報記者的綜合整理，這些學生們的感想主要是針對某些學生與父兄的背叛，作了沉痛的反省與批判！他們說：

對本事件的學校的態度的無情與殘忍是不必再說，但是這樣的結果雖是覺悟在前，若是沒有出了父兄與學生間的叛骨者，也不致有這樣的多數的犧牲者，可以證明台灣人凡事是不顧大局而自謀個人的利益而已。

父兄中不能諒解學生的行動的雖有，但是就中莫如盧安，積極的出來破壞學生的同盟，若無盧安想也沒有所謂穩健派的父兄，而學校也不敢出那樣的強暴的態度。其他如草墩（草屯）洪清紅、員林張清華、彰化荊桐庄保正張鳥皮等，也是破壞我們的

團結最為出力的，是這回罷學解決的功勞者，大家所最為紀念而要表彰的。

其次學生間最可恨的就是四年生的陳某（陳淑琛）和五年生的吳某。

陳某是自初自己表示熱誠加入中央實行委員，誰知他卻是叛骨兒，六月一日的復校完全是出自他的意見，但是一至當日卻自己於午前中就破約單獨向學校去叩頭復校，假裝沒有關係而在寢室安歇高臥，這就足令學生憤慨。那堪六月八日的罷課也是出自他的意見，怎麼大家罷課了，他更自己與數名的內地人學生出席，而竟將罷課的顛末報告了，至於罷課後再到大庭教師的家裡，因為乘人力車與車夫較價錢被學生發現了，所以不得已他卻也自己告白了。六月十三日被退學的二十一名似乎是他去報告的，因為就中有沒有關係而與他有感情不睦的在內。

吳某是五年生，於五月二十七日的第二次的委員會他也擔任筆記，極力主張第二次戰，又於二十七日自己志願要到西螺遊說，向委員會請求了二圓五十錢的旅費，但是不特將旅費胡塗了，甚至自五月二十八日先破約束單獨去復校了，復校後的態度非常傲慢，譏笑被退學者為愚笨，自己說願為臭人。而陳與吳兩人以後非常懼怕不安，陳運動轉學不能，現時一步都不敢出校門，而吳雖通學也恐懼之極，身常帶一短刀，如此想及其叛骨雖可恨，然而及看其驚慌卻也足堪可憐。

總而言之，我們作這回的犧牲，不久要出島外留學，為我們將來的自由學究，倒是絕好的機會，但是一件令人慨嘆不已的就是有這叛骨，果然是台灣人放尿混砂不能作堆嗎？

綜觀以上五次台灣本島的學潮，雖然具體的起因和經過、結果都各有不同，然而，無可置疑地，殖民地被壓迫民族的民族意識在第一次世界大戰後的思潮激盪，可以說是其共同的主要性格。也就是說，日本帝國主義總督政治支配下的台灣學潮，其實也是殖民地台灣反殖民主義民族鬥爭運動中極為突出的一條戰線。儘管這些學潮每次都遭到當局的嚴厲處分，但學生們高漲中的民族意識和運動意欲卻未曾被完全撲滅。此外，每一次事件發生後也都能獲得文化協會以及海外留學生團體的聲援支持，使其影響和作用範圍超出狹窄的校園，成為當時社會反抗運動中極富教育意義的一環。這一期間的學運份子並且有不少人在日後脫穎而出為台灣社會運動的鬥士。

一九三一年（昭和六年）以降，日本統治階級急速法西斯化。在軍部勢力膨脹中，自從一九二八年成立以來即在島內「控制了台灣農民組合、台灣各種工會、台灣文化協會、反帝同盟、赤色救援會，甚至影響到台灣民眾黨，展開了各種各樣的經濟、文化或政治鬥爭，造成了一九二八年至一九三一年台灣民族革命運動的高潮時期」的台灣共產黨，遭到檢舉破壞。從此以後，不管是學運、工運，還是農運等，各個鬥爭領域的台灣抗日民族革命運動，都在以武職總督為象徵的變相軍政控制下，一時慘遭窒息了。



• 台灣議會設置請願運動一度是東京留學生民族主義啟蒙運動的主要訴求。



• 東寧會的領導人——丘璪（念台）



• 遊學東京的台籍左翼青年楊達(前排右)。



• 一九二九年在金澤的赤色學生——廖清燿。

第一節 民族主義的啟蒙運動

日據初期，日本帝國統治台灣的政策是先以暴力恐怖鎮壓台灣人民的武裝鬥爭，確保殖民秩序的穩定；然後再通過國家權力的行使，掠奪土地，榨取農產，同時實行獨佔金融機關和企業，為日本壟斷資本在台灣的發展作準備。就時間上而言，此一時期大體從一八九五年侵占台灣到一九一四年第一次世界大戰期間。

第一次世界大戰爆發，由於帝國主義列強無力東顧，日本資本主義經濟進入了「戰時繁榮」時代，在台的日本壟斷資本也以前所未有的規模和速度發展起來；並且以台灣為基地，趁機對中國及南洋擴張其侵略勢力。為此，它需要利用台灣人，因而開始對台灣人改採懷柔政策。這種改良主義的政策具體地表現在政治、經濟、文化、教育、社會各方面，並且對一部份本地的地主、資本家以及智識份子（大多數也是地主、資本家或高利貸商人）發生了引誘作用，其中不乏服服帖帖地被利用者。

台灣同化會

一般認為，日據時期中部台灣人上流社會的思想在傳統上遠較南北兩地「進步」，他們的思想也可視為一般台灣人知識階級的代表；台中廳直轄阿罩霧庄（今霧峰鄉）廳參事林獻堂，則是其中的典型。

一九一三年五月，林獻堂到北京拜訪梁啟超，隨即轉赴東京，輾轉認識了時居閒職的日人貴族板垣退助伯爵，並向板垣披露台灣的一般情勢，深獲板垣的同情和諒解。

一九一四年三月十七日，板垣伯爵一行在林獻堂資助下第一次訪台。板垣一路南下考察，在各地發表的演講中，一再強調東亞民族團結的主張，並且受到熱烈的歡迎。因此，板垣回東京後即草擬〈台灣的急務〉，提出同化主義的主張，倡立「台灣同化會」。同年七月，板垣又發表〈關於首倡台灣同化會而言〉，指出同化主義才是台灣統治的根本手段。十一月二十三日，板垣再度來台。十二月十日，台灣同化會在台北鐵路飯店舉行正式成立大會。同化會的本部設於台北，台中與台南各設支部，會員一共有三千一百七十三人（其中，日本人四十四人）；因板垣自任總裁，但其班底實際上只是一群日籍的退休官吏、退役軍人、落魄文人和浪人的集合體。

一百七十名醫學生的入會

當時，一部份台灣資產階級士紳都為此興奮不已。據甘得中的追憶，前樹林庄長黃純青在台中召開的同化會演講會會場上，當眾割破小指，瀝血作書：「同化會如慈母」；林獻堂的姪子林仲衡則詩頌板垣：「三百萬人齊下拜，馬頭擁出自由神。」至於學生，似乎也沒有人提出反對的意見。當同化會成立前夕，總督府醫學校的學生蔣渭水等人曾經拜訪林獻堂，向其質疑同化會的成立目的。甘得中追憶，當時，林獻堂並沒有親自向這些醫學生作解釋；而由甘得中代為答道：「是否能同化，固非所知，也未曾加以研究，伯之同化會趣意書所示，是奉戴天皇一視同仁之旨，欲披澤於我台人，同時提高台人地位，成為帝國臣民之一份子，將來能否實現，亦祇因我們現在所遭枷鎖重重，且被束得太緊，倘因伯之同化會，為介紹中央，漸得解脫一些，輕鬆一點，則是我們願望的所在。」結果，第二

天竟然有一百七十幾名醫學生加入同化會。

內台人合演的歷史鬧劇

台灣同化會成立後即受到在台日人的「冷眼旁笑」，反對運動四起；而環繞在板垣身邊的那群日本人也在資金運用上醜態百出；再加上總督府對參加的台灣人大施壓力，如任職台南第二公學校教員的蔡培火被開除，甘得中、蔡惠如等被監視。因此，「以內地人本島人（不問官民）為組織成員，作敦親睦族之交誼，期盼渾然同化，以報一視同仁之皇猷」的同化運動，在一九一五年（大正四年）一月二十六日，以「危害公安」的理由被總督府命令解散後，即告落幕。

這樣，一場「內台人」共同演出的歷史鬧劇便彷彿「船過水無痕」般自然地退出歷史舞台，它既談不上是台灣的民族、民主運動的萌芽，更談不上是日據台灣反日民族主義運動的啟蒙；就像一般史家所云，勉強算是「改良主義的啟蒙運動」吧！在左派的社會運動者如蘇新者流看來，台灣同化會的運動「實際上是出賣台灣人民的靈魂」的運動。

台灣抗日民族解放運動的先鋒

台灣同化會事件落幕之後，台灣本島的思想界便暫時處於沉寂的狀態，並無可見的些許漣漪。然而，哪裡有壓迫，哪裡就有反抗。由於政治上的壓迫，經濟上的剝削和社會上的各種不平等待遇，台灣人民的民族意識不但沒有在日本帝國主義的文化教育政策下被消滅；相反地，台灣青年反而通過近代的科學教育，接受了新的智識、文化與思想，並且擁

有批判日本帝國主義統治的武器。

首先，當歷史的巨輪駛進一九一八年（大正七年）的軌道時，正值第一次世界大戰末期的歐洲思想界揚起了一股民主主義或自由主義的思想風潮；隨著這股思潮的披靡，在所謂民族複合國家（多民族國家）或殖民地民族之間，民族自決主義的思想也立刻抬頭。一九一九年一月十八日，戰後的和平會議在巴黎舉行時，民族自決的主張也被採納於凡爾賽和約中。這些風潮對全球各地的殖民地民族造成極大的影響，對遠東的日本殖民地台灣來說，它也促成了台灣人民的民族覺醒，以及民族主義啟蒙運動的抬頭。

其次，第一次世界大戰以後，國際情勢也起了很大的變化。它主要表現在三個方面：

第一，一個社會主義制度的國家——蘇聯——誕生了，在它的世界革命政策中，殖民地的民族革命問題佔了重要的位置；這點，大大地刺激了台灣人民的抗日情緒。

第二，中國的民主革命浪潮也以第一次世界大戰為契機，日益高漲起來。在政治方面，主要是中國共產黨的創立及其活動的展開，國共合作的實現和北伐的成功，以及其後國共的分裂與內戰的展開等。在文化和社會方面，自一九一九年的「五四運動」開始，也出現了重大的變化，新舊思潮急速地對流著，新舊制度激烈地決鬥著，新舊勢力也逐日地消長著；這新與舊的鬥爭構成中國歷史上光芒萬丈的一頁。所有這樣和那樣的變化與鬥爭，當然直接間接影響了台灣的抗日民族解放運動。

第三，英、美、日等帝國主義列強在大戰結束後又在東方展開新的競爭。同時，帝國主義反蘇的武裝干涉雖告失敗，但帝國主義反對蘇聯的冷戰仍在展開。因此，在帝國主義與社會主義的鬥爭中，在帝國主義與帝國主義的鬥爭中，在全世界殖民地民族反帝的鬥爭

中，中國亦出現了空前未見的戰鬥時代，從一九二五年的上海五卅慘案開始，演至沙基慘案、省港大罷工、國民革命軍的北伐，以及後來國共兩黨間的內戰等等，都是反帝、反封建的具體表現。這些事件當然對台灣的民族解放運動產生很大的影響。此外，這一時期殖民母國——日本——澎湃的革命運動也影響了台灣的民族解放運動，尤其是日本共產黨和日本農民組合，更是大力地扶助了台灣人民的工農運動。

總而言之，在這種內部與外部的新的客觀情勢之下，台灣人民在一九一五年西來庵事件的大屠殺之後便沉寂下來的抗日運動，也就以新的形態出現，並且逐漸形成左、右兩條路線的鬥爭團體。

殖民地的民族解放運動大都由海外（殖民母國）的留學生發動，這是全世界殖民地解放運動的公例；日據時代台灣的民族解放運動也不例外。學生，尤其是留學東京的台灣學生，更是台灣抗日民族解放運動的先鋒。

在差別教育下留學日本之風

日據初期，在台灣的日本當局的教育政策以推行國（日）語為主。基於政策的需要，它積極獎勵台灣人民赴日本內地留學。一九〇一年（明治三十四年）左右，台灣本島的一部份上流階級也作出了相應的行動，開始有人把他們的子弟送到內地留學。風氣既開，留學內地的台灣學生便逐年俱增。為了能夠確實掌握這些留學生的思想與行動，台灣總督府乃於一九〇七年（明治四十年）左右，囑託名為石田新太郎者，擔任東京府轄內留學生的指導監督。第二年，也就是一九〇八年（明治四十一年），石田的職務由田中敬一接替；

這時，在東京府轄區留學的台灣人子弟已達六十名之多。到了一九一二年（大正元年），台灣總督府為了更集中而有效地管理留學日本的台灣學生，於是在東京蓋了一棟「高砂寮」，專收台灣寄宿生。儘管該寮設有舍監，經常對學生作思想上的監督與指導（例如全寮學生每月集會一次，每個寮生每三個月要提一次報告書）；然而，因為該寮收費較低，所以還是有相當多的台灣學生住在寮裡。

一九一五年（大正四年），台灣學生留學日本的總數已達三百餘名。再過四年，也就是一九一九年（大正八年）年底時，台灣留日學生總數又增至五百六十四名。這些學生因受祖國大陸留日學生的影響，深深感到在日本帝國主義統治下的差別待遇，以致對台灣當局諸多不滿。台灣總督府於是及時頒布教育令，以期一面收同化的作用，一面表示「一視同仁」的美意，並藉此轉移輿論的注意，安撫台灣學生不平之心。

一九二二年（大正十一年）三月，田總督頒布台灣新教育令，允許「日台共學」。然而，當時台灣學生在島內能夠進入的高等學校，除了比中學校、女學校程度稍低的高等普通學校（八所，台灣學生共五百六十九人）及女子高等普通學校（八所，台灣學生共七百三十一人）外，僅有一所專科——台北醫學專門學校（限收中學校畢業或同等學力者，修業年限四年，台灣學生總數二百九十二人）。正因為台灣學生在島內的升學機會太少，所以，紛紛赴日留學；一些注重子弟教育的本土資產階級，甚至在自己的子弟剛達學齡時就把他們送到日本留學。因為這樣，在台灣新教育令開始實施的這一年，台灣的留日學生數又激增至二千四百餘名。

一、聲應會

起初，這些留學生都一貫地為同化於日本的風俗習慣而努力，對社會問題、政治運動並不關心。儘管中國留學生或朝鮮學生嘲諷他們是：「唯唯諾諾屈從日本統治之愚民。」但一直沒有看到起而抗辯的人物。後來，隨著智能的發展，這些台灣人留學生中也逐漸有人能夠以批判的眼光來看現實的事物，他們也受到世界性的民族自決主義的思潮影響，以及伴隨而來的朝鮮萬歲騷動（一九一九年三月一日），中國革命國共聯合新展開的種種刺激。這些學生的思想傾向於是變而主張「台灣非台灣人的台灣不可」，並且集結起來，為喚醒民族意識、提高台灣人地位、謀求其自由和解放而運動。

當時，這些青年學生中的主要領導者是：林呈祿（新竹人，明治大學政治經濟科）、蔡培火（台南人，東京高等師範）、王敏川（台中人，早稻田大學政治經濟科）、蔡式毅（新竹人，明治大學法科）、鄭松筠（台中人，明治大學法科）、吳三連（台南人，商科大學）等。他們擁戴夙有「本島知識階級先驅者」美名的林獻堂、蔡惠如為統帥，結成團體，開展民族主義的啟蒙運動。

隨著時代風潮的變遷，一九一九年底，以東京台灣人留學生為中心的東京台灣人知識階級：蔡惠如、彭華英、林呈祿、蔡培火等人，又與具有相同民族淵源和風俗習慣的、在東京的中國學生與知識階級組成的中華青年會幹事：馬伯援、吳有容、劉木琳等，協議組成以親睦為號召的團體——聲應會。

然而，聲應會創立後還來不及推行會員所預期的活動，主要會員便已四方離散而自然

瓦解。儘管這樣，蔡惠如等仍然和中國方面的思想團體保持著密切的聯繫，並致力於指導台灣青年研究中國語，使用中國年號，稱中國為祖國，提高青年學生的反日意識。

另一方面，當時在東京的朝鮮人留學生已經組織了若干從事民族自決運動，乃至民族獨立運動，以及以它為目標的文化啟蒙運動的團體，並且發行機關報，宣傳、普及他們的思想。在運動的發展上大大落後於人的台灣人學生於是漸漸和他們接近，向他們學習。其中，蔡培火、林呈祿不但與《亞細亞公論》的主要幹部柳壽泉親密交往，而且也經常在《亞細亞公論》投稿；蔡培火還一度被延攬為該公論社的理事。此外，在朝鮮人鄭泰玉所主持的《青年朝鮮》上，蔡培火也發表過幾次意見。

二、從啟發會到新民會

除了與中國留學生共組的聲應會之外，一九一九年年底，林獻堂、蔡惠如等人又糾合了百餘名民族意識覺醒，並且已向實踐運動發展的、東京的台灣人留學生，組成啟發會，以推展民族主義的啟蒙運動。不久之後，啟發會改名為新民會，公開揭示「專門研討台灣所有的應革新事項以圖提升其文化」的綱領；同時依據民族自決主義的立場，在實踐上進行台灣人民的啟蒙運動，並以合法地謀求民權的伸張為主要工作。

一九二〇年（大正九年）三月，新民會的學生會員：林呈祿、蔡培火、王敏川、鄭松筠、彭華英（明治大學）、蔡伯份（台中人，帝大生）、陳忻（台中人，慶大生）、劉明朝（台南人，帝大生）、蔡玉麟（台北人，明大生）等會同協議如下的會務方針：

- 一、為增進台灣人的幸福，應進行台灣統治的改革運動。
- 二、為廣泛宣傳吾人主張，啟發島民，爭取同志，應發行機關雜誌。
- 三、謀求與中國同志取得聯絡。

在這三項方針的指導下，新民會會員不但以個人資格參加了「六三法撤廢運動」與「台灣議會設置請願運動」；而且在募得島內有力者辜顯榮、林熊徵、顏雲年等其他相當的捐款後，設立了《台灣青年》雜誌社，創辦了民族啟蒙運動的機關誌《台灣青年》。此外，蔡惠如也率領彭華英、林呈祿等人，渡海到中國大陸，致力於聯絡容共時代的中國國民黨左右翼人物，盡力培養對台灣的運動。

三、東京台灣青年會

新民會的會員大部份是學生。有人認為把學生和非學生的指導幹部集結在同一個團體內，可能會帶來行動上的不便。由於這一類的議論日漸抬頭，新民會的領導者有鑑於它的創立宗旨是「專門研討台灣所有的應革新事項以圖提升其文化」，因此希望它成為純然的研究團體。後來，新民會中的學生會員即另外組成「東京台灣青年會」，揭示「涵養愛鄉心情，發揮自覺精神，促進台灣文化之開展」的綱領。從此以後，新民會的各種運動都在青年會的名下進行，新民會本身則隱匿在島內外民族主義啟蒙運動及合法的政治活動的背後，作為青年會的指導團體，維持長久的存在。

《台灣青年》

一九二〇年七月，東京台灣青年會發行新民會及台灣青年會的機關誌《台灣青年》。在創刊號推出之前，它先對外頒布發行主旨書，聲稱純為提高台灣文化而發行《台灣青年》的意旨。

諸位：前後達四年半的世界武力大戰亂，終於結束了。現在全人類的和平競爭正在如火如荼地大事進行著。這不正是世界人類的反省期嗎？

為了保持國際間的永久和平，出現了國際聯盟的條約，為了避免人類間的弱肉強食，掀起了人類解放的問題，為了防備社會上的優勝劣敗，社會改造的呼聲響徹雲霄。

然而，要謀求世界人類的和平，必先謀求一國內的和平；要謀求國內的和平，不得不先謀求一社會的和平。要維持一社會的和平，必須先求一家的和平，而一家的和平必先從個人身心的和平求之方可。於此，我們為了求得真正而最大的世界人類的和平，非先從最小的取得身心和平來作其開端不可。

諸位！當諸位每回顧自己過去的生活時，定然會懷疑它的價值何在，我們如今是否有必要稍微認真的、嚴格的、慎重的批評自己過去的生活，探索未來的進路，藉以追求真正有意義的生活呢？仔細考慮的話，吾人以往的生活既受迫於許多的不安，又被眾多的疑惑所包圍，故而從未窺見到真正的和平之光。巧逢這次世界改造的良機，我們在此為求得身心的和平，務必掃清這些不安和疑惑，與此同時必須要認真追求台灣的文化生活方可。

諸位，看那內地人青年及中華民國青年們，為純潔的理想所驅使的活潑的運動吧。他們以醒悟的時代自覺，為世界、為邦家，以滿腔熱血奮鬥的光景是何等的令人欣羨？

回顧我們島民青年又如何？尚沉浸在沉默無言當中。清夜自省，心中能沒有不安的感覺嗎？

諸位！如今我台灣應時勢的要求，新的文官總督已經履任了。尤其是聽說田新文官總督就任以降，參酌我台灣民意，大大地一新舊制度的面目。滿腹的偉大經綸，可得依序實行云。值此時刻，我們島民宜奮鬥勉勵，積極協力新督憲的逐步興革，藉以獲得新政的良好成果。也就是說我們應自動及早剷除社會上、宗教上、藝術上、風習上等的諸多缺點，及早發揮我們的眾多優點才行。如要克除這些缺點，發揮優點，我們島民相互間必須有精神上的一致連繫，而且在一定的主義目標下，公平的、冷靜的、嚴正的考究批評過去的種種，以便確立現在及將來應採取的根本方針。惟其考究與批評絕非限於傳統的思想、因襲的見解而已，必須依據現代的判斷、世界的眼光，這是無庸贅言的。

由於上述的理由，我們在京有志一同，膽敢不顧自己的境遇如何，也不揣度自己的才疏力薄，惟有憑恃犧牲和奮鬥的三大精神，在這裡和我敬愛的青年同胞緊緊攜手，步調一致，為我島內的文化啟發，計畫從本月起發行《台灣青年》雜誌。至於有關創刊事宜，業已獲得台灣當局的相當諒解。加之承蒙我同胞前輩的後援，及內地有志者的指導，其穩健堅實自不待言，特別就編輯來說，不假他人之手，由在京青年有志者專當其任，以此作為我島的言論機關，稱它為未曾有的急先鋒也應不為過。

諸位！起來吧。時機已到。見義而不為是無勇的怯懦者。抗拒世界潮流的人是文明的落伍者。我們是擁有偉大歷史的青年，負有重大責任的青年，我們不僅要有這樣

的自覺，而且更要奮發勉勵。直到現在，諸位一定抱有公開發表個人在日常經驗中的感想或內外文明學識心得的極大意願吧。或對我島應加革新改善的種種事項欲加評論，或者冀望與我同胞相互溝通意志。希望今後能善用此一青年機關誌，基於各自的責任感，為我台灣共同努力奮鬥。

最後，我們要重申的是，本誌的維持費完全依靠我同胞有志者的樂捐，至於編輯及其他一切事務，純然依賴在京青年有志者的犧牲努力來擔任。現將計畫每月一次以成本以下的價格提供於諸位閱覽。請不要把本誌看成少數在京青年的專有物，應當作與我全體台灣青年之榮譽有關的共有機關誌，賜予充分的聲援和有益的佳稿，尤其是編輯方面，如有疏忽的地方請給予不客氣的叱責指教，這是我們所一再盼望的。

蔡培火、林呈祿等當時的學生領袖，在〈台灣青年〉創刊之前連袂拜訪了正在東京的台灣總督田健治郎，向他表示創辦〈台灣青年〉純粹是為了提高台灣文化而已，設若有誹謗施政、擾亂治安的過激記事，絕對不予登載；因而取得田總督的諒解，並允予在創刊號上題字：「金聲玉振」。然而，漸漸地，〈台灣青年〉上「過激」的文字卻出現了。到了一九二〇年十月發刊的〈台灣青年〉第四號上，因為刊登蔡培火題為〈我島與我等〉的「不妥」文章而受到查禁的處分。蔡培火在〈我島與我等〉一文中說：

……我等在過去，好像是無神經無思慮一般，缺乏著進取的精神，計畫創造的風氣低迷沉滯，因而陷入了如今的境遇。我等痛感目前正是應該猛省大悟的時候了。……我等只要時時不怠忽，把自覺的種子撒在心田裡，那麼一到春水滲出的時候，它就會自行萌芽，這是必然的，悲觀大可不必。

……：台灣是帝國的台灣，同時也是我等台灣人的台灣。風雨之前，應做未雨綢繆的準備。我等還是偶爾玩弄刺刀也不錯，當然現在並沒有這種自由，但如斯心理準備是絕對需要的。不能用真劍的話，那麼不妨用木刀，對它的施展還是同樣有用。我等應趁著這時候，在自由的範圍內，為準備達成將來的真實生活，一如既述，我等智力須要聰敏，同時我等的體力也有加以充實，鍛鍊的必要。這決非源自於軍國主義末流的想法，是為盡我等本分而衍生的覺悟。……

嗣後，〈台灣青年〉仍然常常登載這一類的「不軌」文字；而且都技巧地維持其合法性而繼續刊行。一直到一九二二年五月，〈台灣青年〉才改名為〈台灣〉繼續發行。

《台灣》與《台灣民報》

〈台灣〉雜誌因為每期贈閱的份數達五、六百份，再加上將募來的雜誌發行資金挪用於台灣議會設置請願運動之故，到了一九二二年夏天，〈台灣〉雜誌社便面臨了資金涸竭的財政危機。為此，蔡培火、林呈祿到處奔走、策劃，於一九二三年六月二十四日，在台中市召開資本額二萬五千圓的株式會社（股份有限公司）創立總會；會中決定，將〈台灣〉雜誌社本社設於東京市牛込區若松町，支局則設於台北市太平町蔣渭水處（一九二六年六月遷至下奎府町二丁目）。從此，島內外便互相呼應，致力於民族主義啟蒙運動的發展。

這時候，由於以白話文刊行的大眾化的〈台灣民報〉已於一九二三年四月創刊；〈台灣〉雜誌於是就當作理論雜誌繼續發行。但隨著〈台灣民報〉的發展，〈台灣〉雜誌不久就廢刊了，〈台灣民報〉則從半月刊改為週刊。到了一九二六年左右，〈台灣民報〉的發

行份數已達兩萬份。實際上，它已超越了作為台灣青年會機關誌的角色，而發展成為當時台灣民族主義啟蒙運動的指導機關了。

支持六三法撤廢運動

台灣青年會初期的主要活動是支持六三法撤廢運動及台灣議會設置請願運動。

所謂〈六三法〉係日本帝國於一八九六年，以法律第六十三號，賦予台灣總督立法權的法律。該〈六三法〉第一條規定：「台灣總督於其管轄區域內，得發布與法律同等效力之命令。」第三條規定：「台灣總督於臨時緊急必要之時，……得即時發布第一條之命令。」這樣，台灣總督在台灣所發的緊急命令便與日本天皇公布的緊急敕令有同等效力。

一九二〇年十一月，台灣總督田健治郎在日本國會第四十四議會上發表有關〈六三法〉存廢問題的意見時指出：「本島的實況尚未達到可廢棄本法之境界」，並且提出六三法延續法案。十一月二十八日，台灣青年會的會員立即糾合二百餘名住在東京的台灣人留學生，在麵町區富士見町教會聚集。當天，蔡培火在講台上豎著一面上書「撤廢法律第六十三號」的大旗，並與十五、六名主要幹部輪番登台演講，並以激烈的語調大喊：「給我們自治權！」、「撤廢法律第六十三號！」等口號。儘管與會者都認為為了縮小台灣總督的權限，立刻推動撤廢六三法的運動確有必要；但是，最後並沒有對運動方針提出結論便散會了。

支持台灣議會請願運動

針對新民會領導幹部推動的「六三法撤廢連動」，新民會內部也有不同的意見出現。其中，明治大學畢業後留在東京繼續做研究的林呈祿的主張最具影響力。在一九二〇年十

二月十五日發行的《台灣青年》第五號上，他通過一篇題為《六三問題的歸著點》的論文，斷言六三法撤廢運動顯然是肯定所謂「內地延長主義」之舉而否定了台灣的特殊性。因此，他主張中止六三法撤廢運動而設置強調台灣特殊性的台灣特別議會。林呈祿的主張立刻便獲得絕大多數受到歐戰後的民族自決、民族解放思潮啟蒙的學生支持。這樣，六三法撤廢運動便急轉為台灣議會設置請願運動。

一九二一年一月三十日，以林獻堂為首的一百八十七名請願連署人（大多數是青年會的會員），向日本國會第四十四議會提出第一次請願。三月底，台灣總督田健治郎在貴族院宣布，這個請願案已被貴族院與眾議院否決。在東京的台灣青年會會員聽到這個消息後，立刻杯葛當時由總務長官依慣例舉行的東京留學生招待園遊會，他們相約缺席這個園遊會，使主辦單位的種種準備變成徒勞；並藉此煽起台灣學生的反對氣勢。

台灣議會請願運動在一九二六年（昭和元年）時進行了第七次的請願。在這七次的請願運動中，台灣青年會的會員者推動請願書的簽名連署，並且負責有關請願委員到東京的宣傳運動等工作；在請願運動中扮演著重要的角色。然而，到了一九二七年（昭和二年），東京台灣青年會的學生因為在共產主義思想影響下轉而投向社會科學研究，對台灣議會請願運動也就一致採取反對的態度，不再介入。

反對言論迫害運動

針對台灣總督府查禁《台灣青年》的言論迫害，一九二一年十二月四日，東京台灣青年會在神田區中華青年會館舉行臨時大會。大會聲言，根據台灣出版規則，台灣總督府取

締《台灣青年》是不當的行為。因此，大會決議：

- 一、反對台灣當局過分苛酷的言論壓迫，要求台灣人民有憲法保障的言論自由。
- 二、台灣當局最近幾次對《台灣青年》的處置方式均為不當。

會後，這些決議同時印成大量的傳單，四處散發。在第三卷第六號的《台灣青年》上也刊出抗議全文，但立刻又被台灣當局查禁。當一九二三年三月號的《台灣》雜誌又被查禁時，台灣青年會再度召集大會，抗議台灣當局迫害言論自由。

高砂寮自治鬥爭

高砂寮是日本帝國為了便於監督在東京的台灣留學生而於一九一二年在東京小石川區茗荷谷興建的學生宿舍；當時不過收容六十幾個人而已。一九二三年九月，關東大地震毀壞了高砂寮的大部份建築物，台灣總督府於是從台灣募集的震災救濟金中台灣人捐出的二百多萬圓，撥出其中的十分之一，也就是二十萬圓，作為高砂寮新館的修建費用。

一九二五年二月，可以容納七十幾人的高砂寮新館竣工了，但台灣當局卻不讓學生搬進去。它說：「新館因經費及其他的關係已不能給與留學生作為寄宿之用。」這時候，原本住在舊館的寮生便派代表向寮方交涉，但幾次下來都不得要領。九月十九日，這些寄住高砂寮的學生在台灣青年會幹部的指導下，企圖佔領高砂寮新館。寮方於是宣布暫時關閉高砂寮新館。雙方僵持不下。到了十月中旬，台灣總督府文教課長生駒又發令說：「舊高砂寮要即時閉鎖，不准台灣留學生寄宿，凡是寄宿之人都要離開，否則要用警察一一逐出。」十月二十五日，在東京的九百餘名台灣留學生為此在神田青年會館召開台灣青年會

臨時總會。會上並且一致通過「相約不撤出寮舍，組織高砂寮自治會，堅持抗爭」的決議：

一、期能火速開辦新高砂寮。

二、確認舊高砂寮的關閉處置為不當，期盼及時撤銷該案。

東京台灣青年會表示，他們之所以通過這項決議的理由是：

大正十二年（一九二三年）九月一日東京震災的快報一傳到台灣，島民的同情油然而生，為了救災釀集二百餘萬圓。這是世人所周知的事實。當時東京台灣的留學生罹災者亦甚多，同樣有設法救濟的必要，這是理所當然的。當時的賀來總務長官有鑑於此，便從前記捐款中撥出一成，亦即動用二十餘萬圓，在小石川區茗荷谷的高台，開始增建東京台灣學生寄宿舍高砂寮新館。直至大正十四年（一九二五年）二月欣見完工。但當局或擬變更原來方針，始終閃爍其辭，拖延至今尚無開寮的跡象。將前後數次學生的陳情、請願，當作馬耳東風，這是我們東京台灣留學生甚詫異的地方。這樣不僅違反了新建該學寮的目的，且徒然令學生滋生不安之感。這是本會認為應速開放新館的理由。

如此一來，當局不開放應為台灣學生而開放的學寮，任其放置達八個月以上的結果，舊高砂寮生與當局之間發生了種種糾紛。想來它的起因，首先可歸諸當局的怠忽職守。理論上當局應當誠心誠意妥善處理才是，卻用高壓手段下令關閉舊高砂寮，使紛爭愈益嚴重。本會認為如此處置為不當，乃於本臨時大會決議如右。

會後，台灣青年會推派大會選出的十名實行委員與當局交涉。負責管理高砂寮的編修官向學生代表說，他沒有權限解決這個問題。學生代表於是要求等待台灣總督或總務長官

到東京時再行交涉。這樣，問題就暫時擱了下來。高砂寮新館仍然被閉鎖著。原先住在舊館的高砂寮寮生仍舊住在那裡，並且組織高砂寮自治會，實行自治制度；一面安心求學，一面準備與總督府當局繼續抗爭。一九二六年一月二十四日，東京台灣青年會在第八十九號的《台灣民報》上發表〈致父兄書〉，不但詳細報導了高砂寮鬥爭的實情，同時也揭露官方媒體的惡意宣傳。

島內的文化巡迴演講

一九二三年起，每逢暑假，東京台灣青年會便以有分量的會員組織夏季演講團，聯絡島內的文化協會，通過文化演講的活動，啟蒙台灣人民的民族意識，非難日本帝國的殖民統治，並致力於喚起台灣人民的民族覺醒。

事實上，文化協會和海外留學生的關係是唇齒相依的。島內的文化協會是島外留學生各種運動的母體與據點，而島外留學生又把東京或中國各地新展開的思想運動注入文化協會，最後，使得文化協會的運動不得不轉向，並且使得台灣社會運動得以飛躍、前進。

文化協會之所以重視巡迴全省各地的演講會，日本早稻田大學政治經濟科畢業的王敏川與黃呈聰扮演了關鍵的角色。一九二三年五月，同為文化協會委員的王敏川與黃呈聰，以《台灣民報》社員的名義，從東京返台，為了推售《台灣民報》，他們便在全省各地舉行巡迴演講。因為他們所講述的民族主義，以及對日本殖民統治的批評，激起地方民眾的熱烈迴響，很受歡迎；文化協會才認識到演講會對一般知識程度較低的民眾的啟蒙效果，並且從此頻繁地舉辦演講活動。東京台灣青年會的夏季講演團便是在這樣的運動需要下組

織的。其中，比較具有代表性的演講及其要旨如下：

一九二五年八月八日，中央大學學生林九龍以《國際聯盟和民族自決》為題，強調「民族自決」的必要性：

歷史證明，任何國家、任何時代都爭端不斷，因此，產生民族自決的需要。尤其，如今的殖民地，民族自決的需要是最迫切的。我日本帝國，是由朝鮮、台灣、日本三民族所構成，這些民族各自團結乃是自然的要求。一個民族有一個國家是理所當然的。再者，不同的民族是絕難永續下去的，我們台灣由三百六十五萬的台灣人和二十萬的內地人構成，但在政治上及言論上，台灣人都很難得到自由。內地人雖然僅有二十萬人，但其背後有武力支持。我們之所以高唱台灣議會請願，也不外乎是出自民族自決的需要。

同年夏天，利用休假返台的另一個中央大學學生蘇惟梁也在演講中強調，推展民族自決或民族自治運動的重要：

自世界大戰以來，各國國民的思想發生了顯著的變化。那就是，少數民族應該團結同種族的想法。殖民地的原住民相應於這種潮流的解決方法有二：其一為民族自決，另一為自治運動。

印度想要脫離英國的統治而獨立。愛爾蘭則訴諸戰爭，要求民族自決，但印度卻不採取戰爭的手段。他們的做法是，既不做英國公司的職員也不擔任英國的官吏，但不入學就讀，且不把錢存入銀行。彼此相約，不和英國人相處，加以排斥。這就是印度人的民族自決運動。

殖民地的自治運動，則是在某國的保護下成立政府，推行政事。我們自從三、四年前就提倡台灣議會，這就是台灣的自治運動。

如果想要在現在的台灣求得幸福，那麼做為殖民地原住民的我們，只有推展民族自決或民族自運動。

另外，同為中央大學學生的賴遠輝則在演講中表示改造台灣社會的重要性：

我們是具有五千年優秀歷史的漢民族的子孫，如果不改造台灣的社會，不但對不起歷代祖先，並且也不能完成對子孫的責任。……在現代的世界裡，有許多吸吮我們膏血的寄生蟲，使我們無法過正常的生活。如要排除它，就必須殺掉它們。否則，我們就不能壯大起來。

一九二六年夏天，留學生返台所作的文化演講中比較具有代表性的演講及其要旨如下：

八月七日，正則英語學校學生陳來成在台南州斗六街所講的《黎明期的青年》中強調團結的重要性：

無論如何，想要達成某一事業都必須團結。有了這個團結，事情必定會成功。今天的日本，也是因為在明治維新時大家團結，如今才能成為世界的五大強國或三大強國之一。

現在的台灣，正值太陽東昇的時候。因為是黎明期，所以也才有暗雲遮蔽，這個雲到底是鬼雲呢？妖雲呢？獸雲或自然雲呢？尚未研究前，是無法曉得的。

我們是純粹的漢民族，並且具有四千年的文化。這文化曾威壓世界，做過世界的

盟主。所以陷入如今的地步，是因為缺乏自覺和團結有以致之。

青年人不可懷有依賴心，必須自主自立，如此才能求得各位的幸福，和漢民族全體的幸福。

八月二十三日，日本大學學生王治祿則以〈中國、日本、台灣文化的比較〉為題，在海山郡鶯歌庄的講演中談到他目睹祖國河山時的感慨：

去年暑假後返回日本時，為了解祖國的狀況，我就順路視察上海、北京及其他地方。當輪船將要開進上海港，看到陸地時，我即感到有無法說出的感慨。台灣正處在台灣總督的專制統治之下。因戰爭的結果，台灣被割讓給日本，其後受到專制政治的統治。在台灣，台灣人的權利絲毫不被承認，全憑總督自由操作。

如台灣議會的成立也不承認，只知榨取錢財而已。因為台灣議會的設置對日本不利，所以極力阻止之。在教育方面，更不承認台灣人的教育，即使台灣人如何勉力讀書，仍然不肯給予承認。我們台灣青年最感遺憾的，就是現在的青年們以使用日語為非常好的事。在日本人不在時，雖時常使用台語，但如有日本人同在時，即刻改用日語。可是要知道，不論怎樣，我們仍然是我們，狗還是狗。現在台灣的政治作風，就是反正台灣人是一別人子弟，統統死掉也無所謂。

十一月六日，東京高等師範學校的台灣人學生謝春木則在基隆為民眾講解〈殖民政策〉。他說：

殖民地是強者從弱者劫奪而成立的。香港、菲律賓率皆如此。台灣也是中日戰爭的結果，作為戰勝的獎品，而由清廷給予日本的。又如某國，趁著原住蕃人的無智，

給予珍品騙去他們的土地，或以迷信誘導，佔領其土地。這樣把這些土地當做殖民地，且為增加本國的財富而經營。這就是帝國主義的侵略。

在殖民地統治上，法國所採取的是母國延長主義。他們毫不顧慮殖民地民眾的民意，一味行使殖民國本位的政治。

加拿大是英國的領土，但和法國統治東南亞不同，實行尊重民意的殖民政策。因此，加拿大的民眾過著愉快的生活。

現今，不是殖民地的人可以放心的時候，如不趁早覺醒，則必陷入悲慘的命運。

十一月十三日，黃白成枝則在台北以〈信仰、懷疑、知識〉為題的演講，揭穿「一視同仁」的虛偽性：

中國最早研究此種哲學，對世界人類做了非常的貢獻。所以世界各國的人甚至對中國抱有羨慕的念頭。然而，為什麼日本人會輕蔑中國人呢？其原因是因為在日清戰爭時，中國吃了敗仗之故。自此以後，日本人便罵中國人為「清國奴」。我到琉球及日本旅行時，每當聽到此種辱罵時，便異常強烈地想到：我們的祖國是中國，中國本是強國、大國，是道德發達較早的國家。這種感觸很深，我們必須常常加深這種情懷。

現在社會是強者苛虐弱者的制度，當然應該倒塌。但光憑一個人是無法打倒它的。所謂，一視同仁，或慈悲等等，都是謊言，都是虛偽的。所以，我們對於某一社會事象，應該判斷：這種事對社會生活有沒有必要，如果沒有必要，就必須把它改革。被人欺負並不是好事。在台灣，真理便非基於這個根本原理來追求不可。我希望諸位奮發努力，以此覺悟來對抗我們的公敵——他們。

通過以上這樣這樣的演講要旨，我們不難理解當年這些留日學生所懷抱的思想之一端，並且進而理解他們推展的文化講演團的運動性質。

四、其他派系的學生團體

自從東京台灣青年會開展民族主義的啟蒙運動以後，在東京的一般台灣留學生對思想運動、社會問題的關心程度明顯地提高了，漸漸地，學生當中不僅是主張民族自決主義而已！因為受到台灣社會運動進入發展期後崛起的無政府主義、共產主義運動的影響，越來越多的學生或者傾向於無政府主義，或者信奉共產主義，以致台灣青年會內部也逐漸產生思想上的分歧，並且出現與青年會站在不同立場而組成各種團體的傾向。在這些團體中，已經超出單純的親睦互助的結社意義而有一定思想背景的主要派系是文運革新會、南盟會與留東同鄉會。

文運革新會

一九二五年十一月，因為參與台北師範學校第二次騷擾事件（一九二四年十一月）遭到退學處分而輾轉留學東京的學生，集結了四十幾名台灣留學生，為「謀求台灣文化的革新」而組織「文運革新會」。同年十二月並發表結社宣言：

……當今強權，雖有卓視公理的情形，但對殖民地的觀念卻已改變。蹂躪他民族，以資我民族之福，這是戰前強國引以為傲的，但在戰後，觀念已經改變，認為引導未開化民族進入文明的領域是文明國的義務。……政治家總是非求即不與……吾文運革

新會有鑑於此。謀求台灣民眾的覺醒……由憤慨時弊的同志起而組織之。

一九二六年一月，該會發行的《會報》登載了一篇題為《由破壞走向新社會》的文章，其中一段文字揭力呼籲台灣青年通過破壞來實現自由平等新社會。它說：

破壞！破壞呀！所有奴隸養成所的學校，為養肥壓迫民族而建設的製糖會社、鐵路、工廠等等，一切的障礙物都該破壞。如今正是著手破壞的良機。破壞，要破壞！由於破壞，自由平等的新社會才能夠實現。

……親愛的純潔的年輕人，持劍站起來，站在三十年來一直挨打、被焚燒、受凌虐的同胞們之一大解放戰的最前線，把劍尖指向惡總督，奮起餘力破壞一切的雜碎吧……。

從這些文字便足以窺見文運革新會無政府主義的思想傾向。因此，當局為了阻止這種激烈言論，除了每一期給予查禁或停刊的行政處分之外，並且幾次以違反新聞法之名，把《會報》負責人移送檢察處偵辦。

正因為這樣的思想基調，所以文運革新會的會員一開始就否定了合法主義者的台灣議會設置請願運動。一九二五年十一月十九日，在該會的創立紀念總會上，出席的二十七名會員中便有人主張：阻止台灣議會設置請願委員到東京，並停止請願運動。當時，以來賓身分與會的請願運動的主要人物林呈祿立即起來婉勸；但遭到革新會會員的反駁。一九二六年十二月二十六日，該會會員十一名集會協議：「本會會員概不簽署台灣議會請願，也不歡迎請願代表來京。」

南盟會

一九二五年十一月，以台南師範學校出身之東京留學生為中心的十幾人，為了「有助於教育的普及、文化的啟發，對抗官憲的壓迫和資本家的橫暴，謀求增進台灣人的幸福」，而組成「南盟會」。

同年年底，他們把南盟會的主張印在賀年片上，寄給台灣的學弟們。它說：

觀察我美麗島的現狀，上有官憲的橫暴壓迫而形同奴隸般被役使；下有大資本的銀行、會社剝削，剝肉削骨，連骨髓都將被吸乾了。我們的生命實在已是時時刻刻都瀕臨危急了。我們祖先以骨肉堆積而成的台灣，我們祖先用血汗結晶而成的美麗島，所以會淪為今天這樣的狀態，如果不是因為我們的不肖又是什麼？……面對這樣的危機，我們一刻也不容遲緩，應抱定誓死的決心努力挽回頹勢。……在校生們，有志之士不可甘於台灣幼稚的教育，趕快到東京來，……獨立獨步才是我們美麗島真正的男子漢。

台南師範學校的在校生收到這份充滿鼓舞的賀年片後，立刻在校內學生間散發；不久，有二名在校生便自動退學，到東京投奔他們的隊伍。

留東同鄉會

留東同鄉會是在台灣出生的大陸人丘琮等人所組織的，屬於客系台灣人和大陸人的學生團體。一八九四年（光緒二十年），丘琮在台中潭子鄉大埔厝出生。當時正值中日甲午戰爭，第二年，清廷敗戰，割讓台灣以求和；丘琮的父親丘逢甲參加「台灣民主國」，領導義軍抗日，失敗後，攜帶家人內渡廣東原鄉。

丘琮十五歲，就讀中學三年級時，丘逢甲為他定別字為念台，並且鄭重地告訴他說：「你明年十六歲就要成年了，我命你別字叫念台，是希望你不要忘記台灣，一定要繼我的志，恢復台灣省，拯救那四百萬的同胞脫離奴隸生活，復還祖國。」

一九一九年秋，丘琮就讀於東京帝國大學理學部的物理科。當時，中國留學生在日本有許多的團體組織，除了各省同鄉會外，還有交誼、學術、政治等性質的組合。然而，也許是因為日本警察監視嚴密的緣故，丘琮卻很少看到有哪個大陸團體與台灣聯繫。丘琮為了使台籍留學生和國內發生聯繫作用，於是依照自己的預定計畫，進行組織台籍留學生的工作。因為他當時不懂閩南語，所以第一步先聯繫客系的台灣青年，其次才及於閩系的台灣青年。這樣，有一個星期天，潮州郡出身的明治大學學生劉詒洪、鍾桂蘭、林炳榮與早稻田大學的學生劉有讚、劉達麟等，以及早稻田大學的中國學生李秉東等在丘琮的寓所聚會，討論台灣革命的事業。丘琮告訴他們，「台灣是土地肥沃、產物豐饒、氣候又溫暖的難得的樂天地」，但是「此得天獨厚的台灣，現今被日本占領，四百萬島民正忍著亡國之悲哀，而非我們能漠視之事。雖然余今日已非台灣人，但他日歸去中國，進入政界，決心一有機會就企圖將台灣收回祖國。」然後又說，身為台灣人的劉詒洪等應該參加台灣革命的策劃。最後，丘琮的意見得到全體贊同，表面上不公開表明「台灣革命」的目的而組織名為「東寧學會」的團體；因為台灣在明末鄭氏時曾稱東寧府，所以借用「東寧」以隱「台灣」。同時，全體與會者還互相誓約，將來無論在何處、占何種地位，都要永遠互相聯絡提攜，共同為台灣復歸中國而豁命努力。

東寧學會的工作方式是通過聯絡台籍學生的感情進而指導他們閱讀祖國課本，學習祖

國語言，鼓勵他們前往中國內地工作，並向他們分析中國政局與革命發展趨勢等等。丘琮等人的最大目標是想在潛移默化中使那些台籍學生的內心深處滋長「擁戴祖國」、「光復台灣」的自覺與希望。這種想法，在當時的台灣境內並不能公開表白，否則就有被捕的危險。

日本警察對台灣人團體一向採取監視態度，而在左翼思想崛起之後，更是特別注意學生團體的活動。東寧會成立後不久就被懷疑是左傾團體，丘琮因而被日本警察約談；除了查詢一般的會務活動外，並以嚴肅的語氣問丘琮：

「東寧是不是『東方列寧』的簡稱？」

「不！」丘琮回答說：「它的涵義是東方安寧。」

一場莫名其妙的偵訊就在這樣的問答下草草收場。

一九二三年，丘琮畢業於東京帝大。但他仍然留在東京，推動東寧會的工作。然而，這年九月，一場大地震使得許多會員離散，東寧會也因此陷於近乎自然消滅的狀態。一九二五年，在丘琮指導下的十六名客系台灣人留學生為東寧會的再組織而奔走下，東寧會又招集了三十六名會員，於十月十七日在神田中華青年會館聚會。會中決定以後每月的第一個星期日為集會日。第二年，也就是一九二六年的十月三十一日，東寧會會員在神田中華青年會館聚會時，決定改名為留東同鄉會，但仍然以東寧會的主張繼續活動。

台灣同仁會

台灣同仁會是台灣青年會在東京的對立團體。當台灣青年會成立並致力於支持台灣議會請願運動的同時，明治大學學生台中州北斗出身的陳金水、台北州宜蘭街出身的吳清水，

以及台北州宜蘭街出身的帝大學生林以士等人卻認為：「要增進台灣本島島民的福利，只有服從並支持台灣總督府的施政方針，以謀求台灣與母國的同化。」因此，在日本人的支持下，於一九二三年三月成立「同仁會」，糾合了對議會設置運動持有異議的學生一百餘名，藉以對抗台灣青年會的民族主義啟蒙運動。

台灣同仁會標榜「基於一視同仁之聖旨，賦予台灣人以帝國臣民的權利，俾能向帝國議會選出議員。」同時「謀求教育的普及和發展」，以期達成「國民思想的大統一」等等。

台灣青年會認為這種反動團體的存在對其運動必產生阻礙，於是分別對參加同仁會的學生進行教育說服的工作，在一定程度上打擊了同仁會的進展。到了一九二三年九月，一場關東大地震後，同仁會便因會員的四散而夭折。

第二節 共產主義的文化運動

一九一八年（大正七年）年初，英、法、美、日等協約國帝國主義者，為扼殺俄國剛誕生的蘇維埃政權，派遣干涉軍從摩爾曼斯克、遠東和南高加索進犯蘇維埃國家。日本政府也因為出兵西伯利亞而搜購軍糧，一般奸商則乘機囤積居奇，導致米價不斷上漲，人民生活急劇惡化。七月二十三日，富山縣魚津町漁民婦女，首先進行反對米商外運糧食和哄抬米價的鬥爭。接著日本全國各主要城市均發生大規模群眾暴動。參加者多為城市貧民和被歧視的部落民。他們襲擊糧米交易所，燒毀奸商和富豪住宅，並與警察激烈搏鬥。這次運動持續了五十三天，波及一道三府三十八縣，參加人數達數百萬人。最後，大約有二萬五千人被捕，其中約七千七百人被起訴，結果約有二千六百人被判處徒刑。

這場「米騷動」事件迫使寺內毅下台，政友會（立憲政友會，一九〇〇年九月由伊藤博文、西園寺公望……等創立。）總裁原敬，在財閥、絲業工商界及地主階級的支持下組閣（一九一八—一九二一）。日本近代史上所謂的「大正民主時代」（一九一八—一九三一）就此開幕。

就在這樣的歷史階段，因為一九〇八年（明治四十一年）六月的「紅旗事件」（又稱「錦輝館事件」。大杉榮等十五名社會主義者因為高舉縫有「無政府共產」白字的紅旗，在街頭遊行而被鎮壓、逮捕並處刑）以及一九一〇年（明治四十三年）五月的「大逆事件」（也叫「幸德事件」。日本政府以「圖謀暗殺天皇」為由，逮捕全國數百名社會主義者；

並按刑法第七十三條的所謂「大逆罪」，起訴幸德秋水等二十六人）而一度轉入低潮的日本社會主義運動，也因為蘇聯十月革命的成功及國內政情變化的較為有利條件而再度高揚蓬勃。

- 一九一九年（大正八年）四月，堺利彥與山川均創辦《社會主義研究》雜誌。
- 一九二〇年（大正九年）十二月，堺利彥又與大杉榮組織「日本社會主義同盟」。
- 一九二一年（大正十年）十一月，標榜共產主義的「曉民共產黨」被檢舉。此外，日本第一個全國性的工會組織——勞工總同盟，也在同年產生。
- 一九二二年（大正十一年）七月，日本共產黨秘密建黨。而日本有史以來最大的農民組織——日本農民組合，也在這一年組成。
- 一九二三年（大正十二年）四月，河合義虎組織日本共產青年同盟。

一、台灣青年會的社會科學研究活動

在東京的台灣人留學生因為受到日本社會主義運動發展的衝擊，也逐漸興起以馬克思主義為主的社會科學的研究熱潮。結果，向來以民族自決主義維持思想統一的東京台灣青年會內部，也產生了意識型態上的分歧與對立；最後，民族自決派與傾向共產主義的激進學生終於分道揚鑣。

台灣新文化學會

彰化籍的許乃昌，曾於一九二二年就讀於上海大學社會系，一九二四年八月，到蘇聯，進入莫斯科某共產主義學校，研究共產主義運動，一直到一九二五年六月，他才停止學習，回到日本，進入日本大學就學。因為具有這樣的經歷，許乃昌於是成為台灣青年會中左傾學生的思想中心，日本大學學生楊貫（台南新化人）、楊雲萍（台北士林人）與帝大學生商滿生（台南人）、高天成（台南人）、中央大學的黃宗堯（台商人）、專修學生林朝宗（台北新莊人），以及印刷工人林聰（新豐人）等，在他的領導下，定期聚會，研究馬克思主義。

一九二六年一月，這些學生在東京帝大新人會（日共的外圍組織）的指導下，組成「台灣新文化學會」，逐漸顯示出通過馬克思主義的研究進而實踐共產主義的行動傾向。為了擴大組織活動，帝大新人會發出要他們在東京台灣青年會內部組織小組的指令；他們於是利用一九二七年三月二十八日召開的東京台灣青年會的春季例會，說服全體青年會幹部，決議設置「社會科學研究部」。大會並且以「東京台灣青年會社會科學研究部組織籌備委員會」的名義，發布宣傳檄文，鼓勵在東京的台灣青年學生即時加入研究部。

各位在東京的台灣男女青年學生們！

在離鄉背井、遠在海外遊學的人們胸中不時飄盪的浮雲，無一不是懷鄉及思慮其將來的情懷？尤其是想到在所謂殖民地政策下，日甚一日地荒廢下去的鄉土時，不知同胞的心中又會作何感想？更何況是熱血沸騰、純真的青年學生，胸中又會是怎樣的感受呢？

不過，我們如今已從過去絕望的沉鬱之中發現，新的黎明之光已赫然照耀在世界

的每個角落了！看哪！那些和我們同一命運的、被凌辱的弱者，已經雄赳赳地站起來了！他們為了創造新的人類歷史，正勇敢地進行著苦戰惡鬥，而且他們的努力眼看著也即將如願以償了。現在，我們同胞心中的意圖也不期而得以匯合團結了。

三月二十八日，在中國青年會館召開的我青年畢業生歡送會席上，畢業生前輩以下，滿堂的同胞曾如何一致地呼籲團結的必要！如何如飢似渴地傾聽中國國民黨代表所發表的有關中國革命運動的講演！又是如何地決意發展社會科學的研究！為著逐步邁向所信之目的，我台灣青年會於是全場一致決議設置社會科學研究部。

我們應怎樣來看混沌的現社會的所有問題和一切現象？又應怎樣來對應它呢？我們應怎樣看待所面臨的民族問題、殖民地問題，或切身的我台灣之總督獨裁政治所包藏的陰謀，並且又應怎樣來對應它呢？本研究部的使命，便在於忠實地、科學地來分析究明這些和我們有密切關係的各種問題。

各位在東京的台灣同胞！各位青年學生！請想想這種趨勢的動因吧。更想想在東京的台灣青年學生對鄉土的特殊使命吧。然後再自問如今應該做什麼？如今又應從什麼做起？「即時加入台灣青年會社會科學研究部」，這就是它的全部答案。

是的，團結就是力量，社會科學就是武器。

支持社會科學研究部吧！

立刻邁出團結的第一步吧。

「社會科學研究部組織籌備委員會」後來又在台灣青年會的事務所召開，結果，大約有八十幾人參加。

四月二十四日，許乃昌、商滿生、高天成、黃宗堯、林朝宗外約三十名學生，在高砂寮秘密舉行「社會科學研究部」的成立大會。大會同時作成以下八點協定：

- 一、確保本研究部內容之秘密。
- 二、實踐活動應於研究進展到某一程度後始實行之。
- 三、聯絡中國國民黨及朝鮮人無產階級。其聯絡協調委任於幹部。
- 四、幹部的選派授權於委員，不予發表。
- 五、委員不另遴選，委請籌備委員原班人員擔任。
- 六、研究部本都設置於台灣青年會內。
- 七、本部每月聘請帝大教授前來演講一次。
- 八、會章如依研究部之立場獨自訂定，應不得與青年會有對立之情形存在，故他日全權委託於本部幹部訂定，不予明示。其費用則利用青年會費。部中內部關係，做效黨之細胞組織，採取中央集權式統制，以幹部為常務委員，委員為中央委員，細胞為班，以地區別設立如次的支部。

東京 柏木支部 小石川支部 神田支部 目黑支部 牛込支部 深川支部
京都 京都支部
大坂 大坂支部

社會科學研究部

社會科學研究部的對外聯絡關係以帝大新人會、無產青年同盟（以後改共產青年同盟）、學生社會科學聯合會為準。此外，在島內則與各左翼團體，尤其是文化協會左派及農民組合幹部，採取密切的聯絡提攜，利用暑假回鄉歸省的時候，與這些團體合流，參加演講會、紀念日政治活動等。平常，研究部的成員每個禮拜都在柏木或神田兩支部秘密集會一次，根據共產主義的文件作研究、討論，或聽取帝大新人會指導員的談話。

因為這樣，當時日本警察對學生社會科學聯合會的取締行動，也逐漸波及到東京台灣青年會。因此，向來與研究部的思想傾向相左的青年會幹部便與研究部的成員公開翻臉；決議要把社會科學研究部趕出青年會。對此，許乃昌、商滿生、黃宗堃等社會科學研究部的主要成員則大肆抨擊青年會幹部為無視台灣被壓迫大眾利益的反動份子。

一九二七年十月三十日，東京台灣青年會的主要會員一百餘名，於神田的明治會館，就兩派是否分離舉行投票。大會採取社會科學研究部一派的意見，採取無記名投票的方式裁決。結果，贊成分離者二十一票，反對者四十一票；由青年會老幹部陳朝景、賴遠輝所提的排除社會科學研究部的提案沒有通過。這時候，黃宗堃等列席的研究部成員便乘勢發表煽動群眾的演講，大叫：「有活力的青年，應有為同胞站在最前線與壓迫者鬥爭的氣概！」黃宗堃等六人因此被臨監官（日人）下令逐出會場。票決失敗的舊幹部一派則由幹事吳春霖聲明：舊幹部總辭。一場分裂的會議於是在混亂中閉幕。

第二天，也就是十月三十一日，針對青年會舊幹部的分裂主張，社會科學研究部的主要成員許乃昌、商滿生、黃宗堃等人，採取為了團結的目的而繼續鬥爭的態度。他們印製了五百張傳單散發給青年會會員，向群眾說明他們的主張是：

團結在青年會旗下！

固守研究部！

埋葬軟弱的幹部！

研究社會科學！

與官憲的無理壓迫戰鬥到底！

十一月十三日，台灣青年會在神田明治會館召開改選幹部的臨時大會。二百五十餘名會員出席。通過無記名投票，選出研究部成員商滿生、黃宗堯、楊雲萍、周慶豐、曾霖澤、林春木，及非研究部的賴遠輝、張大瑞、沈榮、洪清等人為幹部；但賴遠輝、張大瑞、沈榮等三人卻辭任不就。因此，社會科學研究部的成員便完全占領了東京台灣青年會的領導中央。當天，在就任致詞時，商滿生便無限期地說：「台灣青年會向來都不太活躍，現在，我們好不容易地可以採取積極的行動了，我們應該繼續研究，努力不怠來指導本會。」

然而，舊幹部一派的楊肇嘉、賴遠輝、沈榮等人並不甘心就這樣把青年會的領導權拱手讓給左派幹部。因此，他們除了一面準備奪回領導權，一面則向林熊徵、辜顯榮、林獻堂、林階堂等贊助青年會的台灣資產階級報告青年會改組的經過，勸告他們停止捐款給青年會。

社會科學研究會

社會科學研究部的成員通過與青年會舊幹部的鬥爭而取得領導權後，除了努力使青年

會向左轉之外，並且加緊與學生社會科學聯合會、東京無產青年同盟聯繫；同時通過它們與日本共產黨的一系保持聯絡。在台灣本島，他們則與台灣文化協會、台灣農民組合及左翼的各工會互相聯繫，逐漸脫離研究的範圍，進入實踐的運動領域。因此，它的組織發展也日見壯大。然而，到了一九二八年（昭和三年）三月十五日，日本共產黨招致全面檢舉，與日共關係密切的左翼三團體也被命令解散，青年學生間的社會科學研究也同時受到前所未有的嚴重取締。

這時候，東京台灣青年會的舊幹部派便趁機進行奪權的計畫。相對地，研究部的幹部則認為：在這樣的情勢下，固守青年會，不但對本身不利，而且也很難保持對青年會的領導權。因此，他們決定把社會科學研究部從青年會中獨立出來，改稱為「社會科學研究會」。三月二十八日，他們以「台灣青年會社會科學研究部」的名義，對外發表了一則〈關於獨立的聲明書〉，聲明宣稱：

當今國際情勢的特徵是：各帝國主義國家間國內的以及國外的矛盾之尖銳化，和各國殖民地及半殖民地民族運動的激烈化。尤其是最近，在遠東的反帝國主義運動突破了帝國主義列強的拚命鎮壓，鬥爭的浪濤日漸高漲。但帝國主義的鎮壓是會更加狂暴的。在這樣的情勢下，絕對需要全世界被壓迫民眾在解放運動中的統一戰線。作為民族運動的一環，就我台灣解放運動而言，亦同樣有此需要。在我台灣本島，也已有了一統一的共同戰線，這是我全台灣民眾所渴望的。

反過來看，經常扮演我民族運動的先驅，而具有光輝歷史的我青年會，自去年設置研究部以來，有二大潮流一直對立迄今。但對統治階級的鬥爭，斷不許我們分散力

量。雖然如此，二大勢力的對立卻時時孕育著易被統治階級的分化政策所乘的危機。我們對統治階級的分化政策，必須堅決地抗爭到底。

在此，我們深深地感受到：為了消除青年會內部的對立，集中對統治階級的鬥爭勢力，本研究部的獨立及其實行是有必要的。所有的各位會員一定會諒解我們對階級的忠誠吧！

一九二八年五月，日本當局明令禁止社會科學研究，「社會科學研究會」於是又改名為「台灣學術研究會」。然而，由於「三·一五」的日共檢舉事件，日本的左派組織已陷於混亂狀態。在這樣的客觀情勢下，一時之間，台灣學術研究會也無法積極活動。

二、台共東京特別支部指導下的學運

一九二八年一月底，社會科學研究會的進步份子陳來旺，跟隨為了台灣共產黨組黨事宜而潛入東京、列席日共中央委員會的林木順與謝雪紅，一起回上海，準備台共的組黨工作。四月十五日，林木順、翁澤生、潘欽信、謝雪紅、陳來旺、林日高、張茂良及中共代表彭榮、朝鮮共產主義者代表呂運亨等九人，在上海法租界霞飛路的一家照相館樓上，召開台灣共產黨組黨大會。大會除了提出「樹立工農政府」、「無產階級專政」的兩大綱領外，並且通過了有關勞動運動、農民運動、青年運動、婦女運動、赤色救援會及國際問題的決議文件。

在《青年運動綱領》第四項：「青年運動的當前任務」中，針對在日本的台灣留學生，

台共提出了組織及運動的整頓與開展的具體方法。它說：

留學日本的台灣學生應在各地組織學生聯合會，而此種組織須在各校擁有支部。同時努力建立全日本台灣學生聯合會，加入島內的台灣學生總聯合會，成為其中一組織。東京的青年會改為學生聯合會，將現在的小團體取消，並於將來把社會科學研究會納入學生聯合會的一部門。對留日學生我們應提出學生的要求以及國民革命的要求，努力促其參加實際鬥爭，引導他們走上發展革命之途，並使其與日本革命青年產生密切關係，進而加入日本的革命。此外，它與在中國的台灣青年運動和島內青年運動亦須發生密切的關係。

台灣學術研究會的更生運動

四月二十三日，陳來旺身負「台灣共產黨東京特別支部負責人」的指令與任務，返回東京。回到東京的陳來旺，面對的卻是三·一五檢舉事件後左翼運動陷於困境的情勢，於是設法與台灣學術研究會的同志聯絡，逐步進行學術研究會的更生運動，並且以此擴大黨在台灣學術研究會和台灣青年會內部的影響力。此外，在他的努力下，一段時日之後，又與日本共產黨恢復了聯絡。

同年八月，台共建黨的靈魂人物林木順，為了逃避「四·二五」上海讀書會事件的檢舉而潛入東京。在他的指導下，台灣學術研究會又從沉寂的狀態再度活躍起來。九月中旬，他說服學術研究會的激進學生林兌、林添進入黨；九月二十三日，他們四人組成「台灣共產黨東京特別支部」，任命陳來旺為負責人，決議將台灣學術研究會及台灣青年會置於該

特別支部指導下成為大眾團體，並與日本共產黨及台灣共產黨的島內組織相互聯絡。十月五日，陳來旺、林兌、蕭來福、黃宗堯及陳銓生等五人，在東京《大眾時報》社，召開學術研究會委員會，商討有關研究會的財政、組織、鬥爭等事宜。十一月十九日，昭和即位典禮即將結束時，他們五人又再聚於《大眾時報》社，決定有關研究會的組織、活動及財政方面的事情，並討論發行機關報的問題。十二月十二日，陳來旺、黃宗堯、林兌、蕭來福及陳銓生，再加上何火炎與蘇新等七人，第三度在《大眾時報》社集會。會中決定：

一、組織方針

原則上，各學校分開組織，有特殊情形時，則按照原來採取地域別的組織方式。目前的學校別組織及其負責人為：

早稻田高等學院 何火炎

日本大學 林 兑

中央及明治大學 李清標

日本齒科及東京醫專 何瑞麟

二、東京台灣青年會變更組織

為使東京台灣青年會於黨東京特別支部指導下成為大眾團體而改變規約。

通過文運革新會，組織各團體協議會，進行宣傳活動。發佈新聞，號召會員及廣大的一般大眾。

三、發行機關誌

以大約三十圓的預算，發行二百頁左右的機關雜誌，發表各會員的論文等。

四、支持《無產者新聞》

目前訂閱《無產者新聞》的台灣人，東京只不過四十人，島內只約一百二十人。今後，應策劃增加讀者人數，以支持該報，並組織「東京台灣無產者新聞擁護同盟」，以林添進為委員長、蕭來福、林兌為委員。

五、組織台灣解放運動犧牲者救援會

組織救援會，基金定一股為五分錢（一個月份），廣泛向組織內及未入組織的台灣人募集。由蘇新擔任負責人，何火炎、陳銓生擔任委員。

六、台灣農民組合全島大會對策

對十二月三十日擬在台中召開的台灣農民組合全島代表大會的方針，協商結果，今年決定致送一份聲明。

這次會議之後，上述七人除陳銓生外，再加上林添進、李清標、林加才等，一共九人，又接著於一九二九年（昭和四年）的一月二日召開組織者會議。會中，先進行各班組織的情勢報告，然後達成如下的協議：

一、台灣學術研究會的基層組織將以各學校的班組織為原則，現行地域班應加以整理。

二、各班負責人作為組織者應積極接觸各學校內的台灣人，鼓勵他們加入研究會；同時利用研究會發佈的新聞，提出時事問題來加以指導。

三、研究會盡量在校內舉行，宣傳及鼓勵學生訂閱《無產者新聞》，並分頭努力推廣。

當時，台灣學術研究會的組織狀況大體如左：
地域班

中野班 (負責人) 蘇 新

(成員) 許澤容、陳來旺、林 兌、謝 某

余丁町班 (負責人) 謝青澤

(成員) 洪 才、張春煥、張秋松、蕭坤裕、鄭連續、謝清秀

陳水土、吳大猶

戶塚町班 (負責人) 黃宗堯

(成員) 吳新榮、黃百礫、吳榮宗、林泰料、林源財、李清標

落合班 (負責人) 郭華洲

(成員) 吳 成、邱石寶、王 某、吳 某

池袋班 (負責人) 莊 守

(成員) 陳在癸、陳銓生、黃 某

千駄谷班 (負責人) 商滿生

(成員) 林加才、王清風、陳明貴、許乃昌、賴賢浦、蘇 新

目黑班 (負責人) 林寶煙

(成員) 鄭昌言、林百川、陳傳興、廖大福、林爐達

學校班

東醫班……………吳新榮

早大班……………何火炎

日大專門部班……………林乙垣

明大班……………林有財

中大班……………李清標

日大班……………郭華洲

帝大班……………陳逸松

法政大班……………(不詳)

商大班……………郭昌言

中學班……………蕭來福

委員長 蘇 新

組織部 陳銓生

教育部 陳來旺

調查部 黃宗堯

會計部 蕭來福

東京台灣青年會的徹底左傾

台灣學術研究會在台共黨人林木順、陳來旺的指導下，從一九二八年下半年起明顯地活潑起來，經過幾次的整頓與擴大組織後，該會企圖擴大在東京留學生與其他旅日台灣人的影響力，於是在台共東京特別支部的指導下，逐步爭取台灣青年會的左傾學生，並且通過諸如「青年會組織化」、「修改青年會規約」、「幹部改選」、「決定當前的口號」、「組成留日學生聯合會」等議題的討論，開展奪權鬥爭。

一九二九年二月三日，台灣青年會召開定期大會。會中，右派幹部完全被排擠，並且將左翼學生提出的上述議案全部通過；向來不活潑而沉寂的青年會從此改造為左翼學生團體。同月七日，改組後的台灣青年會召開首次中央委員會，選出中央各部的負責人：

委員長 黃宗堦

宣傳部 林 兌 何火炎

教育部 陳水土 鄭昌言

調查部 黃宗堦 賴遠輝

會計部 吳新榮 林有財

書記部 郭華洲 楊景山 蘇 新

會中同時決定發行青年會〈會訊〉，確立各學生所屬學校班別，並逐次在東京、大阪、

名古屋、岡山等地成立或新設地方學生團體，以建立一種大學生聯合組織為目標。二月十一日，新選出的中央幹部十名出席第二次中央委員會，會中決定青年會改組的規約及宣言。從後來發行的〈會訊〉所刊載的「有關東京台灣青年總會組織化事項」的說明記事，我們可以大致理解青年會組織化的意義及內容。

一、組織化的意義

青年會的組織化，這次頭一回變成問題，其實，這個問題在青年會的所謂和平時期便應當當成問題來處理才對。只不過當時的環境並沒有使我們痛切感到組織化的必要而已。可是現在，青年會的組織問題已經真正成為我們的問題了。「日漸衰敗的青年會」，是我青年會被指責的現狀。因此，我們痛感青年會有大加改革的必要。

青年會創立當時的主旨，一言以蔽之，就是「謀求會員互相間的親睦，促進社會文化的提升」。但是，如果我們再次回顧過去一、二年間青年會狀況的話，我們就可清楚的認識到，依照現狀，我們不僅已經無法促進社會文化的向上，而且也無法謀求會員互相間的親睦。如台語的使用被禁止，集會、言論的自由再三被蹂躪，以及一部份上了分化政策之當的墮落幹部的怠忽職守，以致青年會屢次的集會出席者逐漸減少等，在在都明白地證實著這一事實。

在這樣的狀態下，要是有人把青年會當成單純的吃喝茶會，而且主張「只有如此，以前的和平時代才能再度來臨。」這些人，等於是與瞎扯「完全屈服當奴隸，才能被解放」的論調者無異。

必須使用不像樣的日語交談的集會，究竟有什麼趣味可言？唯有取得使用台語的

自由，才有懇親的意義，也才能達成會員的親睦。再者，有了言論、集會的自由，才能現實地促進「社會文化的提昇」。但在現狀之下，我們卻未完全具備這些自由，我們必須要徹底地爭取這些自由才行。

請看！朝鮮人的集會不是堂堂正正的用朝鮮語交談嗎？但為什麼只有我們被強制使用日語呢？不外是因為朝鮮的同志們具有組織的力量，而且一直勇敢地為自由而戰。相反的，我們沒有鞏固的組織，因而沒有力量。

請回想去年三月發生的高砂寮事件吧！如果我們有鞏固的組織力量，我們的兄弟不會被這樣侮辱的。況且高砂寮自主化的問題，由於寮長專制行動的露骨化，愈加成為我們迫切的問題了。在這種情勢下，青年會組織化已是迫切無比的要務了。

二、組織化的內容

那麼，我們應如何來把青年會組織化呢？

1. 主旨的具體化……必須是以明白表達恢復一切我們被奪去的自由，以及貫徹我們的具體要求為主旨。

2. 組織變更。

甲、由贊同本會宗旨，正式參加的旅居東京台灣人所組成。

乙、確立執行機關。

丙、組織的基本單位設於大學。但無黨籍者，在本部統制之下，決定其所屬班。

3. 每月徵收一定數額的會費。

4. 發行會訊。

針對上述的組織化內容，青年會在記事的最後強調地宣稱：

當然，這並非一朝一夕就可達成的。因此，我們相信，在進行組織化的過程中，自然能夠發現更具體的、進步性的內容。尤其是作為我會基本組織——班組織的確立問題，當然是我們不得不加以研究的問題。

青年會的組織，如今已成為我們本身的切實問題，當然，這決不是要破壞，或是要分裂青年會本身。組織化，正是要鞏固一向組織鬆懈的青年會，使我們獲得強大力量。而且，只有依靠組織的力量，才能重新爭取到諸如使用台語的自由與權利。此外，第二次的中央委員會還針對〈會訊〉的發行、留日台灣學生聯合會的組織、高砂寮的自由使用、反對寮長專制，反對在內台航路上對學生進行身家調查、反對奴隸教育、爭取台語使用的自由等各項運動的有關問題及會計方針，進行討論。

二月二十八日，林兌、郭華洲、陳水土、黃宗堃、蘇新等五名常委，召開常委會，通過班組織及〈會訊〉發行的具體方針。

東京台灣青年會從此便徹底地左傾化，在運動上，與台共的步調完全一致。

加入台灣本島的解放戰線

一九二八年八月二十九日，島內農民組合的幹部簡吉與謝氏阿女（謝雪紅）等人，就召開第二次全島代表大會的事宜，在本部召開中央委員會，決定在十二月底，配合以東京「台灣學術研究會」會員身分回台的留日學生，盛大舉行。

同年的十月下旬，潛赴東京的林木順，在回上海之前，針對預定於十二月底召開的台灣農民組合第二次全島大會，特別指令學生主幹林兌「應以反映黨的影響為使命，前往台灣」。十一月二十九日，林兌遵守指令，攜帶著〈農民問題對策〉與〈農組的情勢和大會對策〉的指導文件，化名回台；然後與國際書局的謝氏阿女、楊克培等聯絡。十二月二十五日左右，林兌與農民組合的重要幹部簡吉會面，指導他如何將〈農民問題對策〉的要旨——「將台灣農民組合完全置於台灣共產黨領導之下」——通過大會的議案而實現。十二月三十日起，台灣農民組合第二次全島代表大會，在林兌與謝雪紅的幕後指導下，假台中樂舞台舉行。大體而言，林兌的任務圓滿達成，然後返回東京。

然而，正因為農組已完全置於台共的領導之下，台灣當局便再也難以容忍其存在而放任於農村的思想「惡化」，因此就以「違反出版法」的罪名，在一九二九年二月十二日拂曉，同時在台北、新竹、台中、台南、高雄各州的農組本部、支部事務所，有關團體，以及主要幹部的住宅等約三百處，進行大檢舉；總計農組組員有近六十人之多被捕。

三月三日，在東京的台灣學術研究會立即寄出以〈為全島大拘捕敬告農工兄弟書〉的聲援函：

敬愛的農工兄弟們！日本帝國主義者在台灣逞其豹狼本性進行經濟侵害，我們四百萬的大多數民眾早已無業可就，無生可享，尤其農工兄弟所受的壓榨更是慘不忍睹，這是各位所看到的。工資日日降低，物價太高，住家要戶稅，耕田要地稅。車稅、馬稅、牛稅、保甲費、街庄費……猶有甚之，連打赤膊也要加罪。如此榨取尚不知足，還用強權來霸占農民兄弟的土地，強奪農民兄弟的香蕉、鳳梨、竹林、甘蔗等等。

敬愛的農民弟兄啊！當吸血鬼用強權來霸占強奪土地之時，幸而有「台灣農民組合」替農民兄弟謀取利益，時時刻刻代表農民兄弟的利益而奮鬥，是各位有目共睹的事實。過去兩年來，主張「土地歸於農民」，反對扣押耕種物，反對強奪土地的，不就是台灣農民組合嗎？反對課徵重稅，反對沒收竹林的，不也是農民組合嗎？為謀求農民兄弟的利益著想，與日本帝國主義拚生死的，不正是農民組合嗎？

敬愛的農工兄弟啊！日本帝國主義過去常用陰險手段來陷害咱農民組合，是農工兄弟所親身體驗的，正因農民組合是替農民兄弟謀福利的組合，所以農民組合的存在是日本帝國主義的眼中釘。換句話說，日本帝國主義若想在台灣展現其豺狼本性，使農民兄弟永遠成為他們的奴隸，他們首先必須鎮壓農民組合，才能達成他們的獸慾。

敬愛的農工兄弟啊！這次日本帝國主義為了徹底壓榨農民兄弟，拘捕了台灣農民組合在各地的勇敢份子，並用極其惡毒的陰謀來陷害咱勇敢的兄弟。我們相信，這次的全島大拘捕是日本帝國主義者對於農民兄弟的挑戰，是加深榨取農民兄弟的第一步！

敬愛的農工兄弟啊！我們應該甘心受日本帝國主義的榨取與酷刑嗎？絕不，農工兄弟啊，我們若是希望完全的解放，除非各位團結打倒日本帝國主義，否則辦不到。

農工兄弟，一切被壓迫兄弟啊！一起站起來，重整我們的陣營，與此兇心大發的吃人強盜——日本帝國主義，打個一拚生死的鬥爭吧。無論如何，各位要奮起，用大眾行動來救助被拘捕的兄弟！誓死支持屬於大家的台灣農民組合！

即時釋放為主義而犧牲者！

農工兄弟聯合起來！

土地歸於農民！

反對總督獨裁政治！

打倒日本帝國主義！

由於農民組合經過「二·一二事件」的全面彈壓之後，運動成為全面性的頹勢。在東京的台灣學術研究會認為應該馬上指派會員中的優秀份子返台，參加島內的左翼戰線，並且隨即進行回台旅費的籌募工作。在該會刊行的會報中，有一則題為「募捐參加台灣戰線回台旅費一百五千圓」的記事中，記載著如下的激昂語詞：

被奪去指導者，在虐殺、拷刑的風暴下沾滿鮮血仍繼續鬥爭的台灣的弟兄們，究竟向我們要求什麼？

在暴虐至極的日本帝國主義之下受到的迫害和剝削，現在已一刻都不能再忍耐下去了。弟兄們在向我們呼喚，要我們奔赴打倒帝國主義的戰場。

台灣的弟兄們已經奮起了！看吧！對台灣×××（共產黨）的鎮壓，大量逮捕農民組合員，文化協會的潰滅，對工會的鎮壓，這些現象，正意味著大眾的革命化和鬥爭的尖銳化。

我們得儘早把我們勇敢的同志，送到台灣解放戰線！送到工廠！送到農村！

這次向大眾募捐歸台費用的總額，小計是六十圓四十三分錢。儘管離預定的一百五十圓尚有差距，台灣學術研究會還是派遣蘇新、蕭來福、莊守等優秀幹部，先行回台。在三月十二日的《學術研究會新聞》中刊載了其中一人表明自己「為什麼非回去不可？」以及

「到底有什麼目的？」的告別文章。這位即將返鄉戰鬥的青年說：

歸國當前，特向各位同志緊握雙手道別。敬愛的各位同志！今天我就要遠離這個已住慣的、熱鬧的都市，跟各位分手，賦歸故國了。我為什麼非回去不可呢？到底有什麼目的呢？

我的歸國，只是鑑於今日的國際情勢，和我故國內部的現狀，使我認識到我四百餘萬同胞如今，正面臨着非常的危機，因而感到無論如何非返台不可。我是為加入故國的××（革命）而返台的，除此之外，沒有什麼目的。

我們的故國如今是處在怎樣的情勢下？直截了當地說，就是第二次帝國主義戰爭已迫在眉睫。這一場盜賊戰爭，必定將給我故國四百餘萬同胞帶來空前慘酷的犧牲。而能夠克服這野蠻的強盜戰爭，打倒××（日本）帝國主義，解放台灣民眾，且敢於堅決地把帝國主義戰爭轉而為××（階級）鬥爭的，惟有我台灣×××（共產黨）而已。

雖然，在未來的故國建設××××（共產主義）社會，從而完成世界××（解放）運動的一部分力量，來自我勞動者階級，但不容我們忽視的是，目前，我勞動者階級在一切方面都較落後的事實。它最大的原因就在於工廠沒有基礎。其次，故國的農業勞動者業已崛起，伸出他們的雙手，等待我們。這實在是我們面臨的、需要緊急着手的組織任務。在農民方面，為我××（台灣）農民底結合團體——台灣農民組合，正毫不畏怯地與統治階級勇敢地鬥爭中。因此，如今也正蒙受著極兇狠的鎮壓和迫害。

（中略）

我實在是為了反對如上述的，以我故國同胞作犧牲的強盜戰品——行將來臨的帝

國主義戰爭；同時也為強化唯一能夠解放台灣民族的先鋒隊台灣×××（共產黨），進入其要塞的工廠戰鬥而回國的。而且我也要向各位同志發誓，我站在上述的立場，也就是為解放故國四百萬同胞，為了階級的利益，願冒死果敢戰鬥。同時，我也要呼籲各位！凡自認為是馬克思主義、列寧主義者的同志，相信我們才是未來勝利者的同志，應毅然決然起而馳赴故國！馳赴工廠！馳赴農村！如果不以實踐來表現，那麼一切都是虛言，一切都是空想而已。

各位集結於學術研究會學習，以它作為我故國解放運動的學校，但只有馳赴故國的戰線時，才算是作為一個真實的馬克思主義者、列寧主義者吧。而且，也才能使我們成為未來的勝利者吧。（後略）

台灣學術研究會的再更生運動

一九二九年四月十六日，日本警視廳對日共展開第三次大檢舉；同時從日共黨人間庭末吉所持的黨員名簿中發現有三名以暗號記載的台灣人。日本警視廳判定，這三名台灣人屬於在東京的台灣人團體中左傾的台灣學術研究會，於是針對研究會中的四十三名主要會員展開檢舉，經過搜索這些人的住所後，他們發現並扣押了不少所謂的「證物」；然後通過對這些證物的調查，判明林兌、陳來旺、林添進三人正是日共黨員名簿中以暗號記載的三人，於是就把他們移送檢舉；其他人不久以後都被釋放了，其中一部份人因為曾經奉派返台參加島內的解放戰線，所以就束裝回台；剩餘的研究員則在日警嚴密的監視，以及失去領導者的情況下，未能鞏固團結，以致活動逐漸停頓，組織也陷入無力再起的狀態。然

而，面對這樣的情況，也有幾名被開釋的主要會員不願放棄既定方針，仍然伺機而動。比如，林寶煙就認為：「學術研究會的復興暫時不必作表面的運動，專以地下運動的方式進行再組織，先打好基礎再逐漸進行運動。」因此，他與幾名同志秘密會商後決定：

(一) 調查同志被檢舉的狀況。

(二) 募集救濟資金及物品，充作接濟被捕同志物品的費用及研究會的復興基金。

(三) 近日召開臨時委員會，決定研究會再建方針。

然後，林寶煙等人把這三項決定告知陳傳興與黃宗堯，並徵求他們的意見。但他們兩人卻以為在當前形勢下進行再組織的活動會有危險，因而主張「分散論」。理由是：「縱使現在把學術研究會再組織起來，也完全不可能進行研究或其他活動，不如暫時將各會員分散到各校的讀書會，加以訓練，等待適當時機再進行組織。」結果，他們兩人說服了林寶煙等人。

另一方面，東京台灣青年會也因為在「四·一六」事件中遭受檢舉而陷入幾乎全面覆滅的狀態，因此，當學術研究會的非黨員會員獲釋後，有關台灣青年會的組織究竟應該如何處理的問題也被提出來討論。

六月十日，台灣青年會幹部鄭昌言、吳新榮、黃宗堯、郭華洲等四人，在郭華洲住處協商善後之策。他們首先指出青年會以往的錯誤：「青年會向來是糾合學生的大眾團體，但卻為左翼會員幹部所佔；這些幹部又以指導共產青年團一般的態度來對待會員，因而，似乎把主觀勢力的強弱置之度外。況且，這些幹部徒重理論，沒有進行應做的實踐運動。」

他們據此認為，如果按照現在的狀況發展下去的話，右翼學生可能會離散，因此，在九月新學期開始前應停止活動。為此，鄭昌言提議幹部採取戰術性的辭職。但郭華洲卻認為，這樣會喪失幹部的權威，因而反對。吳新榮則以為應該付諸大眾的研討為宜。眾說紛紜，莫衷一是。最後，決定把這個問題延到九月新學期開始後再討論。

在這期間，他們並以「東京台灣學術研究會」與「東京台灣青年會」的名義，分發給散居各地的學生一份秘密的宣言，為組織「全台灣學生聯盟」而鬥爭。宣言說：

現在，世界帝國主義的危機正在迫近，資本主義則瀕臨於沒落，××（日本）帝國主義已現出狼狽至極的樣相，為了苟延殘喘，正毫無忌憚地剝削所有無產階級。這次，田中反動內閣假藉整肅日本共產黨之名殘酷地鎮壓勞動者、農民、學生。縱觀古今的歷史，證諸遠近的實例，我們得知令人戰慄的事實，領會了為自己的權利不得不戰鬥的道理。

你看吧！看看展開在我們眼前的光景吧！抗拒××（日本）帝國主義，為全體被壓迫民族的解放從事鬥爭的我先鋒隊，身受著無與倫比的鎮壓。他們逮捕數十名無辜的同志，然後極盡刑求拷問之能事。因此，楊景山瀕臨死亡的邊緣，如今在伊香保過著轉地療養的淒苦境遇。官方捏造的偵查內容，終於把三名同志以違反治安維持法，數名同志以違反出版法的罪名，繫於獄中。我們目睹著非筆墨言詞所能形容的這種暴虐迫害。（中略）被壓迫的民族同胞們！多年來，慘遭可恨的××（日本）帝國主義拚命鎮壓和徹底剝削而陷入極度貧困的台灣民眾，現在已抬起頭來，向他們展開決定性的鬥爭，三萬餘的農民組合員與數千的文化協會會員，以及工友會員等所組成的戰

門隊伍，正站在第一線，與吸吮民眾膏血的××（日本）帝國主義及三井、三菱等大財閥決戰。

這是在長久以來的惡法、惡政，以及土地政策的剝削、欺騙下必然燃起的烽火，而且是任何人都無法制止的力量。同時，也只有體驗了長期鬥爭的過程，始能達到目前這樣的階段。渡過資產階級民主主義，資產階級社會革命的過程，更經過了新自由主義，今天終於展開站在無產階級立場的階級鬥爭了。

可是，三十餘年來，為了建設××（日本）資本主義，他們××（日本）帝國主義者不斷向我們施以窮凶極惡的鎮壓，向我們揮動着剝削的鐵槌。當我們回溯歷史所教育的過程時，我們便知道：對付××（日本）帝國主義的××××××（台灣民主國）鬥爭的流血，××××（噓吧啞）的虐殺，或是竹林事件、二林事件、新竹事件，近如這次的共產黨事件等，都是流血果敢的民族鬥爭。這時候，我們已經不能再無視於它的戰鬥。因為，統治階級必定會拚命死守他們的陣營，進行更為殘酷的迫害和掠奪，以更慘酷的魔法捕盡滅絕我們。

被壓迫的台灣民眾們！

在我們的面前展開着兩條應走的大路！那就是，我們或是背叛正義，變成他們統治階級的忠僕和奴隸，甘受滅亡的命運？或是勇敢地撕破社會的虛偽，為自己的解放而戰。這兩條路是我們所熟識的。殖民地被壓迫民族的解放，也正是全日本無產階級解放的前提。而日本無產階級大眾的解放，也是台灣、朝鮮等被壓迫民族解放的前提。我們一起來向他們顯示整個被壓迫大眾的鐵腕和拳頭吧！然後用大眾的力量，搞活學

術研究會和青年會吧！我們發誓和他們進行再一次的大決戰。

- 一、支持台灣的解放運動！
- 一、即時釋放被檢舉者和被投獄者！
- 一、撤廢台灣民眾的桎梏——特別惡法！
- 一、謀求日、台、鮮被壓迫民眾的提攜！
- 一、發起犧牲者的救援運動！
- 一、爭取使用台語的自由！
- 一、絕對反對日本帝國主義戰爭！
- 一、打倒田中反動內閣！
- 一、死守蘇維埃、俄羅斯！
- 一、守護紅旗！
- 一、建立工農的政府！
- 一、絕對反對台灣總督獨裁政治！
- 一、萬國被壓迫民族解放萬歲！
- 一、積極支援台灣學術研究會及青年會！
- 一、台灣共產黨萬歲！
- 一、台灣獨立萬歲！

一、全台灣學生聯盟萬歲！

暑假結束了。

九月三十日，林寶煙、林衡權、黃宗堯、陳傳興等四人，在林衡權的住處聚會，再次協商組織及指導方針。他們然後努力糾合會員，推動組織的更生運動。然而，終因會員已經離散，難於集結。他們於是改以讀書會的名義進行更生運動。十月中旬，第一次讀書會，在林衡權的住處召開，以〈帝國主義與民族問題〉為教材，進行研讀。讀書會的負責者為林寶煙、陳傳興，下設五部，分別是：救援部／陳在癸，新聞部／林衡權，圖書部／林子禎，組織部／陳傳興，會計部／吳遜龍。嗣後，讀書會在各幹部的住處輪流舉行，雖然努力進行研究、學習；但經時逾月之後也變得消極而徒具虛名。這樣，台灣學術研究會的更生，事實上，已是胎死腹中了。

至於台灣青年會，也同樣地沒有具體的進展而陷入有名無實的狀態。

三、合法性的文化運動

旅居東京的台灣留學生的左翼運動機關，因為台灣學術研究會與台灣青年會更生運動的失敗而瀕臨滅亡的邊緣。針對這樣的危機，林兌、葉秋木、賴通堯等人乃於一九三一年（昭和六年）十二月，在澀谷的〈新台灣大眾時報〉社聚會，協商由東京的台灣人留學生組織民族鬥爭團體的方案。然而，這個組織方案卻因違反「一國一黨」的左翼組織原則而形成僵局。為了打破這種僵局，於是出現了另一種論調——「為了研究台灣的特殊情形，

準備對台灣展開左翼運動，所以，不論組織原則如何，在東京的台灣人非得建立某種機構不可。」這樣，林兌、葉秋木、呂江漢、張麗旭等人便組成「台灣問題研究會」，就有關台灣的各種問題，台灣的共產主義運動，尤其是文化協會的解消等問題，進行討論與研究。

從這時候起，以留學生為主的、東京的台灣左翼陣營便在合法性的文藝、文化運動的掩護下，逐漸開拓新境地；在東京的台灣人的抗日解放運動也轉而朝這方向推進。

當時，日本共產黨為了避免黨的運動相繼不斷地被檢舉，而逐漸發展出利用文化運動的小團體或同好會作為宣傳、煽動據點的新傾向。

一九二八年三月十三日，「日本左翼文藝家總聯合會」成立，文藝運動走向「反帝反資本主義的統一戰線」的新方向。

三月十五日，日共第二次檢舉事件使得統一工作迅速地具體化，三月二十六日，「全日本無產者藝術聯盟」（簡稱「納普」，NAP）成立，革命的文藝運動確立了核心組織；接著在五月創辦了機關雜誌《戰旗》。

十二月底，「納普」重新改組，改稱為「全日本無產者藝術團體協議會」（簡稱仍為「納普」）。第二年（一九三九年）一月至二月，日本無產階級作家同盟、劇場同盟、美術家同盟以及電影同盟等各個團體，分別在協議會的統一領導下成立。其中，無產階級作家同盟成為推進合法的文化運動的中心勢力。

就在這樣的無產階級文化運動的風潮之下，那些試圖再建台灣學術研究會卻無法實現的旅居東京的台灣左翼青年，於是轉而策劃進行合法的文化組織的運動。

台灣文化同好會

大約是一九三〇年（昭和五年）春天，在岩手縣女子師範學校擔任教諭，剛剛出版了一本詩集《荊棘之路》，並且在日本的左翼文壇上博得一些好評的王白淵，就無產階級藝術運動的問題與林兌、吳坤煌等旅居東京的左翼青年研討了一段時日後，終於在一九三二年（昭和七年）二月提出組織台灣無產階級文化聯盟的計畫案。

同年三月，王白淵特地到東京與林兌討論這個計畫。林兌極力，向王白淵說明：過去，在東京的朝鮮人與台灣人，在日共系統的各種組織之外都另外有特殊的組織；事實上，這是違反第三國際組織原則的錯誤行為。因此，他並不同意在東京組織「台灣無產階級文化聯盟」。王白淵也接受了林兌的意見。他們兩人並且一致決定：以後把組織遷回台灣後才來組成聯盟，在這之前，可以在納普的指導下，設立如準備會一類的組織。三月二十五日，王白淵又在林新豐的住處會見了林兌、葉秋木、吳坤煌、張麗旭等人，通過商議，全體一致決定：以「藉文學形式啟蒙大眾的革命性」為目標，組織一個屬於「納普」的「台灣文化同好會」。接著，他們又具體研議了同好會的所有部門與組織方針：

部門：文學部、美術部、演劇部、音樂部、普羅萊斯 (Proletariate esperanto) (世界語) 的縮語) 部、電影部、出版部、會計部

機關雜誌：發行《台灣文藝》。在發行計畫尚未具體化之前，先發行《通訊》。

組織：依照左翼團體組織原則，定為分班組織。

中央大學 吳坤煌 林銜權

日本大學 翁廷森

帝國大學 張水蒼

法政大學 吳遜龍

日本神學校 呂坤煌 謝榮華

(以上為各學校班負責人)

七月，暑假一開始，王白淵就再上東京，為同好會的活動而奔走。月底，他與吳坤煌、林兌、張文環等人商議後，決定先發行〈通訊〉，展開宣傳活動，吸收同志；同時，發動募捐來聚集機關報的發行資金，並指定吳坤煌擔任發行負責人。八月三十日，印成〈通訊〉創刊號七十份，分發給在東京的同志、台灣人留學生，以及島內的同志。其中，題為〈把我們的文化同好會加以擴大吧！〉（芙美基）的文章，具體地表明了同好會的組成意義。文章說：

我們的文化同好會是由一群愛好文藝（文學、美術、電影、音樂、演劇等），同時也對台灣的文化問題有興趣的東京台灣青年組成的團體。所以，凡是對文藝有興趣的台灣青年都應該陸續加入我們的同好會。當然，我們也大大歡迎住在京都或岩手等地的台灣青年參與。倘若這些地方的台灣青年能夠在該地設立同好團體，那是最好不過的事。

我們既然是人，自然都具有藝術的情懷，有人吟詩，有人寫小說、創作，有人喜愛戲劇或電影，有人唱歌，有人繪畫，每個人都有不同的藝術嗜好。假使我們喪失了藝術，那麼，人生的一半就幾近乏味了。

我同好會就是為了幫助發展各人所具有的艺术興趣，而互相聚首來從事研究的會。但我們不單偏重個人的趣味，我們還有重要的另一件事。那就是，凡是台灣青年都明白的，我們殖民地人比母國國人忍受著更多的痛苦。我們沒有比母國人更多的言論自由，甚至連選擇語言的自由都沒有（在東京不能使用台語集會），出版的自由那就更不用提了。但這些卻是提升文化發展不可或缺的東西。

台灣獨特的文化發展，任令日本帝國主義肆意蹂躪，我們所享有的文化並不是真正屬於我們生活所要求的文化，而是帝國主義下的被壓迫文化、奴隸文化罷了。在台灣，從公學校二、三年級起就被強制使用日語。如被發現使用台語講話便要受到懲罰。不能使用自己與生俱來的母語，這是多麼殘酷的事呀！我們本來的漢文文章幾乎已被廢棄了。這種語言上的混亂阻礙台灣文化的發展，是難以估計的。

此外，台灣至今尚未實施義務教育制度。台灣人受過小學教育的還不到全國的百分之三十。這正如革命前的帝俄擁有驚人的文盲群。高等專門學校被少數的反動日本人所獨佔，在它的校門前貼著台灣人不准進入的公告。儘管如此，我們卻不被允許設立私立學校或講習會。我們所受的教育到底是什麼？公學校教科書第一頁的題目是（天皇陛下下的行幸）。嗚呼！這就是我們台灣的現實啊！這裡還有什麼獨自的文化可言呢？所以，我們必須依靠我們自己的雙手來創造台灣真正的文化。我們東京台灣青年文化

同好會的組成，也就是在這種現實的要求下應運而生的。

我們還要進一步促成台灣能夠成立真正的普羅列塔利亞文化組織。旅居東京的台灣人學生們，請踴躍參加，讓我們的文化同好會茁壯長大巴。請把同好會發行的會訊，帶到各地同鄉會，也帶到各學校的台灣人會裡去，使它成為弟兄們的熱門話題吧！

八月二十日，吳坤煌又負責召開《通訊》第二期的編輯會議，努力發展組織。但九月一日震災紀念日當天，同好會的主要成員葉秋木卻因為參加勞動者的反帝示威而被捕；同好會的組織於是暴露，林兌、吳坤煌、張文環、張麗旭等人也相繼被搜查、偵訊；結果，日本警察當局大略把同好會的狀況摸清楚了，其中還特別發現吳坤煌曾於同年二月參加日共資金局的活動，並以台灣人學生為對象廣泛地分發日共的機關報《紅旗》。這樣，剛剛萌芽的台灣文化同好會便被日警當局毫不留情地摘除了。

台灣藝術研究會

一九三二年十一月十三日，台灣文化同好會的成員：林添進、魏上春、巫永福、柯賢湖、吳鴻秋、吳坤煌、張文環等人，經過一再的商量而召開台灣文化同好會第一次重建準備會，協商具體的重建方案。會中，魏上春、柯賢湖、吳鴻秋等人認為：「文化同好會應作為非法組織，歸屬於日本無產階級的文化聯盟。」但吳坤煌與張文環則不以為然。他們認為：「如果同好會以非法性再出發，而我們又參加的話；那麼，它不僅將立即受到鎮壓，而且一般的台灣人學生也必定不敢參加。因此，目前還是以合法的組織形態為宜；但在發展期間可以同時採取非法的實質運動。」大家都能接受他們兩人的意見，於是計畫採用「台

灣藝術研究會」的名稱，推舉當時猶被官方認可的高砂寮寮長張福興出任會長。同時，有人提議舉辦「台灣音樂及演劇之夜」來籌募重建款項，但爭論多時，意見始終不能統一，即告散會。

兩天後（十一月十五日），魏上春、柯賢湖、吳鴻秋、巫永福、張文環、莊光榮、陳某等七人，召開第二次準備會。其中魏上春、柯賢湖、吳鴻秋等三人仍然堅持強硬的「非法性」。他們說：「在左翼運動中，那些害怕被官方鎮壓的份子，勢必會給我們的運動帶來障礙。」但張文環與吳坤煌仍採穩健的策略。他們強調：「不能適應客觀情勢的主張反而會阻礙無產階級文化運動的發展。」經過一番爭論之後，最後決定採用合法組織，做為過渡形態來進行重建的準備工作。

這樣，十一月二十五日召開的第三次準備會，決定暫時保留「台灣藝術研究會」的名稱；同時預定成立後各部門的負責人：

演劇部 張文環 黃波堂

音樂部 ×××

文藝部 巫永福 陳××

文化部 魏上春 吳鴻秋 郭××

十一月二十七日，林添進、張文環、吳坤煌、吳鴻秋、魏上春、黃波堂等人，藉著王白淵被免除教職而到東京的機會，在黃宗壘經營的餐館舉辦王白淵慰問會。在席上，張文環報告了重建文化同好會為藝術研究會的工作狀況；接著，林添進則列舉張文環等人所犯

的錯誤，如：收受楊肇嘉提供的資金，誤解林兌的行動，第一次重建準備會的花費過於浪費，以欺瞞的手段汲汲增加會員的數量等，加以批判。此外，他更進一步主張，台灣藝術研究會「應由歷經千錘百鍊，勇敢且富鬥爭性的戰鬥性成員組成，有如朝鮮同志組成的無產階級文化聯盟朝鮮協議會。」針對這種激進的論調，王白淵先是分析客觀情勢和主觀力量的關係，然後在這個認識上力主暫時仍以現行方針進行重建工作，較為妥當。這次的「慰問會」於是就在兩種不同意見的對立下宣佈散會。

另一方面，張文環還在席上與其他與會者洽商，為了籌募運動資金及提供同志聚會場所，擬開設一家咖啡店。他於是從家鄉籌措資金，設立一家命名為「托里奧」的店。

一九三三年（昭和八年）二月十五日，東京的左翼劇團根據國際革命演劇同盟（莫爾托）的指令，在築地劇場舉辦「莫爾托」日紀念演劇會，並訂二十五、二十六日兩天舉辦遠東民族之夜。吳坤煌在三一劇場所屬朝鮮人金波宗一派人士的支援下，演出《出草智》、《搗杵手》及《霧社之月》等舞蹈及民謠。

三月二十日，東京的台灣藝術研究會終於通過魏上春、張文環、吳鴻秋、巫永福、黃波堂等人四處奔走，努力招募會員之下而舉行成立大會。大會推舉蘇維熊為負責人，並發表該會的組織章程草案，明示「以謀求台灣新文藝之進步發展為目的」，同時以發行《福爾摩沙》雜誌來達成這個目的。最後，通過宣告題為《同志諸君！！》的《福爾摩沙》的發刊詞，作為創會宣言，然後散會。

同志諸君！！（檄文）

當台灣青年手創的文藝雜誌《福爾摩沙》發刊之際，於此聊述一些感想，期能敦

促同志奮起。

綜觀歷史，大凡各種新運動，不論洋之東西，時之古今，殆為青年所發動。由此可見，他們的身心能夠勇敢地正視事物的真相；另一方面，他們貫徹自己信念的意志和體力，也是旺盛的。

台灣改隸已經三十年了，但政治開放運動則僅僅歷時十數年，而且，直到現在都尚未有任何收穫可言。文化運動雖肇始於東京青年學生，但空有熱情卻不知冷靜思考破壞後的建設應如何？因此，這就像是患了一場熱病，很快歸於沉寂。如果要找出「文化運動」的功績，那麼，可以說它只不過打破少許台灣固有的迷信觀念而已。對於向來的政治運動和文化運動各團體所採取的方針，以及其所收到的效果的批評，姑且不論，但我們卻不得不由衷慨嘆沒有願意賭命投入運動貫徹目的的人。有鑑於此，〈福爾摩沙〉雜誌的同仁願與同鄉合作，以團體的力量推動一向被忽視的文藝運動，來提高台灣人的精神生活。

台灣有沒有固有的文化？現在還有嗎？這些疑問曾經被再三提起過。三百年前，從福建、廣東兩省遷移台灣的中國民族之一群，毫無疑問，是中國南方文化創造者的子孫。中國的文化——書畫——文學等等……的創造者，不消說就是他們的祖先。古時的書畫已消蹤滅影，由漢詩所代表的文學，甚至已墮落成應酬的手段，祇是一種無病呻吟的囁語。在政治上、經濟上過完整的生活，當然是第一要緊的事。但除此之外，我們更渴望有藝術的生活。我們必須拯救台灣墮落的文藝。

在政治上，台灣已從中國的屬領轉而編入日本的殖民地了。現正掙扎於特殊的國

情和經濟上的剝削政策之下。而且已被傳統的大家族制度、迷信、邪教歪曲成強弩之末的儒教思想，宿命論的天命思想與佛教的結合，反而產生了許多精神上的弊害。再者，地理上，處在熱帶地方特殊的自然環境中；民族上，則土著的高砂民族和台灣人，以及作為統治者的日本人等三者，雜然地，或和好相處，或對立而居。

擁有數千年的文化遺產，目前又處於各種特殊情況下的人們，迄今未能產生獨特的文化，這可以說是非常不可思議的事。台灣已經萎死了。他們不是沒有閒暇或才能，寧可說是勇氣不夠，以致如此。直到近年，好不容易出現了新人，開始創作繪畫和雕刻，這是值得慶幸的。

原來多受拘束的漢詩，確有束縛偉大思想之弊，時到今日，它可說是一個不合時宜的文字表現形式了。同仁等集合於茲，自許為先驅者。在消極方面，則把向來微弱的文藝作品，以及膾炙民間的歌謠傳說等鄉土藝術，加以整理研究；在積極方面，則決心用我們的全副精神——如上述在特殊氣氛中被孕育的——流露從心坎湧現出來的思想和感情，重新創造真實的台灣文藝。我們是一群想重新創造「台灣人的文藝」的人，決不被褊狹的政治、經濟思想所困縛。擬從高瞻遠矚的見地，觀察廣泛的問題，從事創作，冀望藉以提倡台灣人的文化生活。在地理上，介於日本和中國之間的台灣人，應做仲介互為介紹兩國的文化，以資助東洋文化的進一步發展。……

各位台灣青年——為了使自己的生活自由與豐富，我們應該自己著手推行這些文藝運動。平素心有所感但尚未糾合同志的有志者，須奮起聚集，暢談所思，互相幫助，努力於文藝創作。迄今為止的台灣，只可比喻於錦繡其外，內藏朽骨爛肉的「白色墳

墓」罷了。從今以後，我們非要通過文藝來創造真的「美麗島」不可。

五月十日，吳坤煌、王白淵、張文環、巫永福、蘇維熊、施學習、陳兆柏、王繼呂、楊基振、曾石火等十二人，在張文環經營的咖啡店「托里奧」集會。首先，選舉〈福爾摩沙〉雜誌的編輯部員；結果，部長是蘇維熊，部員張文環，會計施學習、吳坤煌。然後，討論〈福爾摩沙〉的發行問題。五月十八日，編輯部成員為了草擬創刊主旨書再度聚會。結果，通過了一份內容與原先發表的大會宣言書幾乎相同的發刊詞；印製後，在各處廣泛分發。

從此以後，張文環、施學習、蘇維熊等人便為了蒐集稿件與籌措發行資金而奔走各方。到了七月，終於印成〈福爾摩沙〉創刊號五百份，分別寄發東京的主要新聞社、圖書館，以及台灣藝術研究會的會員與島內同志。

四、日共系統的赤色救援運動

自從一九二九年四月十六日日共被第三次檢舉之後，諸如「台共東京特別支部」一類的組織便被認為是違反第三國際「在同一地區不可有二系統以上的組織存在」的組織方針。因此，在東京的台灣人左翼份子之間也力避台灣人本身的組織而參加日本共產青年聯盟、反帝同盟、全協（日本勞動組合全國協議會）、赤色救援會、無產階級文化聯盟及其所屬的文化團體等左翼組織。

一九三一年底前後，在東京的台灣左翼學生受到保釋出獄的林兌（「四·一六事件」

被捕）等人的影響而重新活動起來；他們或者開辦讀書會（如林寶煙），或者對仍繫獄中的林添進與陳來旺展開救援運動。其中的主要人物除了林兌與林寶煙之外，還有張麗旭（嘉義人，帝大生），反帝同盟員葉秋木（屏東人），以及金澤四高在學時代校內讀書會的負責人，來京後又與「全協」發生關係的廖清纒（西螺人）等。他們經常聚會，以台灣問題為主，努力研究，並且在國際紀念日、台灣恥（始）政紀念日（六月十七日）時召開紀念座談會。他們計畫逐步地擴大組織。

一九三二年一月，隨著組織的成長，他們於是在林兌的指導下，組成日本赤色救援會東京地方委員會城西地區（街頭班）高圓寺第十五班；負責人是林兌，班員包括張麗旭、廖清纒、李氏芬、呂江漢、葉秋木、徐新綠、蔡德馨等人。此後，他們經常藉著紀念會或音樂會的名義聚會，籌募救援的資金、物品，勸誘新成員加入，同時研究共產主義。

日本赤色救援會在同年舉行的第三次大會中決定，在中央組織部中設置殖民地對策部，以調查殖民地（朝鮮、台灣）的鎮壓狀況，籌劃救援方案；並擬通過這些活動，設置救援會的支部，以擴大黨的影響力。然而，這個決議一直拖到七月中旬都還未付諸實行。

這時候，組織部專員宮川（瀧澤一郎）便通過林兌的聯絡，召集廖清纒、李氏芬和朝鮮人朴得龍，在徐新綠的居所商討殖民地對策部的組織和幹部人選。會中決定由宮川擔任負責人，李氏芬、廖清纒與朴得龍為部員，各別負責與台灣和朝鮮聯絡，並按照對策部的目標進行資料的蒐集與調查。後來，他們又聚會了幾次，致力於對策部的活動。李氏芬與廖清纒則在林兌的援助下，聯絡島內的左翼份子，推動調查事務。然而在調查尚未有可觀的成果時，便因救援會成員之一的葉秋木參加「九·一」反帝示威被檢舉而中斷了聯絡管

道。到了一九三三年十一月至十二月的時候，所有參與對策部的學生也都被檢舉；殖民地對策部的運動於是宣告中絕。

五、日本、朝鮮與台灣無產階級的文化統一戰線

一九二八年十二月底改組的「納普」（全日本無產者藝術團體協議會），到了一九三二年時，非法性的色彩逐漸濃厚，頗具日本共產黨重建的母體雛形。因此，該會對原屬日共的重要任務之一的援助朝鮮及台灣的革命運動也日漸增加其積極性。除了在組織上確立「一國一黨」的原則之外，並於同年三月，在該協議會下設置朝鮮、台灣協議會，作為指導殖民地民眾的機關，致力於組織殖民地民眾，以及加強與既成團體之間的聯絡。

然而，全日本無產者藝術團體協會朝鮮、台灣協議會組成後，似乎並沒有按照既定的運動方針實踐的跡象。因為這樣，納普所屬的、成立於一九二九年二月十日的日本無產階級作家同盟便根據上述的運動方針，於一九三二年四月設立朝鮮、台灣委員會。

五月八日，納普朝鮮、台灣委員會並以「無產階級作家同盟日本支部朝鮮台灣委員會」的名義，向全日本的納普盟員發出一份〈關於確立朝鮮、台灣委員會的指令〉：

全國的各位同盟員！

我日本普羅列塔利亞作家同盟本部朝鮮台灣委員會，茲指令全國各支部、各支準（支部準備會），應盡早於其機構內設置並確立朝台委員會。

諸位！一如諸位所周知的，現在有眾多朝鮮、台灣殖民地的民眾來到日本內地。

除了少數的學生之外，幾乎全部都是（朝鮮的）勞動大眾。據聞其數目大約有七十萬左右……。可是，七十萬左右的勞動大眾，能夠進入工廠從事勞動的人數，尚不足一成。另外一成乃至二成的勞動人口則充當伏役，受雇於土木建築一類的勞動部門，跟隨工頭或營建組在全國各地流浪。剩下的七、八成勞動者大眾別無任何工作可做，徘徊街頭，瀕臨於餓死邊緣，而且還要受到民族的羞辱、虐待及迫害。……於是，深埋在這些勞動者大眾心底的民族意識和不平之氣，自然而然地會爆發成民族的反抗。

為了要把勞動者大眾和一切殖民地民眾永久套牢在自己剝削和壓制的枷鎖之下，貪婪的日本資產階級正在大力宣傳民族的融合……或最近提出的民族改良主義式的標語——「自治」思想等，想用這些來取代民族革命的獨立和分離思想。他們並且鼓吹勞資協調，乃至議會主義一類的社會改良主義思想，想用這些來取代勞動者階級的階級自覺和團結的思想。一言以蔽之，日本帝國主義企圖灌輸勞動者階級改良主義的妥協思想，藉以誤導階級鬥爭走入改良主義的歧途，把階級團結的方向引向民族對立的分裂階級戰線的方向去。而且所有的法西斯主義者、社會法西斯主義者、殖民地的反動民族改良主義者等，都為此而同心協力推動著。

面對這種情勢，日本無產階級所負的任務，是一面與帝國主義資產階級、走狗以及所有的反動政策鬥爭，一面則力謀實現勞動階級的國際統一戰線，緊密地與處在日本帝國主義壓制和剝削下的殖民地民眾的革命運動取得聯絡和提攜，並加緊把居住在日本內地的所有殖民地勤勞大眾組織化。這對為打倒日本帝國主義而不屈不撓地進行著鬥爭的日本無產階級而言，是一刻都不可或缺的緊急而重大的任務。為完成這一任務，日本無產階級長期以來都不斷從事著鬥爭。

……我同盟自第五次大會以來，即設立朝台委員會。毋庸贅言，這些都是為了完成無產階級文化文學運動所擔負的任務。

但是，我同盟在其後的實踐運動中卻完全放棄了我們所應負的任務。也就是說，朝台委員會的活動，自始至終沒有做過。那麼，為什麼沒有做呢？原因之一就是，同盟內部，特別是朝台委員會內，能成為中心活動分子的殖民地出身的同盟員太少了。而他們卻是對不同語言、風俗、習慣的殖民地大眾進行困難的活動時，最需要的人材。因為他們最能了解這些語言、風俗、習慣，所以也最適合合作這類組織活動。整個看來，力量不足是其中一個原因。但最根本的、本質上的原因，卻在於我們內部本身的機會主義。由於這種機會主義，朝台委員會的活動不是一直沒有進行，便是完全推諉給極少數殖民地出身的同盟員，絲毫不予照顧。不過，現在正是肅清本身的機會主義，樹立做為實踐活動指針的正確活動方針的時候了。因此，我們確定了下面的方針。

對日本內地殖民地大眾的活動方針

活動目標：

一、針對重要地方、重要企業、重要產業，尤其是同盟目標之工廠內的朝鮮勞動者，展開活動。鑑於其可能被利用作破壞罷工的倒戈者的危險性，這種活動具有極重要的意義。

二、針對與反失業鬥爭有關的土木建築勞動者，和一般失業勞動者展開工作。

三、在農村展開農業勞動者的工作。

四、針對與反帝鬥爭有關的朝鮮、台灣學生展開活動。

活動方法：

一、根據大眾對文化、文學的利益及要求，進行鬥爭，以日本無產階級的一般性鬥爭口號動員大眾，以實現爭取多數人的任務要求。與此相反，倘若採取一般性的、抽象性的、說明性的活動方法（如見之於目前大部份同好會所採用者）的話，只能獲得少數無力的文學勞動者而已。

二、為在企業（農業）職場、學校內煽動文化、文學鬥爭，應把整個活動投入這些機構中，隨機應變，推出如新聞、傳單、簡短的小說、詩等的創作，或者創造其他的各種活動形態。

三、要掌握成為活動中心分子的青年勞動者，或知識分子。鑑於現在同盟內缺少殖民地出身的工作者，應爭取可成為同盟員或新幹部的人才，養成在一切文化鬥爭中可作先鋒的幹才，實為最緊急迫切的問題。目前，聚集於一般街頭同好會的會員，大多是知識分子。應計畫把這些分子爭取為同盟員，分配到各職場，組織職場內的同好會。這時候，我們的教育活動、研究批判、討論，必須經常與實踐鬥爭結合方可。

四、進行活動時應廣泛分發日本普羅列塔利亞文化聯盟的出版物。……這些活動應和其他同盟或大眾團體協力進行。

五、為確立日本普羅列塔利亞文化聯盟「朝鮮（台灣）協議會」，以及為組織地方協議會，各支部的朝台委員會應站在最前線戰鬥。

六、支援勞動者一切文學創作活動的同時，作為這些文學可能的結合及表現的一個方法，應提議且指導集體創作。尤以朝鮮勞動者為題材的佳作仍嫌太少的現在，應

努力創作能喚起勞動者大眾鬥爭意志的真正優秀的作品。

七、通過以上的全都活動，朝台委員會才能確立起來。

活動的成果，務必每月一次報告本部。

對朝鮮台灣的普羅列塔利亞文化、文學活動的援助合作

方針：

朝鮮、台灣的普羅列塔利亞文化文學運動，較之日本，不僅落後許多，而且顯得虛弱無力。……

台灣雖然有左翼文藝家聯盟，但幾乎沒有活動可言。我朝台委員會為支援殖民地文化運動，而且也為謀求彼此之間的合作，樹立如左的方針：

一、設法讓雙方了解日本及殖民地的文化、文學運動的情勢。為此，應作定期的聯絡，以及出版物的交換、翻譯和介紹等。

二、派遣指導性的、組織方面的協助者到殖民地。

三、設法把日本普羅列塔利亞文化聯盟及日本普羅列塔利亞作家同盟的出版物，廣泛地散發於殖民地普羅列塔利亞大眾。……

全國的同盟員：

全國大會已漸漸迫近諸位眼前。為了克服過去一年間朝台委員會的沉滯和落後，為確立各支部、各支準的朝台委員會，請積極開始活動吧！就同盟而言，對殖民地大眾的工作是全新的經驗，自然會伴隨著許多困難，不過，也祇有克服這些困難，才有

我們鬥爭的輝煌成果。

日本、朝鮮、台灣的普羅列塔利亞大眾業已博得國際上的聲譽。我同胞正期待著朝台委員會的大躍進！。

通過躍進，我們日、鮮、台的無產階級應該攜手鬥爭！

朝台委員會確立萬歲！

同年的十月左右，朝鮮人蘇垣綠、朴玉順與台灣人吳慶濱、白秀悟等左翼分子，在日本無產階級作家同盟的盟員上田定一的指導下，組成文化同好會。第二年，也就是一九三三年的一月十五日，他們並且對外發行了一份機關報《同志》。在發刊辭中，上田定一明白地表達了這是一個「遵從國際主義精神」，由日本、朝鮮、台灣的文學愛好者緊密的握手和團結而組成的文學同好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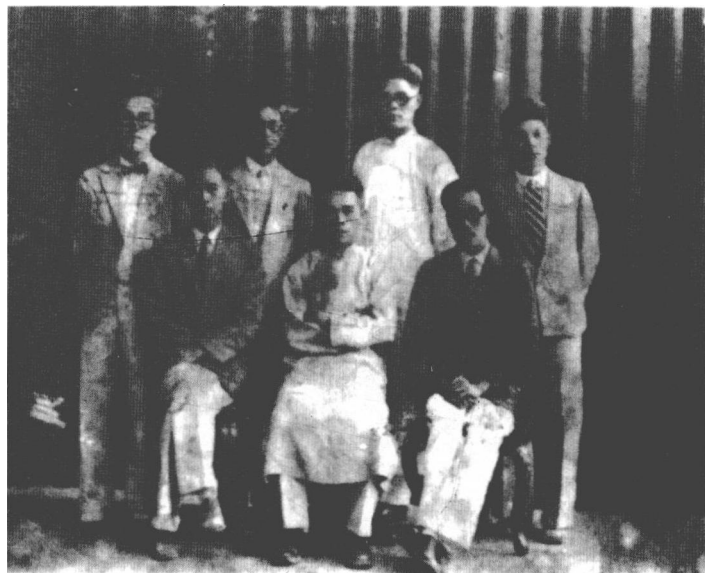
發刊辭宣稱：

我同好會是由日本、朝鮮、台灣的文學愛好者所構成的。這也是我同好會引以為傲的特徵。因為，這證明了我們遵從國際主義的精神，超越國境，緊握雙手並肩前進的事實。

誠如列寧的遺言，我們需要繼續不斷的向過去浩瀚的文化學習，又需要細心、慎重留意文化設施的趕建。我們的……並非在昨天，而是在明天。我們的……是年輕的綠樹。不可一刻或忘於日常的活動和本身的創作，我們擁有未來的青年非前進不可。我們要大力發揮國際主義，高喊日本、朝鮮、台灣緊密的握手和團結。



• 一九二五年的謝雲紅（前排右二）與上海大學的同學們。



• 一九二七年春，留學北京的台籍青年：張我軍（坐中）、洪炎秋（坐右）、吳敦禮（立左）與宋文瑞（斐如）、蘇錦雨等創辦《少年臺灣》月刊。



• 在閩南的台灣學運領導人 留學廈門集美中學時期的翁澤生。

十九世紀二〇年代初葉，在世界民族、民主革命運動的思潮與祖國五四運動的影響推動下，台灣島內一個以「謀台灣文化之向上」，由不同階級出身和不同思想傾向的知識份子組成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線——台灣文化協會，於一九二一年十月十七日，在台北創立。

在文協的文化啟蒙運動影響下，台灣各地也湧現了許多愛國青年的進步組織，並且在工作上與文協保持著密切的聯繫。這樣，在文協的領導下，台灣青年學生發動了多次的學潮鬥爭（詳見第一章）。

在這期間，在中國「第一次大革命」，也就是一九二四至一九二七年國共兩黨合作進行的人民大革命的高潮推動下，台灣青年的民族自信心也大大地受到同屬漢民族的中國青年的革命力量刺激。同時，因為在日本帝國主義統治下的台灣大都沒有發展才能的機會，加之台灣當局又常戴著一副赤色眼鏡監視他們的行動；再加上大陸的學費較便宜的條件下；儘管他們明明知道中國現在的山河破碎，文運不興，然而渡海到祖國留學的人數卻一年比一年增多。在整個中國革命氣氛的感染下，這些留學大陸的台籍青年學生也聯合祖國同胞，成立了許多以學生為主體的反日愛國進步組織，其中比較知名的有：在上海的台灣青年會（一九二三年十月）、平社（一九二四年三月）與上海台灣學生聯合會（一九二五二月）；在北京的北京台灣青年會（一九二二年一月）；在閩南的廈門中國台灣同志會（一九二五年四月）與閩南台灣學生聯合會（一九二四年四月）；在南京的南京中台同志會（一九二六年三月）；在廣州的廣東台灣學生聯合會（一九二六年十二月）與廣東台灣革命青年團（一九二七年二月）等等。這些反日的愛國進步組織都加入祖國人民的反帝鬥爭（如五九國恥紀念），積極開展宣傳活動，在揭露日本殖民統治罪行，聲援島內人民鬥爭，促進祖

國同胞與台胞的團結，聯合東方被壓迫民族開展民族解放運動等方面，做了大量的工作。

就運動性質而言，台灣總督府警察當局認為，在上海、閩南與廣東的台灣學生聯合會，是這些台籍留學生聯繫中國共產黨指導下的全國學生聯石會及其他團體而組成的、進行反帝國主義運動的團體。在台灣社會運動陣線中屬於無產階級運動的陣營。其中，以南京為中心的中台同志會及在廣東的台灣革命青年團的活動，乃其最尖銳的先驅運動。

第一節 在上海

一九一七年，俄國十月革命的勝利，一九一九年中國五四愛國運動的爆發，以及馬克思主義在中國的傳播，中國共產黨的成立（一九二一年）和中國無產階級登上政治舞台，使世界及中國的形勢發生了根本變化。

台灣的留日學生在祖國五四愛國運動所掀起的民族革命思潮的影響和推動下，民族意識高漲，學習漢語，使用中國年號，稱中國為「祖國」，蔚然成風。一九一九年底，蔡惠如、彭華英、林呈祿、蔡培火等與當時留居東京的中華青年會總幹事馬伯援等聯合組織了聲應會；接著又集合同台籍留學生百餘人組織了新民會和東京台灣青年會。一九二〇年，為了加強與祖國的聯繫，蔡惠如、彭華英先後潛往上海，與當時中國國民黨和朝鮮民族運動領導人秘密接觸。同年八月，蔡惠如在中韓互助社歡迎國民黨左派領袖徐謙的集會中發言，

抨擊日本在台殖民暴政。

一九二三年一月，孫中山在上海會見蘇俄政府特使越飛；不久發表了〈孫文越飛宣言〉，公開揭示了聯俄政策。這標誌著國民黨政策的重大轉變。

在確立聯俄政策的同時，孫中山在中國共產黨人李大釗的幫助下，開始了改組國民黨的工作。一九二三年十一月，孫中山委派廖仲愷和共產黨人譚平山等九人組成的國民黨臨時中央執委會發表〈中國國民黨改組宣言〉，說明國民黨改組的必要性和基本要求。一九二四年一月二十日至三十日，中國國民黨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在廣州召開。大會在廿三日通過了〈中國國民黨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宣言〉，制定了以打倒帝國主義和國內封建軍閥為奮鬥目標的革命綱領，規定了包括廢除一切不平等條約在內的內外方針，確立了聯俄、聯共、扶助工農的三大革命政策。這個宣言成為第一次國共合作的革命統一戰線的共同政治綱領。

因為受到改組後的中國國民黨「聯俄、聯共、扶助工農」三大政策的影響，在上海的台籍民族主義者蔡惠如也受到新思潮的啟迪；他於是與曾於一九二〇年（大正九年）加入高津正道、堺利彥等所組的社會主義團體「曉民會」的彭華英，以及原本左傾的許乃昌，共同學習共產主義的世界觀，並且認識到：「民族問題是無產階級革命的總問題之一部份，民族問題的解決只有與無產階級革命發生關係」才有可能實現。因此，他們把台灣民族解放運動視為世界反帝革命運動之一部份。

在這樣的認識基礎上，蔡惠如更把台灣解放的目標放在通過「中國國民黨援助」而使「台灣回歸中國」。此後，他即密切地與在北京的謝廉清、謝文達等，在東京的新民會、

台灣青年會，以及在島內的文化協會幹部，聯絡合作；並且頻頻接觸中國國民黨、蘇聯領事館，以期通過台灣脫離日本殖民統治的民族解放運動，發展為打倒日本帝國主義的聯合陣線。

一、上海台灣青年會

一九二三年十月十二日，蔡惠如糾集十幾個旅滬的台籍青年學生，在上海南方大學組成「上海台灣青年會」。大會同時公布了該會會章，其中「總則」第二條規定，該會「以忍耐、堅毅、勉行為信條，以促進會員之互助親睦，研究中外文化為目的。」事實上，這只是它表面的偽裝，它實際的目標則是通過台灣的民族解放運動來打倒日本帝國主義。

同年十二月十六日清晨，台灣總督府警務局針對台灣的議會設置請願運動者，在本島展開由北到南的大檢舉。當天總共有九十九人遭到扣押、搜查或傳訊；而運動的主要領導者：蔣渭水、王敏川、蔡惠如……等都被扣押。史稱「治安警察法違反檢舉事件」，簡稱「治警事件」。

據葉榮鐘先生的描述，事發後，台灣一切對外簡訊都被當局所控，街頭巷尾及公共場所都有特務站崗，未被檢肅的請願運動者也被特務監視。一時之間全島風聲鶴唳，民心惶恐。而整整一個月期間，台灣的三家日報——《台灣日日新報》、《台灣新聞》及《台南新報》——對這次事件都隻字不提。

在上海的台灣青年會透過管道接到「治警事件」的速報後，認為應把它訴諸國內同胞，

喚起輿論的注意，以提高反對勢力的聲勢，乃於一九二四年一月十二日，在上海務本英文專門學校召開旅滬的台灣人大會。當天計有彰化籍的謝廉清、連枝旺、許乃昌、陳滿盈（陳虛谷、詩人）、甘文芳，台北籍的張我軍（作家）、林鵬飛、鄭進來，嘉義籍的林瓊樹、羅渭章，以及李孝順（汐止人）、張桔梗（台南人）等十幾個人出席。他們在會上紛紛抨擊田總督施政的錯誤，並草擬一份抗議書，另外加上一份主旨書，一併寄給日本帝國的總理大臣及其他有關部門，聲援「治警事件」的受難者。

五九國恥日示威遊行

一九二四年五月九日，中國國民對日外交大會在上海舉辦「國恥紀念大會」。青年會幹部與一些朝鮮同志共同參加了這個紀念大會，並在大會現場散發共同打倒日本帝國主義的傳單。傳單特別指出：

我台灣被如狼似虎的日本帝國主義者所強奪，三百六十萬同胞飽受殘暴的剝削與壓迫。現在，台灣人民已經覺醒了，願與各位攜手、團結，打倒共同的敵人日本帝國主義。諸位，為了自由和獨立，請儘快幫助我們台灣人吧。

反對台灣始政紀念日

同年的六月十七日，恰逢日本帝國在台「始政」紀念日。對台灣人民而言，這一天卻只能說是「恥」政紀念日。因此，青年會幹部及會員四十人，在務本英專召開「反對台灣始政紀念日」的集會，會中除了各自痛罵日本在台灣的殖民統治，報告被壓迫的台灣民眾

受苦的狀況之外，並在各地散發〈毋忘台灣〉的傳單。

反對有力者大會

一九二三年（大正十二年）六月十二、十三兩日，由東京歸台的留學生黃呈聰、王敏川等人在台中公會堂舉辦文化講演會。當講演完畢，即將散會之際，時任總督府評議員的辜顯榮突然出現會場，自動登台演講，攻擊文化協會一派「偏激份子」的宣傳言論與台灣議會設置運動，實際上對台灣島民的美滿生活不能有所幫助。事後，辜顯榮認為戰火既開，乃急速聯絡全台首富的板橋林熊徵，及李延禧、許廷光等親日富紳，於十一月八日組成「公益會」；同時，為了「向天下宣明，所謂『台灣議會設置運動』者，絕非本島之真正輿論。」而於一九二四年六月廿七日，在辜顯榮私邸召開第一次全島「有力者」大會，擴大宣傳。這樣，一度隱退的林獻堂只好正式披掛上陣，親自對抗辜顯榮。他與文協會員幾經討論後，決定於七月三日，分別在台北、台中、台南三地，同時舉行全島「無力者」大會，以對抗「公益會」的「有力者」大會。

當這個運動訊息傳到海峽對岸時，散居大陸各地的台籍民族主義者都紛紛起而響應。上海台灣青年會則以「在華反全島有力者大會」的名義，作成討伐辜顯榮等「有力者」的檄文，寄回島內散發。檄文針對「以辜顯榮、林熊徵為首」的所謂「有力者」毫不留情地批判道：

你們受到台灣總督府的特別照顧而享有特權——諸如鴉片、酒、鹽、菸草等，無一不是政府為餵養諸位而供給的資源——直言之，你們不過是台灣總督府所飼養的走

狗罷了。你們素來和總督狼狽為奸，剝削我們的自由和膏血。這樣，你們又如何能區別有力者和無力者呢？你們罔顧台灣之大局，毫不顧慮台灣之民意，只以糾合同類走狗為能事，捏造輿論，提供總督府作為壓迫民權運動的材料。你們僅計較自己的利益，追求勳章，憧憬特權。這些行為既是沒良心的各位所長於表現的，所以本也不足為怪，但民意是不能加以蒙蔽的，輿論也是不能加以捏造的。你們為何膽敢如此？誠不願偃旗息鼓，還要繼續作奇奇怪怪的勾當嗎？難道你們今後仍要自欺欺人，終而自取公眾的羞辱嗎？需要反省啊！

我們台灣人的臉被你們徹底丟光了。雖然你們不必愛惜自己的台灣人顏面，但也不要忘記省思一下我們同胞的處境喲！

二、旅滬台灣同鄉會

一九二四年五月以後，上海台灣青年會因為經費困難而陷入停滯狀態。五月廿四日，蔡孝乾等青年會幹部便把辦事處從閩北振盛里寶山路九四八號遷到法租界鉅興里筐籟達路六號，並就發行機關誌，支持台灣議會設置請願運動、加強與島內的文化協會合作，爭取經費等事項，重新協商。

十一月十六日，以蔡孝乾、陳炎田（宜蘭人）、李孝順等為首的幹部，在閩北公興路共和樓茶館召開青年會秋季大會。參加者除五十餘名會員外，還有十幾名旅滬的台灣人。會中並聽取一名在商務印書館編輯部工作的祖國人士所作的有關民族問題的演講。在演講中途，當地軍警以戒嚴為由下令解散。大會因此把演講會改為座談會，繼續開會。席上有

人提議，青年會的成員不該只限於學生，應該改變為能廣泛包容台灣人的團體。大會通過此項提案，於是決定解散台灣青年會，重新組織「旅滬台灣同鄉會」，並推舉彰化籍的蔡孝乾、陳北塘與陳紹馨（汐止）、鄭進來（新店）、陳炎田（宜蘭）、林劍英（嘉義）、何景寮（旗山）等為創會委員。

旅滬台灣同鄉會的主要幹部其後雖然四處奔走，募集經費，但結果並不十分理想；因此該會的活動也一直搞不起來。後來，大部份的學生又因為認同中國的共產主義運動而對向來的民族自決主義運動採取否定的態度，並在組織上發展到純共產主義系統的上海台灣學生聯合會的階段。在這樣的情況下，一九二五年一月，許又銘、謝呂西、林策聲等人雖努力以台灣同鄉會的名義召集其他會員，策謀運動的再興，終因無人垂青而自然地無疾而終。

三、上海台灣學生聯合會

一九二五年，原上海台灣青年會的左傾幹部：蔡孝乾、彭華英、許乃昌、何景寮、王慶勳等人，糾集暨南大學、大夏大學和南洋醫科大學等校的台灣學生，做效中國的「全國學生聯合會」（一九一九年六月成立）的模式，組成「上海台灣學生聯合會」。由於這是一個左傾的學生地下團體，它的詳細情形日本警察當局也不太清楚。他們掌握的訊息是，據說蔡孝乾等人在一九二五年十二月二十日在大夏大學發起，除了上海當地的學生之外，他們並向廈門以及其他各地的留華學生發出邀請檄文。然而，成立大會當天，由於大夏大學向來被視為共產主義者的巢穴而受到當地公安局極為嚴厲的取締，只好臨時把會場改為

法租界內的南光中學。大會由蔡孝乾、何景寮兩人擔任司儀，與會者計有台籍留學生一百多名，以及十名朝鮮人與中國人。

此後，上海台灣學生聯合會便在台籍中共黨員翁澤生指導下，隨著中國學生運動的興衰，或向前發展，或停滯沉寂，並隨著運動的進程而逐漸加深其共產主義的思想傾向，為台灣本島的共產主義運動鋪路。

翁澤生與讀書會

翁澤生，一九〇三年生於台北市。太平公學校畢業後即渡海到福建集美中學讀書（一九二一—一九二四）；一九二五年，從廈門大學轉到中共創辦的上海大學，受教於瞿秋白；並在同一年加入中國共產黨。跟隨他從台北到上海藝專讀書的謝志堅（原名謝玉葉），也在他的影響下入黨。

一九二六年十一月，在北伐軍進入福建的有利形勢下，翁澤生奉中共中央之令，組織旅滬的閩、台學生，到閩南進行革命活動。一九二七年四月，蔣介石在上海發動「四·一二政變」，肅清國民黨裡頭的共產黨員。翁澤生由於在閩南漳州公開活動，暴露了身分，不得不奉中共閩南特委之指令，於五、六月間回到白色恐怖籠罩的上海。這時候，革命已經轉入低潮。但翁澤生仍堅持秘密鬥爭，聯絡一批上海台灣學生聯合會的學生，秘密組織台灣青年的讀書會，熱情地指導他們學習馬列主義的革命理論。

這年十二月，翁澤生通過中共中央介紹，認識了剛從莫斯科學習回來的台籍中共黨員林木順和謝雪紅。同年七月共產國際在討論〈日本共產黨綱領〉時規定：「要使殖民地完

全獨立，日共有責任指導台灣的共產主義運動。」林木順和謝雪紅便是遵循這個規定接受日共指導，並接受其推進台灣共產主義運動於實踐階段的指令而返歸上海，與翁澤生商議組建台灣共產黨。他們一致認為：為了加強台灣革命運動的領導和擴大台灣的革命力量，必須聯絡大陸、台灣和日本的台籍共產黨員，共同創建台灣共產黨。並且接受日共指令，「暫時以翁澤生共產黨台灣民族支部的名義組黨且行動」；同時因為日共正忙於國內普選的政治鬥爭，而按其指示，「接受中國共產黨的援助及指導進行組黨」。三人之中，翁澤生曾經組織過上海台灣學生讀書會，聯繫面較廣，因而承擔了較多的任務。

他們通過翁澤生的安排，吸收台灣學生聯合會的左傾學生：江水得、楊金泉、林松水、劉守鴻、張茂良、陳粗皮、陳氏美玉、黃和氣等人，以「研究社會科學，學習中國語」的表面理由，開辦讀書會；實際上則是從事黨幹部的養成及訓練，進行組黨的準備工作。

紀念朝鮮三一·一革命運動

除了內部的組訓工作之外，讀書會的成員也與中國共產黨及朝鮮共產主義者積極聯繫，進行活潑的國際主義的實踐。

一九二八年三月一日，在上海的「大韓民國臨時政府」，在法租界舉辦「三一·一紀念節」（一九一九年三月一日的反日獨立運動）慶賀式，讀書會的幾名會員也參加了這項紀念活動，並由張茂良代表「在日本帝國主義高壓下呻吟的台灣人民」，向朝鮮革命民眾致詞。張茂良首先站在國際主義的立場場說明：「朝鮮的革命紀念日不只是朝鮮同胞的紀念日而已，它同時也是全世界被壓迫民族的紀念日。」接著他就分析了「三一·一」運動以來

「日本帝國主義終致崩潰的必然性」。他特別強調「三·一」革命運動的教訓是：「朝鮮獨立運動倘要成功，只有以無產階級和農民作先鋒，率領一切反抗日本帝國主義的民眾，並緊緊地和全世界所有無產階級與被壓迫民眾攜手合作，才能達成。而且，它絕對必須在列寧主義的施幟下，有組織、有規律地展開才可以。」最後，他高呼：

打倒日本帝國主義！

打倒世界的帝國主義！

日本、台灣、中國、朝鮮的革命大眾緊緊團結！

朝鮮獨立萬歲！

世界革命萬歲！

紀念國際婦女節

一九二八年三月八日，為了紀念國際婦女節，上海台灣學生讀書會成員陳氏美玉等，以「台灣婦女解放同盟旅華支部」的名義，印製了紀念日宣言書，寄發給以上台灣學生聯合會及朝鮮人團體為主的同志們。該宣言書認為：「這一天，是我全世界被壓迫婦女共同團結在第三國際的旗幟下，向壓迫階級宣戰的一個日子。」婦女們「已不能再忍受『三四德』鴉片般的陳腐道德思想，也不能信賴現代資產階級虛偽矯飾的文明」。婦女們「必須團結，用紅色共產主義把自己武裝起來，握緊武器，以國際性的團結力量，開拓進路」。婦女們的「解放，只有依靠勞動軍的決戰才是可靠的」。最後，它呼籲中國、台灣、日本

及全世界被壓迫的婦女們聯合起來！

打倒日本帝國主義！

打倒國際帝國主義！

擁護中國革命！

擁護蘇維埃聯邦！

上海讀書會事件

當讀書會成員在學習共產主義之餘也開始進行活潑的實踐運動時，上海日本總領事館警察署卻截獲一份由「全台灣打倒總督獨裁政治大會」具名，題為〈對昭和二年（一九二七年）底朝鮮共產黨事件致朝鮮同胞諸君〉的宣傳文件。日本警察署探知這份傳單實際上是在上海的台灣留學所擬，因而暗中注意他們的行動，並且探悉有幾名左傾的台灣學生不但參加了旅滬朝鮮人舉行的「三・一節」九週年紀念會，而且在會上公開朗讀「日本、台灣、中國、朝鮮的革命大眾團結起來，打倒日本帝國主義與世界帝國主義！」的賀詞；另外，他們也同時獲悉台灣共產主義者林木順等頻頻聚會，似乎正在進行組織某種秘密結社。日本警察署經由內部偵察結果，決定加以全面檢舉。

一九二八年三月十二日，日警逮捕了黃和氣（旗山人）、江水得（潮州人）與陳美玉（台北人）；三月三十一日，日警又逮捕了陳粗皮（北斗人）；四月二十五日，日警在第三次檢舉中又逮捕了謝雪紅（台中人）、張茂良（竹山人）、楊金泉（台北人）、林松水（南投人）、劉守鴻（潮州人）等，前後一共九人。由於日警掌握情報所知與台灣共產黨

有關的林木順並未被捕，而他們九人又都否認與台共組黨有關；結果，台北地方法院以證據不充分而釋放謝雪紅、陳美玉及黃和氣三人，其他六人則以「與翁澤生及其妻謝氏玉葉，共同擬以否認日本帝國的台灣統治權，促使台灣獨立，變革我（日本）國體，且否認私有財產制度，以期實現共產主義社會目的，而組織上海台灣學生讀書會」的犯罪事實，交付違反〈治安維持法〉公訴，並於一九二九年（昭和四年）五月廿一日宣判：

楊金泉 有期徒刑三年

張茂良 有期徒刑二年六個月

林松水 有期徒刑二年

劉守鴻 有期徒刑二年

江水得 有期徒刑一年六個月

陳粗皮 有期徒刑一年

後來，林、劉、江、陳四人獲緩刑四年的處分；楊金泉和張茂良經上訴後，改判二年，發監服刑；這次讀書會事件才結束。

一九二八年四月十五日才剛成立的台灣共產黨遭此打擊，原來依照黨大會及中央委員會決定之黨機關的構成，鬥士的配置，活動的展開等預定計劃，也因此無法進行。

上海台灣學生的讀書會活動也因此而沉寂下來。然而，因為當時日警還搞不清楚上海讀書會與台共之間的關係，台灣學生聯合會得以暫時無恙。當上海的反帝運動在一九二九年出現高潮時，該會便在翁澤生與林木順的指導下，以上海（共產主義）台灣青年團的名

義投入反帝運動。

反帝的資產階級民主革命

在上海讀書會事件的檢舉中僥倖脫險的翁澤生與林木順，暫時停止對台灣留學生的工作，靜待時機。這段期間，他們兩人也恢復了中國共產黨的黨籍。

當時的中共，在一九二七年的武漢清黨之後，緊接著「南昌起義」，湘鄂贛粵四省的「秋收起義」乃至「廣州起義」都相繼失敗；因而在共產國際指導之下，改採蘇維埃路線。

一九二八年七月九日，中共〈第六次全國代表大會政治決議案〉明確地表示，「中國共產黨第六次大會完全同意於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第七、第八、第九次全體會議對於中國革命性質之估量——中國革命現在的階段是資產階級性的民權革命，推翻帝國主義及土地革命是革命當前的二大任務」。決議案同時也總結了中國革命第二時期——左派國民黨時期——革命失敗的原因，首先就是帝國主義勢力的阻礙。它指出：「中國革命的主要敵人，帝國主義是一切反動力的組織者和支配者。帝國主義利用自己政治上經濟上的威力，對民族資產階級做些小小的讓步，威逼利誘的分裂民族聯合戰線，用賄買軍閥的舊方法，用武力的砲艦政策壓迫革命，實行經濟封鎖。利用自己的強大威力（銀行、公司、軍艦、軍隊等），造成阻礙中國革命發展和勝利的最嚴重的困難之一。」同時「因為中國革命失敗，因為工農暴動被鎮壓下去，因為民族資產階級背叛民族解放的革命，所以帝國主義在中國的力量比一九二五至一九二七年，鞏固了些加強了些。日本對於中國北方的侵略，濟南的出兵，實際上是瓜分中國的開始」。它認為「瓜分政策的目的：一是用非經濟的強暴力量，

實行殖民地的經濟剝削，而完全消滅中國的革命；二是加緊爭奪市場的鬥爭」。而列強在加緊爭奪中國市場的同時，彼此之間的矛盾就要劇烈起來，因此，太平洋上將發生瓜分中國的帝國主義大戰的危險，中國的沿海各省將要成為戰場。通過這樣的革命形勢的評估之後，大會決議要重視「反帝國主義運動及其將來廣大下層群眾的反帝鬥爭」，並在將來新的革命高潮中，通過「武裝暴動」推翻帝國主義、地主資產階級的國民黨政權，完成「資產階級性的民權主義革命」。最後，大會並規定「中國革命現在階段之中的主要口號」十條；其中，頭一條就是「推翻帝國主義的統治」。

此外，中共中央並通過十一月十一日印發的〈告全體同志書〉，總結了「第一次國內革命戰爭時期」以來黨員同志的不正確的觀念，要之為八種，其中第五種即是「輕視反帝運動和偏重反帝運動的危險」。它認為，「這是兩個極端的觀念」。「輕視反帝運動」者「以為工人的經濟鬥爭，農民的土改革命就是反帝運動，此外別無反帝工作」，而「偏重反帝運動」者卻「以為只要造成反帝高潮，便可發動一切工作，甚至主張以『反帝運動來掩護階級鬥爭』」。中共中央指出，這兩個極端的觀念「都是犯了右傾或左傾的危險，我們必須嚴厲的糾正這些錯誤，才能正確的運用（六全）大會的決議與精神，才能走上正確的布爾什維克的策略的路線」。

在這樣的政策指導下，中國各地的帝國主義革命運動便在國民黨政府以高壓手段嚴鎮之下致力展開。一九二九年六月十六日，上海工會聯合會青年工人工部與上海青年聯合會等六、七十個左傾團體（其中與台灣有關係的團體是「台灣青年團」與「台灣學生聯合會」），利用「國際反帝大同盟」與「國際青年反帝大同盟」召開「國際反帝代表大會」的時機，

在上海成立「上海青年反帝大同盟」，真正站在全國人民反帝國主義革命運動的第一線，聯合全世界被壓迫階級，開始向帝國主義攻擊。該同盟認為唯有「大眾性的、反帝國主義的革命運動的發展，才能摧毀帝國主義在中國的勢力，消滅國民黨與帝國主義者的一切勾結行動，然後將帝國主義徹底逐出中國。」

六·一七紀念日鬥爭

在反帝運動昂揚的革命形勢下，翁澤生與林木順於是再度出來工作，把在上海的台籍學生組織起來。一九二九年六月上旬，他們兩人通過進行「六·一七紀念日鬥爭」的計劃，糾合了上海台灣學生聯合會與台籍青年的左傾份子：蔣麗金、李能茂、周宗河、劉照明、沈西東、林延年、陳麗水、劉學海、林某等人，設置六一七鬥爭籌備會，決定鬥爭方針。

籌備會決議在六·一七紀念日當天舉辦遊藝大會，邀請中國人及朝鮮人所屬的友誼團體來參加，然後再看當天聯誼的狀況來決定將來應成立什麼性質的組織。為此，他們推選劉照明、林延年、翁澤生、林木順、蔣麗金等五人為籌備委員，負責遊藝大會的主要工作。此外並由林木順負責邀請朝鮮人組成的歌舞伎團，李能茂邀請中國人組成國貨獎勵團，沈西東邀請中國醫學院的音樂團等友誼團體來共襄盛舉；至於大會所需的財源則由各籌備委員分頭募捐。

為了動員上海台灣學生聯合會的學生，翁澤生、林木順、李能茂、林延年等人特地在六月十天左右，借大夏大學教室召集上海台灣學生聯合會代表大會。翁澤生被推為大會主席，報告了有六·一七紀念鬥爭的計劃；然後由籌備委員就各人分擔的工作，報告進行的

狀況，同時向學生們說明遊藝大會當天預備上演的戲劇內容及其角色。十二、十三兩天，那些決定參加演出的學生在鄭連捷指導下，與一名中國女性演員一同在大夏大學的宿舍排練。

六月十六日，「上海青年反帝同盟」（簡稱「青反」）在上海共同租界內舉行成立典禮，大會通過參加台灣六·一七紀念大會的議案；會後並召開第一次執行委員會，協議「除由大會派遣兩名代表外，所屬各團體至少須派出五名代表參加」，並決定散發題為〈六·一七紀念告民眾書〉的傳單。

到了六月十七日紀念日當天，翁澤生等人便借用租界基督教會的教堂，舉辦六·一七紀念大會及遊藝大會。

翁澤生首先在紀念大會的開場演說中強調：「三十多年前的今天，台灣淪為日本的殖民地。爾後，台灣人民在社會上的一切權利都被剝奪了，變成只盡義務的奴隸，甚至無法在台灣受教育。」因此，他特別向在場的朝鮮與中國的革命志士們呼籲：「當此紀念日，我等台灣人希望中國、朝鮮各團體互相提攜，向日本帝國主義鬥爭。」

接著，由數名隸屬上海青年反帝同盟的各團體代表致詞。六·一七紀念大會結束後，遊藝大會接著舉行。朝鮮歌舞伎團、中國國貨獎勵團及中國醫學院音樂團等輪番表演。最後，由台灣青年演出批判日帝在台的暴虐統治及與其勾結的中國國民黨的宣傳劇——〈殖民魂〉。它的情節大概是說：「台灣某個豪門之家因為反抗日本軍隊及警察，結果造成自己及其母被殺，其子負傷痊癒後出走中國大陸，委身於某富豪家作園丁，後來也因被國民黨特務發現而慘遭殺害。」

四、上海台灣青年團

六·一七紀念結束之後，翁澤生、林木順、鄭連捷、劉子愷、陳麗水、李肇基（友邦）、林延年、李能茂、蔣麗金、劉家浪等籌備員，再度集合於大夏大學，召開六·一七紀念鬥爭的檢討會，並商討解散六·一七籌備會的事宜。翁澤生首先以大會主席的身分，對六·一七紀念會的工作進行自我批判；接著，其他工作的負責人也輪番進行工作檢討，最後，一致決議，宣布解散六·一七籌備會。

六·一七籌備會解散後，翁澤生又提議由居住上海的台灣青年組成解放團體，「上海台灣青年團」於是成立。關於上海台灣青年團的成立過程，翁澤生在被捕之後對日警的敘述如下：

一九二九年六·一七紀念會未召開之前，由於受到當時反帝戰線高潮的刺激，台灣青年也參與上海反帝戰線。當時是以流動性集團參加，沒有確定的名稱，人數也不定。或者以台灣青年團，或者以台灣青年同盟的名義，參加上海的反帝集會。但如一直維持這種權宜方式參加反帝集會將產生阻礙，也難以積極進出。因此，需要有固定的團體。

每逢上海有反帝集會時，由我通知台灣青年場所及時間。我在上海青年反帝大同盟中工作是因為頗受台灣青年們的歡迎。為了聯合台灣青年使上海的反帝工作獲得進展。我認為我自己應該成為勞動者，深感有接觸勞動者，暫離學生們的必要。

把這批人組成一個團體的提議，並不是在六·一七鬥爭籌備會解散的當天，而是

在六月底或七月初，於某人家中，由我、林木順、李能茂及其他一、二位人士，決定以上海台灣青年團為臨時名稱，製作章程，初步決定以參會者為幹部。

從東反到上海反帝大同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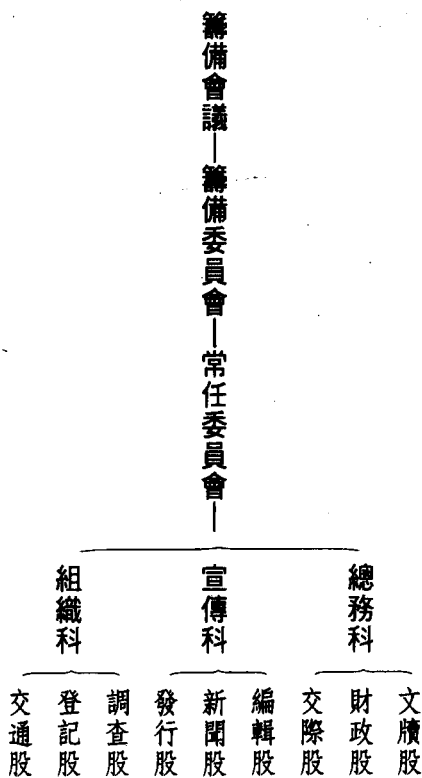
事實上，上海台灣青年團自成立後便很少孤立地行動。一九二九年七月，翁澤生與林木順代表台灣青年團與上海青年反帝大同盟所屬各團體中的中國共產黨細胞，通過兩次協議會後，籌組「東方被壓迫民族反帝大同盟」(The anti-Imperialist League of Eastern Oppress Races，簡稱「東反」)。接受中共黨中央的直接領導，執行東反的三條宗旨：

- 一、促進東方被壓迫民族的反帝鬥爭。
- 二、發動中國被壓迫民族參加中國革命。
- 三、促進東方被壓迫民族及被壓迫階級革命勢力的團結。

七月十日，翁澤生與林木順再度代表台灣青年團出席東反籌備會黨團(Fraction)會議。當天的會議，中共中央特別任命務委員會(周恩來創建並領導的白區組織，簡稱「特委」)與江蘇省「特委」也派人列席指導。會議重新確定東反的三大目標；同時決定採擇「特殊性」、「地方性」的組織方針，不與上海反帝大同盟及上海青年反帝大同盟衝突，召集當時在上海的東方被壓迫民族的大眾革命團體，使其加入東反籌備會，逐漸把組織由上海推及中國各地，然後向太平洋沿岸各地擴大。會議因此決議公開發表宣言，邀請印度、安南、菲律賓加入。

不久，第二次黨團會議在中共中央特派員列席下召開，決定有關邀請印度、安南、菲

律賓入盟的具體工作及負責人，並通過召開全體大會或執行委員會來組成籌備會。籌備會的內部組織如左：



台灣青年團的代表翁澤生除了被選為總務科長之外，並負責起草籌備會的成立宣言。

一九三〇年四月底，中共中央為了確立同類團體的統一方針，而將東反、青反乃上海各界的反帝組織合組為「上海反帝大同盟」。當時參加的重要團體有：上海總工會、自由大同盟、上海革命學生聯合會、社會科學聯盟、上海韓國青年同盟、瓊崖青年會、上海文化大同盟、上海中華左翼作家聯盟、上海安南青年同盟、貧民協會以及上海台灣青年團等二、三十個團體。在這之前，東反一共召開了六次黨團會議，並且進行過「反對帝國主義進攻蘇聯、瓜分中國」的「八·一」反戰示威，以及雙十節、東京事件與十月革命等紀念

日的鬥爭。台灣青年團的領導翁澤生不幸在「八·一」鬥爭中被捕。

政治路線、組織與宣傳

一九二八年，中共黨人朱德、毛澤東等創建了井岡山根據地，點燃「工農武裝割據」的星星之火，開闢了「農村包圍城市」的中國革命新道路。一九二九年，各地紅軍充分利用軍閥混戰的有利時機，開展土地革命鬥爭，建立蘇維埃政權。中國工農革命的星星之火開始成為燎原之勢。到一九三〇年上半年，全國正式紅軍已發展到十三個軍，約十萬人，開闢了大小十五塊革命根據地，分布於十幾個省的三百多個縣。當然，這些根據地一出現就不斷地遭到蔣介石軍隊的「圍剿」。另一方面，在紅軍和根據地鬥爭得到很大發展的同時，中共在國統區的工作也在周恩來、劉少奇等的領導主持下，有了相當程度的恢復和發展。面對這樣的國內革命情勢，台灣青年團內部的革命士氣也逐漸高漲；再加上受到反對逮捕留日左翼學生事件等氣氛的感染，以及廈門方面的同志到上海的刺激，青年團成員的革命積極性更是大大提高。因此，以林木順為主的青年團幹部為確立組織及活動方針而於一九二九年十一月召開緊急會議，討論當時的客觀情勢，並決定關於政治路線、組織問題與宣傳工作的方針：

一、政治路線：擁護蘇維埃聯邦，反對帝國主義戰爭，反對國民黨圍剿中國紅軍、蘇維埃區，反對日本帝國主義對中國、台灣、朝鮮革命青年的壓迫，爭取青年的自由以期台灣革命成功，聯繫群眾的日常鬥爭以便達成台灣獨立。

二、組織問題：團本部設總務、組織、宣傳三部。學校及街頭設支部（細胞），明顯

區分本部與支部，努力擴大組織。

三、宣傳工作：由宣傳部起草宣傳大綱，揭露日本帝國主義的罪惡及國民黨左派（指汪精衛、陳公博派）欺瞞反動的行動（一九二七年七月十五日，汪精衛召集國民黨中央黨務委員會擴大會議，公開背叛孫中山三大政策，正式宣布和共產黨決裂。隨後在武漢地區對共產黨人和革命民眾進行瘋狂的大屠殺。結束了第一次國共合作的國民革命），並大力宣傳與台灣革命運動有關的各種事務。

此外，並決議強化台灣青年團工作的獨立性，同時將原來的機關報《青年團情報》改名為《青年戰士》。

隨著運動的開展，台灣青年團緊接著於一九三〇年三月底前後，在共同租界大夏大學的教室召開青年團大會。出席者有翁澤生、劉學海、劉照明、鄭連捷、侯朝宗、王瑞棋、蘇紅松、周宗河、陳老石、廖學禮、楊春松、陳麗水及另外十四人。據說，林木順因為被國府官憲逮捕而不能出席。大會於是由剛出獄的翁澤生主持。

根據日本警察當局所掌握的團員楊春松日後被捕的審問紀錄，翁澤生在致開會辭時強調，青年團是鬥爭團體而非親睦團體，並且向團員說明青年團的內容。他說：

「由於匯率關係，在上海的台灣青年學生日益增加。這些青年學生都是殖民地被壓迫民族的一分子，具有濃厚的革命素質。因此，本機關將糾合這些青年，予以組織化，使其參加中國的反帝國主義鬥爭，並施予實踐的訓練，以社會科學研究來提高他們對理論的掌握，喚起他們特別注意台灣問題，並加強其組織，一方面支援中國的革命運動，同時亦以培養台灣的革命鬥士為目的。」

翁澤生然後明當時中國革命的情勢，勉勵團員奮起。接著，大會推選鄭連捷為議長，擴大青年團組織為總務、宣傳、研究、組織、救濟等五部，並選舉鄭連捷、翁澤生、侯朝宗、楊春松、蔣麗金等五人為各部負責人。此外，機關報《青年戰士》維持不變，各小組則每週須召開一次社會科學研究會。然後由侯朝宗報告台灣社會運動團體的現況，鄭連捷報告李山火等團員在漳州進行台灣解放運動犧牲者救援遊藝大會的情況。報告結束後散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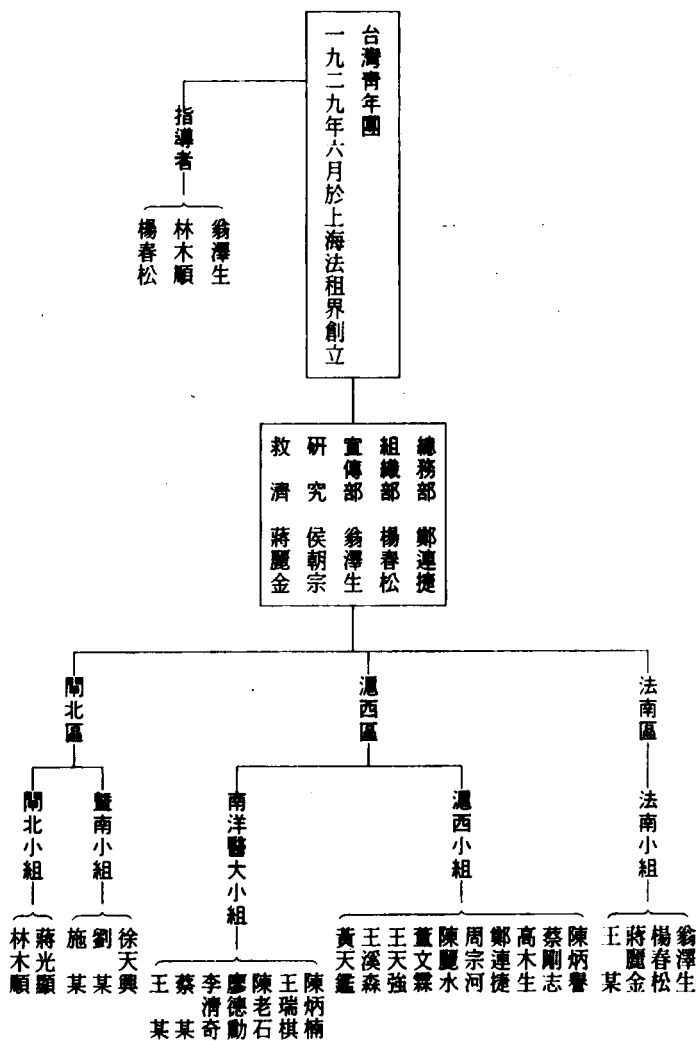
五月中旬左右，翁澤生、鄭連捷、侯朝宗、楊春松、陳麗水等五人，在共同租界陳老石等人的住處，召開青年團幹部會議，就有關青年團發展的實踐活動進行協議。會議決定將青年團宣傳活動的重點擺在《青年戰士》，並由王溪森、鄭連捷負責印刷，黃天鑑、蔡星獻負責發行。同時強化青年團的組織，其內容大約如下頁（一七四頁）附表。

反帝運動紀念鬥爭周

上海台灣青年團在調整組織後，仍然作為上海反帝大同盟所屬團體之一，在中共的指導下，與其他團體共同參與各種革命紀念日及反帝的鬥爭。它通過發行《青年戰士》，散發宣言書、傳單，製作壁報，以及飛行集會等戰術，積極地進行鬥爭。

一九三〇年六月初，翁澤生、楊春松、侯朝宗、王瑞棋、陳老石、廖勳、李清奇、蔡啟獻、王溪森、黃天鑑、蘇紅松、鄭連捷等台灣青年團團員，在鄭連捷的住處集會，針對即將來臨的六·一七，決定舉行比去年更盛大的紀念會與戲劇公演。同時決定具體的準備工作為：一、在《青年戰士》製作《六·一七紀念特刊》；二、發《六·一七紀念宣言》；三、組織「六·一七紀念籌備會」，並以籌備會之名進行一切紀念活動。

備考：本表只作一個示例，因成員的隸屬、職務更迭頻繁，每個時期都有不同。



籌備會的任務編組如下：

總務／蔣麗金

宣傳／翁澤生

演劇／鄭連捷

糾察／陳老石 李清奇 蘇紅松 廖德勳

印刷／王溪森

庶務／王瑞棋

募捐／松春松 侯朝宗

會後，翁澤生等人便開始聯絡廈門、漳州、東京及島內的台灣青年，並著手募集經費。

六月八日，負責有關節目的籌備會會員與上海台灣學生聯合會主要幹部，又於大夏大

學內召開聯席會議。會議決定：

一、利用六月十五日，星期日，演出以日本帝國主義殘酷壓迫台灣民眾，以及四百萬同胞革命崛起為主題的戲劇。

二、掌握朝鮮、印度、安南、菲島革命運動高漲的時機，聯合東方被壓迫民族及中國革命諸團體，舉行大示威。

會後，即將此決議告知上海反帝大同盟，並要求它下令所屬各團體參加與援助。上海反帝大同盟立即為此召開緊急會議，而且決定全力支持。

翁澤生等籌備會幹部於是與演出劇團交涉，致力安排演藝節目。然而，由於左翼劇團「藝術劇社」的團員大部份已遭到檢舉，再加上借不到會場，演劇會的計劃只好中止了。

六月十三日，籌備會幹部為而在大夏大學內召開緊急會議，商討應變對策。最後，決定六·一七當天只舉行示威運動。然後將此決議告知上海反帝大同盟及其他友誼團體，同時也在中共系機關報《上海報》刊登廣告，告知大眾。上海反帝大同盟根據此項決議，決定把六·一七台灣施政紀念日到六·二三沙基慘案紀念日的期間，定為反對帝國主義運動紀念鬥爭周，預定於六·一七舉行示威運動，六·二三召開紀念大會。

六月十四日，上海反帝大同盟所屬共三十餘個團體的代表，在群治大學內秘密召開「台灣六·一七紀念各反帝代表大會」。在會上，翁澤生代表主辦單位——台灣青年團，以《六·一七紀念的意義》為題，進行演講。大會決定六月十七日下午五點三十分，在東京路、澳門路的廣場，舉行大規模的反帝示威運動；同時煽動工場罷工、學校罷課、商店罷市來響應反帝示威運動。

六月十六日，台灣青年團在鄭連捷住處召開六·一七鬥爭籌備會，針對當天飛行集會、示威運動的實踐問題作最後的沙盤演練。事實上，從六月十三日起，各革命學生會、赤色工會及失業團體等，已在上海工場地帶的滬西區組成宣傳隊。該宣傳隊由三人組成一班，各自拿著一面小旗幟，每天傍晚，在滬西各工場附近的英華里、曹家渡、東京路、大夏與群治大學，舉行飛行集會，動員學生與工人參加六·一七的反帝示威運動。它的方式是一個人演講，另外兩個人則大聲呼喊，把經過附近的工人、學生聚攏起來。為了避免被街頭的巡警發現，在一個地方通常只待五分鐘，最長也不超過十分鐘。

另外，在上海反帝大同盟統制下的閘北區，從六月十七日下午兩點起，無數個學生便以三人一組，從蘇州河畔遊行到外白渡橋附近，伺機舉行飛行集會。然而，因為警備森嚴，群眾兩百多人只好匯集在ASTA House到百老匯大街電車路附近，佇立不前。從三點四十分起，虹口工部局的警察開始對現場的群眾搜身，並且逮捕了九名身上帶有傳單、宣言書等「不妥」文件的群眾；其中包括青年團幹部蔣麗金與數名青年團員。由於警力不斷增強，與會的群眾只好一面分發傳單，一面離開現場。台灣青年團襲擊日本領事館的秘密計劃也因此流產。

當天，警方所蒐集的傳單計有，以反帝大同盟具名者四種，以上海工會聯合會具名者四種，以及以中國共產黨江蘇執行委員會之名題為〈六·一七台灣亡國紀念及援助東方殖民地革命告工農兵士貧苦群眾〉的檄文一份。另外，還有一份由台灣青年團以「台灣六·一七紀念籌備會」之名所發的〈六·一七紀念宣言〉。該宣言書聲稱：

六月十七日，是沾滿血腥的日子，是台灣革命群眾永難忘懷的日子，又是我等熱血沸騰的日子。

日本帝國主義開始統治台灣的這一天，是台灣淪落到黑暗、殘酷之活地獄的第一天。回顧當時台灣工農以竹槍、菜刀肉搏日本帝國主義的大砲和炸彈的精神，誰能不憤慨、不感泣呢。回想日軍占領台灣時的姦淫、掠奪、殘酷屠殺，以及豪紳官僚的中途背叛、出賣民主國，有誰不憤慨呢。奮起前進！

三十六年來，最暴虐的鎮壓、被剝得一無所有永無止境的掠奪，只要不是冷血動物誰不痛心疾首呢。空前殘酷的十餘次「血洗全島」的殘暴，嗚吧啞暴動後殺害全村，

將小孩拋向空中以刀刺為樂，強姦婦女剖其腑臟等，只要不是鐵石心腸者，誰能卒睹這種暴行呢。不斷奪取農民的生產品，重要物產由政府專賣，以最殘酷的方法奪取土地，使無產階級的生活牛馬不如。日本帝國主義的毒辣可說是創世界最新的記錄。

至於最近的例子則為強奪土地來築造軍用大道路，禁止農民自由販賣蔬菜，以水利為藉口掠奪農民無數的土地。大量捕殺工農群眾，以殘酷的手段來破壞革命團體。甚至與中國國民黨勾結，拘殺台灣革命青年，學生如果在學校講一句台灣話立刻被開除學籍。這些都證明瘋狗正在最後殘喘中狂舞。

然而，白色恐怖的風暴無法吹熄革命的烽火。日本帝國主義與無恥的台灣豪紳資產階級合演的地方自治戲劇終究無法欺瞞台灣工農。最近，反對建築軍用大道路的罷工、反抗青菜專賣的示威等，在在證明台灣民眾，尤其是工農的革命熱情已日趨高漲。國際帝國主義基礎的動搖，當前已瞭如觀火。歐美無產階級革命的發展，東方被壓迫民族革命運動的膨脹，已為帝國主義敲起了喪鐘。印度工農已經衝破甘地主義的外套，安南的暴動也震動了法國帝國主義的基底。朝鮮、菲島各地的反抗運動日益高漲，中國革命正迅速復興，帝國主義的末路已呈現眼前。

台灣工農勞苦群眾們！東方被壓迫民族革命群眾們！全世界的革命烽火已經普照大地。我等解放自由的日子近在眼前。起來！起來高舉鮮紅的革命旗幟，為我們的獨立解放而鬥爭！

打倒帝國主義！

推翻帝國日本帝國主義的台灣統治權！

打倒民族改良主義！

打倒台灣民眾黨！

反對世界大戰！反對進攻蘇聯！

擁護中國革命！援助印、安、非國的獨立！

爭取七小時勞動制！

土地歸還農民！

建立台灣工農政府！

台灣獨立成功萬歲！

世界革命成功萬歲！

六月十九日，台灣青年團六·一七鬥爭籌備會的籌備委員們，在共同租界閩北區楊騷的住處，召開六·一七紀念工作結束會，檢討示威運動，解散籌備會，並商討救助蔣麗金等犧牲者的對策；同時改選青年團執行委員，翁澤生、楊春松、侯朝宗、王溪森、蘇紅松、陳老石、蔣文來等人當選。六月廿一日，台灣青年團執行委員會在王溪森的住處召開，選出常務委員：楊春松（總務）、王溪森（組織）、蔣文來（宣傳）；同時決定由王溪森向上海反帝大同盟的聯絡員彙報，蔣文來則負責救援六·一七示威的犧牲者，並委請律師致送參加六·一七紀念鬥爭的友誼團體感謝狀。執委會在選定〈青年戰士〉第五期的寫稿人後散會。

一九三〇年的六·一七紀念鬥爭，至此告一段落。

擁護霧社蜂起運動

一九三〇年（昭和五年）十月廿七日，台灣霧社的泰雅族原住民點燃積蓄許久的反抗日本帝國主義的烽火。十一月初，霧社蜂起的消息也傳到海峽彼岸的上海了。一般認為，它是台灣原住民針對日本帝國主義統治的反抗運動，台灣青年團不但有必要擁護這個蜂起事件，而且要把它當作反對帝國主義運動的好題材。翁澤生於是在團員林新木的住所會見了台灣共產黨革命問題而剛從台灣來到上海的潘欽信、楊春松、陳德興等人時，向他們打聽有關霧社蜂起的狀況。第二天，翁澤生便召集台灣青年團團員王溪森、陳炳楠、李清奇、黃天鑑、陳老石、陳炳譽、楊春松、蔣文來、廖德勳、蔡啟獻、王瑞棋、廖瓊娥與潘欽信、陳德興、林新木等人，齊聚蔡啟獻的住處，召開緊急會議。會議首先由翁澤生說明霧社原住民反日蜂起的政治意義，然後各自起來批判帝國主義帝國的台灣統治，最後，決定擁護霧社原住民蜂起運動的方針：

一、發布宣言書

二、〈青年戰士〉製作霧社事件專刊

三、辦壁報及舉行飛行集會

四、發行及散發傳單

同時也向中國共產黨、上海反帝大同盟及其所屬的各友誼團體報告實況，請求支援與指導。

會後，台灣青年團便根據上述決議，作成兩份宣言書。一份由潘欽信起草，刊於上海

各報。另一份則由翁澤生起草，林新木負責謄寫、油印，作為《青年戰士》的特刊，委託上海反帝大同盟的聯絡員蔣文來，分發給各友誼團體，廣為宣傳。十一月七日，他們並向參加中共指導的蘇聯革命紀念日示威運動的青年們散發這份宣言書，以及另外一份以《擁護台灣番人暴動》為題的傳單。在這份傳單中，上海台灣青年團指出：

日本帝國主義遭到第三期經濟恐慌的猛攻而極力將其重壓轉嫁到無產階級及殖民地民眾的身上，以便維持最後的殘喘。台灣各地亦非例外，諸如降低工業、延長勞動時間、沒收農民土地、加重租稅、逮捕革命份子、解散革命團體、禁止革命報刊等，積極且殘暴地在政治上、經濟上壓迫榨取。在這種情勢下，台灣民眾的痛苦唯有與日俱增。

最近，日本帝國主義竟然又在日月潭大興電力工事，沒收番人的土地及房屋，將彼等放逐到荒山曠野。番人遭到莫大的打擊，陷入飢寒交迫的絕境，再也無法忍受帝國主義殘忍的壓迫，於是毅然起來暴動。他們包圍派出所，搶奪兩百餘支槍，殺害兩百餘名日本人。儘管眼前有兇惡的日本帝國主義軍隊包圍，依然繼續勇敢鬥爭。

吾等皆知，日本帝國主義者利用此機會大肆向我們宣傳說：生番是如何野蠻、如何無人道，而又是如何殺害許多吾等文明人，藉以喚起吾等對番人的仇視觀念，以便進行兇暴殘、無人道的大屠殺。

所有的革命民眾們！吾等對此不可信以為真。因為吾等皆知道：這次的番人暴動，完全是為了反抗日本帝國主義的壓迫與榨取而採取痛快手段。是被壓迫民族對帝國主義的革命鬥爭。（彼等的暴動是原始的、自然發生的，但其革命意義非常重大。）

這完全是日本帝國主義第三期的紛亂反映出殖民地民眾如何被壓迫榨取的現象。而第三期的特徵在台灣極明顯地表現出來了。

吾等在此時機最能明瞭地認識台灣的情勢。即帝國主義如何榨取工農、勞苦階級，如何壓迫群眾的革命運動，又是如何加速群眾的貧窮化與階級對立的尖銳化。

這次番人暴動的政治意義是：被壓迫民族反抗帝國主義的革命鬥爭與台灣革命鬥爭的浪潮。

吾等應站穩階級立場，快速起來反抗帝國主義，擁護番人的英雄鬥爭。

最後，青年團呼籲：「台灣被壓迫的民眾諸君！在此血戰的時機，起來吧！起來！以吾等大眾的力量來罷工、罷課、罷市、擁護番人鬥爭。」

青年團提出的鬥爭口號是：「擁護番人暴動！反對進攻番社！反對以番丁來討伐番人！反對白色恐怖！驅逐日本駐台陸軍！推翻日本帝國主義統治！建立台灣工農政府！保障番人的生存！台灣革命成功萬歲！世界革命成功萬歲！」

除了廣發傳單之外，青年團團員蔣麗金與李耀星則在南洋醫科大學的佈告欄上，貼了兩張二尺平方的壁報，上頭除了以彩色繪出台灣警察虐殺原住民的圖畫之外，並寫有巨幅標語：

擁護台灣番人暴動！

反對日本帝國屠殺番人！

建立台灣蘇維埃政府！

台灣工農革命成功萬歲！

另外，翁澤生又在上海中國共產黨的機關報《紅旗日報》發表了一篇有關霧社事件的報導評論，大意是說：「雖然霧社事件的真相未明，但它顯然是反抗日本帝國主義的壓迫，台灣青年負有擁護它的義務。」通過這篇文章，中國共產黨江蘇省委員會也開始重視霧社原住民蜂起的意義，它除了通令分布在各大眾團體的黨的細胞把這次蜂起當作反帝鬥爭的訴求之外，並且以命互濟會江蘇互濟會（國際革命戰士救濟會）為主導團體，提議上海各團體召開「慰問台灣革命運動」的聯席會議。

十一月十五日，台灣青年團的代表：翁澤生、王溪森、林新木，與上海革命互濟會（革命互濟會江蘇互濟會）、上海反帝大同盟、自由大同盟、中華全國總工會、左翼作家聯盟、社會科學聯盟、美術作家聯盟、文化總同盟、貧民協會等團體的代表，聚集在南先施公司後面的鳳凰旅舍，召開聯席會議。上海革命互濟會的代表首先作為發起團體致詞說：

「台灣番人自暴動起義以來，仍然繼續與日本軍警勇敢鬥爭。吾人當慰問之。同時，為了援助孤立無援的霧社番人反對帝國主義的武裝暴動，應促使台灣革命民眾崛起，顛覆日本帝國主義在台灣統治權，中國的革命民眾有義務給予最大的援助。」

接著，台灣青年團的代表向各團體報告霧社蜂起的實況與意義。最後，一致決議：

- 一、中國各革命團體發出慰問台灣番人信。慰問信中應說明這次暴動的意義。
- 二、各團體作成援助暴動番人的宣言書，致力於宣傳。
- 三、在廣州暴動紀念日（十二月十一日）前舉行示威運動。

四、密切結合台灣的革命團體，聯繫各種鬥爭；設立通訊社，由台灣革命團體派任一名負責寫稿者。

五、在各種出版物上多方記載，煽動暴動記事。

可以這麼說，通過這場霧社蜂起，台灣左翼的革命團體才第一次在運動上認識到與同屬勞動階級的原住民結盟的必要。同時，也通過這場蜂起，中國國內的工農革命勢力與台灣島內革命團體的聯繫，變得更加具體而密切了。東方被壓迫民眾站在同樣的階級立場上的反帝運動，於此又向前跨了一大步！在上海的台灣青年學生不可忽視地扮演了重要的角色。

台鮮反日聯合戰線

台灣與朝鮮同屬日本帝國主義的殖民地，具有相同的歷史命運，因此，台灣青年團與中共援助指導下成立的在滬朝鮮獨立運動者同盟、上海朝鮮青年同盟等反帝團體，一直保持密切的聯絡，並且經常共同從事反帝運動。

一九二九年（昭和四年）十一月，當朝鮮發生光州事件後，台灣青年團立即與上述的朝鮮人團體積極支援朝鮮的民族獨立運動。

第二年（一九三〇年）的一月三日與四日，翁澤生與林木順更代表台灣青年團，出席朝鮮獨立運動援助大會。他們在會上發表演說，呼籲「打倒日本帝國主義，以被壓迫民族的共同戰線來擴大被壓迫民族的解放運動」。並且宣讀台灣青年團所發的〈援助朝鮮獨立運動宣言〉：

革命的朝鮮同胞們！被壓迫的東方民族的革命群眾們！日本帝國主義殘忍的屠殺政策再次開始了。如今其原形已畢露。朝鮮革命兄弟的血液沸騰澎湃。「朝鮮獨立」之聲浪已響徹全世界。

日本帝國主義強盜式的無恥剝奪與殘酷壓迫的行動，除了喪心病狂者外誰不痛恨呢。嗚呼！朝鮮竟然被禁止使用其本國語言與文字。對此殘酷的滅絕政策，除亡國奴外誰不咬牙切齒呢。最近，日本帝國主義面臨危機，為謀求解決對策而大舉進攻我等，剝奪及壓迫殖民地與國內的無產階級，進攻蘇維埃，訂立分割中國的計畫等事實是誰也無法否認的。在朝鮮，屠殺或逮捕學生只是其中的一幕而已。

革命的群眾們——現在，朝鮮的青年、職工、農民及群眾已被攪亂於血潮中。我等必須盡全力打倒現在仍繼續屠殺我等兄弟的死敵。

東方的革命工人、農民、勞苦大眾們！太平洋上已經充滿帝國主義第二次大戰的風雲。捆綁在我等身上的鐵鎖正日漸加重。我等應該起來與朝鮮的兄弟共同打倒萬惡的日本帝國主義及世界的帝國主義強盜。鮮、中、台、印、安南、爪哇，全體東方的革命群眾們！結合我等的力量，起來吧！

被壓迫民族與全世界的無產階級才是打倒此帝國主義強盜的唯一武器。

朝鮮的學生與工人、農民等，在日本帝國主義的槍砲下正流著革命的新鮮的熱血。兄弟們！趕快團結，踏著血潮前進！

東方被壓迫的民族！團結起來！

打倒萬惡的日本帝國主義！

打倒國際帝國主義！

援助朝鮮的革命同胞！

反對世界大戰！

反對進攻蘇聯！

援助中國、台灣、印度、安南、爪哇的革命！

反對分割中國！

東方被壓迫民族解放成功萬歲！

朝鮮獨立萬歲！

不久以後的三月一日，又逢朝鮮反日獨立運動（一九一九年三月一日）的十一週年紀念。當天午後兩點起，台灣青年團與前述的朝鮮人反帝國團體，又在法租界浸禮堂共同召開盛大的紀念會。台灣青年團並發表一份〈「三·一」紀念宣言〉，以為聲援。該宣言仍然站在被壓迫民族的國際主義的立場發言：

革命的朝鮮民眾！中國、台灣的工農勞苦同胞們！朝鮮的革命群眾正與邪惡的日帝國主義展開流血鬥爭，東方各弱小民族的革命烽火正沖上天空，此時，我等揮著血淚歡迎「三·一」的到來。

革命的同胞應記得十一年前的今日發生過的事。全朝鮮的革命群眾，不論男女老幼，不論鄉村與都市，一致高喊「獨立」，悲壯且熱烈地舉行反日本的大示威運動。而兇暴的日本帝國主義軍警卻揮著佩刀，舉著槍砲，對付手無寸鐵的群眾，意圖趕盡

殺絕。然而，「獨立」的呼聲依然從倒下的人的口中喊出。反日運動已使大多數的朝鮮工農瞭解日本帝國主義的真面目。

此運動雖因地主資本家的投降與動搖而失敗，但也令我等體認到：殖民地的革命運動只有無產階級的領導才能成功。同時，為使日前的朝鮮革命達到高潮，應該聯合中國、台灣、印度等如潮水般澎湃的革命運動，引導其對抗帝國主義殘酷的屠殺，壓制資產階級的無恥的背叛，才能成功。工農勞苦群眾的被壓迫反而促使他們起來反抗。殖民地、半殖民地的革命群眾已經起來作決死的鬥爭。

台灣的道路築造工人大罷工與貧苦農民反抗徵稅，證明日本帝國主義殖民地的群眾已被逼到絕路。我等應該興起面臨斷崖奔流的決心，與帝國主義作最後的鬥爭。

在此偉大的「三·一」紀念日，我等代表台灣全島的革命群眾，對朝鮮革命表示無限的同情。

最後，讓我們來高喊：

- 一、聯絡朝鮮、台灣、中國的革命勢力奮起
- 一、東方的被壓迫民族與世界的無產階級共同聯合起來
- 一、打倒帝國主義——尤其要打倒日本帝國主義
- 一、援助朝鮮的革命——擁護中國、台灣、印度、安南各國的革命
- 一、反對世界大戰——武裝擁護蘇維埃聯邦
- 一、繼續「三·一」革命的精神

一、朝鮮獨立成功萬歲

一、台灣獨立成功萬歲

一、中國工農革命成功萬歲

一、世界革命成功萬歲

各種國際紀念日的鬥爭

(一) 卡爾·羅莎紀念日鬥爭

卡爾，全名是卡爾·李卜克內西（一八七一—一九一九）。德國社會民主黨和第二國際左派領袖之一，同時也是德國共產黨創始人之一。

羅莎，全名則是羅莎·盧森堡（一八七一—一九一九）。德國和國際工人運動的傑出活動家，同樣也是德國社會民主黨和第二國際的左派領袖，德國共產黨的創始人之一。

一九一九年一月十五日，盧森堡與卡爾·李卜克內西同時被捕，當日犧牲。盧森堡的遺體被投入運河。一月廿五日，德共以空棺和卡爾·李卜克內西等十名烈士同時安葬。五月卅一日，盧森堡的遺體終於浮出水面；六月十三日，她的遺體安葬於柏林墓地。

一九三一年一月十二、十三日左右，翁澤生與台灣青年團團員陳炳楠、李清奇、董文霖、陳炳馨、蔡啟獻、林新木、楊春松、張柏生、王天強等人，聚在陳炳楠的住處，召開卡爾·羅莎紀念日鬥爭的工作會議。會上，翁澤生向其團員發表演講，介紹卡爾與羅莎的革命事蹟，強調反戰鬥爭的必要性。最後決定在紀念日當天發表紀念宣言書，並出動人馬，

到街頭張貼壁報、標語。

一月十五日當天，王天強、陳炳楠、李清奇、董文霖為一隊，蔡啟獻、陳炳譽、林新木另組一隊，各自出動，在上海市內進行宣傳及煽動活動。

(二) 列寧紀念日鬥爭

列寧，全名是弗拉基米爾·伊里奇·列寧（一八七〇—一九二四），原姓烏里揚諾夫。俄國十月革命的領導人。一九二四年一月廿一日（新曆二月七日）在莫斯科附近病逝。

一九三一年二月六日晚上，也就是列寧紀念日（二月七日）前夜，台灣青年團又出動人馬，四處張貼壁報、標語。由陳炳譽、蔡啟獻、董文霖、陳炳楠、李清奇、王天強等團員組成的兩隊人馬，分別在內外棉工場附近的牆壁上塗寫：「為二·七紀念罷業罷課」、「擁護紅軍」、「打倒帝國主義」、「擁護蘇聯」等內容的標語，並散發紀念傳單。

(三) 國際無產婦女節鬥爭

一九三一年三月八日國際無產婦女節前幾天，翁澤生與王天強、陳炳楠、陳炳譽、李清奇、蔡啟獻、高水生、董文霖、張柏生等青年團團員，為了準備國際無產婦女節的鬥爭而聚在王天強住處，召開小組的工作會議。會議首先由翁澤生說明國際婦女節的意義，然後通過討論，決定在婦女節當天，以台灣青年團的名義對外發表紀念國際無產婦女節的宣言書，並出動全體人員，到上海市的街頭寫反帝標語。宣言書後來一共印了五十份，由王天強轉交上海反帝大同盟。

(四) 巴黎公社紀念活動

巴黎公社，是法國巴黎的無產階級，在一八七一年三月十八日的革命之後，於三月廿八日宣告成立的革命政府，它同時也是人類歷史上第一個無產階專政的政權。

一九三一年三月十二、十三日左右，剛剛搞完國際無產婦女節鬥爭的台灣青年團，又在王天強住處召開巴黎公社紀念活動的工作會議。當天，除了指導者翁澤生出席以外，還有董文霖、李清奇、楊春松、陳炳楠、蔡啟獻、陳炳譽、高水生、張柏生、王天強等人與會；會前並且事先聯絡上海反帝大同盟，進行協商。會議仍然先由翁澤生說明紀念巴黎公社的意義，然後通過協商，決議由青年團按例對外發表紀念宣言，並到街頭書寫壁報、標語。

三月十八日，白天，台灣青年團召開了一場巴黎公社紀念座談會。到了晚上則全體出動，四處書寫壁報、標語，並散發台灣青年團與上海反帝大同盟的紀念宣言書。

促進島內的反帝運動

一九三一年元旦，台灣本島的農民組合在竹崎會議中，通過「支持台灣共產黨，組織赤色救援會」的決議。二月三日，農組幹部黃石順、趙港、顏石吉在鳳山郡黃石順宅會合，討論如何實行竹崎會議的決議。最後提出「解散文化協會，改組為反帝同盟」的主張，並交由陳德興與趙港負責執行。

在上海的翁澤生得知此項消息後，立即召集王天強、高水生、張柏生、李清奇、陳炳楠、陳炳譽、蔡啟獻、劉纘周、董文霖等青年團員，在董文霖的住所研討有關文化協會解

散的問題。

翁澤生認為：「台灣一方面有民族資本家的政黨，另一方面又有無產者的政黨，即台灣共產黨。因此，沒有小資產階級政黨的必要。然而，台灣文化協會在台灣社會運動史上，是以知識份子為中心的具有政黨性質的組織。它的存在，除了妨礙台灣共產黨的發展外，實在已無任何價值。因此應將它改組為反帝同盟，吸收台灣被壓迫民眾反帝國主義的力量，並予以組織化，使其接受台灣共產黨的指導。」在座的團員對翁澤生的意見都表示贊成。

三月十日前後，中共中央交付給翁澤生一份第三國際東方局聽取陳德興、潘欽信、翁澤生等有關台灣情勢的報告後所擬的指令——〈致台灣共產主義者書〉。翁澤生則命令既是台灣青年團也是中國共產主義青年團團員的李清奇，於三月廿日歸台後交給台共幹部王萬得。這份指令進一步就文化協會與反帝運動的關係作了說明。指令向台共黨員指出，反帝國主義運動「逐漸地有廣大的農工群眾、土人部落與鄉村城市的貧民參加。為了促進反帝國主義的發展，諸君應竭力組織反帝國主義大同盟。」然而，儘管「文化協會於過去的反帝國主義鬥爭中起了相當的革命作用，而且繼續在台灣多多少少地領導反抗日本帝國主義的鬥爭。但此組織是在工人參加下領導的嗎？」東方局的指令先是質疑，然後不以為然地批判文協。它繼續指出：「實際上，（文協）係小資產階級的組織，無法保障與帝國主義確實而徹底的鬥爭。」因此它建議台共黨員，「諸君宜將它改變為反帝國主義大同盟。諸君應不顧成敗，一切遵從群眾的組織，首先借助職工會、農民組合，組織反帝國主義大同盟。若文化協會不採用改組為反帝同盟的意見，那麼，諸君應在其會員中進行分化，在諸君的組織下，將具有激進的革命情操的會員，特別是農工份子，納入反帝大同盟。諸君應

在一切企業內及各區域，各鄉村，通過黨團，組織更多的反帝同盟支部；黨團則要保證自己的影響與領導。」

完成歷史的階段任務

一九三一年四月，為了使上海台灣青年團的反帝主張更加旗幟鮮明，翁澤生召集了青年團的團員開會。會議通過翁澤生的提議，將台灣青年團改稱為上海台灣反帝同盟；同時決定與青年團宗旨相同的綱領。從此，完成了歷史階段性任務的上海台灣青年團便退出三〇年代反帝運動的舞台了；同樣一批台灣青年學生則繼續團結在色彩更鮮明的上海台灣反帝同盟的旗幟下，為打倒帝國主義與台灣的民族解放而更加積極地實踐。

五、上海台灣反帝同盟

如前所述，上海台灣青年團是在上海的反帝運動掀起高潮時，由台共幹部兼中共黨員翁澤生與林木順，結合在上海的、左傾的台籍學生與青年，於一九二九年六月底組成的鬥爭團體。成立以來，它除了致力發展組織，通過各種反帝鬥爭積極地訓練團員，然後送他們回台灣加入台灣的反帝戰線之外，同時也加盟中共指導的反帝團體——上海反帝大同盟，在其指導下，聯合東方被壓迫民族的反帝運動者，如火如荼地展開一波又一波的反帝鬥爭；以期通過反帝聯合戰線的鬥爭，打倒日本帝國主義，實現台灣的民族解放。

就當時中國國內的政治情勢而言，那時候，正當中共所屬的工農紅軍和革命根據地得

到初步發展，同時地下黨在白區的工作逐漸恢復的時候。台灣青年團成立之後，中國國內外的形勢也發生了對革命有利的變化。在國外，一九二九年底，資本主義世界爆發了嚴重的經濟危機；在國內，一九三〇年五月，蔣介石和馮玉祥、閻錫山之間爆發了所謂「中原大戰」的軍閥大混戰。中共的紅軍也利用這個時機，打了一些勝仗。在這種客觀形勢下，六月十一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李立三主持下，通過了〈新的革命高潮與一省或數省的首先勝利〉的「目前政治任務的決議」。

李立三路線

以李立三為代表的中共中央的領導路線，在革命的形勢問題上，否認中國革命發展的不平衡性，認為中心城市爆發的工人鬥爭必然形成全國革命高潮，而且「中國革命的總爆發必將引起世界革命的總爆發」。在革命的性質問題上，否認中國民主革命的長期性，認為「一省數省首先勝利的開始，就是革命轉變的開始」。因此，在革命道路的問題上，它批評以「農村包圍城市」的思想是「農民意識的地方觀念與保守觀念」。

從以上的認識出發，作為李立三路線代表文獻的這個決議，主張「全國各地都要準備馬上起義」，並且制定了「組織全國中心城市武裝起義和集中全國紅軍進攻中心城市的冒險計劃。隨後又將黨、青年團、工會的各級領導機關合併為準備武裝起義的各級行動委員會。」李立三的「左傾冒險主義」不但使中共的工農紅軍及其革命根據地遭到重大損失和破壞；而且造成在國統區各大城市的罷工和起義相繼失敗，許多黨的組織遭到破壞。

同年九月廿四日至廿八日，在瞿秋白、周恩來等主持下，中共在上海召開了黨的六屆

三中全會，批評了李立三對中國革命的過左估計，停止了李立三的冒險計劃，同時也恢復了中共黨、團、工會的正常工作，基本上結束了這次「左」傾錯誤。李立三在會上也承認了錯誤，隨即離開中共中央的領導崗位。

上海台灣青年團改組

一九三一年四月十二日，翁澤生、林木順、蔣文來、陳炳楠、蔡啟獻、高水生、陳炳馨等人，在蔡啟獻的住處召開台灣青年團的幹部會議，翁澤生與林木順提案將上海台灣青年團改稱為「旅滬台灣反帝青年同盟」，同時把機關報《青年戰士》也改稱《反帝報》。據翁澤生日後被捕受審時的陳述，它的主要理由是受到中共中央清算李立三路線的黨內鬥爭的影響。翁澤生的陳述提到，當時，上海反帝大同盟的基層組織非常貧弱，於是依照中共黨團的指導，開始清算李立三路線，致力建設工場、學校等基本支部（細胞）。但是，這個工作卻不易進展。比如台灣青年團與海南島出身的青年組成的瓊崖青年會，本來就是具有同鄉會性質的團體，儘管它的過渡性質受到承認，但它卻不能成為基本的組織，理論上應該儘快解散，讓那些成員力入學校支部或街頭支部。可是，現實上碰到的問題是，如果在基層組織的建設尚未進展之前就先解散這些團體，反而會造成基層組織建立的困難。因此，黨團決定「參加上海反帝大同盟的各團體應與同盟直屬人員共謀其基礎的充實發展，在突破編制上的困難後再實行解散的工作。如此情況之下，台灣青年團應將本身的組織基礎融入學校或街頭，使其便於未來的解散。」

翁澤生說，改稱的另外一個理由是，青年團的名稱無法表現實質的內容，應該避免使

用意義不明確的團體名稱。為了明白表現台灣青年團具有社會科學研究與反帝國主義運動的性質，所以才提議變更名稱。

四月廿六日，翁澤生又召集了台灣青年團團員，聚集在團員廖興順的住處，為剛從監獄釋放出來的林木順舉行慰勞會。當天出席的團員還有楊春松、陳炳楠、陳老石、陳炳馨、王天強、董文霖、高水生、廖興如、廖興順、蔣文來、廖學禮、王瑞棋、廖德勳、蔡啟獻……以及上海反帝大同盟的代表。翁澤生先向大家報告林木順出獄的始末，以及林木順對台灣社會運動的貢獻；然後向眾人介紹林木順，並由他本人報告被捕及在獄中的狀況。接著，翁澤生又再倡議將台灣青年團改名為「上海台灣反帝同盟」。

根據日警的〈預審詢問調查書〉，翁澤生的意見主要是：

台灣青年團自成立以來將歷經兩年。其間，動員會員參加上海各種紀念日活動及種種反帝運動。進行六·一七紀念鬥爭及有關霧社事件運動，對抗日本帝國主義而宣言台灣獨立，聲援印度、安南的暴動，不願帝國主義、國民黨的暴壓，繼續勇敢地鬥爭。其間，有數名團員被關進鐵窗。

今日，世界的革命運動正處於高潮，中國的革命運動也正急速的發展，台灣的革命運動亦見復興。此時，吾等應更加努力反抗日本帝國主義及所有的帝國主義。唯有親身參加反帝戰線才能讓中國人民知道：吾等台灣青年並不是被罵為日本走狗的那一類台灣流民（無賴漢），而且，亦才能對台灣革命做出貢獻。鑑於事實，兩年來吾人的奮鬥提高了台灣青年的地位。這是吾人共有的深刻認識。

然而，我台灣青年團的名稱並不符合吾人持續的活動，無法表現出反帝國主義的

性質。當然，吾人的青年團是以社會科學的研究與反帝國主義運動為主要目的。因此我提議將團體的名稱改成適合其內容的旅滬台灣反帝青年同盟。但吾人應注意的是，不將其基礎置於學校、工場等的反帝團體很難有強固的發展。所以吾人應與上海的其也反帝團體及反帝份子協力發展學校的基礎組織。利用今日台灣青年團主要會員都出席的機會，希望互相發表意見，討論決定本問題。

針對翁澤生的提議，有幾名團員隨後站起來發表贊成的演說，並且一致通過將台灣青年團改為「旅滬台灣反帝青年同盟」，通稱為「上海台灣反帝同盟」。接著，開始審議由翁澤生等人起草完成的章程，並討論有關擴大小組的問題。綱領、章程的審議只用口頭討論，不作成紀錄，最後決定將中央組織定為總務、宣傳、組織三部，把機關報改為半月刊的〈反帝報〉，並且發行宣言書。

會議同時選出林木順（總務）、楊春松（宣傳）、廖興順（組織）、蔡啟獻（會計）等人為委員。至於機關報的刊行，編輯工作由翁澤生、楊春松、林木順三人負責，董文霖、陳炳譽負責印刷，高水生、王天強負責發行。對外聯絡方面，陳炳譽負責與上海反帝大同盟聯絡，蔡啟獻聯絡社會科學聯盟。學習方面則請社會科學聯盟中國籍的同志王學文，到各小組開設社會科學研究會。

六月初，在林木順的召集下，楊春松、蔣文來、陳炳楠、高水生、董文霖六人，聚集在董文霖住處，討論改組成反帝同盟後的組織該如何擴大？如何使活動積極化？當天，在中國共產主義青年團江蘇省委會一名省委臨席下，決定以他們六人構成上海台灣反帝同盟的黨團。該名中共青團的幹部首先陳述對將來活動的期望，然後由各黨團成員作情勢

報告與討論。最後決議由林木順為台灣反帝同盟的黨團負責人，以後每週召開一次黨團會議。

至於長期以來作為上海台灣學生與青年的革命導師的翁澤生，顯然在完成台灣青年團的改稱後便不再負領導之責了。這年秋天，翁澤生根據中共中央的指示，到兩廣各地考察黨組織、武裝鬥爭和工農運動的情況，並且指導各地組織制定發展反帝運動、職工運動和青年運動的規劃。之後兩次被捕，並於一九三三年三月下旬被從上海引渡到台灣。一九三九年三月十九日，飽受監獄的關押酷刑的翁澤生，在「保外就醫」的第十九天去世，享年三十六歲。戰後曾一度被入祀台北忠烈祠，然而民國四十七年又與賴和、王敏川、洪朝宗、洪朝生等人齊被內政部撤除牌位，「以明忠奸」。

六·一七紀念日鬥爭

針對一九三一年的六·一七紀念運動，上海台灣反帝同盟的成員林木順、楊春松、王瑞棋、廖興順、高水生、王天強等人，於六月初聚集在王瑞棋的住處，討論運動的指導方針，決定募款的具體方案，並以楊春松、王天強、王瑞棋為募捐委員。六月七、八日，林木順與上海台灣反帝同盟的十一名盟員及上海反帝大同盟的代表，又在王瑞棋的住處聚會。

當天的集會以林木順為主席，他先說明「始政紀念日」的意義，然後由楊春松評述台灣島內的現狀；最後，上海反帝大同盟的代表也發表演說。演講之後，接著召開六·一七紀念鬥爭的籌備會，決議鬥爭籌備會分設三部，由林木順負責總務部，高水生負責宣傳部。並且決定鬥爭的方針：

一、發表宣言書

二、發行宣言大綱

三、發行特刊（台灣獨立革命專號）

四、全體出動寫壁報標語

五、在東南醫學院召開紀念演講會

六、在北四川路及吳淞路散發傳單

最後，選舉各項工作的負責人：總務所屬會計負責人——蔡啟獻。宣傳及編輯負責人——林木順、楊春松。印刷負責人——陳炳譽等人。宣傳部所屬發行負責人——董文霖、陳炳譽。

幾天後，蔣文來把謄寫的宣傳大綱印成三百份，宣言書〈告上海工友書〉與〈告上海台灣學生書〉各印五、六百份，以及兩千份紀念傳單，再加上約兩千份〈台灣獨立革命紀念專號〉的〈反帝報〉，分送各地。

〈台灣獨立革命紀念專號〉的內容主要包括「前言」、「六·一七紀念與在華台灣學生」和「六·一七的意義與教訓」三大部份。

前言

資本主義的表鐘敲醒了活地獄中的奴隸！資本主義的掘墓人——勞動階級——飢寒交迫的兄弟姊妹們來自黑暗中的叫喊聲已驚天動地、嚇破資本家地主的膽。彼等手拿著斧頭鐮刀突擊戰陣。

一九三〇年，帝國主義的支配階級因精神與形體脫離，受疫病的襲擊而四面楚歌。現在，……資本主義經濟恐慌，甚至破產，就如同火上加油愈來愈激烈。工場、銀行到處倒閉關門，失業者的洪水橫流五大洲。帝國主義者狂暴地爭奪市場，全國為吃人的第二次世界大戰而準備。因此，工人罷工、農民暴動越發擴大，殖民地民眾反帝鬥爭的進展益見深刻化。這些，都足以證明帝國主義的死症積重難返。

另一方面，一九一七年偉大的十月革命成功使帝國主義受到了致命的一箭。又因為俄國五年計畫的完成使國際帝國主義者心寒，有的企圖不斷地進攻破壞。

簡言之，與勞農階級的衝突鬥爭，殖民地與帝國主義的矛盾，以及各帝國主義國家間的戰爭等根本對立的鬥爭已經融合在一起。在此條件下，全世界無產階級與殖民地被壓迫勞苦群眾的革命鬥爭已呈現出偉大的力量，不斷地擴大與發展。

在這種重大的形勢下，我們迎接三十六週年的六·一七紀念日。……

目前〇〇（台灣）革命重新復興，工農運動擴大發展，在惡毒的白色恐怖的蹂躪下反而發出了偉大的力量。

我等根據重大的客觀條件與六·一七寶貴的經驗可以領悟，殖民地〇〇（台灣）民眾一切的痛苦、貧窮，只有靠鬥爭力量才能解決。我等為了紀念六·一七應該致力於組織〇〇（台灣）工農貧民群眾，激發彼等的鬥爭，努力爭取〇〇（台灣）勞苦階級革命的領導權，進行強烈的反帝鬥爭。

親愛的工人們！農民們！貧苦的青年學生！起來！團結！紀念六·一七！奮勇前進！前進！

不打下萬惡殘忍的帝國主義，我們的前進將不停止！

六·一七紀念與在華台灣學生

只要不是冷血動物，有誰甘心做日本帝國主義的奴隸呢？有誰能忘記這偉大卻可恥的亡國紀念日——六·一七呢？這一天，是台灣的土豪劣紳、地主資產階級等與日本帝國主義舉杯同慶的所謂「始政紀念日」，同時，也是台灣四百萬民眾屈服在日本帝國主義鐵蹄下呻吟的「死症起源日」。

……

弱小民族被壓迫同樣值得憐憫，但與日本狗奴對待其殖民地的兇惡行為相比，簡直是小巫見大巫。經濟上壟斷一切的產業，尤其強制主要產物的專賣制度，虐待工人，加重無產大眾的苛捐雜稅，使台灣人過著毫無餘裕的生活。政治上沒有應享的自由，個人行動更受到彼等的蹂躪與壓迫，青年的思想惟有被抹殺，又施以奴隸教育，企圖使台灣民眾的子子孫孫都成為彼等的奴隸。尤其在歐戰後，日本帝國主義為了補救國內的損失更狂暴的榨取台灣民眾。

然而，歷史的必然性告訴我們。由於受到世界革命潮流沸騰以及近來中國工農無產革命激烈化的影響，台灣民眾已經在日本鐵蹄下蠕動，革命風潮高漲全島。最近，反日運動尖銳化，工農鬥爭從小手工業鬥爭進入重要產業的鬥爭。無產大眾已不甘心長久屈服於日本帝國主義的統治下，革命勢力正在擴大中。因此，本年的六·一七紀念具有特別重大的意義。

為了保持彼等的平準利益，資本主義沒落期的日本利用生產合理化。延長工作時間、減少工資等手段，使工農無產階級更加窘迫。失業軍如洪水般迅速增加，物價累進上漲，苛捐雜稅加重。這一切都使得青年學生失學。最近，日本狗更如瘋狗般壓迫學生的言論，禁止學生研究社會科學，且任意逮捕。去年（一九三〇年）的台灣高等學校事件竟然將大多數的學生退學，使學生失去求學的自由。尤其對海外留學生竟以旅行券加以限制。

然而，中國國民黨不僅幫助帝國主義榨取中國的無產大眾，同樣也抑壓我等留學生，束縛言論、出版、研究、結社的自由，連求學的自由也全無。請看，今年封鎖上海的南洋醫大，停止勞大的招生，又圍命令省立學校這學期停課。這些都是為了逼使青年學生失學的手段。連台灣學生也受其波及而失學。客觀來看，這些完全是為了幫助日本帝國主義在台灣施行奴隸教育。此外，任意將學生開除，如一九二八年將大夏大學的學生開除，最近，又將廈門集美學校的台灣學生開除，對閩南各學校的台灣學生採取疏遠的態度，及警察的逮捕、拘留、屠殺——一九二九年——等所有的事實顯示：國民黨已經與帝國主義合為一體，是我等的勁敵，阻礙我等在華的求學與一切行動。

今年，在此雙重壓迫下的六·一七，我等還是必須參加六·一七準備會。宣導中國無產階級參加反帝運動是我等的任務。

我等的口號是：

打倒日本帝國主義！

打倒一切反革命派，反對開除學生，封鎖學校！

完成六·一七任務！

加入台灣反帝青年大同盟！

擁護台灣革命復興！

中日朝鮮革命成功萬歲！

台灣獨立萬歲！

六·一七的意義與教訓

一、在異常緊張的國際、國內的革命火焰中，我等又要迎接壯烈的台灣亡國紀念日六·一七的第三十六週年，這三十六年，是日本帝國主義榨取台灣的所有財富，台灣民眾受到日本倭奴慘虐無道的高壓而被榨盡膏血的殖民地史。是台灣的兄弟姊妹在帝國主義的鐵蹄下吞血淚呻吟、哭訴無門的慘痛史。同時，也是台灣被壓迫民眾與日本帝國主義肉搏，浴血決戰，為台灣獨立而勇敢戰鬥的革命史。

二、十九世紀末期，一八九〇年代前後，是資本主義最強盛的黃金時代。資本的十字軍橫行五大洲，所有經濟落伍的農業國家早已被先進國——西歐的資本主義國家強奪得一無所有。他們說，這是大英帝國主義的領土，這是德國的屬國，這是美國唯一市場，野蠻的亞細亞封建魔王也屈服在無情、巨大的資本面前。中國的萬里長城也被資本主義的商品一擊擊破了。

同時，我等應該注意的是，此一時期也是黃色第二國際所謂的和平發展時期。是各國的社會民主黨徒在國會與資本家爭議員的位子，互相爭奪得自殖民地的利潤的最

難堪時期。是所有戴上黃色帽子的第二國際的紳士、各國社會民主黨徒、改良主義者、考茨基派的機會主義者等公然出賣無產階級的利益，與資本案握手，共同慶祝資本家遠征軍勝利的時期。

在彼等異口同聲歌頌、美化資本主義時，在專強姦無產者的黃色騎士們的眼底裡是沒有革命這回事的，自以為是上帝子孫的他們自然不願這種事發生。此時，東方突然出現一隻野虎，即日本帝國主義。日本帝國主義在接受明治維新的民主革命（極不徹底的東西）的洗禮後，隨著資本主義經濟的發展逐漸消滅一部分的封建勢力，極迅速地建立資本主義（帶有濃厚的封建性）國家。由於國內市場的統一與資本主義商品經濟生活的發展必然要求廣大的新市場與豐富的原料地，此時，日本尚未能與西歐在豐腴的中國並肩稱雄。

但，當時的朝鮮是彼想一口吞下的甜葡萄。於是，中日以朝鮮為中心的衝突終於在一八九四年爆發中日大戰。當時，中國重要的商港都塞滿列強的商船與戰艦。賣國害民為能事的滿清在前虎後狼的壓迫下已自顧不暇，怎有力照顧朝鮮等地。此次戰爭將中國粉碎得體無完膚。根據中日媾和馬關條約第二條，台灣是獻給戰勝國的禮品。此消息傳到台灣曾一度引起數千萬民眾強烈反抗……建立東方最初的共和國——台灣民主共和國。毅然決定與日本帝國主義做一殊死戰。但是，台灣民眾由於前無援兵、後無兵糧，加上土豪紳及民主共和國領袖的叛變，在一八九五年六月十七日，這個尚未滿一歲的嬰兒——台灣民主共和國，終於被橫暴的日本帝國主義屠殺了。他們在北城上高掛日本帝國主義的太陽旗幟，台灣的土豪劣紳與日本帝國主義共聚一堂，握

手言歡，且為無恥的勝利而乾杯。

三、日本帝國主義獨占台灣後，最緊急的任務就是使用大砲、機關槍掃射台灣革命民眾，捕殺革命領袖。且不允许人民自由來往，嚴禁台灣與中國的交通，切斷中台民眾的聯絡，藉此一舉消滅台灣人的反抗運動。

第二是採用軍事的非常統治法。解散台灣既存的政府組織與民間的一切團體。不允许台灣人參與政治，連自願投降的、無恥的土豪劣紳也不許自由參與。設置台灣總督總攬政權。歷代的台灣總督都是日本資本家地主的代理人，都是專制的魔王。四百餘萬台灣民眾的生命完全操在彼一人的手中。第三是收買土豪劣紳走狗，破壞台灣民眾的反抗，以為日本帝國主義統治台灣的先鋒。第四是整理財政，將銀本位改成金本位，設立台灣銀行壟斷台灣的金融界，設立專賣局獨占一切主要的生產品。開設鐵道交通機關以便強奪台灣的產物及榨取民眾的膏血。又完備無數的苛捐與雜稅以資增加國庫的收入。根據一九二六年的調查，每位台灣人不論男女老幼每年有繳納租稅五十八圓的義務。如此一來，日本帝國主義從台灣搜刮數千萬圓以上到日本的金庫。此數字尚不包括個人搬走的金額。第五是除了政治上施行高壓、經濟上施行榨取政策外，不要忘了文化政策也是國際帝國主義統治殖民地的一個重要利器。日本帝國主義自占領台灣以來所利用的文化政策是一貫的愚民政策。當時，立即改變文化制度，創設日本式的學校，以奴隸教育來麻醉台灣青年。上自大學下自小學全是培養忠僕、奴隸的活地獄。學校、商會等所有的文件、報紙、雜誌等一律以日文來編輯，禁止使用台灣文字（即漢文）。

舉個例子來說，本人（林木順）到上海時中國的報紙一句也看不懂。由此可以看

出奴隸教育的一般面目。提起宗教則從前的佛由日本皇帝、日本偉人、日本英雄來取代。簡言之，自日本帝國主義開始統治台灣以來即始終一貫採行反動政策。政治上的壓迫、經濟上的榨取掠奪、文化上的侵略麻醉，不僅肆無忌憚而且劇烈地搖動根本。

四、在歷史發展的過程中，不可否認，帝國主義征服經濟落後的國家是資本主義發展的必然的結果。同時，我也認為資本主義的命運必然有其沒落的一日。馬克斯不是明確地說過嗎：資本家階級在其所到之處也為自己製造了數千萬埋葬彼等的掘墓人。事實上，日本帝國主義持一貫的高壓政策治理台灣，不僅沒有消滅台灣的革命運動，反而促使人民發動革命運動。日本資本家在台灣設立無數的工場，同時也在那裡製造無數埋葬彼等的墓穴。彼等在台灣生產無窮盡的各種商品，同時，也製造無數埋葬彼等的掘墓人——革命戰士、無產階級、農民、貧苦群眾。連續幾次六·一七的偉大的台灣人暴動、去年霧社著的暴動、最近台灣革命運動的興起與更進一步的發展、反帝鬥爭深入到群眾中、工農階級鬥爭的尖銳化、革命運動的領導全面移到台灣××（共產）黨等，這是誰也無法否認的鐵證。

五、我等的結論

(1) 六·一七不只是悲慘的台灣亡國紀念日，也是沾滿鮮血的革命日。台灣革命民眾在帝國主義可怕的槍林彈雨中，不管土豪劣紳領袖的叛變與退卻，依然奮戰堅持到底。如此勇敢的鬥爭精神足以使日本帝國主義心膽寒慄。儘管在六·一七遭到日本帝國主義殘忍的蹂躪，在台灣革命史上之意義與光榮依然形成偉大的一頁。

(2) 六·一七是日本治理台灣的元旦，是台灣人開始變成奴隸的第一日。日本帝國主義竟然無恥地決定這天為台灣的國慶紀念日——始政紀念日。強迫台灣人民與彼等共同祝賀台灣受日本統治的幸運與光榮（？），同聲呼喊日本帝國萬萬歲，感激日本天皇的浩浩皇恩。因此，這天是日本帝國主義者公開欺瞞、侮辱台灣民眾的日子。同時，也是廣大的台灣革命民眾給予日本帝國主義肉搏痛擊的最好日子，是台灣民眾示威的革命節。

(3) 六·一七失敗的主要原因是沒有堅固的政黨來領導，以及沒有國際上的扶助、工農勞苦民眾動員不夠充分、地主劣紳的無恥投降與領導者的背叛。在台灣民眾與日本帝國主義戰爭最不利的時刻，這些狼心狗肺的叛徒一伙將革命的財源悉數捲走，逃亡海外。

(4) 六·一七的寶貴經驗與偉大教訓明白地告訴我們，台灣的地主、土豪劣紳、民族階級向無恥的帝國主義投降，其破壞革命的毒素與反動臭氣瀰漫在六·一七的當時。我們知道，現在台灣的自治聯盟、台灣民眾黨蔣渭水一派的毒物是反動派的忠良子孫。彼等與日本帝國同一鼻孔呼吸並不是什麼不可思議的事。事實上，彼等欺騙勞苦無產者的手腕與破壞革命戰線之高明，與彼等的反動視察（或為「觀點」之意？）相比，又不知高過幾倍，惡劣至極。

(5) 六·一七的寶貴經驗也是我們最好的教訓。即六·一七唯一的繼承者只有工農勞苦群眾。只有工農的革命力才能切斷帝國主義的鐵鎖。只有動員廣大的工農貧民群眾毅然地反對日本帝國主義、反對台灣自治聯盟、反對民眾黨蔣渭水的

機會主義，才能完成六·一七的任務，達到最後的解放。六·一七更告訴我們，一切的革命運動流血是在所難免。我等不必遲疑或駭怕。只有以我等的鮮血才能洗淨污惡的世界。六·一七失敗的教訓更是最好的證明。台灣的解放運動如果沒有國際上的扶助，尤其是沒有東方弱小民族中國、日本、朝鮮工農的革命扶助的話，畢竟是無法成功的。

同時，台灣民眾只有努力學習六·一七的經驗，學習世界革命與中國的偉大、寶貴的經驗，聯合世界被壓迫民族的無產階級，團結於台灣××（共產）黨的領導下，才能達到最後目的。台灣革命的先鋒隊台灣××（共產）黨只有在日常群眾鬥爭的過程中努力反對機會主義的鬥爭，揭發民眾黨、自治聯盟、蔣渭水派反動化的真相，在白色恐怖踐踏下鼓起勇氣，刻苦進行地下工作，強化本身及群眾的各種組織，如此才能完成偉大的歷史使命。勇敢地取得真正無產階級的領導權以及政治上的信仰，才是台灣革命成功的前提條件與唯一保證。

六月十五日，林木順、楊春松、廖興順、王瑞棋、高水生、陳炳楠、王天強等人，又會聚在法租界法國公園池畔，召開上海台灣反帝同盟的幹部會議。原先預定「在東南醫學院召開紀念演講會」的鬥爭數百張傳單，在北四川路與吳淞路各處散發，同時在各地方的牆壁上用粉筆寫標語，最後在蘇州路郵政總局前集合，然後散會。

六月十七日當天，上海台灣反帝同盟按照計劃進行了紀念鬥爭運動。兩天後，他們又聚集在王瑞棋的住處，舉行六·一七紀念日鬥爭運動的檢討會。

第二次霧社事件的鬥爭

除了六·一七在台灣施政紀念日的鬥爭之外，上海台灣反帝同盟也針對六·二三沙基慘案紀念日，以及四月廿五日發生的第二次霧社事件，展開積極地運動。其間同盟的機關報〈反帝報〉還特別製作了第二次霧社事件的特刊，內容包括〈發行辭〉、〈反對日本帝國主義虐殺俘虜蕃人的宣言〉、〈反對虐殺蕃人〉與〈台灣蕃人暴動的經過〉。

一、特刊發行辭

目前，階級鬥爭正逐漸尖銳化。但因白色恐怖虎視眈眈蹂躪勞農大眾並任意逮捕虐殺，從市街到僻村常因革命鬥爭而引發流血的慘案。言種現象在世界各地帝國主義強壓下的殖民地，更是慘不忍睹。最近，日本帝國主義者逮捕虐殺台灣共產黨員及左傾的革命大眾，破壞反帝鬥爭的組織，蹂躪五一勞動節的示威鬥爭，虐殺無數的革命蕃人等，就是最有力的證據。

霧社暴動後，日本帝國主義者更加慘壓榨取蕃人，公然煽動蕃人虐殺無數的蕃人。日本帝國主義出以如此的蠻行並不單是欺壓蕃人的局部問題，而是對台灣革命大眾的示威。

反帝的鬥士們！

統治階級慘壓、逮捕、虐殺革命鬥士，在階級鬥爭尖銳化的客觀狀況下是在所難免的。我等沒有必要悲觀或恐怖。

十八萬蕃人兄弟姊妹們！站在斷崖絕壁上吶喊吧！我們也將極力應援！

(1) 反對日本帝國主義虐殺蕃人！

(2) 反對白色恐怖！

(3) 反對無報酬的勞動！

(4) 擁護蕃人的革命運動！

(5) 蕃人及台灣勞農聯合萬歲！

二、反對日本帝國主義虐殺俘虜蕃人的宣言

可憎的日本帝國主義不只是以飛機、毒瓦斯來虐殺霧社的革命蕃人，最近又施毒手，利用落伍的蕃人來虐殺數百名蕃人。

針對此一事件，狡猾的日本帝國主義者口口聲聲宣傳說：「這是蕃人相互間的鬥爭。」可是，被虐殺者全部是被逮捕監禁四禮拜的蕃人，他們被關入日本政府所造的高柵欄內，被日本警察派遣的九十名警察官監視著。而襲擊者是久受日本帝國主義利用的「淘資」（部落名）蕃人。虐殺這些革命蕃人所用的凶器即日本帝國主義所貸與的。九十名負監視責任的警察伴作不知，任其被虐殺。

帝國主義慘壓下的兄弟姊妹！

這決不只是單純的蕃人問題！你們瞧！

最近，日本帝國主義不是更加猛烈地掠奪與壓迫我們嗎？台灣的勞動大眾不正徬徨於飢餓的十字路口嗎？台灣的革命鬥爭不正陷於黑暗的地獄中嗎？面對如洪水的失業業者以及最近屢次的檢舉等，這些向我等表示什麼呢？

今日，帝國主義對待革命蕃人的殘酷手段與對付台灣一般勞農大眾的手段是相同的。革命蕃人被虐殺是他們壓迫台灣革命大眾的一幕。有誰甘心永久做奴隸呢？有誰願意受帝國主義的虐殺呢？又有誰不想與帝國主義做一殊死鬥爭呢？

中國的革命大眾！東方被壓迫的兄弟們！日本帝國主義不單是台灣被壓迫大眾的敵人，也是我等共同的敵人。

中國的大眾沒有人能夠忘記「二十一條」、「五三慘案」的流血事件。占領朝鮮！併吞琉球等！我等的命運不也會像那樣嗎？

「三·一五」、「四·一六」，是日本國內被壓迫的勞農大眾兄弟們受到我等敵人慘壓的日子。

我等如果不一齊起來顛覆帝國主義的統治則無法達到我等的解放的。

起來！被壓迫的兄弟姊妹們！

打破所有改良主義的假面具，使機會主義者動搖與恐怖，踏著前輩兄弟們的血跡前進！再前進！

(1) 反對虐殺革命蕃人！

(2) 反對白色恐怖！

(3) 擁護台灣革命！

(4) 台灣獨立成功萬歲！

三、反對虐殺蕃人

暴露離間政策的陰謀！

擁護番人的革命運動！

這次，在霧社又發生極殘酷的蕃人被襲擊虐殺事件。

被襲擊者都是上回霧社大暴動時受日本帝國主義嚴密監視的俘虜蕃人約一百七十餘人，其中大部分是小孩與婦女。此慘劇發生後，日本帝國主義非常恐慌，狼狽地頒布嚴重的戒嚴令，表現出如臨大敵的態度。

另一方面又發出欺瞞的聲明書，說是蕃人自身的鬥爭。宣傳說政府為了保護蕃人的生命安全曾經解除襲擊蕃人的武裝云云。且利用御用新聞大作無根據的反宣傳，以掩蔽日本帝國主義虐殺殖民地大眾的秘密。但掩飾事實是不可能的，從表面上我等也無法認定那是蕃人虐殺蕃人的事件。何況，科學的馬克思主義者與反帝鬥爭的鬥士不可能只滿足於表面上的觀察。因此，讓我們進一步來分析其真相！

第一……這次的虐殺事件顯然是落伍的蕃人被日本帝國主義利用而盲目地虐殺彼等的兄弟。毫無疑問的，日本帝國主義運用離間政策虐殺被壓迫大眾的陰謀已奏功。然而，加害的蕃人與被害的蕃人同樣都是受日本帝國主義野蠻搾取與極端欺壓的人。而且，由於同是被壓迫的奴隸，兩者在利害上沒有發生衝突的理由。不管日本帝國主義如何造謠仍無法掩飾事實。其「渴血的真面目」，除了走狗外，大家都看得一清二楚。

第二……這次多數的蕃人被虐殺，無疑是霧社大暴動的繼續，是革命鬥爭的餘波，當然會發生的問題。因此，此一事件存在著政治的意義與革命的內涵。如果不能確實掌握住這點，我們就不能正確地下結論。

使全世界震撼的、驚天動地的、偉大的霧社大暴動爆發後，狡猾的日本帝國主義鬼計百出，到處下毒手，更加猛烈地欺壓蕃人，恐嚇、欺瞞、收買、利用落伍的蕃人，以至於爆發這次的慘劇。因此，這次慘劇的發生，的確可說是日本帝國主義運用「理蕃政策」得到了「小勝利」。

革命蕃人雖然逃進深山，但這是轉為持久戰的表現。反帝鬥爭的情緒正自一社擴大到另一社，醞釀著更廣泛的革命鬥爭。因此，不管日本帝國主義的走狗與台灣總督府如何為蕃人的貧苦問題傷腦筋，也無法解決。為了更加猛烈地欺壓榨取他們，日本帝國主義的文明武器及科學飛機、毒瓦斯等紛紛出籠，但仍然得不到什麼成果。當我們分析這次慘劇的真相時所得的事實教訓是，絕對不可輕視帝國主義的離間政策，那正是帝國主義統治殖民地不可欠缺的一個重要政策。英帝國主義是利用回教與佛教的差別煽動一部分無知落伍的印度人互相殘殺。而日本帝國主義則利用廈門、福州的流浪者來破壞中、台革命大眾的結合。這些事實足以證明以上的教訓。

雖然我等過去在揭發這些可惡的離間政策時對大眾的宣傳不夠充分，但在革命鬥爭日漸尖銳化的目前，在客觀的形勢下，日本帝國主義的忠僕、革命運動的大敵——台灣民眾黨、自治聯盟、蔣渭水一派的左右民族改良主義者等害蟲，都在大眾中持續擴大反革命作用的事實，是不容輕視的問題。因此，不斷地對他們展開猛烈的鬥爭，揭發其陰謀，是我們不可缺的任務。

霧社暴動時，台灣的左派沒有發動廣泛的大眾鬥爭實在是犯了很大的錯誤。十八萬的蕃人問題是發展台灣革命運動的主題，且也明示這一點讓勞農及蕃人大眾知道，

只有由台灣被壓迫的大眾與勞農共同起來鬥爭，顛覆帝國主義的統治，才能解決島內的民族問題。

對於蕃人的革命組織與革命運動，台灣的革命大眾當然應該給予強力的援助。又對日本帝國主義的白色恐怖……虐殺革命蕃人，當然要揭露帝國主義才是這次慘劇的真正犯人的事實。我們必須打破機會主義的右傾與恐怖心理，勇敢地起來號召廣泛的大眾，然後強化組織。

(1) 反對白色恐怖！

(2) 擁護蕃人革命！

四、台灣蕃人暴動的經過

「無數的蕃人身受其害蒙受日本帝國主義的軍事虐殺」

在說明蕃人暴動前，先說明其經過與社會地位吧。

台灣全人口四百餘萬中，蕃人有十八萬，佔全人口的二十分之一。此十八萬餘的蕃人散居於深山幽谷中過著原始的野蠻生活。彼等受自日本帝國主義的壓迫與榨取是非常極端的。在世界有名的所謂「理蕃政策」之極端野蠻壓迫榨取下，彼等的生活極為惡化而低下。自三井、三菱兩公司參加經營土地以來，其代理者台灣總督府日益加速集中土地，魔爪自台灣人土地伸向蕃人的土地予以強奪。尤其，蕃界廣大未開墾的土地是彼等垂涎萬丈之地。彼等以「理蕃政策」的強盜手段進行軍事的佔領，或派許多警察與台灣人強奪其土地。他們奮勇反抗，由於寡不敵眾只好退入深山。其肥沃的

土地自然落入彼等之手。

現在，蕃人耕作的土地是巍峨的山地，收穫極少，生活極為艱辛。而且被剝奪了交易的自由，彼此進行交易都會受到處罰。因此，蕃人的經濟生活極為低下也影響到其他方面。沒有政治的自由，不用說，更遑論受教育的機會了。在交通便利的蕃界有數所收容蕃童的小學校，但也只是徒具形式而已。在工業方面的榨取更為嚴重，勞動工資——日本人為三圓、台灣人為一圓、蕃人為二十錢，差別可說極大。

總之，我等知道，日本帝國主義是以滅亡其種族的極惡毒的政策來對待蕃人。近來，蕃人人口漸漸減少就是最好的證據。遭受日本帝國主義狠毒壓榨的蕃人經常處在種族滅亡的危險，因而往往起來表示勇敢、悲壯的行動是理所當然的。當日本帝國主義政府完成嘉南大圳的大水源時，就以保護水源之名目將居住於濁水溪上流的蕃人驅逐境外。

與蕃人的生命息息相關的土地就是這樣被日本帝國主義強奪去了。其魔手甚至進一步企圖滅亡蕃族，蕃人再也無法忍受了，霧社蕃人於是率先奮起，舉起英勇的暴動的烽火，包圍派出所，掠奪武器彈藥，虐殺多數的警察與日本人，造成空前的大事變。

觀彼等蕃人在此暴動中的行動頗有進步性。但日本帝國主義卻利用惡毒的離間政策，強迫、欺瞞、利用一部分的蕃人虐殺手無寸鐵、無抵抗力的俘虜蕃兩百人。日本警察為了怕其復仇，目前佈置嚴重的警戒。形勢極為緊迫，吾等應記取此項血的教訓。

萬寶山事件的示威與檢舉

一九二七年六月，日本剛上任的首相田中義一召開所謂「東方會議」，公開了獨占「滿蒙」的最高國策。一九二九年十月，由美國開始的空前的經濟大危機席捲整個資本主義世界，日本經濟也瀕臨崩潰。為了擺脫危機，日本軍國主義者決心趁歐美各國忙於內部事務、無暇東顧，以及中國政府忙於內戰，民生凋敝、國防空虛之機，實施其既定的侵華政策。

一九三一年六月，日本軍部制定《解決滿洲問題方策大綱》，確定了「採取軍事行動」占領「滿蒙」的方針。日本軍國主義分子於是不斷在東北製造挑釁事件，作為增兵東北、發動侵略戰爭的藉口。七月，關東軍特務在長春北郊萬寶山挑撥中朝農民關係，唆使朝鮮浪人強占農田，造成流血衝突；並在它統治下的朝鮮煽動排華風潮，借以動員日本朝野的反華輿論。七月二十二日，在中國共產黨江蘇省委的指導下，上海各大眾團體於日本電信局附近，針對萬寶山事件，舉行聯合示威運動。上海台灣反帝同盟的兩名盟員：陳炳譽與董文霖，在分發傳單時被租界工部局的警察逮捕，調查結果，判明他們為台灣籍民，而被引渡到上海日本領事館警察署。日本領事館警察署進一步調查之後，發現他們兩人都是在翁澤生與林木順指導下成立的上海台灣反帝同盟的成員；讓同盟並且接到中國共產黨的指令，要它派人參加同一天的虹口區的示威活動。

九月十日，日本領事館當局接到情報，然後在中國警察的援助下，又在大夏大學逮捕了台灣籍學生高水生。高水生坦承自己是上海台灣反帝同盟的成員，參加過幾次上海的中共主持的示威活動。日本領事館當局在檢查高水生的私人物品時，發現了與台灣共產黨的通信，以及幾本與共產主義有關的書籍。日本領事館的警察署與工部局的警察隨後又協力在陳炳譽的住處搜出英文的第三國際機關報《International Press Correspondence》十

五份及一張中國蘇維埃區的地區。董文霖則自承，除了參加過中共上海組織的示威活動外，還製作過六種宣傳的小冊子與傳單。十一月五日，日本領事館便根據日本警察調查的結果，將陳炳譽、董文霖與高水生三人移送台灣總督府所屬的法院審理。

另外一方面，台灣島內的警察當局也根據上海領事館的調查內容，並參考以往的内偵檔案，於九月十四日一齊逮捕了當時人在台灣，與上海台灣反帝同盟的組織有關的王溪森及其他十二人。

事實上，日本警察當局在上海的搜查行動並沒有就此結束。一直要到一九三二年七月八日，搜查才告一段落。結果，發現與上海台灣反帝同盟有組織關係者達六十三人；其中鄭連捷等三十人被附有罪意見移送台灣，其他三十三人則繼續留在上海各地，未遭逮捕。一九三三年，日本領事館又分別於五月卅日、六月廿九日與十一月六日，將張德明、張梗與蔣文來移送檢察局。

蔣文來是於一九三三年五月一日，在共產主義者進行勞動節示威運動的現場攝影時被捕的。蔣文來被捕以後便被帶到工部局老閘警察署，進行審問。蔣文來只供認自己是台灣人，因為與共產主義運動有關而被日本領事官憲偵查中；對於其他問題則閉口不言。老閘警察署於是向日本領事館警察照會，確定警文來所供認的身分屬實，而引渡給日本警察。蔣文來後來也向日本警察陳述自己的革命經歷。他說，他於一九三〇年五月自福建到上海，在福建時已加入中國共產黨。但是他始終拒絕回答有關中國共產黨及其活動的詳細情形，而只略述自己活動的概要。他又說，一九二〇年七月，外國士兵委員會(Foreign Soldiers Committee)成立時，他被任命為組織部長兼全委員會日本部的負責人，因此，當日本艦隊

士官練習生（預備軍官）於同年十二月訪問在上海的東亞同文書院時，他便與「日中鬥爭同盟」的同志們協力散發宣傳共產主義的傳單。這段期間，他同時也擔任上海反帝大同盟機關報〈紐司〉的編輯；後來又成為同盟的青年部長……。一九三三年五月十六日，蔣文來被移送台灣審判。

一九三四年，上海台灣反帝同盟的盟員劉家浪、林新木、蔡啟獻陸續被移送。再加上同盟的主幹楊春松、翁澤生等也先後被捕，上海台灣反帝同盟歷時三個月的反帝活動於是結束。

這樣，一九二三年十月十二日，在上海南方大學成立的上海台灣青年會，歷經上海台灣同鄉會、上海台灣學生聯合會、上海台灣青年團而上海台灣反帝同盟的台灣留學生運動也告一段落。

除了上海台灣青年會一系組織的活動外，同一期間，在上海的其他台灣青年學生團體還有：平社、台灣自治協會與台韓同志會。

六、平社

一九二四年三月前後，一名信仰共產主義的中國人羅豁，讓一些台籍與朝鮮的青年寄宿在他法租界霞飛路的住宅，並教導他們學習共產主義。其中，朝鮮籍的卓武初、呂運亨、尹滋英與台籍的彭華英、蔡炳耀（蔡惠如的長子）等人又提出組織為一個團體的計劃。後來，台灣青年會的幹部林堯坤、許乃昌、張沐真、游金水等人也參與討論這個組織計劃。

三月底，他們於是組成了以「研究現代學術，介紹世界思潮，以圖人類互助之實現」為宗旨的、跨國性的——「平社」。

《平平》發刊辭

平社在組成之初便以共產主義的研究和宣傳為目標，帶有濃厚的共產主義色彩。因此，在運動上，它似乎也最重視發行機關誌《平平》旬刊，謀求對台灣人民與朝鮮人民宣傳共產主義。在《平平》創刊號的發刊辭中，「同人」們宣稱：

我們是渴望和平的一群人。我們希望世人都能維持要吃有食、要穿有衣的生活，同時也祈冀人類能在同一水平線上。我們素以人類的相親相愛、彼此幫助為共同的理想。但現實卻與此相反，富者愈富，貧者愈貧，強者高舉和平的招牌，進行掠奪、吸血之實。他們並且有法律的保障和槍砲的支援。

我們不只是一要批評現代的政治，而且以實現下面兩事為我們的共同目標。第一，我們是依靠我們的努力來消滅這些不合理的現象，另行建設多數人所要求的社會。第二，消除形成現代經濟制度下之盜匪社會的根本原因，改造一個階級壟斷經濟利益及自由的現有制度，使其能普遍為一般民眾公平地享有。

我們非獨要打破從來束縛婦女的規範及禮教制度，還要促使男女站在平等的水平線上。所以，夫唱婦隨或拜倒石榴裙下一類的說法，均非吾人所主張者。

現時，台灣正處在天皇統治的政治制度下，朝鮮仍未脫離東方普魯士的鐵蹄蹂躪，中國的膏腴也任憑外國財閥凌虐玩弄，東方各民族正處在格外的困苦之中。但這反而

使我們的事業易於下手進行。也就是說，我們不分門戶、不分種族、不分性別，結合被壓迫人民的全體意志，共同從事解放及改造運動才是。

「以言動人，其感也深。」我們要舉出大量的事實，加以解剖，把社會的實狀暴露於白日下，以方便讀者之考察，更提供它作為建設之材料。

反對台灣議會運動

另外，他們也在《平平》創刊號上，通過署名「沐雲」許乃昌的〈從台灣議會到革命運動〉一文，發表反對台灣議會設置請願運動的意見。它認為台灣議會請願運動不可能「完成達成民族獨立和自由」，必須「對內尋求團結，對外聯合勞農階級國家蘇聯，以及日本的被壓迫階級，乃至受日本掠奪的中國、朝鮮等國的人民，組成國際性戰鬥團體——反帝國主義大同盟，全力從事革命鬥爭。」

沐雲沉痛地寫道：

由於甲午之役的敗北而割讓給日本的台灣，三十年來忍辱屈服於日本帝國主義之下，從而遭遇到一切非人道的壓迫和掠奪。其間，雖發生過多次反抗運動，但因方法常常是非科學的，且沒有強力的意識形態，因而，始終沒有得到任何成果便歸於沉寂了。近來，由於日本資本主義的入侵，在台灣的資產階級和獨佔台灣經濟利益的日本資產階級之間，發生了利害的衝突。為了要改善本身發展的空間，遂引發了台灣資產階級反抗日本統治的風潮。然而，他們還是很幼稚，不知效法印度、朝鮮的革命行動，仍戀戀不捨於所謂「台灣議會」的參政運動。

他們想在日本法律容許的範圍內，在台灣另設一個立法機構，亦即「台灣議會」，來處理台灣的一切政策和法律。其代表者並將這議案向日本國會叩頭屈膝，請求允准者，已達三次，但極端的日本資本主義，對台灣剝削的惡勢力卻愈益增加不已。終於，上述的叩頭請願運動，只落得招來主要份子二十八名入獄的下場。其間毫無慈悲可言。

我台灣同胞！諸位於今還熱衷於台灣議會的請願運動嗎？可以休矣，但願諸位不要再被島田三郎一派的偽君子所欺瞞了。台灣議會實際上不會帶來任何好處，今後再用數百顆頭顱叩地哀求，其結果還是一樣的。要求日本帝國主義施捨我們些微的幸福，無疑是緣木求魚、水中撈月。如果我們真有如此心願的話，不如對內尋求團結，對外聯合勞農階級國家蘇聯及日本的被壓迫階級，乃至受日本掠奪的中國、朝鮮等國的人民，組成國際性戰鬥團體——反帝國主義大同盟，全力從事革命鬥爭。只有靠這力量，我們才可以完全達成民族獨立和自由。起來吧！為了我們的權益，趕快展開革命的鬥爭吧。

平社的台籍同人同時也將這篇文章的要旨通告林獻堂，並且約定自第四次請願運動以後便不再簽名支持許乃昌所批判的這種「台灣資產階級的議會參政運動」。

到解放之路

〔平平〕創刊號除了上述的〈發刊辭〉與〈從台灣議會到革命運動〉兩文之外，還包括朝鮮人尹蘇野的〈朝鮮的民族運動〉、日共佐野學（一九三三年六月七日在獄中「轉向」的〈經過上海〉），以及署名「真一」的〈台灣將如何？〉等文。接著，在第二號中，

〈平平〉又刊了一篇有關台灣的記事：〈再談台灣問題〉。〈再〉文詳細地陳述了台灣的歷史演變，以及昔日土匪土豪的掠奪與日本帝國主義剝削的差別性，並分析了台灣作為日本帝國主義殖民地的經濟、政治與軍事意義——

過去，獨立於海外，和世界的文化思潮毫無瓜葛的台灣，這數年來，也與澎湃而起的這些潮流開始匯合了。在清朝的統治下，它只不過是一塊荒地而已。土匪強盜到處出沒，由於官方無能，弱肉強食公然橫行。土匪互爭地盤，掠奪良民財產，強者一日強過一日；相反地，作為弱者的平民，卻一日也不得安樂地營生。

割讓給日本後，土匪被平定，強盜也減少了。土匪及土豪已不能恣意掠奪。弱小良民始得各安其業。故從這一方面來觀察，台灣歸屬日本後獲得的些微幸福，可視之為日本所賜的恩惠吧。非也，這只是表面的現象而已，並不能說已窺透內部的真實狀況。試問：世界何處去尋覓如此有良心的殖民地強盜呢？日本取得台灣後，除平定土匪、開拓土地之外，是否對台灣尚懷有其他要求或野心呢？如果沒有，那日本可說是大慈大悲的救世祖，對他們的大恩大德，我們該當每日早起，向它頓首再拜，表示感激。這樣，怎麼可以再叫它是帝國主義、侵略主義的強盜呢？

台灣是無盡藏的寶庫，物產豐富的天堂。這個事實，是任何人都不能否定的。過去，蟠踞於島內的土匪盜賊，不過只是為了他們的生活奪取其寶而已；並非吃肉不足，尚且啃骨吸髓般徹底無厭的剝削。因此，並不至於吸食人民的膏血。況且，他們掠奪的物品依然留在島內而未外流，好比是一個大家族，由於管教失宜、兄弟失和而發生鬩牆之爭的事情，只止於他們內部的財產分配問題，並不涉及嚴重性的外部問題。然

而，日本垂涎寶庫台灣已久，佔領後，雖肅清他們所謂的台灣土匪，但事實上，並非為三百餘萬台灣人著想，全是為了他們自己的利益而做的。他們的眼光看得比盜賊更遠，他們的見識比從前的小土匪更高。也就是說，他們不但想要奪去蘊藏於台灣的一切金銀財寶，更有吸乾人民身上膏血的長久打算。

一言以蔽之，「去了搶掠台灣小錢的小盜賊，來了個搬空一切，還要吸盡人民膏血的大強盜。」

荒地被開墾了，鑛山被開發了，產量年年在增加。但墾地、挖鑛所增加的物產卻總是被剝奪，而去肥了他們自己的私腹。對台灣人民而言，這是「風馬牛不相干」的一回事。

事實上，台灣的山林、鑛山，以及重要物產，諸如砂糖、茶、鹽、樟腦等，大多已被置於專賣之下，或為日本人會社（公司）包辦經營，一無所剩。

在這中間，被留給台灣人的，單單是些許的田園，和生產稻米的生計而已。雖然如此，台灣人在這些部份都還不能安穩抓在自己手中，如強盜似的日本人使用更進步的剝削方法，課徵重稅，來滿足他們的慾望。人民收穫一石米，大約要被日本政府抽走三、四斗，以致台灣人民一年不如一年的陷入窮困之中，宣告破產的人，接踵出現，恐怕十年、二十年後的將來，除滅亡之外，再也沒有路可走了。台灣三百餘萬人民，在日本資本主義的鐵蹄下，無疑都會變成無產勞動者。現在，台灣尚殘留有眾多財產一、二萬圓程度的中產階級，但他們亦遭受日本資本家的剝削之苦，而挺不起腰來，只能大發呻吟之聲。畢竟，他們亦要自然地淪落為無產階級。他們的財產，正日甚一

日地消耗侵蝕著。所以，在目前的台灣，還沒有階級鬥爭的問題。假設將來會發生階級鬥爭，不外也是整個台灣人和日本資本家之間的鬥爭罷了。

說起台灣的日本資本家，台灣總督府可說是它的大本營。因而，台灣的階級運動要以民族運動的面目出現。將來，在台灣，除以驅逐日本為宗旨的民族運動而外，其他的運動都會消失無蹤。

台灣的民眾現被吸吮膏血，幾無生存的餘地。不久的將來嚴重貧血而站不起來的時候，縱令團結一致對抗日本，企圖打倒日本資本家，亦會成為不可能的事了。屆時，其命運將悲慘無比，令人不忍卒睹。

可慶幸的是，他們現在已逐漸覺醒中，逐漸團結，如此，可免於受日本人永久的愚弄。在東亞，台灣人也是被壓迫民族之一。印度、朝鮮、菲律賓等諸多弱小民族，總是為了他們的獨立而激烈活動，以對抗資本帝國主義。台灣倘能追隨他們而起，實現東亞弱小民族的大同團結，那麼，我們東亞的社會革命便在眼前，世界革命也自然會成功。

東亞的革命，首先以打倒日本帝國主義為開端。日本是東亞的舊德意志帝國。從前日本的領土只不過是三個小島而已。但自甲午（明治二十七、八年——一八九四、九五年）以後，佔領台灣，繼而取得庫頁島，然後併吞朝鮮，這些都是日本帝國主義的功績。

日本奪取台灣和朝鮮，是為了完成資本帝國主義的目標。因為朝鮮可當作侵略滿蒙的陸軍基地，台灣可當作虎視太平洋，與列國進行帝國主義競賽的海軍基地。台灣

不僅寶藏被取竭，還要被供作他們軍備的前哨而成為帝國主義的根據地，一旦有事，將成為他們的砲火目標和廝殺的戰場。就台灣而言，再也沒有比這更可怕更可憐的事了。英國在新加坡建設軍港，美國在菲律賓佈置九十九架飛機的飛行隊。對此事，日本的反應是要在台灣高雄修築軍港，以為對付。這顯然證明：日本為了與列國進行當仁不讓的帝國主義競賽，竟把台灣拿來作防禦列強盾牌的事實。是故，日本帝國主義的侵略和台灣有密不可分的關係。日本帝國主義如果放棄了台灣，便一日都不能存在。因此，台灣的離合，對日本而言，不啻意指著台灣物產的取捨而已，也成為日本帝國主義存亡的關鍵問題。

台灣的朋友們！同胞們！在日本不肯放棄台灣的時候，諸位絕不可有怯懦之情。諸位不可以不察世界自由的氣息一天比一天濃厚，資本帝國主義一天比一天走近滅亡的趨勢。現在，日本的資本帝國主義並不具有永久性，如對其壓迫感到頭痛的話，必須馬上起來抵抗才是。諸位！不妨睜開眼睛，看看遠方，光明就在眼前。

日本國內的反資本主義勢力，為了打倒資本主義，革命份子已在極力糾合同志，團結一致，繼續進行他們的革命事業。

諸位在台灣，勢必與所有階級團結在一起，共同反抗日本，同時，也要支援日本國內的革命才可以。為了打倒帝國資本主義而彼此握手合作。

日本是東亞唯一的帝國主義國家，倘若能早一日打倒日本，東亞民族的幸福便能早一日到來。世界的弱小民族都已覺醒了。東亞的被壓迫民族也已抬頭挺胸了。台灣人呀！起來吧！

諸位如果擔憂自己的力量不夠，那麼，趕快和東亞及世界弱小民族攜手呼應吧！然後協力來打倒資本帝國主義日本吧。這才是你們該走的自由之路，同時，也是對東亞應盡的一份義務，也是對世界革命應有的貢獻和建功機會。

顯然地，〈再談台灣問題〉一文包含了幾個台灣社會結構與運動策略上的重點：

第一，在日本資本主義的鐵蹄下，台灣人民，包括眾多的「中產階級」，終將淪為無產勞動者。

第二，在上述的規律下，目前的台灣還沒有階級鬥爭的問題。也就是說台灣人民內部之間並不存在所謂的「階級矛盾」。

第三，即使將來台灣社會會發生階級鬥爭，那也是全體台灣人民和日本資本家之間的鬥爭。因此，在運動策略上，台灣的階級運動也要以「驅逐日本」的共同目標，聯合各階級的台灣人，以「民族運動」的形式表現。

當然，它並不是狹義的、改良主義式的民族運動；不同於島內以往由資產階級領導的民族運動，在性質上，平社所倡言的可以由無產階級領導的民族解放運動吧！因此，它仍然站在國際主義的立場強調，殖民地台灣的民族解放運動必須團結所有的階級，對外聯合日本的革命人民，以及東亞的被壓迫民族，打倒共同的敵人——日本帝國主義；然後再團結世界弱小民族，打倒資本主義，完成世界革命！

七、台灣自治協會

台灣自治協會是由台灣青年會幹部及與平社有關係的台灣人，於一九二四年五月前後組成的團體。大體而言，它站在民族自決的立場，圖謀台灣脫離日本統治的民族獨立，並企圖喚起中國的輿論，重視台灣問題，團結台灣人。

成立宣言

五月三十一日，台灣自治協會對外發表了一份成立宣言。通過這篇宣言，台灣自治協會表白了它的成立宗旨：

諸位！請閉起眼睛想一想，我台灣民族在日本暴力的壓制下，不知不覺之間已經歷了長久的歲月。在這段期間內，我台灣同胞付出了許多生命和血淚，可是，面對過去所受的苦難，我們只能回顧，毫無主張正義的力量，只能吞聲飲泣，在異族壓制之下繼續沉淪下去。請看！菲律賓和印度正進行著獨立運動，想從本國分離出去。然而，我們弱小民族畢竟沒有抵抗暴力而站起來的實力。跟我們同一命運的朝鮮人竟在國境之外的自由地區，高倡獨立的旗幟，高喊恢復祖國之歌，相較之下，我台灣人的情形則遠遠不及他們。

我們台灣民族畢竟猶如牧場的牧草，只被當作任憑牛馬啃食的飼料罷了。倘若過著無異於爬蟲類般悲慘生活的我們台灣人，有心參加世界弱小民族的解放運動，爭取我們的自由解放，建設自由平等的天堂，那麼，我們台灣民族的遺民，非得拋捨更多的生命，灑灑更多的血淚，追隨不甘做亡國奴隸的菲律賓、印度等的獨立運動不可。

此刻，我們還有許多事想要告訴你們，但由於甘做異族走狗的密探為了邀獲主子

的稿賞已密密蠟集在周圍，準備通風報信，作為日後壓制我們言論的理由。但願我台灣人能從根本喚醒民族的自覺；更乞求我親愛的中國人，幫助我們的自治運動。是所至禱！

警告中國學生

台灣自治協會的辦事處併設於台灣青年會內，因此也可以把它看作是與台灣青年會「同心一體」的運動團體。據日本警察當局所掌握的資料，它在組成以後的活動狀況大致如下：

一九二四年六月十七日，「台灣始政紀念日」當天，在務本英文專門學校召開反對台灣始政紀念日的集會。十幾名台籍學生與中國人及外國人各數名參加。蔡孝乾、謝雪紅、張深切、林維金及洪緝洽等同聲批評：「台灣總督政治的暴虐」，並揭露在其統治下台灣民眾悲慘的處境，咒詛日本帝國在台的「始政紀念日」。其中，謝雪紅「婦女也得參加革命，支援男人的運動，才容易成功」的主張，尤其激起全場的喝采。大會同時也印製了大量反對始政紀念日的傳單，在上海各地分發，並且寄發到東京、北京、南京、廈門以及島內各地的同志手中。

六月廿五日，它又向各有關團體、中國學生及各方面人士，寄發一份〈台灣自治協會對中國青年學生的警告〉的宣言書，提醒他們注意日本以「文化侵略」的手段滅亡中國的野心。

警告書直接揭露日本帝國主義的侵華野心：

諸位！對呻吟在萬劫不復的痛苦中的我們台灣人而言，諸位付出了極大苦心與時

日的二十一條款撤銷運動，實在令人敬佩。然而，侵略野心未泯，宛如豺狼的下賤日本，卻根本對諸位的運動無動於衷，正準備拿出獨有的奸惡手段來付諸實行了。他們戴著日中親善的假面具，企圖達成侵略中國的野心。諸位青年學生如果不信，不妨看看那締結二十一條款、虎狼也似的日本外交家，已在護憲的旗幟下升任為總理大臣的事實。他們意圖吞滅中國的野心，是昭然若揭的。

請再把焦點轉向別處，看看對美問題吧。美國人排斥黃色人種，固然不當，我們亞洲民族應該一致表示強硬反對。但口蜜腹劍的日本人，一方面大聲高唱反美論調，一方面卻禁止同文同種的中國勞動者入境。吾人對日本人所說的人種平等的意義，實在不了解。諸位不妨考量這中間的兩種矛盾吧。定可察悟到日本人的惡劣形跡之不可捉摸。我們台灣人，原是亡國之奴隸，本來就沒有發言的餘地，但旁觀者清，憶及幼稚的中國青年子弟，在他們奸惡手段之前，不察覺任何危機而昏睡不醒，不禁要為各位捏一把冷汗了。諸位醒醒吧！覺醒吧！……諸位與其空談有名無實的、夢幻般的經濟絕交，不如以實力貫徹愛國運動，同時幫助我們亡國的台灣同胞所進行的自主獨立運動吧。於今諸位若再不覺醒，諸位無疑亦將和我們同樣陷於亡國奴隸的命運。

容我們再向親愛的求學青年進一言。諸位請想想看，日本人要奪取別人國土，滅亡異族的新方案，是靠文化侵略這一事實。現在的台灣，顯然就是這種侵略的結果。諸位！切勿裝聾作啞，聽不進下面的幾句話；以庚子退款設置的文化交流方案，完全是出自日本人對中國的文化侵略野心。其設想之周到、執行之徹底，較之英美更凶猛數倍。諸位也不必再費心尋求實例。請看，凡從事文化事業的日本人，無一不是日本外務省（外交部）的官員，他們所設計的施設內容，總不外是把日本式的奴隸教育搬

來中國，好讓中國人民去實習。當然，諸位不過是研究學問的青年，沒有參與此種施設的餘地。不過，縱使是中國著名的教育家，日本亦不讓他們有參與的機會，這真是可怕的侵略計謀呀！

我們應該說的話，也已經道盡了。總之，冀望諸位仔細觀察日本人的文化侵略手段吧！如果諸位如我們被拘束的台灣人接受同樣教育的話，中華民國這四個字恐怕終會被抹消掉的。

警告中華人民

在此之前的一九二三年十月，直系軍閥首領曹錕在英美帝國主義支持下，以五千元一票的高價收買國會議員，演出了一齣賄選總統的醜劇。全國人民於是掀起了反對曹錕賄選的運動，斥責受賄議員是「豬仔議員」，國會是「豬仔國會」。南方的孫中山大元帥下達了討伐曹錕、通緝受賄議員的命令；孫中山還通電各國政府，不得承認這個僭竊的政權。為了討伐直系軍閥，孫中山與奉系張作霖和浙江皖系盧永祥結成了反直的三角聯盟。江蘇直系軍閥齊燮元對浙江盧永祥控制江蘇境內的上海早已十分不滿。一九二四年春，在福建被孫傳芳擊敗的臧致平、楊化昭兩部，又被盧永祥改編為浙江邊防軍，使齊燮元備感威脅，於是聯合贛、閩、皖三省軍閥迫盧永祥解散臧、楊兩部，並電請曹錕下令討伐盧永祥。江浙戰爭有一觸即發的態勢。

正值戰雲密佈的八月廿一日，上海各界的反日團體共同舉辦一場「市民外交大會」。台灣自治協會也派遣數名會員參加，向當場的八百餘名聽眾訴說台灣人民的悲慘境遇，並

分發題為〈警告中華商界諸公〉的宣傳單，呼籲中華商界人士「繼續與日本作永久性的經濟絕交，藉以導致日本勢力的敗亡，若非如此，整個中國也將陷入和台灣相同的命運」。此外，還有同樣主旨的傳單幾種，其中一種題為〈台灣民族警告中華人民〉者則針對這段期間的緊張政局作了深刻的分析，它指出：

江浙緊迫的風雲，是誰帶來的？不消說，那是軍閥造成的。然則，為何軍閥膽敢如此？這是日本按照其政策，秘密供給武器，加以煽動之故。如今，戰禍眼看即將波及上海了。日本狂妄的野心已暴露無遺。閩北一帶進駐日軍，正好證明此事。侵略中國的第一步已經踏出來了。

上海罹患戰禍時，只要敗兵一侵入上海，盜匪、劫難就不免發生。但上海是中國的領土，主權屬於中國，日本憑什麼名目在此我行我素。更奇怪的是，只要中國的商人船東豎起旭日旗，任何人都不能加以干涉。試問，為何有這條規定存在？難道諸位意欲亡國嗎？恐亦不然。但情勢很明顯，日本進逼侵蝕中國的步伐會知底止嗎？倘若如此放任下去的話，終究會墜入敢怒而不敢爭、欲立而不能起之境地，到了這種地步，諸位還敢講，你們不是亡國之民嗎？

諸位！如今是驅逐漢奸，闡明中國的主權，不許日本人侵入內地盤據，進而編成民團軍維持治安的時候了。只有這樣，才能使日本軍沒有藉口侵略的餘地，因此也才能使諸位的生存維持不墜。否則，閩北一帶不久便會變成日本的租界地，且會日復一日地禍延全國無疑。

一個禮拜後，也就是八月廿八日，當全國學生大會籌備會在上海法租界的南洋大學中

學部召開時，台灣自治協會也派兩名會員，到會場散發題為〈告諸位學生〉的傳單，呼籲與會的中國學生：同情台灣同胞，共同抵抗日本，以收復失地。

反對日軍進駐閩北

九月三日，江浙戰爭爆發了。

九月十日，中共所屬機關報〈嚮導〉第八十二期發表〈中共中央第三次對時局的主張〉，揭露了英、美與日、法在戰前對直系與奉浙財政上和軍事上的支持。並且指出：「此次戰爭直接是直系與反直系的戰爭，而間接乃是英、美與日、法帝國主義的戰爭。」戰爭的結束，若是「直勝，則美國將助直系在中國政治的統一壓制，以成就美國在中國經濟的統一侵略」；若是「直敗，則為日本勢力結合安福奉張，支配中國的政治經濟。」然而，「無論前者、後者，外力侵入斷送國家生命的慘痛都是有加無已，內部戰爭屠戮人民、犧牲人民的慘痛也都是有加無已。」因此，「目前解救中國的唯一道路，只有人民組織起來，在國民革命的旗幟之下，推翻直系，解除一切軍閥的武裝，尤其要在根本上推翻外國帝國主義在中國一切既得的權利與勢力。」

九月十五日，規模空前的第二次直奉戰爭在山海關與灤東一線展開。直系因其反動統治倒行逆施及其內部矛盾鬥爭不斷加深，尤其是馮玉祥與吳佩孚之間的矛盾，導致馮玉祥倒戈反直，發動「北京政變」，包圍總統府，囚禁曹錕；迅速瓦解曹、吳的統治，結束了第二次直奉戰爭。奉系在第二次直奉戰爭中的勝利，表明日本帝國主義在與英、美帝國主義爭霸中國的鬥爭中取得了優勢地位。由於當時上海的反帝國主義運動正達高潮，日本軍

隊為了趁勢實現其侵略中國的企圖，於是派兵進駐臺北。

九月廿二日，台灣自治協會針對日軍的不軌舉動，特別召集了廿九名學生與會員，在務本英文專門學校開會。台灣自治協會公開指出，日軍此舉實乃「內藏侵略中國之意圖」；因此，它呼籲上海市民採取「經濟絕交」與「編成民軍」的手段，起來與日本帝國主義鬥爭。

批判「中日同盟」之說

北京政變後，中國的政局變得更加複雜化了。當時的政治、軍事形勢變化和各派勢力之間矛盾鬥爭發展，造成段祺瑞再度上台的結果。十一月廿四日，段祺瑞在馮玉祥等擁護下，出任中華民國臨時執政府的「臨時總執政」。然而，臨時執政府成立後實行的對內、對外政策卻迅速地暴露了它的反動本質。上台後立即著手籌備召開善後會議。此外，他在就職誓詞中還提出了「外崇國信」的對外政策。所謂「外崇國信」，就是承認帝國主義過去強加於我國的一切不平等條約繼續有效。當時廢除不平等條約運動正在全國範圍內蓬勃開展，帝國主義各國亟欲取得中國政府遵守條約的保證，段祺瑞公開宣稱「外崇國信」，正是為了迎合帝國主義的意願。

段祺瑞雖然沒有什麼軍事實力，但其背後卻有日本帝國主義的支持。在這樣的政治態勢下，市井百姓間竟而流傳起有關「中日同盟」的流言。

十二月一日，台灣自治協會針對這樣的政治逆流，特以茶話會的名義，在務本英文專門學校集會。會議從下午三點鐘開始，主題是討論、批判當時所謂「中日同盟」的議論。與會者除了五十幾名台灣籍的青年、學生之外，還包括四十幾名朝鮮人反日運動者及兩名

美國人。會後，並對外散發題為《台灣自治協會宣言》的傳單，批判所謂「中日同盟」的傳說——

中日大同盟的呼聲，近來愈益高昂，倡導者的用意到底何在？姑不論宣傳者的心意如何，這無疑是東亞舞台的大變局。中國現在的立場是，反省過去，瞻望將來。有否聯日聯俄的必要，這屬於外交上的一大問題。何況一面排斥歐美，一面勾結日俄，這無異是前門拒虎、後門引狼的乖謬行為。況且，日本所抱持的文化、經濟侵略，處處都到足致中國死命而有餘的地步。中國再也不能忍受這種痛苦了。然則，時至今日，中國竟甘於進一步陷入這囚籠中。為了中國，也為了整個東亞的將來，實有令人不忍之感。

我們原來是台灣亡國的遺民，根本沒有發言的機會，但中國雖是數千年文明的始祖，現在卻聽信二、三奸人的巧言，蹈亡國之覆轍。吾人以為，這是攸關同胞生死存亡的關頭，再也難於保持緘默了。所喧嚷反對不休，實不在於自救，而在救人！吾人本就人微言輕，深知力不足以扭轉中國的大勢。然而，回顧民國成立以來的歷史，誠可知所謂二十一條款的苛酷，所謂軍事條約是如何嚴厲，更可知所謂滿蒙權益，是如何包藏野心。我們不禁要悲嘆，具有優秀文化和最高智慧的華人，為何竟會如此愚蠢蒙昧。

是的，排他獨尊的吹牛政客，竟以日本為護符，賣起中日同盟的膏藥來。但根據事實，大多數中國民眾是不贊同此舉的，其中，雖然難免也有因這種聯日的偉人出現而徘徊歧路的人。吾人對中國雖無利害關係，但自古以來的血統淵源，令我們不忍坐

視中國的淪亡。今敢於告於諸位中國人民，日本乃是世界野心國家的頭號元凶，且侵略中國最明目張膽的鄰邦之一。假使中國能實行經濟絕交，以斷絕物質上的供應，狡猾如日本，也終有俯首聽命於中國之一日。萬一不然，則必朝倡同盟，夕作侵略，以至奪去中國一切物資，助其攻陷英美的大計略，果真一旦戰勝英美，中國也難免淪為其屬國，危機之大，未曾如斯，對中國人，我們別無所望，只籲請起而糾正這一歪風而已。

納入上海反帝陣線

除了以上所述的主要活動之外，只要有適當的機會，台灣自治協會便機動地散佈大量的各種傳單與宣言書，努力團結在上海的台灣人，同時以此促進中國人民對台灣問題的關心，以期能夠藉助中國方面的援助，發展台灣脫離日本統治的革命。

然而，在一九二五年五月卅日因為上海學生抗議日本內外綿會社罷工事件而引發的「五卅慘案」之前，中國的學生運動已經逐漸傾向無產階級運動了，隨著這樣的運動進展，台灣自治協會的運動也不知不覺地銷聲匿跡，轉而納入以共產主義為指導原則的上海台灣學生聯合會的組織。

八、台韓同志會

旅居上海的台灣青年、學生相繼組成的台灣青年會、平社與台灣自治協會等團體所從事的事的台灣革命運動，一直停留在研究、宣傳、煽動等啟蒙運動的領域。相對地，在滬朝鮮

人革命份子們的行動則有所不同，他們隨著中國國民黨改組及其「聯俄、容共、扶助工農」左傾政策的發展而明顯地增強他們的實踐活動。因為這樣，向來與他們保持合作關係的台灣青年會幹部也受到了影響，再加上被稱為構成「台灣文化協會上海支部」的許乃昌、連枝旺、彭華英等人，於是醞釀組成以行動為主的鬥爭團體。

台韓互助解救民族

一九二四年六月廿九日，韓國流亡政府的外交總長、勞動總長，以及主要的朝鮮人團體的幹部等，與上海台灣青年會、台灣自治協會等團體的幹部，共約一百卅人，聚集在南方大學，舉行「台韓同志會」的創立儀式。在當天的典禮上，曾經有三名台灣人、五名朝鮮人，以及一名外國人，輪番上台演講，各自以激烈的言詞抨擊日本帝國主義，高倡朝鮮、台灣組成民族鬥爭的聯合陣線，同時擁護中國革命。大會並且通過協調，決定該會的組織、幹部人選和鬥爭方針。

根據該會秘密分發給會員的〈台韓同志會規約〉的規定，台韓同志會「以達成台韓獨立，建設自由聯邦為唯一目的」。在運動策略上，「採用台韓互助主義，以期民族解救之實現。」所以，它「不贊同毫無意義之自治運動」。在會員紀律上，它「排斥使用霸道所獲致的屈服軟化」，希望會員「抱持犧牲精神行動，不介意成敗利鈍，不論任何手段，只要能完成吾人之目的，將排除萬難，貫徹到底」。

台韓同志會在創會典禮之後即刻對發表〈宣言〉，及題為〈我們要向中華民國請教〉的聲明。

《宣言》聲稱：

亡國之哀，亡國民之慘，固然古今中外皆然。而於同種同族之下為奴隸，其慘尤甚。我台韓民族為亞洲黃色人種之後裔，捫心自問，素與他人無怨。不意仍遭心為豺狼、骨為虎豹之天驕所覬覦，毫不顧公理，不恤人言，不守公法，劫持我土地，荼毒我人民，用盡世界一切滅國的新手段，一一加在我等無辜亡國奴隸之上。尤其可恨者，焚我歷史，斷我文化，阻我通婚，滅我同種，既以其暴政肆意蹂躪，復杜遏我自治之路。所實行之不平等待遇，雖印度、安南亦望塵莫及！我台韓同志有鑑於揭竿起義，對抗強權，而無相與之人，僅孤單盲進，未曾有互助之效，故屢起而屢敗。同人等久經憂患，深深悟到，單獨盲動，實不如聯合運動之易於成功。何況，既同命運又同目的之雙方，胡不如此！我台韓民族而自甘滅亡者不論矣，若猶有自存自榮之寸意者，即應糾合一致，共謀自決，以誓死之決心，期解放之實現。不懼刀鋸斧鉞，凡我同志奮勇前來。

批判「亞細亞聯盟主義」

《我們要向中華民國請教》則針對中華民國姑息那些締結廿一條款的賣國外交家組閣，以及部份附和「亞細亞聯盟主義」的國人而直言批判——

我親愛的中華民國，你們平時雖高唱經濟絕交，但此時那締結廿一條款、豺狼般的外交家，已組織內閣，成為總理，諸位，為何還不加以激烈的反對呢？

中蘇協定，本來屬於中蘇兩國的內部事務，絕不容許外人干涉的，但野心未泯的

小鬼子，卻數次前來干涉，強加阻擋，諸位，既作為中蘇協定的主人翁，曾經參與見聞，為何竟無一人敢出而抗爭？

台灣和朝鮮，皆是日本用暴力加以掠奪的。荏苒於茲，已經數十年了。但為何諸位竟無一人起而支援我們的獨立運動？我們想不透，因此要向諸位請教。

美國排斥黃色人種，扶桑兒郎拚死反對，且高倡亞細亞聯盟主義，以為排美之利器。但另一方面，它卻禁止中國勞工入國，對此事不知諸位知道不知道？畢竟，日人所提倡的人種平等，只針對異種人，對同種人卻不適用。這些消息，諸位應該是非常清楚的，那麼，為何諸位之中還有些人對亞洲民族主義同聲唱和，甚或加以鼓吹呢？若不是喪心病狂，便是變成金錢的奴隸罷了。

台韓同志會規定：「會員須嚴守秘密。雖是親族或任何親密關係之人，亦不得有洩漏之情事。」因此，日本警方只能掌握到他們「散發傳單、發表宣言書」的行動，其餘的具體事實則無法得悉。據統計，自台韓同志會組成以來至一九二五年二月間為止，日本當局就取得了五十餘種由該會發出的宣言與傳單。通過這些宣言和傳單，大致也不難理解該會的活動狀況。

一九二四年七月廿九日晚上，台韓同志會在上海法租界霞飛路上海商科大學的第一講堂，召開朝鮮人大會，參加者有一百廿名朝鮮人、三十幾名台灣人、中國人廿名，以及幾名蘇聯人。會上總共有十幾人輪流上台演講，批判日本侵略中國的行為，鼓動中國人民起來反抗日本帝國主義。

「國貨救亡」無異與虎謀皮

八月卅一日，上海的反日團體「國貨維持會」，在上海總商會會館舉辦「第一次國貨救亡大會」。台韓同志會所屬會員中的朝鮮人十幾名與二名台灣人，攜帶大量的傳單到現場，聲明要參加大會。然而，大會卻以他們是外國人之故而拒絕。他們於是當場散發題「警告對日外交市民大會諸君」的傳單，然後離開。

《警告書》指出，以「提倡國貨」來代替「排斥日貨」，無異於與虎謀皮的無謀之舉；如果不以日本為仇敵，規劃更根本的對抗救濟運動的話，日本終將要求中國為其殖民地。它語重心長地警告那些上海的小商人——

諸位高舉「提倡國貨」的旗幟，以進行反對日本加徵對華關稅的運動。對此，吾人雖然不敢說是錯誤的，但諸位果真了然日本的本質嗎？難道，日本不是世界所公認的豺狼嗎？不是我中華民國不共戴天的仇敵乎？對豺狼般的仇人訴之於理，不獨無效，諸位尚且欲以「提倡國貨」來代替「排斥日貨」，意圖恢復既失的商權，保障既有的利權，這一類的行為，毋寧說是無異於與虎謀皮的無謀之舉了。

諸位，迫於燃眉之急，無遑熟慮彼此而採取如此手段，這是吾人可以體諒的，但諸位若不以日本為仇敵，規劃更根本的對抗救濟運動的話，相繼而至的一切奸惡伎倆，將愈益加緊其步驟，終究要求中國為其殖民地。

諸位覺醒吧！如今猶不覺醒，更待何時？

我台韓民族，同為華人血統，亦同為日本人所仇視。諸位不妨看看日本對台韓人

的壓迫；在暑假中舉行演說而被捕的，進行自治運動而被拘禁的，真不計其數。他們期望以殘暴的壓制，讓你走向滅亡。如今，我們如不逃亡國外，便只有坐以待斃了。俗語說：「苛政猛於虎」，這句話是台韓民族痛切同感的現實寫照。諸位未曾體驗此中的悲慘處境，故亦不知個中的痛苦何在。最近日本禁止華工入國，並為排斥華貨而增課奢侈品稅，這就是日本侵略中國的第一步棋，也是殖民地化慾望的第一次表現。諸位對此，仍僅止於提倡國貨、反對加稅的口頭嗎？若然，諸位果真還有當獨立國民的資格否？

起來吧！起來吧！

我們希望以我們的熱血，誓為諸位之後盾。

揭露段祺瑞的賣國陰謀

馮玉祥的「北京政變」（一九二四年十月）之後，段祺瑞於十一月廿四日就任臨時執政府總執政。台韓同志會立即委託國立南洋大學學生會，於十一月卅日，散發一份題為〈請注意日本對華政策〉的傳單，揭露段祺瑞政府擬與日本簽訂密約，割讓滿洲（東北）給日本的陰謀。

該份傳單指出：

據可靠方面的消息，日本的對華外交終於決定擁段政策。自段進入政界後，日本便提議取消所謂二十一條款，並把駐華公使昇格為大使，以便使中國列為一等國地位等。這實是表面上以甘言蜜語空賣人情，藉以欺瞞中國民眾的愚弄性作為。他們骨子

裡明白：只要段一出馬，便有履行雙方既有密約之可能，所以，這不外是為了攫得中國的權益而玩弄的奸策而已。

薄施有名無實的小恩惠，愚弄民眾，以期獲取更多更大的酬報，日本這種對華外交所企圖的是什麼？這分明就是說，段祺瑞是日本走狗，他和日本之間已有密約，訂有互相支援的條款。一俟段就任執政後，日本便可放棄向來的中立姿態，積極援段，欲藉此掠奪中國國土、資源和利權。

雖然國人略知段和日本的互相關係，但知悉其密約者，恐怕就少之又少了。密約是什麼？吳佩孚失勢的原因便是。吳佩孚遭到日本的壓迫才失足。這是由於段在津時代締結的密約——日本如援助奉天，使直隸系失敗的話，便可以割讓滿洲——而來的。依據秦皇島之《回光通訊》的報導，日本暗中援助奉天的事實，是明顯不過的。然則援段政策是什麼？此無他，亦即供奉一個頭腦愚笨的人——軍閥，作為政策實行上的傀儡，俟機執行密約，使其實現，如此而已。

段已經是日本的走狗，雙手捧著中國要送給日本。如今，假使日本的援段政策能夠進展，恐怕中國四千年的文化，不久便要變成在博物館展示の木乃伊收場！

第二節 在北京

第一次世界大戰後，中國重新成為帝國主義列強重點爭奪的地區。大戰期間，日本趁英、美等國無暇東顧的機會，加緊在中國擴張勢力，一度出現了日本獨霸中國的趨勢。戰後，美國的經濟實力急劇增長，成為最大的資本輸出國，並且力求削弱日本在中國的優勢地位，美、日矛盾於是日益尖銳。此外，英、日之間的矛盾也在加劇。

一九二〇年十月，在美國提議下，日、英、法、美四國，在紐約簽訂新四國銀行團協定，包攬中國的一切經濟和政治借款，打破了日本獨占的格局。

為了進一步限制和削弱日本勢力，協調各主要帝國主義國家的矛盾，美、英、日、法、意、中、荷、比、葡九國，又在美國提議下，在華盛頓召開「太平洋會議」。會議通過〈九國公約〉（又稱〈九國關於中國事件應適用各原則及政策之條約〉），在所謂「各國在華機會均等」和「中國門戶開放」的原則下，打破了日本在中國的獨占優勢，為美國實現控制中國的計劃創造了條件，並造成了各帝國主義列強協同侵略、共同支配中國的局面。

戰後美、英與日本在中國的爭奪，直接導致了它們各自支持的中國各派軍閥之間的混戰與爭鬥。

大戰期間，皖系軍閥段祺瑞依仗日本帝國主義的支持，控制著北京政府的實權。直系軍閥曹錕、吳佩孚則在美、英帝國主義的支持下，從各方面進行倒段活動，並同奉系張作霖暫時取得和解，企圖問鼎北京政府。一九二〇年初，形成了直、蘇、鄂、贛、豫和東北

三省的八省反皖同盟。七月，直皖戰爭爆發。結果，皖軍全線崩潰。七月十九日，段祺瑞通電辭職，直、奉軍閥控制了北京政府。

就在軍閥混戰下政局紛亂的這一年（一九二〇年），第一個到北京留學的台灣學生——劉錦棠，從東京來到北京。劉錦棠，台中樹子腳人，原來是東京美術學校學洋畫的學生，美術學校畢業後一直沒有回台，轉赴祖國大陸的北京，為第一個以「華僑優待生」（當時台灣人係日本籍）進入北京大學的台灣學生，後來拜當時任國民黨中央委員的王法勤（勵齋）為義父，改名王悅之，並幫助王法勤從事國民黨地下工作。後來經營「北平藝術專科學校」，自任校長，終戰前逝世。

由於交通、語言、氣候、風習等種種條件的限制，到北京留學的台灣學生，始終不見增加。然而隨著島內文化協會民族主義啟蒙運動的開展，台灣人民的民族意識也普遍覺醒，因而向來不引人注意的、到中國留學的人數，也有明顯增加的趨勢。到了一九二二年時，在北京的台灣留學生人數已從之前的廿人左右，增至卅二個人。

這時候的北京，經歷了一場五四愛國運動的革命洗禮之後，新文化運動明顯地表現出向更深層次發展的趨向，圍繞著如何改造中國、改造社會這個中心議題，掀起了巨大的宣傳新思想的浪潮，各種社團和期刊，各種社會思潮和改造社會的方案紛紛出現，形成中國思想界少有的百家爭鳴的生動局面。

就在五四以來中國學生運動及各種社會思潮的衝擊之下，這些留學北京的台灣學生也漸漸在認同中華民族的共同意識下，組織起來，開展反日的學生運動。

一、北京台灣青年會

一九二〇年的直皖戰爭一結束，直、奉兩派軍閥爭奪權力的鬥爭就尖銳起來。直系吳佩孚在英、美的支持下，向長江流域擴展勢力，引起張作霖的極度不滿。一九二二年一月，聽從張作霖擺布的北京政府梁士詒內閣又在吳佩孚和直系各省督軍的逼迫下下台。奉軍於是再次大批入關。四月底，第一次直奉戰爭爆發。結果，奉軍大敗，雙方議和罷兵，北京政府完全由直系所控制。

就在政局這樣動盪不安的時期，留學北京的卅二名台灣學生，在一九二二年一月發起組織「北京台灣青年會」。青年會的主要成員包括：北京的林炳坤（海山郡）、鄭明祿（苗栗郡）、黃兆耀（台北市），與陳江棟（集集庄）、劉錦棠（台中市，改名王悅之）、林子明（台北市）、林飛熊、范本梁（嘉義人）、林瑞臚（霧峰）、蔡惠如（清水街）、吳子瑜（台中市）、林松壽（海山郡）、廖景雲、林煥文（竹東郡）等。會址設於北京崇文門內鈞耳胡同十四號。

北京台灣青年會的會章開宗明義地規定：該會以「謀求會員間的意志溝通，獎勵研究中國文化」為宗旨。同時，在這樣的宗旨之下，他們聘請了北大校長蔡元培、教務長胡適與李石曾教授，以及袁世凱政權的財政總長梁啟超、司法總長林長民和參議員王法勤（勵齋）等人為名譽會員。就思想的調子而言，蔡元培鼓吹所謂「好人政府」的論調；胡適主張「多研究問題，少談主義」；梁啟超是鼓吹基爾特社會主義，提倡社會改良的「研究系」首領；而李石曾則是有名無政府主義者。基本上，他們認為中國沒有進行社會主義運動的

必要，也都反對無產階級領導的社會政治革命。因此，可以說，北京台灣青年會在思想上並沒有接受以李大釗、陳獨秀為主的馬克思主義的宣傳運動。

北京台灣青年會成立以後即對外發行機關誌〈會報〉，並且通過〈會報〉，聯絡島內文化協會會員，支持當時文協推動的民族主義啟蒙運動及台灣議會設置請願運動；同時也將當時北大校長蔡元培以下的進步教授與學運所帶來的影響，反映給島內的青年學生。

同胞們！我最敬愛的同胞們！無聊而悲苦的嚴冬，已經過去；活潑而爛漫的新春，已經來了。為何諸位猶鼾聲大作，貪圖春眠而不醒耶？枝梢的鳥，草叢的蟲，無不高唱自由之歌。自由！自由！正是我們終局的目標。為此，我們須流血鬥爭。野外的花草都爛漫開放，齊奏和平之曲。和平是我們究極的目的。大家須奮勇前進。為何諸位猶按捺不動，在威嚇壓迫之下，甘於緘默？同胞們！我最傷心苦惱的同胞們！數十年來被日本欺壓的同胞們！飽受帝國主義威嚇的同胞們！無聊悲苦的嚴冬已經過去，百花爛漫的春天已經來了。枝梢的鳥，草叢的蟲，正在活潑地蹦跳，野外的花草綻開了笑容。萬物的靈長，華夏的遺民，焉猶不醒？何不抬頭挺胸？

同胞們！可憐的同胞們！自由之光比任何東西更美。和平之華比任何東西更絢爛。我們希望與諸位一起灑血、流淚、共同奮鬥。

趕快起來奮鬥。大膽拚命的奮鬥。奮鬥！奮鬥！奮鬥！這是我們的生活。奮鬥愈加激烈，我們人生的意義愈加深刻，快樂更是無可比擬。停止低徊逡巡，活潑地前進吧！爛漫的新春，不許我們逡巡。

「純鳴者」是無政府主義者范本梁的筆名之一，據此推測，這篇「不但嚇壞了受信人，

同時也嚇壞了日本當局」的賀年信，很可能是由范本梁執筆的。

此外，他們也完成了入學北大的許可運動，改變了向來台灣學生只能旁聽的規定，使得他們可以如同其他華僑學生一般，先以華僑優待生名義（之前，台灣學生被視作日本人）。考進去，唸一年，成績及格後再昇為正式本科生。一九二三年九月，洪炎秋與宋斐如通過嚴格的考試，考入北大預科，他們兩人算是台灣學生最早以一般考生名義正式考進北大者。為了募集更多的台灣青年到北京留學，青年會不僅在機關誌登載北京就學指南，而且也通過島內的文協會員，進行勸誘的工作。一九二五年，宋斐如針對王悅之有關台灣學生留學北京的談話，特地在十一月一日發行的第七十七號《台灣民報》，發表一篇題為《王悅之氏之謬談與北大台灣同人》的反駁文章。宋斐如的文章澄清了有關北大入學方式的謠傳，並介紹了在北大的台灣同人的狀況，鼓勵懷抱熱血的台灣青年到北京留學。

聲援台灣治警事件

一九二三年十二月十六日，台灣總督府以「違憲」之由，在治安警察的後盾下，將「台灣議會期成同盟會」強行解散，並將所有的關係人物全數加以檢舉。史稱「治警事件」。

遠在祖國大陸北京城求學的北京台灣青年會的同人，一旦知悉島內發生的此一檢舉事件後，隨於一九二四年三月五日，召開「華北台灣大會」，隔海聲援。大會並發表一份《華北台灣人大會宣言》，痛斥日本帝國主義的總督政治，號召台灣民眾聯合全世界被壓迫的弱小勞苦大眾，共同奮鬥，推翻一切強權及不自然的制度。

《宣言》為「台灣議會設置請願同盟」的檢舉事件而鳴不平道：

親愛的同胞們！自日本佔領台灣以來，我三百四十多萬可憐無辜的台灣遺民，受盡了日本人的侮辱，也受盡了官僚的欺壓，受盡了軍閥的肆虐及資本家的橫暴，遭遇到無與倫比的種種痛苦，這是經常思念及此的諸位所熟知不過的事。

前年，大批軍隊在大埔林、噶吧嘒慘殺無辜的老幼數萬人，在彰化，虎狼也似的警官把無數的良民處以酷刑，無惡不作的官僚不斷欺壓著全台灣的勞苦群眾，種種痛心而使人膽戰的慘事，令人幾致不忍卒聞，而又片刻都不能忘懷。

這次，我們國內政治運動的先鋒隊，為了保持人格的尊嚴，擁護民權的完整，基於日本憲法第二十九條所揭示的人民集會結社的自由權利，向帝國議會提出溫和的請願陳情，結果，竟被總督府拘禁了四十九名，其中十四名經被起訴，數百名遭到警方的持刑訊問及粗暴的家屬搜查，以致人心惶惶，不可終日，失恃的男女老幼，徘徊於街頭路邊。同胞們！有志氣的學生青年們！諸位請看這慘虐無道、違悖天理的日本總督政治，帝國主義、資本主義所產生的畸形怪物吧！它剝奪了台灣主人翁應享的自由權利，這是可以原諒的嗎？此可忍孰不可忍？同胞們！有血有淚的各界人士！速速起而團結吧！速速起而驅逐這殘暴不法的官僚吧！

諸位！我們最親愛的諸位！不願受壓迫、掠奪、殘虐，但願休戚相關、和衷共濟的諸位！總督專政禍害台灣已達極點了。政府的暴虐，軍閥的殘暴，警察的橫行，財主的恣肆禍害勞苦民眾，現在已到達極點了。作為人應當享受的一切自由，一切幸福，一切趣味，全被他們侵害了，全被他們剝奪了，又統統被他們霸佔了。

如此這般的蹂躪民權，霸佔一切自由，掠奪一切幸福，侵犯一切趣味，非人道而

無處申訴的殘暴行為，成為這次台灣民選議會請願團親身碰到的迫切問題。舉凡台灣的遺民及全世界被壓迫弱小勞工民眾，應該齊同奮起，形成席捲每個角落的大規模民眾運動。團結一致，對抗我們的仇敵——軍閥——資本家及其爪牙，以解救我們全世界被壓迫勞苦人類同胞，也就是要為我們全島同胞，及全世界同胞的生存和自由而戰。這也就是勦滅我們共同的敵人，解除我們共同的，追求我們人類共同的幸福，以圖恢復我們作為人所應享有的一切權利。

全島的同胞們！有志氣的青年們！有血有淚的各界人士！

我們華北台灣人大會已全體決議，以實力支援弱小稚嫩的台灣民選議會請願團及其期成同盟，務使諸位先鋒，能夠進行激烈的以暴抗暴的大眾運動。並和他們協力，向全世界暴露日本帝國的毒辣政治，同時聯合各地同志，共同推翻一切強權，摧毀一切不自然的制度。

同胞們！有志氣的學生青年們！全島悲苦的被壓迫同胞們！

起來！快起來！快起來奮鬥！各位一齊起來奮鬥。目前正是生死關頭，時間極為緊迫！

值得注意的是，這份宣言所署的年號，既不是西元，也不是民國，更不是昭和，而是安那其主義者慣用的「世界語紀元」。另外，通觀此篇宣言所用的詞彙，更完全是安那其主義者慣用的口吻，因此，我們很難不聯想到執筆人是范本梁；以及他在青年會中的影響力。

反對段祺瑞召開善後會議

一九二四年十月廿三日，傾向革命的北洋軍將領馮玉祥在第二次直奉戰爭中發動「北京政變」，推翻曹錕、吳佩孚的直系軍閥政權，改所部為國民軍，並邀請孫中山北上，共商統一大計。孫中山則提出了召開「國民會議」的主張，並於十一月十日發表北上宣言，十二日由廣州動身北上。在孫中山北上的同時，中國共產黨與國民黨左派倡導組織「國民會議促成會」，並在全國發起了召集國民會議和廢除不平等條約的人民運動。有著強大群眾運動作後盾的孫中山，在北上途經上海時對記者說：「我這次北上，有兩個目的：一、召集國民會議，是對待軍閥的；二、廢除不平等條約，是對待帝國主義的。」

各地軍閥大為恐慌。因此，抬出段祺瑞來組閣（十一月廿四日），希望先造成既定事實來抵制孫中山。十二月四日，孫中山到達天津，三十一日扶病到達北京。這時，他所面對的已經不是傾向革命的馮玉祥，而是奉系軍閥張作霖所支持的「臨時總執政」段祺瑞了。皖系軍閥頭子段祺瑞為了對抗孫中山所提國民會議，而提出召開「善後會議」，借以使其統治合法化。

一九二五年一月十一日至二十二日，中國共產黨在上海舉行第四次全國代表大會，發表大會宣言，揭露了段祺瑞「善後會議」的欺騙性和反動實質，號召人民反對「善後會議」。二月，段祺瑞不顧人民的反對，召開「善後會議」，並發表承認以往和各國所訂不平等條約的宣言，頒布善後會議條例。對此，國民會議促成會全國代表大會於三月一日在北京揭幕，向全國人民指出具體的鬥爭目標。三月十二日，孫中山因病逝世，召開國民會議和廢除不平等條約的運動，也隨著全國人民對他的哀悼而更加深入人心。

據洪炎秋說，當時，台灣的中華會館也推出一個台灣的華僑代表，前來北京參加段祺

瑞的「善後會議」。事實上，當時在台灣華僑大都從事菜刀、剃頭刀、裁縫刀的三刀生涯，很難推出一個可以花錢的知識份子來充代表。台中太平庄有位林姓士紳，因為看到霧峰的林獻堂在台灣一直很出鋒頭，有點吃味，於是趁機活動，捐出一筆款項給中華會館，由會館讓具日本有國籍的他冒充華僑，參加善後會議；同時他還為主持會館的兩位董事代出旅費，讓他們陪他到北京各地遊覽。

在北京的那些已經秘密加入改組後的國民黨的台灣學生，偵知此事後即借題發揮，在北京大學第三院的大禮堂召開北京台灣學生全體會議，當場決議：勸阻林某出席善後會議，否則將發表宣言，暴露其假華僑的身分。林某為此而著了慌，急忙四處託人以酒肉收買一些貪圖小惠的學生，並請最早到北京留學的台灣人王悅之為其說情；但這些學生卻嚴詞拒絕。林某於是要那些被他收買的學生出來反對大會的決議，要求重新開會、討論。然而，在第二次會議，林某收買的學生仍占絕對少數，無法翻案。林某只好另請平素與在北京的台灣人都有往來、人緣最佳的北京郵政局日本課課長——林濱南先生（作家林海音的父親）出來調停。林濱南認為，北大學生是最有號召力的中堅分子，只要北大學生的態度稍為緩和，事情也就好辦了。所以，他就約請洪炎秋、蘇薌雨、游祥耀（戰後曾代表張鳴主持淡江英專）、宋文瑞（斐如）等人，到他家裡去和林某見面，商談一個大家可以下台階的辦法。洪炎秋等人商量之後，決定看在濱南先生的份上，與林某面談看看。

當時，林濱南先生寄居於南柳巷的永春會館。當洪炎秋、游祥耀與蘇薌雨三人走到巷子口時，忽然從巷子暗處竄出一個手拿一把尖刀的醉漢，向他們撲刺過來。結果，刀子刺穿了洪炎秋的耳朵，並在他的脖子上劃了一道兩寸長、二分深的刀傷；蘇薌雨因為奪刀，

虎口也受了輕傷。那名醉漢後來也被警察逮住，問明身分竟同是台灣人（台北艋舺人，姓王），就讀於平民大學。警察於是把他轉送日本領事館警察署處理。經此事件，林某不敢出席善後會議而悄悄回台。在北京的台灣學生則更深刻地認識到：「把台灣的命運和祖國的命運連在一起，依靠祖國以收復台灣，參加祖國的建國工作，才是救援台灣之道。」因此，北大的蘇紹文、王民寧等人便轉而學武了。

二、韓台革命同志會

一九二三年，就讀北京世界語專門學校的宜蘭人張鐘銓（戰後，淡江文理學院的創辦人張鳴）與一名叫吳基星的朝鮮流亡學生，糾合了十名左右的朝鮮與台灣青年，組織一個「韓台革命同志會」。其中，台灣學生以居住泉州郡會館的為主，他們是：洪炎秋、李金鐘（當時化名甘振南，朝陽大學學生，光復後任職台灣合會公司）、呂茂宗（後改名呂永凱，曾任汪政權立法委員，光復後曾任台灣省議員）、楊克培（台中人，與楊克煌屬同胞兄弟，一九一三年畢業於彰化公學校，一九二二年至一九二四年分別在日本和中國北京就讀，在北京高等師範學校讀書時對共產主義發生共鳴。日本明治大學畢業後，曾隨參加一九二七年五月廿至廿六日在漢口舉行的太平洋職工會議日本代表山本玄藏返華，擔任翻譯工作，同年加入中共並隨後返台，從事農組運動。一九二八年在台共黨員謝阿女的誘使下加入台共，共同在台北開設國際書局，成為各地台共黨員的聯絡中心。他還指導文協、農組等大眾團體，組織社會科學研究會，擔任講師傳授共產主義，並從事黨的擴大與強化工作。被日警逮捕後拘役五年）。

然而，這批同志，志雖相同，經濟條件卻大大不同。台灣學生大都是席豐履厚的「膏粱子弟」，而朝鮮同志卻多是赤手空拳的「亡命之徒」。這種處境上的差距，不但表現在每次開會的茶點、便餐費都仰賴台灣學生的小事上，而且反映在擬定行動綱領時雙方認知的截然不同。朝鮮學生往往把暴動、暗殺列為主要手段，可台灣學生卻認為朝、台兩地情況不同，朝鮮毗連大陸，行動失敗，容易逃亡；但台灣四面環海，日本人可以壘中捉鱉。因此主張不該做無謂的犧牲。雙方因而引起很大的爭論。

後來，台灣學生之間通過集體協議，一致認為「要解救台灣，除了參加祖國的建設，等祖國強大起來，由祖國來收復以外，自由擺脫，是十分困難的。」因此，他們決定解散這個組織。韓台革命同志會原來規定每個月開會一次，由韓、台兩方輪流召集。當台灣學生輪到召集時，他們就以無限期延期的手段，使它逐漸無疾而終。

三、新台灣安社

第二個到北京求學的台灣學生是後來創設無政府主義團體——新台灣安社——的范本梁。

范本梁字牛，號鐵牛，一八九六年（明治廿九年）出生於嘉義市東門町。一九一五年（大正四年）赴日本留學，經由東京青山學院、茨城縣土浦中學校，而於一九二〇年（大正九年）進入上智大學哲學系。這段期間正值俄國十月革命成功，蘇共政權開始著手「歷史上無產階級建國的首次實驗」，無政府主義工團主義的宣傳和勞工運動也正在歐洲日趨活躍。所以，當時台灣留日學生們熱烈的求知活動，可以說是把馬克思主義和巴枯寧主義

奉為新的時代標識的革命理論和實踐號召。范本梁，也就是從這時開始信仰無政府主義，並且與在東京的無政府主義者——不論其為日本人、朝鮮人或中國人——來往，努力研究無政府主義。後來，他因為在無政府主義團體——世界主義俱樂部（Cosmopolitan Club）主辦的演講會中發表煽動性的演講而被拘禁。

一九二二年（大正十一年）八月左右，范本梁因憧憬當時北大的自由學風和蓬勃的學生運動，而隻身離開東京，前赴北京。在北京，他不但到北大哲學系旁聽，而且和當地的無政府主義者，以及僑居北京的台灣學生，尤其是台中出身的留學生關錦輝、謝廉清、謝文達等人，時常一起進行思想上的討論與學習。後來，范本梁加入了住在北京的無政府主義者兼世界語推動者梅景九等一百九十幾人組成的「北京安社」。

一九二四年左右，范本梁結識了燕京大學學生許地山，並且密切往來。因為許地山在台灣居住過，兩人於是決意以北京的台灣留學生為中心，組織一個無政府主義團體——「新台灣安社」。後來，范本梁及其組成的北京新台灣安社便被稱為「台灣無政府主義運動嚆矢」。

新台灣安社宣言

新台灣安社成立的同時，也於世界語紀元（一八八七年是世界語紀元元年）卅八年（公元一九二四年，亦即民國十三年，大正十三年）二月八日，向北京各界發出〈新台灣安社宣言書〉。這篇宣言相當長，它首先說明無政府主義者一般論的抽象理念與他們心目中的社會觀，然後又以人性觀念論的歷史觀說到人類原始共同體完美的自然狀態的破壞過程，同時也指摘攻擊帝國主義與私有財產制度，批判各國的革命運動，最後便根據狂熱的破壞

與改造意念，提出激烈的政治主張——

現在，我們大多數台灣民眾所要求、所熱望的是甚麼呢？我們奮鬥的目標又是甚麼呢？我們敢說，那是為了幸福與和平、真理與光明，及正義與自由！

現在，大多數台灣民眾和世界其他弱小民族一樣，熱望能避免無聊、悲苦、迷信、黑暗、暴虐和壓迫。因為無聊悲苦的生活會抹殺人生的趣味，磨滅人的天性。所以為了和平幸福，要排除無聊與悲苦。

我們為何追求真理與光明？為何排斥迷信與黑暗？那是因為迷信會阻礙人類的創造性，禁閉知能與本性；黑暗會阻礙社會的進步，破壞人文之故。因此，我們若要伸張創造性，發揮知能本性，企圖人文之發達，實現社會之進步，必須拋棄迷信就真理，突破黑暗進入光明。

我們之所以要求正義與自由，排斥暴虐與壓迫，是因為正義的反面是暴虐，自由的反面即為壓迫之故。我們曾經遭受過無數的暴虐者的強制，無數掠奪者的威嚇壓迫，深知那是不自然而違反人生本旨的行為。因此對現在的我們，正義與自由是不可缺的中心要求，我們必須為正義與自由誓死力鬥。

然而，自從政府剝奪了我們做為人而應該享受的一切自由，資本家獨佔了我們做為人而應該享受的自然財貨，應屬自由的社會變得一片混濁。光明的世界受盡蹂躪，應屬幸福的人生陷入於獸類世界的慘酷狀況中。我們民眾受盡了強暴者的壓迫，受盡了惡毒者的盜奪，數千年來，在所謂英雄者的愚弄和所謂聖賢者的蠱惑下，經過了無寧日無趣味的歷史，直到現代。

現在人文已開拓，科學漸昌明。現代民眾已知人之為人之價值，和人生興趣之所在。已知社會之連帶責任，已能洞察現代之所謂正義、自由、幸福、和平、真理、光明、平等、文明等言辭，皆為虛假，目的只在於欺瞞民眾。更知一切自私自利之所以產生，姦淫誘拐之所以發生，頑固偏執之所以發生，禍起蕭牆之所以盛行，欺壓殘暴之所以不止，侵略戰爭之所以不絕，皆起自人我之別，男女之別，宗教、家庭、官民之別，國境之存在等理由。而這些莫非都是國家、政府、官僚、軍閥、貴族等強者的罪惡，是資本家、地主、工場主、銀行家及集積貨幣的盜賊的罪行。一切都是源自權力之存在，私有財產制度之維持所帶來的必然的罪惡。我們的社會發展史，明確地指出這一事實。

在那沒有政府壓迫、沒有法律束縛、沒有家族權力、沒有資本掠奪的上古社會，是人人共居，共聚，日出而作，日入而息，鑿井而飲，耕田而食，各盡其所能，各取其所需，擊壤而歌，鼓腹而嬉的世界。這種狀態是完全的自然法則，其間沒有掠奪，沒有欺壓，沒有殘虐，沒有支配，沒有服從，沒有命令。

然而，少數殘暴懶惰的野人出現了。他們逞強凌弱掠奪別人，產生了隸男奴女的惡風。至此，漁獵時代的聚居被廢，變成了游牧粗農的部落制度，產生了儲蓄及利息的觀念。懶惰野人好勇、好鬥、侮辱柔弱女子，而且，逞勇好殺的男子備受尊敬。從此開始，男女系統，父子關係漸明，開始有了遺產繼承制度，發生家族制度。人與人之間興起了階級主義，出現部族民族之對立，更發展為國家主義，民族對立變成為國家對立，於是發展為現代怪物——侵略的帝國主義。

現時各地所推行的運動，如民族自決運動，印度、菲律賓、朝鮮的獨立運動，日本（內地）的普選運動、女子參政運動，我們台灣的民選議會請願運動等等，皆屬幼稚運動，皆非解決根本問題的運動。這些皆不過所謂以暴易暴之運動，不過少數意存壟斷的資本家及資產階級，企圖獨佔漁翁之利的野心家，利用群眾革命心理，犧牲可憐的民眾的財貨與血淚，目的只在於自肥私囊。就如同中國之革命，其性質頗不徹底。一桀去而紂來，自由人何時能抬頭？這種中國式革命，即使反覆千百回，即使可憐的民眾如何灑血流淚，傾家滅親殺子，亦不可能帶來安寧之日，抬頭之餘地。

故此我們斷言，現時各地所推行之各種運動，一切政治活動，皆類同帝國主義之惡辣政策，不過填充少數人慾望，掠奪多數人福利，阻礙科學進步，而絕非帶來人類自由平等理想之運動。……

我們唯有斷然廢除一切權力、一切不自然之私有財產……以暴動清除現在之一切國家、政府、軍閥、官僚、貴族、資本家……秉持暴動無政府主義（廣義之無政府主義）輔佐勞苦的平民大眾，開始猛烈的世界大眾革命，發動猛烈的暴動社會革命。

我們要變少數人的國家為多數自由人的國家。變陸海軍人的國家為農工商人自由組織之社會。變資本家橫行之社會為勞動者有之社會。使軍人變為生產的農工商人。使少數人獨佔之私有財產變為多數人的共同財產。打破萬惡根源的家庭，廢止不自然的婚姻制度。主張自由之獨居生活，尊重各人之自由戀愛。以世界為家，主張無宗教、無迷信。改造一切不公不義、非文明、非科學、非人性的邪說。變一切為人民之幸福，自由人之權利。

由於科學發達，人文昌明，只要相信正義博愛之心便不難壓倒偏頗的愛國心，撲滅惑人的宗教，消滅非科學的迷信。這種科學的無政府主義能夠剿滅野蠻的軍國主義，四海一家的無政府主義又能剷除二十世紀的怪物——侵略的帝國主義，使國際資本主義化為烏有。

同胞諸君！青年有志諸君！社會改革的健將，黑暗世界的良醫志士諸君！奮起吧！奮起鬥爭的時期來臨了！看那馬克思派赤俄（指紅色俄羅斯）帶上了資本家色彩（指列寧的新經濟政策），提出中央集權的錯誤主張，我們無政府主義者必須斷然奮起。必須大膽以生命為賭注奮鬥！

打破一切權力、推翻一切不自然的制度、掃除一切非科學的迷信！

為勞苦民眾之真正幸福與被壓迫者的真正自由而奮鬥！……：

我們不顧知識、經驗之不足而設「新台灣安社」，期以糾合全台灣之義士同志，為民眾鬥爭，為窮人而謀，欲向我們的仇敵進攻，加以殲滅。

這就是我們的使命，我們「新台灣安社」組織之宗旨。

通過這篇宣言，我們稍可窺知廿世紀二〇年代初創時期的台灣無政府主義者的基本認知，同時進而了解當時巴枯寧主義在東方殖民地社會思想影響的大概。

《新台灣》雜誌

范本梁在北京的無政府主義組織工作，似乎並沒有得到太多旅居北京的台灣支持。究其原因，一方面是謝廉清、謝文達等主要幹部在思想上已傾向共產主義；另一方面則因為

其他人在性格上和范本梁不投合（據張深切所云，范本梁一動嘴就是提倡革命、暴動、打手槍、擲炸彈。他的談話雖然有趣，但理論卻難叫人共鳴；尤其他的生活過於浪漫、荒唐，更無法使人心服），遑論共事。最後，只好以近乎雜誌社的形態與北京安社合流，以其機關誌《新台灣》加入北京安社出版的系列宣傳刊物。

《新台灣》始終無法克服財務方面的困難。一九二四年四月十五日，創刊號發行。然而，它卻因基金無以為繼，一直要到同年（一說是一九二五年，日本、東京文庫《近代中國研究》）十二月五日，才又發行第二號。

《新台灣》發刊之初，關錦輝、謝廉清、林阿謨等人仍然協助范本梁。雜誌的印刷則和北京安社機關誌一起委託北大出版部。每號刊行五百份左右，密送給在北京、廈門與日本東京、京都等地的台灣留學生，以及島內的同情者。

通過《新台灣》第二號刊登的新台灣安社實行部宣言的片段文字，我們不難看出它所表達巴枯寧主義者的狂熱信念——

……欲維持台灣民族之生存，必須驅逐日本強盜。而欲驅逐日本強盜，除暴動革命以外別無他途……茲將我同人極力主張，特意提倡者，由本社實行部訂為該部之事務，列為五條。

- (一) 暗殺台灣總督及其餘官吏。
- (二) 暗殺日本全國性重要人物及官吏。
- (三) 暗殺特務走狗及欺國賊民之輩。

(四) 暗殺資本家及特權階級。

(五) 破壞敵人之一切設施。

吾人必須反覆實行暗殺、暴動，以期達成台灣民眾革命之成功。

第二號出刊以後，〈新台灣〉的財務問題仍然沒有改善。因此，第三號要在三個月之後才改為報紙型態發行。這期所載的〈台灣革命運動方法〉一文，公開宣示了新台灣安社「目的肯定手段」的革命主張：

將日本人欺凌台灣人的慘狀訴之於大眾，使三百六十萬同胞自覺猛省，殺台灣民眾之兇敵日本人，打破日本之強盜統治，破壞一切不合理的制度與組織，以期實現沒有壓迫、沒有剝削、自由平等的新台灣，犧牲吾身以供同胞之血肉。

同胞們，不要忘記巴枯寧在里昂受審時所喚出的二事和虛無黨的一語！二事者，一、腦中之思想與槍裡的子彈！二、一顆爆炸的炸裂勝於十萬本書籍的傳播。一語者，「目的肯定手段」。

所謂「目的肯定手段」，也有人說成「目的淨化手段」。當年主張以暴力的激烈手段刺殺當政者，並破壞國家軍政公共設施的無政府主義者，以此作為革命信條。他們這種「為達目的不擇手段」的激烈主張，為他們贏得了「虛無黨」的通稱。

至於「虛無黨」，語源出自屠格涅夫（一八一八—一八八三）的小說〈父與子〉。在這本於一八六二年出版的小說中，屠格涅夫不但創造了「虛無主義者」的名詞，同時也深入刻劃了「虛無主義者」巴札洛夫那種「不承認一切權力，否定所有不被證明的法則，要

求絕對的個人自由」的明確形象。俄國的革命民主主義作家車爾尼雪夫斯基（一八二八—一八八七），進一步把屠格涅夫描述的個人絕對自由主義加以社會主義化，成為農奴解放（一八六一）後的巴古寧派運動的先驅。

范本梁之死

為了推展「新台灣安社」的宣傳活動，范本梁不惜犧牲學業，多方奔走。

一九二六年三月，國民軍鹿鍾麟部退出北京，張作霖的奉天軍入關，進駐北京，立即大事鎮壓學生運動，掃蕩無政府主義者與共產主義者，李大釗等人猝不及防地被強行逮捕，立地絞殺。北京大學的師生也有多人犧牲。倖免於難的范本梁在隱匿數月後，於同年七月潛離北京。至此，在北京展開的台灣無政府主義運動的第一波——新台灣安社，也隨之沉寂結束。

七月十五日，范本梁潛回台灣。儘管他想要在島內秘密重建新台灣安社，可總督府警察當局早已掌握他在北京時的活動情況，並且指派特高監視他的動態。不久，他就被捕了。日警當局同時在全島十一處被認為與范本梁的無政府主義運動有關聯的個人住所，展開搜索。經過初步審問（據說日警曾以重刑拷問）後，范本梁以違反〈治安維持法〉第三條之罪名被移送法辦。一九二七年（昭和二年）十二月廿六日，第一審終結；第二年（一九二八年）二月廿七日，正式宣判：處以五年徒刑，監禁收押。

根據日警的審訊紀錄，范本梁為了免使戰友們受到刑罰，一肩承擔了那些「大逆不道」的論文和宣言的文責。范本梁供稱，登在〈新台灣〉雜誌上的那些文章，包括「一洗」、

「鐵牛」、「體信」、「重生」、「志義」、「斯民」、「純鳴者」等筆名，都是他一人撰述的。

服刑期間，范本梁不改其安那其主義者的虛無本色，以「寒餓困苦鍛心軀」，留下幾首詩以明志。其中一首詩云：

三十年華入獄城 勸修苦練五周星

心神颯爽胸懷闊 氣魄清高意念平

一九三七年，七七事變後，范本梁再度被拘押，判刑十五年。這一次，他似乎覺悟到自己已沒有生還的希望了，因而在獄中做了幾百首的詩歌，留給後人。其中，他在獄中常吟的兩首詩是：

一、人類可滅也，大地可沉也，吾志不可奪也。

二、立志男兒要克難 不干荊棘萬重山

思想武器同爭戰 死筆誰言遜死彈

一九四五年春末，范本梁還在台南監獄裡高吟：「歷盡艱難兼辛苦，毫無沮喪毫無塵；縱觀五百萬民眾（當時的台灣人口數），誰是鐵牛第二人？」孰料，不久後他即瘐死獄中。此時距離日本投降、台灣光復，只有四個月。

四、《少年台灣》月刊

一九二六年，「台灣新文學運動的奠基者」——張我軍在譯完日本社會主義山川均所

著的〈弱小民族的悲哀〉（一九二六年五月十六日起在《台灣民報》第一〇五號至一一五號陸續連載）一個多月後的八月十一日，帶著四本剛出版的《台灣民報》（第一一三號至一一六號），到魚迅寓所拜訪魯訊，並且悲憤地向魯迅訴說：「中國人似乎都忘記了台灣了，誰也不大提起。」這事，使得魯迅在八個月後還不勝唏噓地回憶說：「我當時就像受了創痛似的，有點苦楚，但口上卻道：『不，那倒不至於，只因為本國太破爛，內憂外患，非常之多，自顧不暇了，所以只能將台灣這些事情暫且放下。』……」

這年秋天，張我軍考入北京私立中國大學國學系就讀。為了「喚起國人對台灣的關切」，張我軍積極聯繫當時就讀北大哲學系三年級的蘇維霖（薌雨，戰後曾任台大圖書館館長）、教育系二年級的洪楮（炎秋）、經濟系一年級的宋文瑞（斐如，戰後任台灣省長官公署教育處副處長，二·二八時犧牲），以及政治系一年級的吳敦禮等台灣學生，響應東京的台灣留學生創辦的啟蒙刊物——《少年台灣》的月刊。一九二七年二月六日發行的第一百四十二號《台灣民報》刊載了一則題為《少年台灣將出現》的時事報導，說明其創刊的目的與進行狀況。該報導說，張我軍等人「以為現在台灣各種社會的政治的實際運動正在盛行，倘若台灣人的思想沒有改造一下，實在很難收效。然而台灣人的思想的改造方面，卻沒有多少人去下手，長此以往恐非台人之益，故特糾合同志，將於研究餘暇，作些文章給台灣人看，冀於台灣人思想上，收若干改造的效力」。

三月十五日，《少年台灣》正式在北京發刊。張我軍開宗明義即通過「記者」的筆名所寫的〈發刊詞〉，表明《少年台灣》的兩個目的：「第一是要為台灣人添一個思想知識的交換機關」，以促進台灣社會的進步；「第二是要為台灣與祖國間添一個交涉的橋樑」，

以免彼此產生隔膜與誤會。接著，他又通過筆名「莪君」的〈少年台灣的使命〉一文指出：〈少年台灣〉是不幸生於野蠻慘酷的專制政治下的台灣人說話的地方。然而，在當時現狀下的台灣，不想說話則已，若想說話似應由「思想改造」入手，也就是要「揭破孔教道釋之妄，芟除一切有礙社會人群進化的因襲道德習慣，而樹立合理的新的觀念，新的道德」。

在雜誌最後的〈編輯餘話〉中，張我軍仍然以筆名「記者」宣稱：「我們無論如何是要說話的，只要每月的印刷費不缺乏，〈少年台灣〉是必定遵期繼續在世間出現的。」

「〈少年台灣〉的創刊號流入台灣的數量頗多，一般同胞的反映也非常熱烈。然而，四月中旬第二號出版後，蠻橫無所不至的北方軍閥竟以「不在京師警察廳備案」為理由，將該雜誌收押一大部份，因此，〈少年台灣〉第二號在台灣就不容易見到了。」

「〈少年台灣〉的同仁經此打擊也決定暫時休刊，等待時機轉好時再繼續出刊。然而，來自政治的言論壓迫雖然比較緩和了，〈少年台灣〉終究因為經費短絀，稿源缺乏，出了八、九期後即瀕臨停刊的厄運；當時幸好彰化籍的文化協會幹部施至善先生（後來帶領全家輾轉從福建漳州投奔中共中央蘇區首府——瑞金，參加革命，在一九三一年六月廿三日成立的「蘇區反帝同盟」，與另一名台灣人蔡孝乾同被選為執委）到北京旅遊，認為停刊可惜，捐贈了百元大洋，〈少年台灣〉因而又得以繼續出版數期。可是，最後還是因為在北京求學且能執筆的台灣學生太少，印費的籌集又十分困難，再加上寄回台灣的雜誌十之八九都被查禁沒收，無法達到預期的宣傳使命而任它夭折了。前後總計發行了約一年之久。

第三節 在閩南

一九二一年前後，受到國內五四運動及島內文化協會民族主義啟蒙運動的影響，到中國留學的台灣學生人數突然大增，其中大部份又都在語言、風俗如同台灣的廈門一地。根據一九二三年七月的調查統計，當時台灣留學生的總數已達一百九十五名之多。

大體而言，在軍閥割據時代的福建，在直系、皖系對抗時期（一九一七—一九二〇），屬於皖系勢力範圍。其間，駐防粵東，統領二十營粵軍的陳炯明，曾在一九一八年五月，孫中山第一次護法運動失敗、去職南方軍政府時，積極進攻閩南，佔有漳州等地，成為國民黨的唯一武力。五四愛國運動之後的十二月，陳炯明也曾在漳州發行〈閩星〉半月刊，推廣新文化運動。

福建督軍李厚基於皖系失敗後，轉投直系。一九二二年十月，孫中山趁著直、奉戰爭的時機，策動閩北駐軍，會台北伐軍許崇智部，將李厚基逐走。一九二三年一月，為了收復廣東，許崇智軍離閩返粵，福建於是又為直系軍閥孫傳芳所得。

一、台灣尚志社

就在這樣動盪的局勢下，一九二三年六月廿日，經由台南州嘉義出身的李思禎的提倡與努力奔走，這些留學閩南的台籍男女學生組成了標榜「以互助精神切磋學術，謀求文化的促進」為目的的「台灣尚志社」。事實上，通過其實踐活動的狀況看來，它的終極目的

卻是站在民族自決主義的立場，啟蒙台灣民眾的民族意識，使台灣脫離日本帝國的統治。同年的八月十五日，在廈門的台灣尚志社的機關誌《尚志廈門號》創刊了。內容主要是批判台灣的統治方式，與喚醒台灣人民的民族意識。

一九二四年一月卅日，台灣尚志社的同仁為聲援島內因「治警事件」被捕的議會請願運動者而召開廈門學生大會。大會決議反對台灣當局的處理方法，並作成聲明書，廣向島內、中國各地和東京等地的關係同志分發。

台灣尚志社的聲明宣稱：

夫立憲國以維護民權為貴，人民言論、集會之自由乃憲法所保障者。然觀台灣統治之現狀，則存有極大之謬誤。蓋總督攬立法、行政之大權，逕行獨裁政治。為政者既不顧台灣之歷史、風習，又不與聞島民之輿論，並且掠奪人民應有的權利，束縛公眾的言論自由，不但視台灣島民如奴隸，而且濫用官權。如大埔林、噍吧啤之大虐殺，彰化募兵事件之大施酷刑等，殘虐暴行不知底止，根本無視於人道。最近，又因台灣議會請願團事件而拘禁許多無辜島民，企圖一手遮天，以陰險手段妨礙合法的請願運動，違背立憲精神莫此為甚。又古往今來竟有如此大慘事，可說完全出乎意料之外也。

最後，台灣尚志社同人宣稱，為了東亞和平，也為了日本帝國，更為了台灣，而作成「反對歷代台灣總督之壓迫政策」與「反對台灣總督府非法拘留議會請願者」的兩點決議，以警惕當局，並表示他們的決心。

台灣尚志社在閩南台灣學生聯合會成立後，便自然地退出歷史的舞台。

二、廈門中國台灣同志會

一九二五年四月十八日，廈門市內街頭巷尾的牆壁上、電桿上，突然張貼了大量題為〈中國台灣同志會在廈第一次宣言〉的印刷海報——

五月九日已迫近了。大逆不道的二十一條要求，尚未撤廢，旅大租期滿後，已經過去二年了。

中國的同胞們！我們台灣人本亦屬漢民族，我們的祖先來自福建、漳州、泉州、廣東、潮州等地。但為了脫離滿清的虐政，另圖漢民族的發展，而移往台灣。不意，光緒二十一年（一八九五年）的日清之役，清朝竟把它割讓給日本，由是，東洋第一寶庫的台灣便淪入野蠻的倭人手中了。

日本是專制君主國，領台以來，於茲三十年，其間，我們所開拓的土地、森林、山產、海產，以及種種利權，悉數橫被剝奪，並用苛虐的經濟政策及魔鬼的手段，恣意加以精神上、物質上的重重壓迫。看吧！官員僅五萬餘人，便佔全島日本人的四成，他們以專制，實施其惡政、苛稅、酷刑等，吾人的言論、出版自由，更正在被剝奪中。而且，他們還存有併吞福建的野心哩！

日本自領台以來，禁止台灣人來往於中國，除極少數人外，甚至連和親屬間的往來都被禁止。他們以為妨害同胞間的親愛互助，才是侵略福建的最佳手段。在台灣的競爭失敗者，近來渡海到廈門的漸漸增加。由於缺乏求生的途徑，遂開辦賭場、煙館、妓女戶等，顯有擾亂社會秩序的現象。故我們需要對此統籌一個救濟方法，務期求得

社會的安寧幸福才好。

台灣人不是日本人。縱使排斥日本人，也不該排斥台灣人。台灣人亦是中國人的同胞，亦是廈門人，亦是漢民族。在廈台灣同胞！請諸位絕不要假藉日本的勢力。諸位該明白本身所屬的民族和自己所處的地位，若為生計，另覓其他正業吧。我們同胞正在台灣飽受日本的壓迫，應好好去想報仇雪恨的路徑，切勿為日本人所利用。廈門的中國同胞！切勿忘記國恥的日子，且更進一步策劃收回舊有領土，撤廢不平等條約，脫離外國的羈絆，以期成為獨立自主的民治國吧。

通過這篇宣言書，我們看到，當時許多失意的台灣人到了廈門以後，竟因為生計問題而假藉日本勢力，開辦賭場、煙館、妓女戶等，擾亂當地的社會秩序，並造成台灣人與當地人的緊張關係。廈門中台同志會預警到這點危機而及早提出呼籲，並要求與在廈門的中國人共同努力，響應國共兩黨聯合推動的將來臨的「五九國恥日」。

中國台灣同志會在廈第二次宣言（日警抄譯）

國恥，國恥，不可忘卻的國恥……。收復旅大，取消二十一條款及一切不平等條約的記憶猶新……，這些是擺在眼前的問題，但無法自主的人民卻後退了，大家只有五分鐘熱度而已。嗚呼……。

中國同胞們！我們篤信民族的獨立。拋棄紙上的空論，首先整頓國內，然後一致對抗外部。為何呢？因為近來內政、外交均極紊亂，人民煎熬於塗炭之苦，導致國勢日益衰頹。

中國同胞們！倘要為那被割讓、已成為殖民地的台灣同胞洗恥雪恨，而且要達成

獨立的目標，首先非著手於自治議會的運動不可！我們要奮鬥到底，與那非人道的東邊狐狸（日本人）絕交。中國同胞們，你們原本就富於愛國思想，且有救國的志氣。謀求民族的獨立，有如陽光普射，光明照耀四方之感呢。

光緒二十一年（一八九五年），根據馬關條約，支付了二億兩的賠款，割讓台灣和奉天的南部，加上承認朝鮮為完全的獨立國。從光緒三十一年（一九〇五年）直到民國十四年，旅大租借期卻已超過了二年。

民國四年，迫於日本的最後通牒，我政府不得已而批准的，就是國恥二十一條款，是國人所不予承認的。台灣同胞們！我們非要記住不行。倭奴愈益添增兇狠無道、暴虐之勢，進而壓迫居留對岸的台灣同胞，迫使我們無處棲身。宜和中國同胞協力，以期報仇雪恨。

同胞們，自重吧！自覺吧！醒醒吧！昏睡的獅子該睜開眼睛成為清醒的獅子了。五月九日已經迫近了。請各方團體結合起來，進行富於理性的運動吧。不要只發洩五分鐘的熱情便停止。

三月二十六日，在東京舉行的示威大遊行的歌詞如左：

一、野心狼子霸東邊 慾壑終難填

霸佔旅順大連灣 到期不交還

同胞努力結成團 督促政府辦

不達目的心不甘 國民外交最為先

二、國民外交最為先 同胞心要堅

抵制日貨好手段 效力非等閑
足使倭鬼心膽寒 餓死東海岸

不廢一兵不折箭 收回旅大在目前

泣上海五卅慘殺事件

一九二五年以來，中國各地的革命群眾運動，特別是工人階級反對帝國主義的鬥爭，迅猛發展，呈現出風起雲湧的形勢。五月一日，第二次全國勞動大會在廣州召開，成立了中國工人階級全國性的統一組織——中華全國總工會，有力地促進了工人運動的進一步發展。五月十四日，上海內外棉紗廠工人為抗議日本資本家無理開除中國工人而舉行罷工。第二天，日籍職員竟開槍打死一名共產黨工人顧正紅，並打傷十餘人。這一暴行激起上海各界人民的無比憤怒，紛紛起來支援工人的鬥爭。五月卅日，上海學生兩千餘人在租界內進行反帝宣傳，聲援工人鬥爭，要求收回租界，隨後匯集群眾萬餘人，舉行遊行示威，高呼：「上海是中國的上海」、「打倒帝國主義」等口號。不料，英帝國主義巡捕竟悍然向手無寸鐵的群眾開槍，當場打死十三人，打傷數十人，造成了震動全國的「五卅」慘案。

「五卅」運動的革命風暴迅速由上海席捲全國，形成了全國範圍的反帝鬥爭新高潮。遠在廈門的中台同志會也不落人後地再次出動，在街頭各處張貼題為〈留廈台灣學生之泣詞〉的宣言書。

根據日警抄譯的資料，該〈泣詞〉呼籲：

同胞們！趕快起來，和祖國的同胞聯繫，和世界弱小民族攜手，打垮帝國主義，拯救世界上被壓迫的人們吧。

三十年來，我們台灣人在帝國主義日本政府的壓迫下，過著痛苦不堪的日子。然而，精神並未麻木，反而受其刺激，愈益奮發，出而謀求本身的解放和幸福。我們是漢民族，是中華民族。我們承繼受了滿清的壓迫仍堅持民族主義而移居台灣的祖先遺訓，一向思想堅定、重正義。

這次，上海的慘殺事件表示帝國主義者的橫暴已達極點。同胞所受的痛苦和我們現在所承受的並無兩樣。因此，以互助合作的精神來對付壓迫者，是理所當然的。

同胞們！趕快起來，加緊連絡、合作，進行排斥日貨及罷工，以貫徹主義，期能達成我們的目標。……

據日警的調查，在廈門的中國台灣同志會，似乎是中華中學學生郭丙辛和英漢中學院學生林茂銓等為核心，由台籍學生與中國學生組成的。另外，一九二五年六月創設的「中國台灣新青年社」所發行的《台灣新青年》雜誌，可能就是中台同志會的機關報。

同年四月，廈門台灣學生聯合會成立。郭丙辛等人後來也都參加了學聯會。這樣，中台同志會的活動便逐漸無疾而終了。

三、閩南台灣學生聯合會

一九二四年一月卅日，廈門台灣尚志社為聲援台灣島內因「治警事件」而被捕的反日

同志，召開了一場學生大會。此後，由於受到當時中國學生運動日漸蓬勃的影響，在廈門的台灣學生當中也有人提議組成「閩南台灣學生聯合會」。同時，在廈門大學的李思禎與王慶勳（彰化人）、中華中學的郭丙辛（北門郡）與江萬星（教師，台南人）、集美中學的翁澤生（台北人）與洪朝宗（台北人）、同文書院的許植亭（基隆人），以及英華書院的蕭文安等人努力推動下，於同年的四月廿五、廿六兩天，召開成立大會。

大會的第二天，也就是廿六日，在柳真甫長壽學校搭了一座戲台，讓四百多名與會學生共同欣賞學生演出的反日劇。演出的劇本根據彰化北白川宮遺跡碑毀損案的「募兵事件」編寫，題為〈八卦山〉與〈無冤受屈〉兩劇，分別譏諷日本帝國的台灣統治，及暴露在其統治下台灣民眾被壓迫與虐待的情景；用以喚醒觀劇學生的反日民族意識。中場休息時間則高唱〈台灣議會請願歌〉等，以凸顯高亢的抗爭態勢。

第二天，學聯會又趁勢召開紀念演講會，由各校台灣學生推選的代表輪番上台，講述有關台灣的歷史與日本統治下台灣民眾的悲慘境遇，甚至鼓動台灣革命等內容。當天，廈門〈廈聲日報〉主持人陳沙崙也以來賓代表的身份，上台致詞，鼓勵這些台籍學生。

從此以後，閩南台灣學生聯合會即一直持續著活潑的反日運動。七月，當他們獲悉辜顯榮、林熊徵等人為反對台灣議會請願運動而召開「有力者大會」後，立即印行反對「有力者」的檄文，寄給島內的所謂「有力者」，以及文協會員與台灣議會設置請願者。

十一月十六日，閩南台灣學生聯合會於思明教育會館召開秋季大會，總共有六十多名會員與十幾名來賓出席。會中，與會者紛紛發表有關反日的革命言論。其中，台南州北門郡出身的郭丙辛所作的、題為〈日本管轄後台灣所遭致的慘狀〉的演講內容，還被當地的

《思明日報》刊載。

日本管轄後台灣所遭致的慘狀

……

一如諸位所熟知的，我們家鄉台灣原來是中國的土地，我們原來也是大漢民族。儘管如此，因為中國在三十多年前的中日戰爭中戰敗，遂把物產豐富、風景如畫的台灣割讓給日本。嗣後，日本宛若秦始皇一般暴虐無道。那麼，負責統治的總督施政，究竟又是怎樣的倒行逆施呢？

諸位！我們台灣被統治以來，一切民權悉數被奪，我們有如俎上的魚肉，任人宰割。就七、八年前的噍吧哖事件而言，他們並不充分調查事件真相，只依據少數山賊的蜂起就獨斷看成是陰謀叛變，慘殺了我好幾百名善良的男女老幼。追憶如斯慘絕人寰的往事，吾人不禁有肝腸寸斷之感。再說，我台灣的一切物產，理該為我台灣人所擁有，但自被日本統治後，這些都被剝奪殆盡了。

比如說：目前我台灣的山林、礦山，以及主要物產如砂糖、樟腦、茶、鹽等類的物品，都已經成為政府的專賣品，沒有任何一個台灣人有插手的餘地。不僅如此，只要多多少少有利可圖的事業，便都歸入他們的手中，全被壟斷了。假使他們不這樣強奪我們的利權，我們當然也不這樣強烈的反對。台灣人並不比他們傻，但那些窮日本人一旦來台，不出幾年便坐擁財產，儼然成為資本家。

一如上述，日本人苛虐我們台灣人的所作所為，諸位已很清楚。他們大肆侵犯我們，給我們帶來種種痛苦，迫使我們幾無立足的餘地。我們飲恨，故而產生抵抗的意

志，也希望反攻的日子早日來臨。再說，他們厲行一種可致台灣人於死地的政策。那就是，為使我們三百萬同胞完全日本化而不顧實際情形，執意斷喪我漢民族固有的民族性，令我中國的風俗習慣都向他們看齊，努力把他們的祖宗代替我們的祖宗。倘若我們竟同化於他們的話，就再也沒有反抗他們的機會了。如此手，段稱為最險惡的手段是什麼？

他們又利用很多流氓，渡海到中國各地，促使此輩幹盡壞事，擾亂中國的治安，好讓中國人仇視台灣人，使其對台灣人永遠喪失同情心。這是他們的陰險政策。因此，我們有理智的青年必須時時洞察他們的奸計，留心不上他們的當才好。一言以蔽之，我台灣的一切寶藏已被日本政府公然掠奪而去，人民還要被課徵百分之五十的苛稅。

另一方面又在無形之中被日本資本家剝削利權。故我們台灣民眾愈來愈失去立足的餘地，致使原來的資本家一變而為無產的平民，或正逐漸淪落成無產階級。我們不獨這樣被強奪錢財，且還要被那些豺狼般的警察、枷鎖民眾的惡法，及非人道的刑罰所困擾。我們失去言論自由，目前我們同胞已陷入求生不得、求死不能的苦境。我們現時的處境比中國三十多年前遭海賊侵略時所受的災害，更加悲慘暗淡。有志氣的諸位！當真甘受如此的壓迫嗎？我們身為男子漢，生於這自由平等的社會，而不能享受自由平等的生活，豈非莫大的恥辱？諸位！對此心中有了決意否？有了決意的話，就要努力推翻那野蠻的帝國主義勢力，阻止其手段的得逞吧。諸位！倘要追求真正的自由平等，那麼，究竟要如何改造台灣呢？質言之，就是要我們同胞覺醒，聯合一致，推進民族自治運動，乘機趁勢脫離日本政府殖民政策的羈絆，為奪回台灣產業、剷除倭奴的野心而盡力。

我如此說，或有人以為是癡人說夢，不錯，這事無疑困難重重，但世界上任何事都事在人為，並非天地之神可以替你代辦的。我只怕我們的意志不夠堅定，假若我們能真正知恥，不怕流血流淚，抱著和那倭奴不共戴天的堅定意志去行動的話，那些倭奴也就不能高枕無憂了。況且，二十世紀的人道昌明，相信世界列國也不會袖手旁觀的。我們如果要更進一步防止那些不平等和羞辱的痛苦的話，為抗爭野蠻的帝國主義而犧牲也是光榮的。有血性的諸位，能夠知恥的諸位！諸位！如今在各自的心中是否已有台灣先覺者的自覺呢？是否已有拯救三百多萬同胞於水深火熱中的意志呢？如果有，我們就非要趕快來籌劃實際可行的手段不可。有了如此的期望和態度，然後才可獲得成功。

《共鳴》雜誌

另外，閩南台灣學生聯合會為了機關誌的發行，而於一九二四年五月創設一家雜誌社——閩南台灣學生聯合會共鳴社，籌劃刊行《共鳴》雜誌，並交由嘉義籍的莊泗川與張梗負責編務。

在創刊號上刊登了兩則有關台灣的紀事，投稿者是一名居住台北的青年，通過「台灣學生血淚團宣傳部」的名義，向海外的台胞告知向來不能自由公佈的台灣事情。執筆時間是一九二四年十一月廿八日。

《共鳴》編輯部在《通信》之前作了有力的編按。它寫道：

同胞們，覺醒吧。

台灣議會期成同盟會多位會員已被宣告徒刑。打破陋習大演講會的多位青年已被收押了。台灣同胞，覺醒吧！

以諸位的血淚，換取諸位的自由吧。

中華同胞，覺醒吧，覺醒吧！

勿為日人離間之計所欺瞞。

有血有淚的人們，讀了這兩篇台灣通信，難道還能不猛醒奮進嗎？

台灣通信（一）

島內外的各位同胞！強權下的悲慘事為何？此實不必再說。帝國主義下的台灣痛史，那堪重翻。日人掠奪的殘虐手段，慘無人道，各位亦已知之甚詳。嗚吧啞的殘殺事件，彰化的酷刑事件，各位亦聞而不免為之心酸。（中略）

四、五年來，一部份有志青年認為，孤懸海外，內外無援，若非先倡導文化，養成實力，則雖急躁起事，亦將重蹈覆轍，重演往日慘劇，同胞的血，難免又白流。因此，忍辱一時，向日本政府要求設置台灣民選議會，藉此稍微抑制台灣總督府的淫威，恢復言論、集會、出版的自由，以實行遠大的計劃。（中略）

但，日人狼心狗肺，以為非把從事議會運動的諸位同仁一網打盡，則不能再進行恣意的劫掠搶奪，是故，在去年冬天，非法拘禁台灣議會期成同盟會諸位會員，直到今年，由於島民反抗更加熾烈，宛若野火燎原，幾有不可遏止之勢。狼狽之餘，乃將被捕者宣告無罪。又此再審期間被釋的這些青年，始終不屈不撓，各種活動更形加劇，

而台胞的反日情緒，亦日見高亢。鑑於懷柔政策不克奏效，因而，他們已宣布將判處蔣渭水以徒刑之罪，且決定併用壓制手段，干涉台胞的政治運動。（下略）

台灣通信（二）

（上略）台灣自從被日人領管以來，礦山、森林已開採殆盡。樟腦、菸、鹽的利權，亦盡歸日人手中。此外，有利可圖的商業，鮮有不被他們所佔奪。故近來，台灣經濟極為蕭條，時起恐慌。台人除二、三富豪外，不為衣食所苦者幾稀？實非昔日所可比擬。更有進者，台北一部份腐敗士紳，不獨自私自利而已，且一擲數十萬，極盡奢華之能事，聞之令人忿懣不已。

因而，台北有志青年齊起反對，組織無產青年會，在大稻埕文化講座上，大舉進行打破陋習演講會，以滿腔熱血，滔滔辯論奢侈之非，連夜喊得聲嘶力竭，只冀望解放同胞，免受他日經濟壓迫之苦而已。但為什麼日本政府竟出而干涉，橫施毒手，禁止開會，且當場逮捕高君兩貴、黃君成枝、胡君柳生等三名，並將其帶回警所收押。壓迫手段之惡劣，莫此為甚。日本政府的狼心狗肺，愚民政策的真面目，已赤裸裸地呈現在眼前了。島內外的同胞還能不奮發而前進乎？（下略）

（我們現居台灣，一向沒有公佈這一事實的自由。而島內知之者亦少。特向海外同胞宣佈之。）

嗚呼！有血有淚的各位同胞，趕快起來，奮發前進，打垮強權，求取我們的自由！廈門的同胞們，不要上日人反間計的惡當！

在〈台灣通信〉之後，〈共鳴〉編輯部又刊登了兩則敬告讀者的啟事。第一，如果以

後台灣發生特殊事情，將由全體學生專責宣傳任務，但我們（指〈共鳴〉的工作人員）只不過是一介學生而已，能力有限。所以希望台灣與廈門的同志們盡力支援。第二，說明〈共鳴〉編輯部的通信處暫定為中華中學葉魂生的住處。

嗣後，閩南台灣學生聯合會卻因為學生的離散及情勢的變遷而變得有名無實。一九二五年後，原本就和大陸方面的學生聯合會有所聯繫並共同活動的郭丙辛、黃和氣、張輝煥等人，和上海台灣學生聯合會取得聯絡，並且在共產主義運動的影響下，準備策動閩南台灣學生聯合會的再起；然而，它還沒有進展到確立組織的地步便因為種種主觀、客觀的因素而消失無形了。

一直要到一九二九年年底，因為參與八一反戰鬥爭而被檢舉的上海台灣青年團的領導者翁澤生出獄後，為了在全中國的台灣學生間廣泛地擴大台灣青年團的組織而派遣侯朝宗、鄭連捷等人南下，聯絡在廈門活動的潘欽信、詹以昌，設置社會科學研究會，聯合各學校的台灣學生會進行左傾的指導。這樣，閩南地方的台灣留學生才再度集結起來，開展潑辣的反帝運動。

四、漳州台灣解放運動犧牲者救援會

一九二九年，台灣青年蔣文來因為具有共產黨員的嫌疑而在漳州被捕，經漳州第一師軍法會議審判，遭到拘禁的處分。當時，住在漳州的左傾的台灣青年——李山火、蔡孝乾（台共中委，一九二八年秋「台共檢舉事件」發生，惟恐波及島內組織，而與島內重要幹

部洪朝宗、潘欽信、謝玉葉等逃離台灣，來到漳州，寄寓於城內東半後街枕頭巷。為了生活和掩護，先後在石碼中學和龍溪女子中學教書。）、張炳煌等人，立即展開救援蔣文來的行動。此外，他們也藉著進行救援運動的機會，召集了數十名在漳州的台灣留學生，於同年的十月五日，組成台灣解放運動犧牲者的救援團體。

救援會成立後隨即加緊進行宣傳運動。一九三〇年三月，為了聲援島內農民組合救援「二·一二」事件被檢舉的農組同志的行動，同時也為了擴大宣傳救援會的運動與募集活動基金，在上海台灣青年團的支援、指導下，救援會的主要幹部李山火、蔡孝乾、張炳煌等人，主持了一場遊藝大會的救援活動。大會在活動前的二月三、四日左右，分別向廈門同文台灣留學生會、留集台灣學生會和附近其他縣的留學生、台灣青年，以及漳州縣黨部……等各種官衙、學校，發出邀請信。此外，他們還在漳州市內張貼傳單，明白告訴漳州國軍第一師師長張貞和公安會長張式等人，有關召開救援台灣解放運動犧牲者遊藝大會的情形。另外，經廣泛募捐的結果，大會在舉行前已募集了一百餘元的基金。

二月九日，遊藝大會正式舉行。在場外，救援會印製了約二千份的〈台灣解放運動犧牲者救援大會特刊〉，在漳州市內、上海、東京及島內各地，同時散發。〈特刊〉的內容包括：〈日本最近對台灣的暴壓政策〉、〈暴壓政策下的各階級民眾〉、〈島內各團體的鬥爭情勢〉、〈海外台灣青年的活動情勢〉，以及一份〈宣言〉。

〈宣言〉對外聲稱：

國際帝國主義的根本已動搖。

現在，全世界弱小民族的革命運動已日漸熾熱。各帝國主義國家對弱小民族殖民

地的彈壓也日益加重。因此，帝國主義國家與弱小民族間的鬥爭也日漸尖銳化。

最近，世界弱小民族革命運動有印度的抗英、朝鮮的抗日、土耳其與摩洛哥的戰爭，這些戰爭都震驚了全地球的人類。我台灣可說是個孤島，但在日本帝國主義鐵蹄的重壓下，民眾的革命鬥爭力尚且不落人後。除了極少數的走狗、土豪、劣紳及反動分子外，四百萬台灣民眾都是勇往邁進的鬥士。

過去的三十年間，我台灣民眾反抗日本政府，因此遭到血淋淋的屠殺。如北埔事件、林杞埔、苗栗、西來庵事件等，其間的消息就無庸贅言。最近三、四年來，台灣民眾英雄的戰鬥正如火如荼地進行。可是日本帝國主義更加肆無忌憚地兇暴鎮壓。台灣革命民眾自一九二七年以來爆發的檢舉事件接連不斷。例如：

黑色青年事件（三十餘名）、鳳山農組（十餘名）、大寶農林（十餘名）、中壢農組（九十餘名，入獄二十餘名）、新竹事件（檢舉三百餘名，入獄百餘名）、上海台灣共產黨事件（七名）、台南塗糞事件（四十餘名）、高雄洋灰工人暴力事件（四十名）、台中農組印刷事件（四百餘名，入獄二十餘名）、東京台灣社會科學事件、第二次六·一七事件等。

隨著解放運動的犧牲者的增加，日本帝國主義對吾等犧牲者就越發施以慘無人道的毆打與拷問。另一方面又使入獄者的家族飢寒交迫、流離失所。其慘狀真是莫可名狀。

漳廈的台灣同胞組成救援台灣解放運動犧牲者遊藝會，將募得的錢贈給入獄的同志及其家族。一方面藉以撫慰入獄的同志及其家族，另一方面則激勵解放戰線上的鬥士，進而鞏固革命勢力，為將來的革命鬥爭而努力。

革命的同胞們！同志們！第二次世界大戰將爆發，我等應團結起來打倒帝國主義。
打倒日本帝國主義。

中台的革命民眾團結起來！

全世界被壓迫的民族團結起來！

打倒國際帝國主義！

擁護中國革命！

台灣獨立成功萬歲！

在影藝大戲院的會場內的牆柱上也貼滿了各種訴求的口號。其中，主要的口號是：

被壓迫民族努力奮鬥達到自由！

台灣解放萬歲！

台灣獨立成功萬歲！

打倒日本帝國主義！

援助台灣解放犧牲者！

《殖民魂》與《血濺竹林》

大會在李山火的主持下進行。陳志輝專題報告台灣革命運動的經過與救援犧牲者的必要之後，進行音樂演奏、歌舞、演劇等表演節目。演出者包括施至善的三個子女：施月英、施月娥、施月霞，以及林翠英、汪瑞淑、黃桂林……等另外十三名台籍青年學生。

演劇部份包括：獨幕劇《殖民魂》與四幕劇《血濺竹林》

《殖民魂》的大綱是說——

在台灣某革命家的家庭附近聽到槍聲，長男因擔心父親的安危而拿著大刀出去。身負重傷瀕死邊緣的老革命家好不容易才摸索到家門口，喊叫著說：「被日本兵殺害。」而後死亡。長男拿著染血的青龍刀回來。他殺了日本兵後高喊：「台灣民主國萬歲。」然後取出寫有台灣民主國大字的旗幟搖了一會。不久，當他進入室內得知父親死亡而悲嘆時，武裝的日本兵闖入他家，經過搏鬥後將他逮捕。那時日本兵殺害了其母及幼兒。

至於《血濺竹林》的各幕大綱分別是——

第一幕 將三菱竹林事件（竹山、古坑及竹崎一帶）予以戲劇化。描寫民眾被叫到派出所，台灣警官脅迫民眾要將竹林讓給三菱公司，強制他們蓋章的場面。

第二幕 數名台灣人集合在竹林中眺望禁止採取的告示牌，敘述竹林被強奪的始末以及責難台灣施政的對話。

第三幕 女乞丐來到竹林，正在悲嘆竹林被強奪而落到此地步時，來了一位農民開始採伐竹林而被警察逮捕。該農夫被釋放後，糾集附近的農民攜帶竹矛等武器襲擊派出所，在殺害兩名警察後撤退。

第四幕 武裝軍人出來挨家挨戶搜查農家，十數名的農民被拉出來送到死刑執行場。連續兩天的表演節目，總共吸引了近六百名的觀眾前來觀賞，因而獲得約五百元的門

票收入，作為救援會的基金。

三月底左右，上海台灣青年團在上海共同租界的大夏大學召開大會。在會上，作為上海台灣青年團的特派代表前來漳州指導演戲的鄭連捷，向與會團員報告了李山火等人在漳州進行台灣解放運動犧牲者救援遊藝大會的情況。後來，青年團又在其機關報〈青年戰士〉，發表題為〈日本帝國主義禁止激憤的救援台灣解放運動犧牲者遊藝大會在漳州演出〉的狀況報告書。

該報導寫道——

中國同志踴躍參加

觀眾數千皆激昂異常

台灣民眾受日本帝國主義者的壓迫、蹂躪已達極點。民眾的反抗心越來越濃厚。農民抗租、工人罷工及反抗行動，日益激烈。日本帝國主義者為了延長最後五分鐘的生命而極力鎮壓、屠殺逮捕革命分子，以及吹毛求疵。他們的面貌越猙獰，犧牲者就越多。我等置身於異域者所受的脅迫之害就越深（與反動國民政府勾結逮捕我革命同志）。置身於水深火熱中的同胞之淒慘叫聲讓人聽來不由怒火中燒。十數萬先烈的遺骨尚存、鮮血未乾。白匪究竟是什麼東西，我等應加緊進行我等應做的工作……

這次我等與抱持同一心理的漳州同胞舉行救援犧牲者遊藝大會，以些微的物質來援助我等的犧牲者及其家庭，以及對故鄉表示關懷，並向日本帝國主義者示威。

遊藝大會開幕當天，籌備會員總動員到戲院做一切的準備。當天剛好是星期日，有許多來觀賞電影的兵士，知道電影停映後就加暴並毆打我等同志。因此，開幕時間

延遲，兩、三位同志受了傷，演戲也受到干擾，千餘名觀眾覺得失望。

當天發現有日本帝國主義者派遣的走狗混入會場，立刻設法將他們驅逐。第二天，會員們恢復了元氣，物品也補充了。觀眾雖然很少，但成績是第一晚的數倍，所以心情頗為興奮。台灣革命史劇《殖民魂》、《血濺竹林》演出成功，可謂頗富刺激性，觀眾不由得拍手喝采。觀眾對著日本帝國主義的走狗——警察、守衛等人大喊：「放屁——放屁」「打倒、打倒」。觀眾對帝國主義的憤恨之深可見一斑。日本帝國主義的走狗聽到打倒帝國主義的喊聲，當場落荒而逃。革命同志的計畫實現了，示威的效果頗大。

遊藝會結束後，日本領事館（駐廈）得到奸人的報告，深感狼狽。於是派遣許多日本的奸人欲行逮捕遊藝會幹部及重要分子。但因我等同志早已散會，始得倖免於難。

五、閩南學生聯合會

廈門集美學校留集台灣學生會與同文台灣學生會，以及漳州的留漳台灣學生們，通過李山火、蔡孝乾、施玉善、張炳煌、潘爐、陳新春等人的直接指導，以及與在上海的翁澤生、林木順等人的連絡，在思想上逐漸傾向共產主義。一九二九年十一月三日，朝鮮發生光州學生反日運動的事件；事件後那些因為牽連此事而流亡閩南地方的朝鮮學生，有意擴大原有的組織。因為這樣的契機，留學閩南的台灣學生於是在一九三〇年二月，以學生會幹部詹以昌、曹炯朴、王溪森等人為中心，組成閩南學生聯合會，進行社會科學的研究，並策劃台灣的民族解放運動。為了有系統地進行動以擴大組織，在王溪森、詹以昌、曹炯

朴等幹部倡導下，聯合會於五月八日，以廈門留集學生會與中華中學台灣同學會為發起團的名義，向閩南各地中等以上學校的台灣學生，發出入會的勸誘信，說明組成閩南學生聯合會的歷史必要性。

親愛的同鄉們！

我等需瞭解自己並應知道我等的環境，及在此地位、時代該如何自處。目前我等一面處在世界帝國主義共同侵略下的中國，另一方面，作為日本帝國主義鐵蹄下的台灣人，是經常遭帝國主義壓迫的弱小民族，是在支配階級支配下的被抑壓階級，是資本主義體制下的無產階級。由於受到兇惡的帝國主義及資本家的壓迫與剝削已身無一物，我們只有加入無產階級的隊伍。我等就生存於時代的狂風暴雨中。然而資本主義社會形成後終必導致社會主義之到來，而無產階級也必將在革命時代光臨後獲致最後勝利的榮冠。

現實中我等的環境是如此的惡劣與悲慘。而我等的地位也是如此危急。在這奔騰時代的漩渦中我等的使命如何呢？我等仍然奢望能做官積財，或是進大學得學位，或是回故鄉享福。我等已經知道此舉是愚昧的。我等應該更努力學習。處於此時代，最要緊的使命是革命工作。我等該如何完成我等的使命呢？首先是要組成一個團體。我們個人的力量是很薄弱的。為了達成使命，我們必須要有萬全的準備，必須努力與帝國主義鬥爭。然而帝國主義的爪牙——法律、軍隊能輕易地迫害我等的身體。因此，我等必須團結才能與之抗衡。甚至要進入無產階級中發展運動，針對帝國主義的壓迫採取共同一致的行動。我等如欲在中國對日本帝國主義展開反抗的運動。在中國也必

須一樣共同對付日本帝國主義，然而這種帝國主義的共同性反而越發促成我等的團結。我等海外的台灣青年身負特別重大的使命。要使日本帝國主義侵略下的殖民地民眾與受列強帝國主義侵略的漢民族自覺其使命的重要性，且與身負同一使命僑居中國的台灣青年團結起來，努力達成我等偉大的歷史使命。雖然閩南的台灣青年人數不少，但宛如一片散砂。雖然有同鄉會的存在但沒有團結的力量。各個學生會無力擔起重大的使命，或者被帝國主義破壞而分崩離析，就如同同文學生會。真可說是可恥的事。

有鑑於此，敝會深感組成團體的必要性。因此想組成久已荒廢的閩南學生聯合會。

……

兩次籌備會

之後，聯合會的幹部們又分別到各校，與各校同學會深入討論組成聯合會的問題，聽取各校學生的意見。通過這樣那樣的努力勸誘，聯合會於六月一日，在廈門中華中學第四教堂，召開了第一次擴大組織籌備會。與會者包括：漳州第十一高級中學代表施懷清，第八中學代表廖國，崇正中學代表某某，集美中學代表詹以昌、高文波、邱克修，中華中學代表林樹勳、邱仁村、陳啟仁，以及廈門中學代表等。會議由中華中學學生林樹勳主持，然後從集美中學選出三人、漳州中學二人、廈門中學一人、中華中學二人為籌備委員。同時決定由漳州中學代表負責起草會章，中華中學負責外交事務，集美中學各代表負責總務事務。此外，會議還推舉共產主義者潘欽信和陳新春為籌備會特別委員，接受他們的指導。

六月五日，第二次籌備會又在中華中學召開。施懷清、邱克修、蔡高林、高水生、林

樹勳、陳啟仁、蘇望村、王溪森等籌備委員，以及特別委員潘欽信、陳新春都出席了這次籌備會。會議由施懷清主持，進行成立儀式的準備工作。

秘密大會

六月九日，閩南學生聯合會在廈門中學的禮堂秘密舉行成立儀式。當天，出席者包括：集美中學的詹以昌、曹炯朴、王登才、高水生、董文霖、齊懷深，中華中學的林樹勳、陳啟仁、曹雪樵、李盛田、漳州第十一高級中學的施懷清、第八中學的沈連白、廈門職業學校的高某、廈門中學的蘇望村，以及潘欽信、陳新春、王溪森、盧丙丁……等指導者。

大會決議：

- 一、統一各學校的學生會，設置體育部、組織部、救濟部。
- 二、逐次擴大聯合會而成立全國台灣學生聯合會。
- 三、各校學生會報告來閩學生的數量、生活狀態及組織情況。密切連絡以順利進展工作。
- 四、各校學生會分別負責有關國際情勢及台灣諸情勢的宣言大綱。
- 五、計劃機關雜誌的發行。
- 六、要歸台學生休假回台時，與台灣社會運動諸團體連絡。或要其參加運動，同時與來閩的學生認識，負責斡旋的工作。
- 七、編纂記述台灣的情況，然後在中國及其他各國出版發行，努力介紹台灣的情形。以及以演戲、辦演講會來大作宣傳。

八、與中國各地的台灣學生互相提攜。與各地的青年團、學生會以及台灣島內解放運動團體密切連絡。支持中國共產青年團。

九、進行救濟台灣島內社會運動的犧牲者、中國的貧困學生與避難者的運動。

十、進行上述事項所需的經費由總務部計畫。本大會決定的成立宣言及會則如下：

大會成立宣言

台灣同胞們！革命的中國民眾！

長久計畫準備的閩南台灣學生聯合會今天宣布成立。我相信，除了日本帝國主義者及其走狗外，大家都會衷心慶祝的。

兇暴的日本帝國主義不斷地蹂躪我等四百萬同胞，因此，我等的鬥爭工作一日也不能停止。我等閩南台灣學生聯合會正準備做殊死的鬥爭。它是在台灣解放運動的過程中產生的。「為鬥爭而組織」是本會的標語，也是閩南學生聯合會產生的原因。

閩南台灣學生聯合會已於民國十三年左右由廈門及集美的學生組成。但不久組織即呈消滅的狀態。這是因為組織不夠堅固。因此，我等閩南學生聯合會為了果敢地對敵人展開鬥爭，決定將組織鞏固與擴大。

彼日本帝國主義的兇暴日復一日嚴重。四百萬的台灣同胞在地獄中呻吟。我等被壓迫的台灣青年已經不堪被壓迫，我等的鬥爭極為緊迫。我等的使命也很重大。因此，我等呼喊被壓迫的台灣民眾及革命的中國民眾要共同起來與日本帝國主義做決死的鬥爭。

台灣的同胞！被壓迫的中國民眾！起來！勇敢地與帝國主義及其走狗對峙！

中國、台灣的被壓迫民眾！聯合起來！

全世界被壓迫的民眾！團結起來！

打倒國際帝國主義及其走狗！

擁護中國革命！

台灣獨立成功萬歲！

閩南台灣學生聯合會萬歲！

目的與活動

儘管閩南學生聯合會在會則總綱的第二條即開宗明義地表明其成立宗旨是：「藉著連絡感情來涵養團結的精神謀取相互的利益。」然而，無論是從其勸誘學生加入聯合會的文件或是成立大會的宣言來看，聯合會的目的不外就是「團結被壓迫的台灣民眾與革命的中國民眾，共同起來與日本帝國主義進行鬥爭」。

事實上，閩南學生聯合會的暫定名稱及其組織的成立過程與目的，完全是依照上海台灣青年團的模式進行的。它成立以後的活動也一直以社會科學研究和反帝運動為主。因此，在六月九日的成立大會及執行委員會中便決定進行反對六·一七台灣始政紀念日的鬥爭，印製了兩千餘份的紀念六·一七特刊，分送給廈門、漳州、上海及台灣島內的各左翼團體。

紀念特刊的〈宣言〉部份聲稱：

四百萬台灣同胞應憎恨並覺得恥辱的六·一七紀念日又來臨了。那吸血的惡獸日

本帝國主義者在日本公然地慶祝所謂「始政紀念日」。對彼等來說是在慶祝征服、掠奪、屠殺的勝利。然而，彼等帝國主義者的利益就是我等被壓迫民族的禍害。同時也是大多數工農群眾的禍害。彼等帝國主義勝利的、榮耀的反面就是吾等被壓迫民眾的失敗與恥辱。日本已經占領台灣三十餘年了。但日本帝國主義者究竟給了我們什麼？只是貧窮、破產、流離失所、苛稅、拷問、毆打、屠殺、監禁罷了。我們不但沒有一點政治權力，甚至連經濟權力也完全操在日本人的手中。而解放運動又暴露於極端的白色恐怖活動下，大多數的工農群眾只好每天痛苦殘喘。

在這種情況下，只有無恥的台灣民眾才會希望日本帝國主義者給予台灣民眾鴻恩厚惠，期待能有所謂「光明的政治」、「一視同仁」的政治。然而，只要日本帝國主義一日存在，台灣被壓迫的民眾就只有貧窮、被壓迫而絕無可能解放。

台灣解放運動的目的是要求台灣獨立，否認日本帝國主義的存在，必須要求台灣解放，顛覆帝國主義的統治。今日吾等在迎接六·一七紀念時應更加汲汲於顛覆帝國主義，同時預防叛逆的反動。海外的吾等青年應盡最大的努力來從事反帝運動。妨害反帝運動的都是叛逆者。總之，我等今日紀念六·一七必須有顛覆日本帝國主義的覺悟。然後將「始政紀念日」改成「獨立紀念日」。

工友們！農友們！諸君放下鐵鎚與鋤頭起來紀念六·一七吧！市民罷市、學生罷課來紀念六·一七吧。中台被壓迫的民眾聯合起來！全世界被壓迫的民族團結起來！打倒國際帝國主義！打倒台灣民眾黨！擁護中國革命！擁護朝鮮、印度、各國革命！台灣獨立萬歲！世界革命萬歲！

六·一七紀念鬥爭之後，自創立以來便非常重視社會科學研究的學生聯合會，更積極在各地開辦研究會，致力於共產主義理論的學習。當時的讀書會主要分成兩班：

集美學寮班：王燈財、邱克修、王光天、高水生、廖某等。

詹以昌的班：詹以昌、王溪森、黃天鑑、董文霖、曹鴻跳等。

到了九月，學生聯合會又利用每週六的下午，在會員董文霖的住處開辦有關〈進化論〉及〈新興經濟學〉（楊明山著）的學習會，講師由台灣農民組合幹部侯朝宗（劉啟光）擔任。參與的會員有董文霖、高水生、鄭明顯、蔡大河、張梗、陳鑫堃、王燈財、陳坤成、蘇深淵、王太鑫、廖丙丁、林清淮、王天強、林明德等人。

擁護霧社蜂起

十一月初，台灣島內傳來霧社原住民抗日蜂起的消息。學生聯合會聞訊後便暫停理論的研習，於十一月八日，在集美郵局附近集合，召開緊急會議。當天，一共到了卅幾名會員。聯合會的指導員潘欽信、陳新春，幹部曹炯朴，以及會員董文霖、王太鑫、邱克修等人，紛紛起來發言。大家並且一致認為，霧社事件的「起因是日本帝國主義的壓迫。他們不法出兵，慘殺暴動蕃，實在是無視人道的作為。我等同胞應更加團結援助暴動蕃，共同奮起打倒帝國主義。」會議同時決定呼應上海台灣青年團的聲援行動，以「留集台灣學生有志團」之名發行〈援助台灣蕃族革命號召宣言〉及〈台灣革命特刊〉，密送到島內各地散發。

〈宣言〉呼籲：

革命的同胞們！自東亞第一代民主國台灣共和國滅亡於兇暴的日本帝國主義之鐵蹄下以來，鄉村被血洗、市鎮被焚燒、家產被掠奪、婦女被姦淫、山林土地被強奪、生產品被壟斷、強徵勞役、苛斂誅求等，四百萬台灣同胞於黑暗的地獄中呻吟已有三十餘年。其間純樸柔順的民眾，曾毅然拿起槍劍發動十四次的武裝暴動，反抗帝國主義的欺凌壓迫。由此可以窺知，日本帝國主義的面貌是如何兇惡猙獰，而台灣民眾所處的地位又是如何悲傷可憐。

目前，國際帝國主義正面臨極大的經濟危機。資本主義的過程瀕於崩壞、潰滅邊緣，強盜等欲再分割新殖民地的第二次世界大戰的危機又迫在眉睫。帝國主義如果不加緊剝削民眾，尤其是殖民地的民眾，無法維持其生命。這半年來，印度、朝鮮、安南、緬甸、比島（菲律賓）等被壓迫民族英雄式的反帝國主義鬥爭，足以證實帝國主義的榨取與壓迫及弱小民族的痛苦與反抗。台灣當然也不例外。我等的慘苦比印、朝、安更甚，尤其是在日本帝國主義的統治下被隔絕於台灣山間強行奴隸制度、文化較低的蕃族更是悲慘。

這次，日本帝國主義積極為第二次世界大屠殺準備而建立一座大發電廠，以槍劍做先鋒沒收了五千餘名蕃民的土地、房屋，並強迫他們遷居。蕃民不堪此壓迫竟然於上月二十七日毅然奮起，脫去過去柔順的奴隸外皮，進行有組織、有計劃的大暴動。總共動員萬餘人，殺害日人兩百餘人，燒毀三十幾個派出所，搶奪數百枝槍砲及五萬餘發彈藥。憑藉著天險與日本帝國主義做殊死的戰爭。

日本帝國主義受此突如其來的打擊，甚為害怕，立刻出動軍隊、派遣飛機，開始

以炸彈、機關槍、大砲攻擊蕃界。日軍到處蹂躪，一面乘機逮捕漢族的革命戰士，鎮壓民眾所有的反抗運動，另一方面則欺騙、威嚇參加暴動的蕃族，欲利用「以蕃平番」的毒策。然而彼等堅持拒絕，許多蕃婦甚至以死勸其丈夫、小孩參加革命。根據帝國主義報章雜誌的報導，單是一社的人數就多達一百八十一名。

革命的同胞們！

台灣蕃族與倭奴帝國主義的直接鬥爭不單是蕃族與台灣的孤立問題，它完全是被壓迫民族與國際帝國主義的問題。倭奴施毒手殺害蕃眾，屠殺我等的兄弟，切斷我等的手足。想要打倒帝國主義，實行民族革命的話，就要聯合帝國主義蹂躪下的所有民眾，共同起來奮鬥。如此才能獲得最後的勝利。

革命的同胞們！起來！起來！援助台灣的蕃族革命！反對倭奴屠殺蕃民！聯合全世界被壓迫的民族！弱小民族解放萬歲！

學生聯合會擁護霧社原住民暴動蜂起的運動，後來在廈門天馬山召開結論會而告一段落。學生聯合會於是又在廈門集美學校中國籍英語教師陳天弼的住處，繼續組織社會科學研究會。參與的會員分作兩班：

陳天弼的班 侯朝宗 王燈財 董文霖 王光天 張梗 王天強 高水生 林明德
 集美學校學寮的班 蘇深淵 王太鑫 林清淮 鄭明顯 陳鑫堯 蔡大河 陳坤成
 研究會仍然由侯朝宗負責指導

六、廈門反帝同盟台灣分盟

一九三一年四月，上海台灣青年團受到中共中央清算李立三路線的影響，而把原本具有同鄉會的過渡性質的青年團解散，改組為具有社會科學研究與反帝運動性質的、旗幟鮮明的反帝團體——上海台灣反帝同盟。

不久以後，在廈門的學生團體受此影響也起而做效。六月左右，侯朝宗召集了他所指導的閩南學生聯合會中的激進分子：王燈財、康續、陳耀林、陳啟仁、戴遙慶、陳興宇等人，在廈門市白鹿洞集會，決定組織屬於廈門反帝同盟的台灣分盟，並推舉王燈財為負責人。

廈門反帝同盟台灣分盟成立後，它的領導人侯朝宗隨即與上海台灣反帝同盟及中國共產主義青年團廈門支部聯絡。然後，他除了指導廈門的台灣學生將反帝運動組織化之外，並且也促成他們與廈門地方的中共系團體互相合作，強化反帝國主義運動的宣導與煽動。

這樣，廈門反帝同盟台灣分盟成立後，當地的台灣青年們顯然要比以前更加活潑地進行運動。首先，在六月上旬，侯朝宗、王燈財、康續、陳興宇、鄭明德等人，為了反對即將來臨的所謂「台灣六·一七始政紀念日」，而在廈門竹子河的許氏家族自治鄉團聚會，協議鬥爭策略，結果，決定印刷三千份以「打倒日本帝國主義，謀求台灣獨立」為重點的〈紀念六·一七台灣亡國宣言特刊〉，然後分發到全國各地及台灣島內。

該宣言書題為〈於台灣國恥紀念日告華南的台灣民眾〉，內容是說：

四十年前，兇惡的日本帝國主義派遣大軍，以殘酷野蠻的手段屠殺台灣民眾，來鎮壓廣大無辜的民眾。自一八九五年六月十七日開始其血腥的統治。

日本帝國主義在四十年間將台灣全土的國民經濟納入自己的掌中，實行極端的剝奪政策。妨害台灣經濟的自由發展，犧牲工農群眾的生活。鎮壓勞動者拚死的反抗。在農業的範圍內完全保持中世紀封建剝奪制度，實行半農奴式的剝奪。結果導致農村經濟破產，全體工農群眾陷於飢餓中。失去土地、死於困境者不知其數。

日本為了強化其血腥統治而干涉中國革命。為了準備世界大戰而將其毒牙向中國伸張，擴張台灣的軍備、充實警察網、實行警察政治。用以對抗空前的白色人種威脅與反日、反資本主義的民眾，尤其是共產黨員。一方面又巧妙地運用政策，給與台灣民族資產階級某種社會地位，藉以懷柔反動。

台灣下階層的民眾受到共和國領袖的慫恿而躊躇不決，反而向日本帝國主義投降，犧牲了自己所有的一切。但之後仍以英勇的精神不斷地抵抗日本，引起民眾革命戰爭。噓吧啤事件、羅福星等反日的大暴動都使日本帝國主義者感到恐怖。「三年小叛、五年大亂」的鬥爭精神也使島內弱小民族生番的反日情緒奮起。霧社的偉大暴動使地主及民族資產階級戰慄不已。然而，無恥的台灣民族資產階級竟然向日本帝國主義投降。代表上階層地主、資本家的台灣地方自治聯盟、台灣民眾黨（現在已被解散，但其系統仍在）都變作日本帝國主義的走狗。尤其是以左傾的民族、武斷主義來粧點門面的民眾黨，更是台灣工農最危險的敵人。

彼等異口同聲叫著「台灣議會」、「自治」來打擊民眾的反帝鬥爭，不但公開承認日本的統治而且還稱讚其政績。台灣民族資產階級公開擁護三民主義，反對中國蘇維埃及紅軍。激勵日本帝國主義來鎮壓生番的暴動，承認其占領東北、華南，公然在

自己的報紙上談論「東亞是東亞人的東亞」。即自負為日本人的東亞，誇示日本帝國的優越性。實在無恥極了。

日本帝國主義統治的績效就是使國民繼續崩壞，使工農群眾的生活更加悲慘。帝國主義第二次侵略戰爭已迫在眉睫，而且將把台灣當作戰場，作為攻擊中國蘇維埃紅軍，攻擊華南的根據地。然而，台灣民族資產階級卻變成日本帝國主義的清道夫與侵略戰爭的鼓吹者，變成壓迫台灣解放運動之機關與土地革命的敵人。

另一方面，包括生蕃在內，全台灣民眾的反帝鬥爭日益勃興。在台灣共產黨的指導下開始與日本帝國主義戰鬥。將日本驅出台灣，徹底實行土地革命，消滅農村的封建剝削，學習中國蘇維埃的方法，向蘇維埃前進。如此才能救工農自身，創造出光明的世界。

全華南、台灣的下層的民眾！

日本帝國主義利用華南政策進行各種鬼計，在中國與台灣的勞苦民眾間造成鴻溝。故意利用一部分台灣的落伍分子煽動民族反感，然後乘機得利。彼朝鮮人在滿洲就因此被日本利用了，不是嗎？因此，吾等擔心再引起第二次的萬寶山事件。今日日本帝國主義占有華南、進逼廈門。如果不願變成亡國奴，只要呼應吾等的號召，成立中國台灣民族統一戰線，打倒共同的敵人。我們必須糾彈日本帝國主義的陰謀與國民黨及台灣民族資產階級無恥的賣國行為。在蘇維埃的口號下擁護中國，實施反帝統一戰線。建設中國與台灣勞苦民眾的兄弟關係，參加蘇維埃革命。

全華南的台灣勞苦民眾！

吾等因在台灣受到日本帝國主義無限的壓迫而逃離當地。吾等積極地參加中國革命就是為了不願變成日本帝國主義的俘虜。吾等參加台灣革命實行土地革命，為打倒日本帝國主義與建設蘇維埃台灣而勇敢地鬥爭。

吾等高喊：

反對日本帝國主義屠殺台灣工農群眾！

反對台灣民族資產階級無恥的賣國行爲！

反對日本帝國主義侵略中國！

反對日本帝國主義的離間政策！

即時釋放政治犯！

承認言論、結社、出版、集會、罷工等一切的自由！

反對台灣總督府的警察政治！

即時撤退駐在台灣的所有日本陸海空軍！

將日本帝國主義驅出台灣！

聯合中國、台灣的勞苦群眾！

打倒共同的敵人日本帝國主義！

打倒無恥的賣國賊、漢奸——中國國民黨！

粉碎帝國主義國民黨的五次圍剿！

反對帝國主義的第二次世界大戰！

武裝與保衛世界工人階級、被壓迫民族解放運動的大本營——蘇維埃聯邦！

擁護中國、蘇維埃政府的民族政策——民族自決（即建設自己獨立自由的國家）！

擁護中國共產黨！

擁護台灣共產黨！

加入反帝大同盟！

九月十八日，日本帝國主義突然發動柳條溝事變，強占我國東三省。侯朝宗於是於同年十月再次召集王燈財、陳耀林、陳坤成等十幾名台灣學生，在廈門大同中學討論反日的對策。結果，會議決定發出一份〈反對日本帝國主義占據東三省〉的宣言書。會後，王燈財、陳耀林及另外三名學生又協議連絡及結合台灣學生的方法，並共同起草上述的宣言書，然後交付印刷。其中，數百張分發給廈門及漳州地方的台灣學生。

台灣分盟想要通過大力的宣傳，結合台灣籍的青年、學生，以擴大組織。

到了這年年底的前後，台灣分盟幹部王燈財、陳耀林、陳啟仁等又經侯朝宗的介紹，由中共青團一詹姓團員吸收為共青團團員，然後台灣分盟內部進行「宗派」活動。然而，就在這個時期，侯朝宗卻因為身分暴露，有被檢舉的危險而潛入地下，行蹤不明。

學生抗日救亡運動

九·一八事變後，全國廣大民眾展開了聲勢浩大的抗日救亡運動，要求政府出兵抗日，

收復東北失地。

青年學生在九·一八後的抗日運動中起了先鋒、橋樑作用，是一支強大的生力軍。九月十九日晚，北平各校學生會召開緊急會議，商議抗日救國；廿一日起，北平各校學生陸續展開罷課行動，並且走上街頭，進行抗日宣傳；廿四日，北平學生抗日救國聯合會成立。在上海，九月廿日，受共產黨影響深的東亞同文書院的中國學生首先罷課，敦促國民政府立即出兵，對日宣戰。同濟、交通、復旦等大學即起響應。廿二日，上海各大學抗日救國聯合會成立。在北平、上海學生的推動下，九月下旬，各地學生絡繹不絕地湧入南京，向國民政府請願。廿八日，上海和南京學生到外交部請願。蔣介石儼於學生舉動，乃於第二天在中央軍校接見學生代表，表示願意考慮學生要求；學生代表信以為真。十一月，蔣介石在國民黨四全大會上聲稱「個人決心北上」、「效命黨國」。南京各大中學校學生於是在中共南京市委領導下，趁時發起「送蔣北上」運動；各地學生聞風而起，陸續趕赴南京。廿六日，上海和各地學生代表前往國民政府門前，要求蔣介石接見並簽署出兵日期。廿七日下午，蔣介石被迫接見學生代表。同時，北平學聯組織了二千多名學生到張學良私邸請願，要求張學良出兵東北；開封中專以上學校八千名學生赴河南省政府和省黨部請願，要求轉呈中央發給槍械，北上抗日。

十二月初，學生救亡運動開始由請願轉變為示威。十二月五日，北京大學南下示威團在南京舉行第一次示威，遭到國民黨軍警包圍，結果，一百八十五名學生被扣押，三十三人受傷。上海各校學生隨即舉行示威遊行，聲援北大學生。十二月中旬，北平、天津、廣州、濟南、武漢、上海等地學生代表匯集南京。十七日，各地學生和南京大中學生三萬多

人舉行聯合大示威。當示威隊伍走到國民黨（中央日報）社附近的珍珠橋時，又遭到國民黨軍警的襲擊，幾十人受傷，五、六百人被捕，上海文氏英專學生、共青團員楊同桓被打死。是為「一二·一七珍珠橋慘案」。學生抗日救亡運動受到嚴重挫折。

在全國風起雲湧的抗日救亡學生中，中共中央也在九·一八後隨即作出〈堅決反對日本帝國主義的侵略和國民黨的不抵抗主義〉的決議。

一九三二年三月，為了響應學生救亡運動，中國共產主義青年團廈門支部指導下的學生與青年團體內的團員，召開了活動份子聯席會議。廈門反帝同盟台灣分盟的重要幹部：王燈財、陳耀林、陳啟仁等人，也以共產主義青年團團員的身分出席。聯席會議通過協商而決定，今後各團體以中國共產黨「抗日救國」的新方針，作為反帝國主義統一戰線運動的共同訴求；並且決議將台灣青年組成的「廈門反帝同盟台灣分盟」解散，併入依據「抗日救國」的方針組成的「廈門青年救國會」，共同以「抗日救國」的訴求來爭取大眾，擴大組織。

至此，在廈門的台灣人組織已經全部不存在了。王燈財、陳耀林、陳啟仁等人仍然活躍地進行著抗日救國的運動。為了即將來臨的五一勞動節紀念日，他們於四月底參加了在廈門竹子河許氏家族自治會鄉團召開的中國共產主義青年團活動份子聯席會議，討論關於勞動節紀念活動的細節；會議決定大量散發反帝傳單給當時碇泊在廈門的日本帝國主義所屬軍艦的水兵。勞動節之後，他們又於五月二日參加中國共產主義青年團的廈門白鶴巖召開的聯席會議，協議濟南事變（五三慘案）的傳單。到了九·一八前夕，他們又於九月十六日出席了在廈門虎溪巖召開的共產主義青年團聯席會議，協議九·一八事變一週年紀念

鬥爭的方式。九月十八晚上，廈門青年救國會動員了所屬各團體的成員，在廈門街頭舉行飛行集會，並且分發題為〈揭發日本帝國主義的侵略政策〉與〈抗日救國〉的傳單。

廈門反帝運動關係者的檢舉

一九三一年七月二十二日，上海台灣反帝同盟的盟員陳炳譽與董文霖，在中共江蘇省委指導的抗議萬寶山事件的聯合示威遊行中分發傳單，因而被租界工部局警察檢舉，調查結果判明他們為台灣籍民而引渡到日本駐上海領事館警察署。日本領事館警察因而偵悉上海台灣反帝同盟的組織，及其與翁澤生、林木順等人的關係，於是從九月十日起陸續檢舉了上海台灣青年團與上海台灣反帝同盟的關係者。通過這樣的檢舉與偵訊，日本警察大致也推知了廈門閩南學生聯合會及廈門反帝同盟台灣分盟的活動概況，並且決定與上海台灣反帝同盟統一處置。然而，由於事件關係者因時間不同而頻繁運動，而且侯朝宗以下的主要人物大多無法檢舉，所以採取徹底掃蕩的檢舉行動。

起訴）、陳鑫堃（暫緩起訴）、林建忠（暫緩起訴）、王燈財（暫緩起訴）、陳坤成（暫緩起訴）、施懷清、邱順、張梗（保釋中逃走）、陳啟德、陳啟仁（暫緩起訴）、周壽源、邱樹波、陳耀林（死亡）。

另外，一九三二年四月紅軍進入漳州城後，台灣學生沈乙庚、林飄萍、施碧晨、沈存薦、余曉陽……等人則與蔡孝乾及施至善一家，一起參加紅軍，進入江西蘇區。

第四節 在南京

一九二五年的五卅運動後，反帝鬥爭的風暴迅速席捲全國。南京也如同國內其他幾個城市一般，舉行了有幾萬甚至十幾萬人參加的反帝集會和遊行示威。在南京的台灣學生也就在這樣的反帝風暴襲捲下著手進行反帝運動的組織與實踐。因為這樣的時代背景，在南京的台灣學生運動，基本上是通過以台灣學生與中國學生為中心聯合組成的中台同志會展開。就其團體的性質而言，日本警務當局根據當時的檢舉情報及會議紀錄而判定，中台同志會的組成主要是受到「五卅」事件當時大陸學生運動的影響；同時因為他們對中國反帝運動的勃興及成果抱著極大的期望，所以決定以驅逐台灣的日本帝國主義勢力，策劃台灣的民族獨立為目標；因此，在角色上，他們除了扮演台灣大眾民族革命運動啟蒙者之外，也企圖聯絡台灣與中國的革命勢力相結合。至於在思想形態上，中台同志會似乎也受到中國共產黨相當濃厚的影響。

中台同志會

中台同志會組成的中心人物是原籍宜蘭羅東街的吳麗水，一九二三年五月，他曾上上海暨南大學中學部就讀，後來又輾轉於南京新智中學與東南大學中學部。這段期間，吳麗水在中國學生運動的影響下也逐漸產生參與抗日運動的實踐慾望。一九二五年，五卅運動後的九月左右，吳麗水聯絡就讀南京東南大學的同鄉李振芳，一起放棄學業，專心糾合同

志，研究社會主義，並努力接近中國學生，與他們討論有關台灣的問題。然而，因為日本當局曾利用一批台灣流氓在大陸東南海岸的廈門、福州、汕頭等地，開設煙館，賭場與妓院……，為非作歹；而且還為虎作倀，充當日本線民，迫害中國的善良同胞。這一切作為使得中國同胞敢怒不敢言；並且只要一提到「台灣人」，他們都敬而遠之。

在這種客觀條件下，吳麗水與李振芳的工作幾乎一籌莫展。因此，他們與中國方面的同志有感於「中國與台灣的感情甚為隔閡，中國方面甚至把台灣人當作是外國人看」的現實，一致認為有必要組織一個反抗日本帝國主義侵略中國與台灣的革命團體，以資推展革命運動。後來，他們拿這個計劃向平時便接受他指導的中山中學堂（中國國民黨經辦）教師文化震請教。文化震指出，中國同胞與台灣同胞同樣受到日本帝國主義的侵略、壓迫，他們的利害一致，命運一體；必須互相提攜、支援、團結在一起，才能打倒日本帝國主義。文化震於是說服中山中學堂的其他教師：陳君起、劉璋璋、胡錫奎、趙作霖等人與吳麗水、李振芳共同推動中台同志會的組織工作。

一九二六年三月十九日，吳麗水、李振芳、文化震、陳君起、劉璋璋、胡錫奎、趙作霖等人，在連續三天的籌備委員會的討論後，共同擬定了中台同志會的成立主旨書，分發給居住在南京的台灣人與中國學生，並且在廿一日的成立大會前獲得四十名左右的入會同志。

中台同志會成立大會主旨書

噫！甲午戰後，日本帝國主義以武力脅迫清朝，締結馬關條約，終於把我東南屏障台灣及三百六十餘萬同胞置於淪亡之地，任令彼等恣意宰割。吾人每想及此便不勝憤慨。因此，於茲組織本會，以便連結中台同胞情誼，開拓中台間文化，為祖國謀利

益，為台灣謀解放。惟茲事體大，而資群稀少，雖欲群策，力卻不足以造成較大基礎。是故，吾輩決於三月二十一日午後一時先於新街口中山中學，召開成立大會，茲切望諸位，排除萬難，蒞臨指導，為禱！

三月廿一日下午，吳麗水、李振芳集合了以中山中學堂教師與學生為主的約四十名同志，於南京新街口的中山中學禮堂，舉行中台同志會成立大會。當天，中山中學的校內校外張貼著以下的標語：

台灣同胞和中國同胞聯合起來！

中國民族團結起來！

打倒日本帝國主義！

中台同志會是中台同胞相結合的唯一革命團體！

台灣革命成功萬歲！

中國革命成功萬歲！

大會推選出十三名委員，並由這些委員互選文化震為主任委員，李振芳為副主任委員，以及總務部長（曾魯）、組織部長（吳麗水）、外交部長（陳君起）、宣傳部長（趙作霖）、財政部長（唐宏濤）、僑務部長（藍煥呈）等。發布了成立宣言與組織規章。該會除了在簡章中規定：「本會以增進中國台灣同胞間的意志疏通，促進中國台灣間的文化，以兩地同胞的團結精神，謀求兩地在世界政治上、經濟上的自由平等為主旨。」並且在成立宣言中說明，「台灣人的唯一願望便是脫離日本帝國主義的羈絆。」而「中國人最緊迫的需求也莫過於脫離日本帝國主義的羈絆。」因此，「日本帝國主義乃是兩地人民的公

敵」，兩地人民實際上也有「共生共死」的密切關係。中台同志會在性質上可以說是兩地民眾「反帝國主義戰線實際聯合之先驅」。

中台同志會於六月一日對外發布的宣言聲稱：

霹靂一聲，中台同志會已經正式成立了。這一事實，實在具有極重大的意義。這種組織的成功，一方面表示中台兩地民眾實際已踏出緊密團結的第一步；另一方面亦表示，日本帝國主義已趨向崩潰的第一程。故本會以特別熱烈的希望向所有民眾宣言。

台灣被日本帝國併吞以後，日本帝國主義遂用一切惡毒手段剝削台灣民眾。全台灣的人口，中國人佔有三百多萬，土人佔有十多萬，日人卻僅佔十多萬而已。欲以絕對少數統治絕對多數，如非有所假借，則一切優越勢力亦終不為功。於茲，一方面利用不平等法令，封鎖台灣人的政治能力；一方面則輸入其帝國資本主義，以降低台灣人的經濟地位。至此，台灣人的生命隨時可能斷喪，台灣人的血汗隨時可以榨取，台灣人的言論可以任意取締，台灣人的文化可以任意摧殘，舉凡人類間的一切不平等待遇均讓台灣人飽嚙無餘。故在這時期，台灣人的唯一願望便是脫離日本帝國主義的羈絆，這是極其自然的趨勢。

至於中國，在各方面也和台灣一樣，正飽受著全世界帝國主義的肆意蹂躪，而日本帝國主義，由於憑恃其在東亞的特殊地位，特別激烈的侵略中國民眾，以不平等條約謀取利權，一方面獲得經濟上的優越權力，一方面則獲得政治上的特殊地位。最近十年來更變本加厲，以完全制中國民眾於死命為其最終目的。際此，中國人最緊迫的需求莫過於脫離日本帝國主義的羈絆。

考之於歷史上之事實，台灣滅亡之日亦即是中國民眾被帝國主義所控制之日，中國完全屈服於日本帝國主義者乃是兩地民眾的公敵。因此，兩地的民眾自然具有相同的要求，具有更進一步彼此聯合，站在同一戰線，向共同敵人發動大攻擊的需要。我們須知，各帝國向被壓迫民眾進攻時往往採取一致行動；而被壓迫民眾不論被壓迫之時或之後卻往往顯得分離散漫，有時甚至被帝國主義所煽動，或被其離間政策所迷惑，反而出現互相仇視的情形。

這種方法，帶給帝國主義者完全的勝利，卻造成被壓迫民族的致命傷。是以，各弱小民族若不建立堅固的聯合戰線，帝國主義將永無崩潰之日，而弱小民族亦將完全滅絕，其災難將永無休止的一天。因此，中台同志會的成立，一方面是兩地民眾要求的表現；一方面也是反帝國主義戰線實際聯合的先驅。本會既以代表兩地民眾的要求為使命，另一方面亦以建立兩地民眾的聯合戰線為職司。因而，本會工作的第一步將是，喚起兩地民眾完全脫離日本帝國主義的羈絆，然後，促使中台兩地民眾，重新發生密切的政治關係。對台灣本地的民族，擬以一律平等的原則來樹立互相間的友好關係。謹此宣言。

島內分部設置會議

中台同志會一經成立便把成立宣言及組織章程等文件，寄給上海、廈門、東京以及島內各地的學生，通過宣傳活動，說服各地的青年學生加入，努力擴大組織。同年（一九二六年）五月，在上海大學附屬中學就讀的羅東籍的藍煥呈，與上海大學學生翁澤生、蔡孝

乾、何景寮等，加入中台同志會。在東京、原籍羅東街的東亞商業學校學生藍阿嬰也加入了中台同志會。此外，它也與由廈門大學學生郭丙辛、黃和氣及中國學生共組的廈門中國台灣同志會取得聯絡。

中台同志會雖然可以在中國大陸公開活動，但是在日帝統治下的台灣島內，它仍然是不能公開的「非法」團體。為此，吳麗水、李振芳與藍煥呈三人便利用暑假回台省親之便，推動設置島內分部的工作。七月廿三日，他們三人找了三名羅東的有志青年：黃天海、楊如松與新入會的陳昭松，在李振芳的廣興街老家聚會，討論有關設置中台同志會台灣分會的事宜。

會議首先由吳麗水報告他從上海經由廈門回台灣的經過，以及當地的狀況。吳麗水說：「第一，關於在上海設立分會的事，雖然我已經和翁澤生、蔡孝乾接洽過，但他們兩人似乎有意把總會遷移到上海。第二，廈門一帶，密探非常多，不便進行公開的宣傳活動，但本會印製的宣傳單已託當地的國民黨組織，代為散發，後來，雖然有許多密探打聽、調查，但還不至於被發覺。最後，羅東分會到現在還沒有成立，李同志（振芳）回鄉以後應當再積極推動，並按預定計劃，推展到台北地區。」

藍煥呈接著發言道：「我並沒有什麼可以報告的資料。陳君（招松）來上海的時候，我曾經和他洽商組織分會的事宜，但陳君怕會被共產黨利用，表示不贊成。由於他抱持猶疑的態度，我就沒有積極勸誘他參加。至於上海方面，目前有相當多的人支持。雖然現在還沒有組織分會，但將來是有可能的。」

接著由主席李振芳說明中台同志會的組成過程及其目的。他說：「本會的第一目的在

於謀求中國及台灣之自由獨立，第二目的是謀求沐浴於兩地之文化。以中台民眾及華僑為組織對象。但現在的工作仍應停留在宣傳階段。也就是說，一方面將台灣的事情告知中國民眾，同時也把中國的事情傳達給台灣民眾，通過這種作法來增進兩地的親密關係。再說，只要中國民眾能夠同情屬於漢民族一支的我們，那麼，他們就會不吝惜於捐款幫助我們。現在，中台同志會只希望各位能喚起民眾的覺醒，致力發展民智。」

「目前，」黃天海在李振芳的報告結束後立即問道：「你們的策略如何？」

李振芳回答說：「目前，我們還處在宣傳階段。但是對中國革命必須大力相助。我們認為，只要中國成為強國，我們台灣人就能脫離日本的統治，民族的解放也自然水到渠成。在台灣這方面，我們的策略則是以工人和農民為基本的力量，只有靠這多數的力量來策動，才可能成功。」

「目前，日本警察的取締非常嚴厲，要如何宣傳才能得到實效呢？」陳招松問。

李振芳毫不考慮地說：「秘密進行。」

「我本人的意見以為，」陳招松質疑道：「應先培養人才，從台灣派遣留學生到中國。」但是，他接著又再質疑說：「這事首先必須要尋求財源。因為這一定需要相當多的經費，沒有經費，單靠才能，是不能成功的。」

會議最後由藍煥呈報告藍文炳（阿嬰）在東京被拘留的事件。藍煥呈說：「藍文炳君由於接受上海寄來的中台同志會的傳單，已被日本警察當局處以七天的拘留。」

會議然後在沒有具體決議的狀況下結束。後來，中台同志會的島內分部似乎還沒有明

確組成，便遭到檢舉了。

毋忘國恥紀念日

一九一四年八月，第一次世界大戰爆發，日本便乘歐洲列強無暇東顧的時機，借口向德、奧宣戰，但不派兵到歐洲戰場，卻在中國山東沿海登陸，占領了青島和膠濟鐵路全線。袁世凱為了取得日本侵略者的支持，竟宣布「局外中立」，聽任日本侵略。緊接著一九一五年一月廿八日，日本向袁世凱提出滅亡中國的《二十一條》，要求：「中國政府承認日本享有德國在山東的一切權利」，「將旅大租界期及南滿、安奉兩鐵路期限，延長為九十九年，並承認日本在南滿及內蒙古東部的特殊權利」，「中日合辦漢冶萍公司，未經公司同意，不准他人開採附近礦山」、「中國沿海港灣及島嶼，不得租借或割給其他國家」、「中國中央政府聘用日本人為政治、財政、軍事等顧問。中國警政及兵工廠由中日合辦……」。並且通過日本駐華公使日置益對袁世凱政府明白表示：要袁世凱接受《二十一條》，作為換取日本支持其復辟帝制的條件。經過幾個月的秘密談判，日本又於五月七日發出最後通牒，限四十八小時內答覆。袁世凱稱帝心切，竟於五月九日接受滅亡中國的《二十一條》（除第五號「容日後協商」外，其餘全部接受）。這事激起了全國人民極大的憤怒，反對日本帝國主義的鬥爭，也通過發表宣言、罷工抗議、遊行示威、抵制日貨等方式迅速展開，使《二十一條》不能付諸實行。此後，中國人民便把五月七日或五月九日，當作中國的國恥日，以此喚醒人民反日帝的民族意識。

一九二六年三月廿一日正式成立的中台同志會，針對即將來臨的「國恥紀念日」，立

即加以把握，展開宣傳活動。五月七日當天，它以「中台同志會執行委員會」的名義印製了大量的傳單，在南京、上海、廈門、東京及島內各地散發。根據日本警察在七月廿六日逮捕李振芳等人之後在黃天海身上取得的文書資料，該國恥紀念日的宣傳單呼籲：

五月七日又來了。我們牢記著。十一年前的今天，日本軍閥勾結顯預而無氣力的同胞軍閥，在全國民眾之前提出暴虐的二十一條要求。我們牢記著。十一年前的今天，全國民眾展開熱烈的示威運動，表示一致反抗的決心。此外，我們更要深深銘記於心的，便是三十二年前的一段往事。台灣民眾已首先淪為日本帝國主義的奴隸了。而今，兩地的民眾正一路走向這淪亡的深淵去。現在雖無法打倒這萬惡的白色怪物。歲月雖然一年復一年的過，但我們心中的傷痕卻日甚一日加深；我們的回憶也日甚一日地加重痛苦。

中台兩地的同胞們！應在我們的公敵前趕快覺醒！趕快起來，準備機槍和斷頭台吧！

反對六·一七的鬥爭

「五·七」國恥紀念日之後，中台同志會立即準備另一個「恥日」紀念的鬥爭，那就是即將來臨的「六·一七」台灣「恥」政紀念日。六·一七當天，該會依台灣留學生的提議，在南京舉辦了一場反對六·一七台灣始政紀念日的大會，中台同志會的會員，台灣留學生及部份中國國民黨左派人物都出席了這場反對大會。並且印製了數千份題為〈中台同志會六·一七紀念告民眾書〉的傳單，在現場散發。會後並夾著上海方面的同志以「台灣青年大同盟」的名義製成的〈台恥紀念日宣言〉，一起寄發到全國各地。

在〈告民眾書〉中，中台同志會說明紀念「六·一七」的意義在於：永遠把「六·一七」當作中台民眾——特別是台灣——的「解放運動日」，最終目的在於創造一個自由平等的台灣。接著，就「六·一七」的歷史來源、台灣解放運動的意義與目標，以及台灣與中國的關係，詳加說明。

中台同志會六·一七紀念告民眾書

本年三月中，中國及台灣的同人數十名，於南京成立一個中台同志會。成立後發表的宣言，首先分析中台兩地的密切關係，繼而確定兩地民眾合作的必要性，並在同一宣言中，說明中台同志會的工作方針：「第一步，要立即喚起兩地民眾對實際要追求之事的認識，使其將來懷抱希望。亦即，首先表明希望中台兩地民眾完全脫離日本帝國主義的羈絆，然後，使兩者重新發生密切的政治關係」。本會根據這一宗旨，以進行台灣的革命事業為本會的唯一使命，以台灣的完全解放為本會的最終目的。

六月十七日終於來臨了。這一節日，對台灣的革命及解放，均具有非比尋常的意義。就日本方面來看，六月十七日是所謂「始政」。換句話說，也就是日本帝國主義採取嚴酷手段、壓迫台灣民眾的第一日。就中國方面來看，這一日，帝國主義的侵略再一次取得了重大成功。也是這龐大的中國無法保全近在咫尺之間的人民，免於受到莫大的恥辱的一個日子。就台灣這一邊來看，台灣人身受的一切痛苦，是從這一天開始發生的。由是觀之，「六·一七」對我們有何意義？本會根據這觀點，遂把這一天確定為台灣解放運動日。以後每逢這一天，當日本帝國主義者熱烈慶祝他們的始政紀念日之際，我們便進行示威運動，表明我們要創造一個自由平等的台灣。換句話說：

以後要永遠把「六·一七」當作中台民眾——特別是台灣——的「解放運動日」，直至革命成功為止。

為要分析「六·一七」的歷史，並以謀台灣民眾的解放為目的，茲宣傳台灣和中國的關係如下：

一、「六·一七」的來源

前清光緒二十一年，中國和日本締結了馬關條約。條約中，有一項是清朝割讓遼東半島、台灣及澎湖列島與日本的條款。這是台灣淪入日本帝國主義手中的起源。

台灣尚未割讓日本版圖以前，台灣的民族運動是充滿著榮光的。吳三桂率清兵入關之後，內地各省先後寂然無聲地陷入滿族的手中。後來，清朝強加壓力幾十年，最後，竟派兵入侵一向不在意的海外孤島——台灣。然不出數日，這一行動完全歸於失敗了。台灣同胞為民族自由而戰的精神，為世人所公認。時至今天，猶值我們深深緬懷。

台灣在滿族淫威下完全被征服之後，台灣民眾遂在同地同胞同一命運之下，全體臣屬於滿清達二百年之久。及至清末數十年中，大清帝國的大一統局面漸被帝國主義所打破。法帝國主義佔領安南、大英帝國佔領緬甸、日本帝國主義佔領高麗，而孤立在海外的台灣不久亦像高麗一樣，完全被編入日本帝國主義的版圖內。

光緒二十一年六月一日，清朝任命李經芳為交割台灣的大使，終於把台灣雙手奉給日本帝國主義。獻地後的六月十七日，日本帝國主義在台灣開始施行其統治。於是六·一七節遂成為我們永遠不能忘卻的一個日子。但台灣民眾並非容易屈服的。清廷出賣台灣的消息一傳到台灣，台灣民眾便表現出一種激烈的憤怒和極端的反抗。滿清

皇帝獲悉這種狀況後，始終用敷衍的態度，欺瞞台灣人民。但台灣民眾卻推出前巡撫唐景崧為總統，舉兵獨立。

不幸，後來，唐氏軍隊發生內訌，以致四散逃亡，嗣後，只有劉永福孤軍佔領台南，始終抵抗著日本帝國主義。然而，可惜的是，由於久無聲援，台灣民眾最後終於被日本帝國主義制壓了。不過，此次奮鬥的經過，將讓台灣民眾的民族運動史上，更增添一篇光榮失敗的記錄，也留給我們一份深長的懷念。

台灣的反抗運動，這樣始終歸於失敗。六月十七日，日本帝國主義正式開始施政。而台灣民眾忍氣吞聲，屈服於其淫威之下，已經三十一年。今天便是第三十一年頭尾的六·一七節。中台兩地的同胞或已淡忘，但對我們而言，卻是絕不可或忘的日子。也就是，我們永遠不能忘卻「台灣人的田園住宅，隨時可以佔領；台灣人的生命，隨時可以剝奪。台灣人的血汗，可以任意搾取；台灣人的文化，可以任意摧殘。」等種種事實。這就是我們日常所聞、日常所見的現象。如此，日日所聽所看的現實，教我們如何不懷有一種痛苦的回憶呢？

單單回憶是沒有用的。我們在六·一七的這一天，必須抱定徹定的覺悟。必須抱定堅定的決心，追求我們永遠的自由。現在，我們規定六·一七為台灣民眾的解放運動日。在這一天，我們不參加日本所慶祝的始政節，而參加對抗日本帝國主義的種種示威運動，來紀念我們的「始恨節」。台南、台北的同胞們！請用海濤般怒嘯的聲音，高喊如下的口號吧。

還我台灣人的自由！

二、台灣解放運動

「六·一七」節，是我們的解放運動日。在這一天，我們要進行種種活動，來向日本帝國主義示威。解放運動的目的，當然是要創造一個自由的台灣。

如何來爭取台灣民眾的自由，關於這個方法，我們必須要作慎重的考慮。觀察目前的情勢，台灣自由運動的聲浪中明顯地存在著兩種意見。第一種意見認為，台灣已經完全被踩在日本帝國主義的鐵蹄下，萬無翻身脫離其羈絆的可能性。因此他們便採取絕對妥協的方法，只要求日本帝國主義施捨一點仁慈。第二種意見，和前者略同，認為台灣的獨立是絕望的，但要讓台灣人得到自由的一項保障。於是要求有個台灣人的議會，藉以立法保護台灣人的利益。他們所採用的方法，雖比第一種意見的人稍微激烈，但對這兩種主張，我們都不難指出它的錯誤何在。

就第一種主張來說：我們知道，統治階級的利益是完全建立在犧牲被統治階級上面。故這兩種階級之間委實存在著絕對的不調和性。亦即，當被統治階級的要求極為激烈的時候，統治階級或許偶爾會賞賜一些恩惠，但那只不過是要緩和一下反對的聲浪而已，究其實，仍然是屬於欺騙的手段。

就第二種意見來說：此事無助於台灣人民的幸福，亦如前者。因為，如果成立了台灣人的議會，專門為台灣人的利益而立法的話，到時候，蒙受損失的便是日本帝國主義，這是明白不過的事。換句話說，這和台灣已經永遠脫離日本帝國主義的羈絆並無不同。故這種政策的可能與否，終究等於台灣的完全獨立可能與否，是同一問題。換言之，真正的台灣人議會假如能夠成功，那麼，台灣人的獨立也能夠成功，但倘若

議會變成替日本帝國主義粧飾門面的話，那麼，這種議會果真是台灣民眾所要求的東西嗎？是故，我們敢斷言，議會政策，此路萬萬行不通。

我們已經指出上面兩說的不可行。因此，關於如何解決台灣解放的問題，我們終達到一種堅固的信念。這信念是什麼？這就是，倘若我們不用革命的手段，則台灣人的利益永遠不能獲得保障；「自由獨立的台灣」也永遠沒有實現的可能。

台南、台北及兩地的同胞們！在澎湃的怒濤聲中，讓我們高喊如下的口號吧。

打倒日本帝國主義！

三、台灣與中國

台灣和中國，以前的關係如何？以後的關係又將如何？對此，我們非要有一個明確的分析不可。因為本會是為結合中台兩地而發起的會，是故，在台灣的解放運動上，本會的主張非顧及兩地所有民眾的意願不可。

台灣和中國的關係，從人種方面來說，台灣人口中的絕大多數（三百多萬）是中國人，他們所用的語言屬於福建土話的一種。至於他們的風俗習慣則和中國內地完全一樣。就地理方面來說，台灣和中國大陸只有一衣帶水之隔，交通上實可一葦渡之。故，台灣自有史以來便在不知不覺中和中國大陸發生了極為密切的關係。而兩地的經濟、政治、文化均自然形成為一系統，是故，兩地遂具有不可分離之勢。這就是台灣和中國的自然關係。

至於，將來中台之間的關係，我們只須確定一個原則即可。亦即「中國不能採用

帝國主義政策，而以台灣為其殖民地」。根據這一原則可以決定中台間的未來關係。台灣解放成功後，台灣所得權利之一便是自決權。

自決權的意思就是，視台灣經濟上、政治上的條件讓台灣成為一個有如獨立自由之邦。實際上也就是無異於台灣的獨立。萬一，由其他種種因素，兩地民眾認為中台應組成聯邦為宜，或認為有合併的可能性時，其取捨應根據台灣全體民眾的自由決定。這一原則，將是我們堅守不渝的。

在台灣解放運動的過程中，中國因其所處地位的關係應給台灣以充分的援助。與此同時，台灣民眾為追求台灣的自由光明必須要求台灣的自決。但台灣的自決必須出於台灣本身的自發性要求。換句話說，中國雖然成為台灣解放運動的後盾，但台灣民眾要拋棄完全依賴的心理，首先要有自發性的、廣大的運動。同時，要留意及中國的國民革命，因其直接或間接的對東亞各弱小民族之解放運動將產生不少的影響。故，我們希望台灣民眾要把中國國革命當作不單止於中國的問題，更是和我們息息相關的一個條件來看待。為此，在中國國民革命的過程中，我們也希望，台灣民眾宜在各方面盡力加以協助。

倘使這種互助精神能符合中台同志會的期待，中台的解放便不難在最近期間內有實現的可能性。台灣及兩地的同胞們！讓我們來熱烈高喊如下的口號吧。

中國國民革命成功萬歲！

台灣解放運動成功萬歲！

顯然地，中台同志會通過這份〈六·一七紀念告民眾書〉而表達的殖民地台灣人追求「自由獨立的台灣」的意願，是與今天「反中國」的台獨運動，在性質上大大不同的。

另外，中台同志會在上海方面的同志，以「台灣青年大同盟」名義發表的〈台恥紀念日宣言〉，則回憶了一八九五年以來的台灣哀史，控訴日本帝國在台灣卅一年來的暴虐統治，並號召台灣同胞團結起來，效法抗日先烈的精神，以現代的組織統一民眾的力量，並聯合全世界被壓迫民族，起來和日本帝國主義決一死戰。

中台同志會檢舉事件

日本帝國台灣總督府，早在接到有關中台同志會反對台灣始政紀念日活動的情報時，便指令有關方面，對其組織與個別成員，加以留意監視。不久，日警當局又發現，在廈門發行的〈思明日報〉與〈廈門日報〉的報導記事中都提過，它們曾經收到一份由「台灣青年大同盟」署名，題為〈台恥紀念日宣言〉的投書文件；此事經日本廈門領事的調查，查知該投書是當時就讀上海復旦大學的學生郭丙辛與大夏大學學生何景寮、黃阿器等人共同投寄的。台灣總督府接獲廈門方面的通報後，更加注意中台同志會同仁在台灣的活動。

同年（一九二六年）七月十四日，就讀上海大學附屬中學的藍煥呈與南京東南大學附屬中學的吳麗水，利用暑假假期回台省親，途經廈門時，他們乘機把署名「中台同志會」的宣傳印刷品，分送給當地的台灣留學生。此事經日本在廈門的領事館通報後，台灣總督府警務局立即展開蒐證工作；這時候，它又接獲警視廳的通知：七月上旬，上海方面寄了〈中台同志會成立宣言〉、〈中台同志會簡章〉及〈中台同志會同志會六·一七紀念告民

眾書》不妥印刷品，共一百九十幾份，給住在東京市外代代幡町幡谷，原籍羅東街的東亞商校學生藍阿嬰。台灣總督府警務當局綜合上述情報後，立即飭令台北州特高課會同羅東郡警察局，於七月卅一日清晨包圍吳麗水、李振芳與藍煥呈的家宅，嚴加搜查。結果，在吳麗水家搜出以下「證物」：一、一九二六年三月十九日，以中台同志會籌備委員會名義寄出的《中台同志會成立大會通知書》。二、一九二六年七月十日，中台同志會執行委員會派任吳麗水在台灣推行會務及進行募捐活動的代表證明書。三、吳麗水個人的日記本，其中記載了吳麗水參與中台同志會的事實有——出席中台同志會委員會，討論「五卅」紀念運動的有關問題，決定張貼宣傳海報；修改中台同志會宣言書，並送麗華印刷廠付印；六月三日召開執委會，協商有關台灣始政紀念日的鬥爭活動等。另外，在李振芳家則搜出吳麗水、藍煥呈、楊如松、陳招松、黃天海及李振芳等六人七月廿三日的台灣分部籌組會議的議事紀錄。

日本警方依此「證物」而檢舉李振芳、吳麗水等六人，把他們移送台北地方法院檢察處偵查。另外，日本警方也檢舉了於七月廿六日回台的上海大學學生何景寮、蔡孝乾，以及廈門大學學生黃和氣。據一九二六年（大正十五年）發刊的《台灣民報》第一百十八號報導，蔡孝乾是在八月二日早上被捕的，因為罪證不足，午後就放了出來。

台北地方法院預審庭於一九二七年二月廿二日預審終結，主謀者吳麗水、李振芳、藍煥呈被提起公訴，其餘三人則因證據不充分，予以不起訴處分。

違反台灣治安維持法

四月廿一日早上十時，台北地方法院對「中台同志會治安維持法違反事件」的三名被告：羅東郡羅東街的吳麗水（廿三歲）與藍煥呈（廿四歲），以及同郡冬山庄的李振芳（廿四歲），開第一回的公判庭。由於這是日本統治者第一次以〈治安維持法〉檢舉台灣的社會運動者，因此法庭內外聚集了大量聲援的群眾。

儘管他們三人已在獄中囚禁了九個多月，但當天出庭時，他們仍然元氣充足。其中，李振芳面色顯示了獄中人的蒼白特色，而吳麗水與藍煥呈兩人的面色卻很有血氣。判官首先針對他們預審時的供詞對吳麗水說：「你說起初中台同志會的目的是要謀中日親善。我想你們並不是謀中日親善，而是謀中台親善，對不對？」接著，判官又說：「你們對警官所說『因為台灣自被日本占領以後，在經濟上、政治上、民族上，受盡三重壓迫。為要脫離帝國主義台灣統治的這些痛苦，所以企圖台灣獨立的運動。其方法是：第一、對島內實行階級鬥爭。第二、引導中國革命勢力進來台灣活動。第三、做俄國共產黨的組織和方法實行獨立運動。』這些話是真的嗎？」

「不是！」吳麗水當庭否認。

判官冷笑一聲，然後說：「警官豈有亂造口供之理。」

公判的結果因為沒有中台同志會是他們三人主謀的證據，所以對三人的事實審問，始終不得要領。吳麗水等三人則異口同聲地堅持說，「中台同志會起初的宗旨在謀中日親善，促進中台文化的接近，因為這宗旨是好的，所以加入。至於它後來變更宗旨為『台灣獨立』，那時我們就退會了……。」

第一回的公判庭就這樣草草結束。

四月廿八日，繼續開庭。當天除了檢察官的論告求刑之外，還有被告辯護人的辯論。傍聽的民眾仍然非常多。早上十一點開庭，除了檢察官之外，還有裁判長與兩名判官合議。庭訊首先由檢察官林見略述論告及求刑的理由與結果。他說：

當本件搜查之初為同胞的一人，是希望為一種的兒戲事，但是不幸事實的證據卻很確然，究竟其進行已到那邊是個很要注意的。被告的犯罪地是在中國，而其同志全部是學生與教師，或者說本件是單純的學生的討論會，但是所押收的證據是很可怕的。幸得發生地是在中國，不是直接在台灣，所以稍可安心。

試觀中國的思想界是非常的混亂，不得以都會的程度為標準，本職亦曾久在中國，對地方樸實的農民很有同情，有識者應該講究方法去指導才是。但是中台同志會的主旨果合於情理嗎？況且被告等是由父兄供給學資求學的熱血青年，倘若失錯一步就甚危險的，所以是要警戒其將來。至於證據是極明瞭，又且如藍煥呈在警察調查的時候，極有志士仁人的態度，甚至有死的覺悟，本職見此甚為駭怕，想若有好機會當要想懇說服才是。

至於罪的量定，幸得是發現很早，未及影響過大，對此點可得酌量，故對被告等各求刑懲役三個月。

此外，針對吳麗水與藍煥呈兩人違反渡華旅券規則之事，各處罰金二十圓。

檢察官報告之後，辯護士永山立即起來為吳麗水等三人辯護。其要旨大抵如下：

本件是關係思想的問題，所以要酌量周圍的事件才是。如檢察官所說的中國的思想

想是很混沌，又且受外國的壓迫，所以一切的戰爭，沒有實力彈丸而以口頭的宣傳解決，為此英國過去的基礎也崩壞了。

就中可嘆的對日感情的不好，在上海南京各地最多奇異思想的人雜在其間，青年學生動不動就受其影響，在如此的地方被告等受種種的活動宣傳是極容易的。抱排日思想的中國人以台灣學生為同志，要把握排日的材料而親近台灣學生，這是極當然的事。對此被動的青年學生應該是要以溫情對待，故此檢事的求刑未免過酷，裁判長當以諄諄的諭示使他們能的（夠）回心才是。

至於旅券的問題在台灣的人是最抱不平的，由日本往中國的時（候）是不能給照，這是制度的缺陷，當然是不能罰金的，故此對旅券的問題也當判作無罪才是。

另一名辯護士安保也接著辯護說：

先就結論而言，本件不該當於治安維持法，又不當旅券規則的違反，故此雙方盡要判為無罪。

治安維持法的第一條是規定要處罰變革國體及否認私有財產制為目的的。在此最要注意的是不可將國體與政體混同，但是台灣的警察都是將這觀念混同，所以斷本件為治安維持法的違反。日本的國體雖是萬世一系的君主國，但是政體是指政治的樣式，變改政治的樣式是不該當治安維持法第一條所規定的。

然而在警察卻沒有發見事件是在於何處發生，只據家宅搜查所發見的宣傳單、在宣傳單所言的是朝憲紊亂的言辭，不過是要改政府——政治的樣式——並不是要改變國體的。在被告不過是要發布朝憲紊亂的宣傳單而已。故若要罰或者以朝憲紊亂與出

版法違反較為合理，但是這也是在事前就被檢舉了，並沒有成立罪的。

若以中台同志會為要變革國體，此是未免太過邪推，被告在南京的中台同志會與同民族的中國人組織的，被告是說以圖中日親善為宗旨的，不過是一個學生的懇談會而已。在會則上雖有言及政治的經濟的自由平等，這個與變改國體有何干係呢？

試讀宣傳單完全是對台灣政治的不平，言論其他的不自由憤慨，而在中國方面是痛罵日本的帝國主義而已，並沒有違反治安維持法是極明瞭的。故此我斷本件的中台同志會設立的當初全然沒有改革國體的宗旨，而後來也沒有變改國體的證據。

至於旅券的問題為司法官的檢事，即刻變為立法官說話了，在何處有由日本往中國要旅券的規則嗎？斷不可將法律放任的行為誤作違法的行為才是了。

最後，裁判長於中午十二點廿分宣布閉庭。

五月十二日，早上十一點，違反治安維持法的中台同志會事件，在台北地方法院第一法庭，由同一個裁判長宣判。

吳麗水 懲役三年，罰金廿圓。

李振芳 懲役三年。

藍煥呈 懲役二年，罰金廿圓。

台北地方法院刑庭合議部判決吳麗水等人的理由大致是：

一、查前記被告乃於一九二六年三月在南京與人合謀組織中台同志會，將以革命方法使台灣完全脫離日本帝國統治，圖謀台灣復歸中國，以便實現解放台灣民眾，茲為達到此

目的乃企圖召集在南京的中台人士開會，提倡組織中台同志會，其後因事件被發覺，遂未能達其目的。

二、被告李振芳、吳麗水、藍煥呈共謀發表宣言、傳單，從事革命工作之煽動行為。

三、查本案所關各作內容均以羅列矯激之文句，主倡參加中國革命，並接受中國民眾的支持，主張聯合中台民眾起來，實行打倒日本帝國主義而且圖謀欲將台灣脫離日本帝國統治，似便台灣獨立或歸中國，鼓吹革命，企圖變革日本帝國之國體等情。

在審判告一段落後，裁判長問三名被告：「你們還有什麼話要話嗎？」他們一致表示不服，並且要上訴。李振芳更進一步地對日本裁判長說：「台灣本來就是中國的領土，台灣的民眾就是中國的民眾，日本以武力佔據台灣，剝削台灣民眾一切言論、結社、出版自由，以殖民地政策置台灣民眾於水深火熱之中，因此大感不服，才連絡海內外同志，群起反抗日本帝國主義統治，圖謀台灣民眾解放，是正當的，豈有犯法之理。」

吳麗水上訴不久即撤回服刑。九月十六日，李振芳與藍煥呈的上訴案，宣告維持原判。李振芳立即服刑，藍煥呈仍然不死心，繼續提出上訴，十一月十九日，上訴再一次被駁回。

在南京成立的中台同志會的運動，至此也告一段落。

第五節 在廣州

廣東是國共第一次合作的革命統一戰線發動國民革命的根據地。因此，當時在當地的台灣學生反日運動必然深受當時當地的革命局勢與氣氛影響。為了理解在廣東的台灣學生運動，我們有必要先進一步理解當時的廣東局勢。

中共一大（一九二一年七月）後，為集中力量領導工人運動，而於八月在上海成立了中國勞動組合書記部，其後廣州及其他城市也都設立了分部，以加強全國各大城市工人運動的聯繫、協調和統一行動。通過這樣那樣的努力，中國工人運動很快出現了新面貌，各地工人罷工不斷發生。

為了適應工人運動高漲形勢的需要，一九二二年的「五一」節，由中國勞動組合書記部發起，在廣州召開第一次全國勞動大會。大會接受了共產黨提出的：「打倒帝國主義」、「打倒軍閥」的口號；通過了罷工援助、全國總工會組織原則等決議案……。這次大會促進了中國工人階級的團結，也推動了工人運動的發展。

此外，為了積極開展青年運動，中共還在一九二〇年下半年，在北京、廣州、長沙、武漢等地相繼建立了社會主義青年團。但是，由於團員成分比較複雜，又缺乏領導幹部，不少地方的團組織實際處於停頓狀態。一九二二年一月，張太雷受中共和少共國際委託，重建社會主義青年團。五月，中國社會主義青年團第一次代表大會在廣州舉行，大會通過了青年團的〈綱領〉。從此，青年團成為中共領導下的思想上、政治上和組織上統一的革

命組統，積極開展青年運動。

一九二二年七月，中共二大在上海召開，大會發表的宣言指出，第一次世界大戰和十月革命以後，世界已劃分為帝國主義和無產階級與被壓迫民族兩大營壘；中國已經成為帝國主義共同宰割的最大殖民地，中國人民的解放運動必須和世界革命運動聯合起來，才能取得勝利；宣言著重分析了中國的社會性質是「半殖民半封建」的社會，並且指出革命對象是帝國主義和封建軍閥，現階段中國革命的性質是民主主義革命，革命的基本動力是工人、農民和小資產階級、民族資產階級的聯合戰線。

第一次國共合作

二大以後，回莫斯科述職，並向共產國際提出國共合作建議獲得採納的共產國際代表馬林，返抵中國。中共中央隨即在杭州西湖舉行特別會議，專門討論與國民黨合作，建立統一戰線的問題。馬林在會上傳達了共產國際的指示，堅決主張中共黨員以個人身分加入國民黨，以建立國共合作的統一戰線。會議經過兩天激烈的討論，最後決定：在孫中山按民主主義原則改組國民黨的條件下，中共黨員及社會主義青年團可以以個人名義加入國民黨。

西湖會議後，中共中央先後派李大釗、陳獨秀和林伯渠等，同孫中山及國民黨其他領導人在上海會晤，向孫中山正式說明中共關於實行兩黨合作，建立革命統一戰線的主張和具體途徑。辛亥革命後，堅持民主主義立場，進行過「二次革命」、倒袁鬥爭及護法運動等多次奮鬥，卻都先後遭到失敗而處於極度苦悶之中的孫中山欣然贊同。隨即，李大釗、陳獨秀、蔡和森、張國燾、張太雷等中共中央領導人，先後以個人名義加入國民黨。

然而，當時中共黨內的多數人只贊成同國民黨建立民主革命的聯合戰線，對於加入國民黨的組織還抱有懷疑。後來，一九二三年二月京滬鐵路工人的罷工，卻於七日當天在漢口、長辛店、鄭州等地遭到吳佩孚的血腥屠殺。「二七慘案」的發生使中國共產黨人對於建立革命統一戰線迫切性的認識有了進一步的增加。同年五月，馬林又帶來共產國際於一月時作出的〈關於中國共產黨與國民黨的關係問題的決議〉。決議指出：「中國唯一重大的民族革命集團是國民黨」，「在目前條件下，中國共產黨黨員留在國民黨內是適宜的」。因此，為了進一步統一全黨思想，妥善解決與國民黨合作的問題，正式制定統一戰線方針，中國共產黨於一九二三年六月在廣州召開第三次全國代表大會。經過代表們激烈的討論和爭辯，大會通過〈關於國民運動及國民黨問題的決議案〉，制定了與孫中山領導的國民黨建立革命統一戰線的方針、政策，從而大大推動了第一次國共合作的形成。

另一方面，孫中山也開始了改組國民黨的工作。一九二二年九月，他在上海召開國民黨改進黨務會議，指定包括共產黨人陳獨秀在內的九人為國民黨黨務改進案起草委員。一九二三年元旦，孫中山發布〈中國國民黨宣言〉，提出革命要依靠工農以及反對帝國主義、修改不平等條約的思想；同月廿六日，孫中山在上海會見蘇俄政府特使越飛之後，發表了〈孫文越飛宣言〉，公開揭示了聯俄政策。

同年二月，孫中山得到楊希閔、劉震寰滇桂軍的支持，回到廣州；並且在共產黨人的合作下，大大加快了國民黨改組的步伐。

一九二三年八月，孫中山委派以蔣介石為首，有共產黨人張太雷等參加的「孫逸仙博士代表團」赴蘇俄考察黨、政、軍組織情況。不久，蘇俄政府應孫中山邀請，派鮑羅廷來

華，十月，孫中山委任他為國民黨組織教練員，參加並指導國民黨改組工作。同一個時期，中共中央和廣東區委、廣東團委舉行聯席會議，決定在廣東成立「國民運動委員會」，以推動正在進行的國民黨改組工作。孫中山接著又委派廖仲愷和共產黨人譚平山等九人組成國民黨臨時中央執委會，李大釗為候補委員，鮑羅廷為顧問，全面負責改組的各項準備工作。十一月廿五日，臨時中央執委會發表〈中國國民黨改組宣言〉，進一步說明國民黨改組的必要性和改組的基本要求。臨時中央執委會還認真討論了國民黨全國代表大會召開日期，大會宣言和黨綱黨章草案，並具體部署了代表的推選等事宜。至此，完成了國民黨改組的準備工作。

孫中山改組國民黨的決策雖然得到許多國民黨人，特別是廖仲愷等國民黨左派的大力贊助，但也引起國民黨內右翼分子的阻撓和反對。就在改組宣言發表的當天，與孫中山有著較深私人情誼的鄧澤如、林宜勉等十一人，以國民黨廣東支部名義上書孫中山，彈劾共產黨。但孫中山不但親筆批駁了鄧等人的陳詞，而且重申國民黨改組和聯共的必要性。

這樣，在孫中山與國民黨左派義無反顧堅持聯俄、聯共的立場保證之下，一九二四年一月廿日至卅日，中國國民黨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在廣州國立高等師範學校召開。大會經過曲折迂迴的過程，終於通過了孫中山提出的〈中國國民黨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宣言〉。孫中山通過這份宣言重新解釋了三民主義，把舊三民主義發展為具有反帝、反封建內容的新三民主義，為第一次國共合作的革命統一戰線奠定了理論基礎，使國共兩黨有一個共同的政治綱領。同時，大會在討論〈中國國民黨章程〉時，經過激烈的辯論，最後通過了同意共產黨人和青年團員以個人身分加入國民黨的決議；並決議要努力在工農中發展黨員，

堅決淘汰不純分子，整頓各級組織，嚴明黨的紀律。

中國國民黨從此由一個資產階級性的政黨開始轉變為工人、農民、城市小資產階級和資產階級的民主革命聯盟，從而成為國共合作的革命統一戰線的組織形式。並且為新的革命高潮的到來，從政治上、組織上和政策上奠定了基礎。

廣東根據地的統一

孫中山在國民黨一大上正式決定在廣州市郊黃埔島上創辦中國國民黨陸軍軍官學校（簡稱黃埔軍校）。一九二四年五月，在共和蘇政府的幫助下，黃埔軍校正式成立，第一期學生入學上課。六月十六日舉行了開學典禮。孫中山自任軍校總理，蔣介石為校長，廖仲愷為黨代表，組成校本部最高領導，直屬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會。中國共產黨也先後派遣周恩來、惲代英、蕭楚女、熊雄、聶榮臻等到軍校擔任各項負責工作；並要求各地黨組織選派共產黨員、青年團員和優秀青年報考軍校。在國民黨左派和共產黨人的共同努力下，軍校後來培養了一批優秀的軍事、政治人材，推動了革命武裝的建立，為日後廣東革命根據地的統一和北伐戰爭的勝利進展作出了重要貢獻。

國共合作的建立也直接推動了工農運動的恢復和發展。身任國民黨中央工人部長的廖仲愷積極貫徹孫中山的三大革命政策，大力支持工人鬥爭。一九二四年五月，經過共產黨人的努力，廣州工人召開代表大會。廖仲愷主持了開幕式。大會議決成立廣州工人代表執行委員會，建立工團軍。七月，廣州沙面數千名工人舉行政治大罷工，反對英、法帝國主義限制中國人自由出入沙面租界的新警律。罷工在廣州工人、學生和全國各地群眾的支持

下，堅持一個多月，終於取得完全的勝利。這次罷工推動了各地工人運動的發展，成為中國工人運動由低潮轉向高潮的信號。

與此同時，由共產黨人擔任部長的國民黨中央農民部，派遣特派員分赴廣東各地開展農民運動，並於一九二四年七月在廣州創辦了農民運動講習所，由國民黨中央農民部秘書彭湃（共產黨員）擔任講習所第一任主任，教員也大部份是共產黨員；孫中山、廖仲愷都曾到講習所發表演說。農講所培養了一大批農民運動的骨幹。在廣東，大部分縣的農民迅速行動起來，組織農民協會，建立農民自衛軍，開展抗捐鬥爭。

另一方面，國共合作的革命統一戰線建立以後，以英國匯豐銀行廣州分行買辦陳廉伯和佛山大地主陳恭受為首的地主買辦階級的廣州商團，在英帝國主義支持下，打著商界武裝自己的幌子，建立商團軍，陰謀發動武裝暴亂，顛覆廣東革命政府。一九二四年十月，孫中山成立了以他為首的革命委員會，作為鎮壓商團叛亂的權力機關。十月十五日，廣東政府軍在廣州的工團軍、農民自衛軍、黃埔學生軍的有力配合和廣大群眾的熱情支援下，全殲了商團軍。

廣州商團叛亂的平定，解除了廣東革命政府的一個「心腹之患」，有力地打擊了英帝國主義和地主買辦階級，使廣東革命政權得到初步穩定，並為廣東根據地的統一創造了條件。

雖然這樣，廣東的局勢仍然不很穩固。這時候，廣東革命根據地的範圍不大，廣州四周還被一些大小軍閥所占據，特別是盤踞東江的軍閥陳炯明，對廣東革命政權是最大的威脅。另外，混跡在廣東革命政府、軍隊內部的滇、桂軍閥楊希閔、劉震寰，表面上擁護孫中山，暗地卻和帝國主義、北洋軍閥以及陳炯明相勾結，伺機推翻廣東革命政府。

一九二四年十一月，陳炯明趁孫中山北上之機，自封「救粵軍總司令」，準備進攻廣州。廣東革命政府於是決定進行東征，組織了以黃埔軍校教導一團、二團和第二期學生為主力的東征軍，由校長蔣介石統領；軍校政治部主任周恩來兼任東征軍政治部主任，負責戰時政治工作；蘇聯軍事總顧問加倫將軍也參加了東征，幫助制定作戰計劃。一九二五年二月，東征軍整裝出征。在東江農民的積極支援下，東征軍一路告捷。正當東征軍乘勝追擊，準備一舉圍攻陳炯明的老巢惠州時，四月，楊希閔、劉震寰與英帝國主義和北洋軍閥段祺瑞的代表密談後，在廣州發動武裝叛亂，控制了廣州市區，廣東革命政府被迫撤退到黃埔港。廖仲愷等國民黨左派和中共廣東區委堅決主張討伐楊、劉，決定撤回東征的黃埔學生軍，回師廣州，平定叛亂。廣州電廠和廣九、粵漢等鐵路的工人於是相繼舉行罷工，斷電斷水斷絕交通，海員工人則在各河道及海口堵截楊、劉的援兵；市郊農民也紛紛起來，斷絕叛軍後路。在廣大工農群眾的支持下，廣東革命軍於六月十二日發動總攻，叛軍全線迅速崩潰，楊希閔、劉震寰由沙面逃往香港。廣州局勢轉危為安。

楊、劉叛亂平定後，國民黨中央決定把大元帥制的軍政府，改組為委員制的國民政府。一九二五年七月一日，中華民國國民政府在廣州正式成立。由汪精衛任政府主席，聘請鮑羅廷為高等顧問。國民政府發表宣言，表示要履行大元帥孫中山（三月十二日病逝北京）的遺囑，廢除一切不平等條約，召集國民會議，推翻軍閥統治。

國民政府設立了軍事委員會；在八月，將所轄各軍隊統一改編為國民革命軍。同一時期，它還進行了行政、民政和財政的整頓；使廣東全省的軍政、財政、民政逐漸統一於國

民政府的直接領導之下，廣東全省的財經狀況也大為好轉。

一九二五年九月，陳炯明乘著東征軍主力回師廣州，討伐楊、劉時，又在英帝國主義與段祺瑞的支撐下，重新占領了東江一帶。盤踞在廣東南部的鄧本殷也予以配合，形成對廣州的夾擊形勢。

一九二五年十月，國民革命軍舉行第二次東征。在東江農民的支持下，經過激烈戰鬥，東征軍於十月十四日攻占了陳炯明的老巢惠州，然後分路追擊，完全收復了東江，取得第二次東征的徹底勝利。

一九二六年二月，經過近四個月的作戰，國民政府的南征軍，終於掃蕩了退守海南島的鄧本殷殘部。至此，國民革命軍全部肅清了廣東境內的軍閥勢力，統一了廣東全省，廣東革命根據地大大鞏固，為後來的北伐出師和工農運動的發展奠定了基礎。

在廣東的台灣學生運動，基本上就是在中國國民黨「聯俄、容共、扶助工農」三大政策影響的歷史條件下逐漸發展起來的；同時，它也隨著蔣介石在一九二七年四月展開的「清黨」行動而潰滅。由於廣州是中國革命的發祥地，同時也是策源地，所以革命團體的組織和實踐運動方式都和別地方不同，這裡比較熱烈而且更有公開而具體的行動。更由於廣東是蔣介石實行北伐的根據地，同時也是中國共產黨工農運動的勢力範圍；因此，日本警務當局據此以為在廣東的台灣學生的革命熱情與共產主義的傾向，自然與其他地方的台灣學生大異其趣。

一、廣東台灣學生聯合會

國民黨的改組，以及黃埔陸軍軍官學校的成立，對整個中國局勢雖然還沒有發生絕對的影響，但是，它卻深深地激動了青年學生們的革命熱情，許多青年學生們都急不容緩地奔往廣州去投軍。

一九二五年冬天，在廣東的台灣學生運動主要核心之一的張深切（上海商務印書館附設國語師範學校畢業），也在生意失敗的情況下，「迫不得已只好投廣州去參加革命」。張深切在寒冬雪夜的黃埔江邊搭上開往廣州的「醒獅」輪。這時候，他是確實抱著「臨難無悔」、「誓死不歸」的「荊軻之志」，準備「到廣州去討死」，「做一個無名英雄」。

到了廣州，張深切先寄居於朋友宿舍，和就讀中山大學醫學院的同鄉洪紹潭、郭德欽等住在一起；因而也認識了不少中山大學與黃埔軍校的學生。這些學生連同廣州其他大學的台灣學生經常聚會，討論的人材已經夠了，他們大多反對張深切入黃埔軍官學校。當時，台灣學生已有李肇基（友邦）在一九二四年入黃埔二期（一說存疑）；第三期也有林文騰、黃濟英、陳紹馥等；第四期有張士德、廖善郎；在校學生還有陳辰同、楊春錦、陳旺穰、林萬振、溫而勵等人。另外，空軍有謝文達，軍醫有張美統；但還沒有人研究政治，所以勸張深切研究政治。郭德欽、洪紹潭及嶺南大學的張月澄等人也都表示贊成，並且約定將跟隨張深切之後，轉入中山大學法學院。議論一決，眾人就按照計劃進行。

他們一方面準備中山大學的入學與轉學考試，一方面開始活動，訪問各方面的要人，舉凡肯支援他們的，他們都無不歡迎。據張深切回憶，當時最熱心指導他們的，右派有戴

季陶，左派有施存統等人。

這時候，在張深切眼裡，廣州的「青年們都好像生龍活虎，自由發揮其能耐，拚命出盡其實力，造成全市為一團革命的火球，光芒萬丈，輝煌燦爛，融化萬眾為一心……凡呼吸著廣州空氣的人，沒有一個不革命」。就在時局的要求與時勢的潮流所孕育的革命空氣之下，在廣州的台灣青年自然不能視若無睹，因而都崛起奮起了。為了建立台灣的抗日革命組織，為了協助中國的北伐革命，他們幾乎為籌組在廣東的台灣學生聯合會而天天開會，討論方策。

張月澄的〈台灣痛史〉

一九二六年六月十六日起，一連三天，廣東《民國日報》刊載了一篇題為〈台灣痛史——一個台灣人告中國同胞書〉的文章，作者是為組成台灣學生聯合會而到處奔走的嶺南大學（後來轉入中山大學法科政治系）學生張月澄（台北人）。

張月澄的文章首先提到：「一八九五年，由於滿清政府締結馬關條約，台灣四百萬同胞遂被出賣為日本帝國主義者的奴隸。當時，我們台灣的中國民眾極為痛憤，立即宣布獨立，創建『台灣民主國』。這是卅一年前的五月廿四日。這一天，是遠東被壓迫民族解放革命運動史上出現的第一個民主共和國的紀念日。然而，這一熱烈的運動在既不得天時，又不得人和，前無救兵，後無糧餉的情形下，竟在日本帝國主義者的毒砲機槍之前，遭到掃蕩擊垮的厄運。從這一天起，我台灣絢爛美麗的大地就被三島的倭奴所併吞。如今，已過了卅一年的歲月。」

「回想起來，這些日子無一不是台灣民族革命運動的血淚史，無一不是遠東弱小民族追求解放的慘史。我們台灣愛國青年為反抗日本而掀起的革命運動，前後已達十四次之多……」

張月澄接著一一舉出羅福星事件，余清芳事件，以及其他反日事件的史例。然後，他又說：「這是世界革命裁判史上未曾有的慘虐史。想到這些革命同志流血犧牲的慘史，其傷痛令人永遠不能忘懷。這樣，到了一九二六年的今天，我們的一切已被日本帝國主義蹂躪壓制而摧殘無餘。如今，其毒計更日甚一日，運用政治、經濟、文化等三種侵略手段，欲完全吞滅台灣。」

「親愛的中國同胞們！請看一下它的侵略事蹟吧！」張月澄沉痛地向中國同胞呼籲，然後介紹台灣人民最近所展開的解放運動——台灣議會設置請願運動。

張月澄說：「自歐戰以來，在日本帝國主義鐵蹄下的台灣民眾頓時覺醒，最近，《台灣民報》刊載了青年男女為自由而奮鬥與痛罵日本政府的革命思想，台灣同胞革命運動的戰線正在擴大，其中心問題則為爭取參政權。它以台灣議會設置為訴求手段，正在全力進行各種活動。」

接著，張月澄談到台灣議會設置請願運動的狀況，並抨擊台灣總督府對它的壓制；同時也勉勵革命領袖、學者、學生、農民、商人各階級應聯合起來，甘冒犧牲，誓為台灣議會促進運動而盡力奪取政權為期許。此外，他又敘述了台灣政治、經濟、文化，以及社會運動的概況，並進一步提倡革新所有的運動，煽動這些運動團體統一起來，形成聯合陣線，以對抗日本帝國主義。然後他總結說，這些運動的成功並不在遠等等。

最後，張月澄更大力呼籲中國同胞支援台灣的議會設置請願運動，因為它是中國民族解放革命運動的一環——

親愛的同胞們，台灣四百萬同胞正遭受著日本的壓迫。台灣四百萬同胞之遭受壓迫，正是中國人的遭受壓迫。我們要反抗日本帝國主義，讓鮮紅的熱血直流。這將成為中國民族解放的革命運動。直到革命獲得成功為止，我們台灣民眾將不惜生命，不怕犧牲，發揚革命精神，循著「壓迫愈大，反抗亦將愈大」的原理，進行戰鬥，爭取自由、平等到底。我們的運動能夠早一日壯大，中國民族解放的完成亦可早一天來臨。中國同胞們，請諸位若能協力一致，支援我們的「台灣議會」，我們將有奪回政權的一日，台灣內政的獨立便可實現。內政的獨立如能實現便能摧毀日本帝國主義的機關。換句話說：台灣議會成立之日，便是日本帝國主義失敗之日，同時也就是我們中國民族解放運動成功之日矣。

〈台灣痛史〉最後以下面五句口號結束。

實現三民主義！

打倒日本帝國主義！

促成台灣議會！

中國國民革命努力成功萬歲！

促進世界弱小民族解放成功萬歲！

在〈里程碑〉一書中，張深切所描述的張月澄是「最活躍的」同志，因為他「有錢，

所以富有活動力」。此外，「他多才多藝，能說一口流利的廣東話和英語，面容有點似托洛茨基，如果除掉了少爺脾氣，便是一個好革命家」。

〈台灣痛史〉刊載完十天後，一些台籍學生又從廣州昌興街的了卜圖書館，秘密向台灣內寄出一份楊成志（可能是張月澄的化名）所編，題為〈毋忘台灣〉的小冊子。在小冊子卷首的〈引言〉中，編者楊成志說明了編輯這本小冊子的三個目的。「第一，是要把『台灣民主國』獨立紀念日——五·二四——作為我們的慶祝日；第二，是向中國民眾介紹被日本帝國主義併吞的四百萬台灣民眾的慘狀，讓我們的同胞得知其詳；第三，是介紹目前台灣政治運動的中心——台灣議會設置請願運動的內容，籲請中國的同胞的援助，並喚起國人注意。」此外，它還收錄了張月澄刊登在〈民國日報〉的〈台灣痛史〉，以及中國左翼作家郭沫若的序文與楊成志以〈一個台灣人告中國同胞書讀後有感〉為題的論文等。

在日警當局看來，這些文章都是用激烈的語調煽動台灣革命的偏激不當的文書。然而，通過這些宣傳煽動，再加上當時的政局影響，在廣州的台灣留學生對中國國民革命的憧憬與台灣革命冀望於是逐漸升高，並且在當時廣州中山大學校長戴傳賢（字季陶，號天仇，國民黨右派的驍將）與該校教授及中國學生的指導下，組成一個台灣人團體。

台灣學生聯合會

一九二七年（昭和二年）一月十六日〈台灣民報〉第一百四十號的「時事」欄，報導了一則有關「廣州台灣學生的活動」的記事。該記事說：「自北伐軍得勝以來，因受革命空氣的影響，台灣學生到廣東就學日多一日。現在有的在國立大學，有的在外人經營的大、

中、小學，有的在軍事、政治學校求學，研究學術、軍事政治及社會運動，男女皆有，實是很大進步。最近聞留廣學生因欲連絡同鄉感情並促進台灣文化啟發起見，於昨（一九二六年）十二月十九日在廣州市開了「廣州台灣學生聯合會」籌備大會。」當天，洪紹潭、張月澄、郭德金、張深切、吳文身、盧炳欽、林文騰、簡錦銘、林仲節等廿幾名學生代表，聚集在廣州中山大學，同時在黃埔軍官學校政治部主任孫炳文（共產黨人）、中國國民黨廣東省黨部與廣州市黨部各主任，以及中山大學校長戴天仇等列席之下，舉行廣州台灣學生聯合會的成立大會。

會中，洪紹潭（據張深切說，他是一位厚道的青年。只管讀書，不願意參加積極的革命運動，但還熱心從旁支援）首先起來說明組織學生聯合會的目的：「台灣是中國的土地。台灣人是中國人。然則，這個台灣和這些中國人為何要受日本帝國主義的壓迫而在水深火熱中煎熬呢？為了解救受苦的台灣人，我們需要研究革命。而為了革命的完成，我們認為最佳而且必須的條件是台灣人同心協力。因此，在此地組織學生聯合會，用以聯合各地的學生，以便燃起革命的烽火。希望各位同學為達成此一目的而努力不懈，自許為革命的先鋒，務必一致協力奮鬥。」

接著，由林文騰（號劍亭，歲數最大，當時是軍校第三期生，為人耿介而忠厚，具有老大哥的風度。）說明該聯合會的組織過程；負責組織工作的郭德金則解釋會章草案的重要項目。會中同時決定監察部、交際部、文牘部、財政部與總部的掌管事項，並選出洪紹潭、張深切、郭德金、張月澄與林文騰等人為委員。聯合會決定：對內，每月暫時在中山大學內舉辦一次研究會、演說會或討論會等事項；對外則儘速與國民政府轄下的各地學界

交涉，關於學術、軍事、政治、婦女運動、農民運動、華僑運動、工人運動的學習，各界學校機關應特別優待來廣的台灣男女學生，以養成將來從事社會運動的人材（據張深切說，因為朝鮮人對中國革命有貢獻，所以在廣州留學可享免費的優待；而台灣人絲毫沒有革命成績，所以不能享受同等的待遇。）；同時，該會更歡迎台灣的青年繼續到廣東留學。為此，它在廣州嶺南大學內設有台灣學生聯合會辦事處，以應各界的詢問，通信等。

戴季陶：《孫中山與台灣》

廣東台灣學生聯合會的會員，大多是大、中學生及黃埔軍校學生，因此，他們相當受到戴季陶的重視，並且極力要把聯合會掌握在自己的思想影響之下。戴季陶早年參加過同盟會，做過孫中山護法軍政府的秘書長；一九二四年，在國民黨一全大會上，當選為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會委員。在國共合作正式建立之前，戴季陶不但反對孫中山改組國民黨，更反對中共黨員加入國民黨。國共合作正式建立之後，他曾一度表示擁護孫中山的聯共政策。而且於一九二五年五月起草了國民黨一屆三中全會關於容納共產黨員加入國民黨的訓令。然而，當此訓令的墨跡未乾時，他便因為中國共產黨工農群眾運動得到恢復與發展的形勢而否定「無產階級領導權」；此外，一九二五年三月十二日孫中山逝世後，在國民黨一時失去領導核心的歷史背景下，戴季陶便以闡述孫中山的思想為名，於同年夏天在上海先後刊行了《孫文主義之哲學的基礎》與《國民革命與中國國民黨》。這兩本小冊子，連同他同年五月在廣州發表的《民主哲學系統表》，構成了較完整的反共理論體系，同時也標識著以「反對孫中山的聯共政策」和「主張國共分立」為核心的「戴季陶主義」的形成。

從這一主張出發，他發起了一個所謂國民黨的「獨立運動」。同時，在「戴季陶主義」的旗幟下，國民黨新老右派結成了反共聯盟，並且在上海、北京、廣州等地發動了反共事件。一九二五年十一月廿三日起，以林森、鄒魯、謝持為首的一部分國民黨中央執監委員，在北京西山碧雲寺召開了所謂國民黨一屆四中全會。因為會議在西山舉行，史稱「西山會議」。會議的中心問題是「解決共產派」問題，並且決議開除國民黨的共產派。它的指導思想就是「戴季陶主義」。一九二六年三月廿日發生的「中山艦事件」，以及爾後的「整理黨務案」（一九二六年五月十五日至廿二日廣州召開的國民黨二屆二中全會上由蔣介石所提），也是蔣介石發揮「戴季陶主義」以排斥共產黨，奪取國民黨黨權的鬥爭結果。

另一方面，為了維護和發展國共合作的關係，共產黨人紛紛起來反對「戴季陶主義」，展開一場激烈的思想鬥爭。一九二五年八月，憚代英發表了〈讀〈孫文主義之哲學的基礎〉〉一文，著重批判了戴氏所謂「孫中山的三民主義是繼承了中國固有文化」的論調，和所謂「不相信中國固有文化便不能進行革命」的觀點。同月，陳獨秀在〈給戴季陶的一封信〉中一針見血地指出：「你及你們的根本錯誤，乃是只看見民族鬥爭的需要而看不見階級鬥爭的需要。」九月，瞿秋白發表了題為〈中國國民革命與戴季陶主義〉的文章。他在該文中指出：戴季陶主義「理論上是所謂建立純粹三民主義的中心思想，實際上是反對左派，反對階級鬥爭，反對C·P·的跨黨，甚至於反對C·P·的存在之宣傳。」瞿秋白更進一步指出：「中國無產階級政黨的黨員——C·P·所以加入國民黨，便是因為在已經過去的兩年的時期，國民革命的聯合戰線可以黨內合作的形式去進行。……C·P·所以能加入，亦是由於國民黨的政綱，三民主義的政治經濟要求，能一部分的代表工農

階級的利益。」瞿秋白警告說，如果戴季陶「要在各階級合作的國民黨內，建立所謂絕對的『中心思想』，那就只有一條路：不准工人農民在國民黨中主張階級利益，這就使國民黨完全變成資產階級的政黨。」

除共產黨人外，國民黨左派和一般革命群眾也參加了反對戴季陶主義的鬥爭。戴季陶的小冊子一出版，國民黨江蘇省黨部立即通知各級黨組織批判；同時，致函廣州中央執行委員會，請求查禁戴季陶的小冊子。在廣州、北京、武漢等地，〈國民革命與中國國民黨〉這本小冊子被燒掉數萬冊。

這樣，在共產黨人、國民黨左派與革命群眾的「反對鬥爭」之下，戴季陶主義「當時竟不能收圓滿的效果」。同時，隨著一九二六年以來國共合作統一戰線內部矛盾的敵化，中國共產黨共青團的各級組織，為了堅持反帝反封建的綱領，爭取受到戴季陶主義影響的青年學生，加強對青年學生運動的領導，於是把反對戴季陶主義的鬥爭，作為共青團的最重要的工作。

就在這個歷史階段上，為了拉攏台灣來的青年學生，曾任黃埔軍校政治部主任與政治教官的戴季陶，於一九二七年二月五日，在黃埔軍校政治部，向廣東台灣學生聯合會的台灣青年們發表題為〈孫中山與台灣〉的演講。他說：

今天，有這麼好的機會與各位台灣青年同胞見面，心中不禁湧起兩種情懷。一是悲痛之情，另一則是欣喜之情。

台灣民族是我們中國的民族，台灣領土本來也是中國的領土。日本利用強權和武力奪去我土地，把我台灣同胞當成奴隸。這就是心懷悲痛之情的所以然。

今天親見台灣青年同胞，覺得有一種不可名狀的親愛情感油然而生。這是因為見到諸位熱誠而勇敢的精神有以致之的，這就是心懷欣喜之情的所以然。

台灣民眾就是我們中國的民眾，台灣民眾的團結就是我們民眾的力量。台灣民眾摯愛祖國的熱誠，即是我們民眾革命精神的發揮。

現在，尚沒言及關於我們前途的工作問題，這到底要怎麼做才可以呢？關於這一點，我現在有兩件事情要報告，好讓諸位明白。

第一項報告：

一、民國七年，我們總理孫中山先生在廣東停留期間，由於革命失敗，不得不離開廣東他去。第一站到汕頭，然後經由台灣赴日本。這時，我們總理孫先生心內有一個意圖。也就是順路到台灣，和台灣同胞見見面，趁機發表他的意見，宣傳他的主義，喚起台胞的民族意識，鼓吹台胞的愛國精神。

當總理赴台的消息傳出時，台灣同胞極為高興，準備用萬分的熱誠歡迎他。但日本政府——台灣總督卻拒絕總理和台灣民眾的接觸。不僅總理想宣傳主義的意圖受阻，且他一抵台，總督便表明不允許他在台逗留，甚至利用各種方法阻止他登陸，以防總理在台北和台灣同胞晤面，台灣同胞雖竭誠歡迎總理，但日本卻想盡辦法加以阻礙。

當總理的船抵台時，台灣的日本官憲便派人上船招待總理一行，表示願意幫忙我們赴日本，其意在阻止台灣民眾和總理會見。及至一行登陸，轉赴台北，日本官方卻宣稱：「總理預定急赴神戶，將搭明日往神戶的船。只擬留台一天而已」，敦促總理儘快離台。從這一點，足可知日本政府想要離開台灣同胞和我等革命同志的意圖。

二、日本人士之中有一個和台灣有關係者，名字叫做板垣退助，他在民國四、五年左右，曾發起台灣同化會的組織。該會的主旨，若從我們的民族觀點來說，我們覺得不滿，不過所主張的是比較溫和的民權。……

然而，台灣的日本政府不允許他繼續留台，干涉他的停留乃至他和台灣同胞間的接觸。由是觀之，不但中國國民黨的革命家不能和台灣同胞合作，連對台灣懷有善意的日本人亦不許接觸台灣同胞；由此可知，日本政府及其附從者一派，和台灣民眾的隔閡是愈來愈大了。這種政策之目的祇是在於使台灣民眾永遠接觸不到革命思想的鼓動而已。

第二項報告：

當總理病狀極極沉重時（總理逝世二十日前），我曾經到北京探望他的病。當時，總理向我談起有關日本的若干事。其中，有三項極重要的事。

總理說：「我們對日本，有三個最低限度的主張。一是廢棄日本和中國所締結的一切不平等條約；二是讓台灣及高麗兩民族實行最低限度的自治；三是日本不應反對蘇聯的政治政策，也不阻止蘇聯和台灣及朝鮮的接觸；這是我們最低限度的要求。」

按照總理所表示的意見，可知，我們第一是要取消不平等條約。第二是要援助台灣及朝鮮建立自治政治。第三是要日本不干涉蘇聯與台灣、朝鮮接觸。

由這件事，亦可看出總理雖在病中，卻仍愛護關懷著台灣同志，同時，亦始終留意台灣同胞的革命策略問題。在台灣，我們當前的革命運動，要把目標放在設立議會和自治政府。這就是總理在病中告訴我：「希望把它作為中國達成完全獨立的一種方法。」

今天，我們看到有關台灣的一本小冊子（《毋忘台灣》），讀完它的內容，得知台灣有個議會運動，這是民族運動的第一個步驟。換句話說，這是台灣同胞自發運動第一步，這「議會運動」就是支援中國的民族運動，和總理所說要在台灣設立一個自治政治，其意相同。這可以證明總理在兩年前所談內容的準確性。

諸位台灣青年同胞，台灣是如何和中國發生阻隔的呢？什麼時候發生阻隔的呢？這是我們大家都很明白的。在中日戰爭中，日本給與的打擊究有多大，這也是大家都很熱識的。中國戰敗後，日本提出的條件記載於馬關條約的第一條：「中國承諾，幫助高麗獨立」。這便是高麗日後被日本所亡的前兆。我們也可從這裡看出，日本硬用兵力打敗中國的目的何在。日本政府的政策難道還不是帝國主義的侵略政策嗎？我們應該領悟日本所主張的所謂高麗獨立，其實是日本東方侵略政策的偽裝罷了。

從前總理對一位日本政治家說過：「你們所講的話是要馬上實行的。但互相約束的事卻全未實行，因此，我們不得不反對日本。」由此可謂高麗實際不可能獨立，只有被日本所滅亡。日本滅亡高麗的事實，成為我們的一個歷史教訓。

由是觀之，我們亦可推知台灣同胞的遭遇亦將和高麗一樣。我們很清楚，在台灣中國同胞被日本壓迫虐待的情形委實和高麗並無兩樣。所以，我們主張台灣民族應該獨立。台灣民族獨立運動應該採取的路線是，聯合與台灣同一境遇的朝鮮及我們東方被壓迫民族，以對抗壓迫我們的帝國主義者。這是我們一定要銘記於心的。

日本打敗中國後，主張朝鮮的獨立，然後把它併吞，令其滅亡。又和英國締結同盟，然後，以此同盟為後盾，和俄國開仗。換言之，締結日英同盟的動機是準備日俄

戰爭。結果，由這一仗奪取了庫頁島的一半。我們曉得，今日世界頭號的帝國主義國家是日本和英國。太平洋上到處可見受此二國壓迫的各民族。我們不妨看看受日本壓迫的朝鮮和台灣。我們便可瞭解帝國主義間國際性聯手合作的事實。

為脫離日本帝國主義的壓迫，台灣民眾倡議「台灣議會」，說來也不過是一時的權宜之計而已。那麼，我們台灣民族運動究竟要如何才能獲得成功，要如何才能擊垮世界的帝國主義者呢？答案只有一個，就是團結所有帝國主義下的被壓迫民族及一切弱小民族，組成一條堅強的聯合陣線，為打倒帝國主義而共同奮鬥。此外別無他策。換言之，如果我們台灣、印度、菲律賓及全世界弱小民族不能聯合、擴大戰線，積極向我們的敵人進攻的話，全世界的革命便沒有成功的指望。這是歷史事實啟發我們的教訓。

如各位所周知的，各種各樣的民族運動正發展於東方的印度、朝鮮，西方的南美、土耳其等。為何會產生這些運動呢？這是歐洲大戰後，帝國主義國家內部本身發生種種利害的鬥爭及矛盾的衝突，再加上各地弱小民族受到思想潮流的影響而普遍覺醒的結果。可以說，歐洲大戰終結之際，即為弱小民族解放中國開始之時。

俄國革命的發生是儼然的事實。不論在歷史上或事實上，它的革命是被壓迫民族的解放運動，它所帶來的影響是無比的既大且深。從前俄國的民眾呻吟在羅曼諾夫王朝的壓迫下，如今，在政治上、經濟上、文化上都已經有非常的進步。俄國革命的成就是俄國民族運動的成功。同時，也可以說是世界革命運動初綻的曙光。現代世界的帝國主義者，壓迫無產階級，剝削弱小民族不遺餘力。當歐洲大戰期間，列強帝國主義者依然在歐洲進行政治鬥爭的時候，日本卻代替歐洲，將其武力集中於東方，

壓迫東方所有的弱小民族，分割其殖民地。

第三是國際運動——這是東西兩洋被壓迫階級的運動。這種運動如能以同一精神結合，為打倒帝國主義者而努力的話，我們的希望、我們的成功，亦即我們最後的勝利是可以肯定的。所以，我們必須聯合起來從事鬥爭。總理孫中山先生曾對我們說：不要讓日本阻擋蘇聯跟台灣及朝鮮相互間的聯絡交通。這就是指明我們台灣應和蘇聯交往的意思。這是我們的目標。但我們也不應因為確定這一目標而阻礙台灣議會運動。然則，我們該如何來進行運動呢？我中國民族同志要和台灣同胞和朝鮮聯合起來，共同奮鬥，時時刻刻都朝這個目標努力前進，以實行我們總理的遺訓。我們要求解放，要求全世界被壓迫民族的解放！這是我們一刻不可或忘的。

今天，能和各位見面，本人不勝欣喜。在此，對各位的熱誠表示由衷的歡迎，最後，切望各位努力克盡義務。

戴季陶的這篇講詞後來也被數入廣東台灣革命青年團的機關報——《台灣先鋒》。基本上，他還是在孫中山的「聯俄」政策下，主張台灣的民族解放運動應該「團結所有帝國主義下的被壓迫民族及一切弱小民族，組成一條堅強的聯合陣線，為打倒帝國主義而共同奮鬥」。除此之外，「別無他策」。可以這麼說，他並不否認中國的國民革命，以及殖民地台灣的民族解放中國是世界反帝革命陣線的一環。問題在於，他並沒有提出革命的領導權歸於「無產階級」這一點。因此，他並沒有多談孫中山三大政策中「容共」的這個部份。我們也因而看不出他對中共的態度了。可以說，他與中共的矛盾其實只是爭奪中國國民革命領導權的一個反映！這樣的黨派之爭的暗流在當時也影響了廣東的台灣學生聯合會的分裂。

二、廣東台灣革命青年團

當時，在廣州的台灣學生大都加入中國革命的黨派，其中又以加入國民黨的占多數。學生聯合會成立不久，會員之間即為了「爭奪領導權」而時常發生齟齬，鬧個不休。張深切認為，促使學生會分裂的原因是因為李友邦「沒有學籍的學生不能入學生會，但二十歲以下者不在此限」的主張。張深切的理由是，經「細查結果才知道（吵鬧）主要的目標，在乎攻擊我個人，說我沒有學籍，不該稱學生，更不該擔任學生會的要職，在左右學生會的動向」。張深切於是退出學生聯合會，另與林文騰、張美統等現職軍官和非學生人士組織「台灣革命青年團」。當青年團成立時，張深切也已考上中山大學法科政治系了。隨後郭德欽、洪紹潭與張月澄等人也都通過轉科考試進入中大法科。他們於是一起計劃並推動青年團的活動，吸收了學生會的全體學生，兩個團體儼然成爲一個組織。

一九二七年三月十三日，在中山大學召開的學生聯合會例會中，林文騰提議：為使會員的革命意識更加明確，應該明示該會的主張，同時應廣泛吸收學生以外的人士，把學生聯合會往前推一步，表現為革命團體。大會決議通過重新籌劃一個新團體——廣東台灣革命青年團。同時經由洽商，選出林文騰、郭德金、張深切三人為綱領和會章的起草委員，籌備期定為兩星期。

兩個禮拜後的三月廿七日，林文騰、郭德金、張深切、洪紹潭、張月澄、林洋中、陳辰同、楊春錦、陳思齊等廿多人，在中山大學集會。會上，林文騰等十幾人先後站起來高喊：打倒日本帝國主義，實行台灣革命等口號；同時在聆聽起草委員的綱領、會章草案的

報告後，予以議決通過。大會決定，表面上仍然以學生聯合會為名稱，台灣革命青年團則作為秘密組織，展開活動。

據〈台灣總督府警察沿革志〉的記載，當時青年團的組織系統如左：

總務部長：謝文達。宣傳部／部長：張深切；部員：李肇基（台北，李友邦），陳鳳珠、林劍亭（斗六，林文騰）、黃懷生（台南）、蔣明生（彰化）、吳文身（台南，吳文臣）、簡金木（台南）。外交部／部長：張月澄（台北）；部員：郭德欽（南投）、郭英才（南投）、林萬振（台中）。財政部／部長：洪紹潭（南投）；部員：鄭漢臣（新竹）、張逸霞（台中）。庶務部／部長：陳辰同（台北）；部員：陳旺權（宜蘭）、張文進、李清文、林先漢。調查部／部長：廖啟甫；部員：郭金印、林仲節。

然而，張深切卻認為日本當局所掌握的這部資料，事實上並不正確。他的理由是：第一、革命青年團成立時，謝文達已離開廣州到華北了，因而沒有擔任過總務部長。第二、洪紹潭根本沒有參加青年團（他太太連〈台灣先鋒〉都不准他放在家裡閱讀），自然不會做財政部長。他又說，實際上，青年團的主要幹部可以說是：林文騰、郭德欽、張月澄和他自己。

《台灣先鋒》

一九二七年四月一日，廣東台灣革命青年團的機關報〈台灣先鋒〉創刊。創刊號總共印刷了二千份左右，主要是向中國大陸各地的中、台同胞與朝鮮人，以及在東京的台灣留學生寄發；另外一部份則通過書店對外銷售。針對台灣島內，總共設立了二十二處聯絡站，

其中主要的聯絡人包括：台北二中學生劉盛列；基隆的吳金發；台中，李應章等十一人；新竹，吳石麟等六人；台南，新巷信用組合；以及鹽水的陳秋逢等。

機關報的主要負責人則是該團幹部林文騰。在創刊號中除了有中國國民黨幹部李濟琛的題字之外，並且在卷首刊登孫文的肖像和遺囑，同時也提出以下的口號：

台灣是台灣人的台灣！

台灣的民眾團結起來！

台灣的農、工、商、學聯合起來！

日本被壓迫階級聯合起來！

中國民族聯合起來！

世界被壓迫階級聯合起來！

打倒日本帝國主義！

打倒日本資本主義！

打倒日本南進主義！

打倒日本殖民政策！

打倒日本同化政策！

打倒日本愚民政策！

打倒日本陰謀的亞細亞大同盟！

打倒日本的一切假面具！

打倒虐待農工的資產階級！

打倒一切反革命派！

打倒反革命的文協右派！

打倒諂媚的日本走狗！

打倒封建的一切社會制度！

打倒基於舊禮教的家族制度！

反對把台灣的土地撥給日本人！

反對日本禁止言論、出版、結社的自由！

反對禁止創設台灣人的學校及報社！

讓台灣革命先鋒進入台灣民間！

促使農工階級覺醒並加以訓練！

農工階級是革命的急先鋒！

援助台灣革命！

援助朝鮮獨立革命！

援助日本被壓迫階級的革命！

援助中國國民黨革命！

援助東方弱小民族的革命！

援助世界被壓迫階級的革命！

參加世界革命！

台灣革命成功萬歲！

中國革命成功萬歲！

東方弱小民族解放萬歲！

世界革命成功萬萬歲！

以上口號，總歸起來，不外是聯合世界被壓迫階級，完成反帝國主義與資本主義的世界革命！就廣東台灣革命青年團而言，具體的實踐步驟則是，先把台灣的農、工、商、學聯合起來；對內打倒反革命的文協右派、虐待農工的資產階級與諂媚日本的走狗，然後聯合日本被壓迫階級與中國民族，打倒日本資本帝國主義，完成台灣農工階級的革命。

廣東台灣革命青年團的核心幹部張月澄，以「叛逆兒」筆名在〈台灣先鋒〉創刊號上發表的〈台灣農工商學聯合起來〉一文，充分闡明了這個革命理論。

台灣農工商學聯合起來

親愛的台灣中華革命民族！

四百萬的愛國同胞們，團結起來，聯合起來！

打垮日本帝國主義的政治、經濟、文化的三大侵略政策吧！

導論

趕快起來，要求國民政府實行「收復台灣」，促進台灣民族革命的圓滿成功吧！

野蠻的倭奴，兇惡的日本帝國，資本主義者，於一八九五年中日戰爭後，以它的武力砲艦政策，脅迫我中華政府，締造帝國主義式的馬關條約，割取台灣，使中國不得不出賣台灣四百萬中華民族，任令他們淪為日本帝國主義者的奴隸。台灣被日本強奪後的三十多年間，無一日不受日本帝國主義者的兇狡手段。政治、經濟、文化三大侵略政策推行的結果，原屬中國領土的台灣及其四百萬中華民族，慘遭蠶食、鯨吞、壓迫、蹂躪、慘殺等一切罪行。嗚呼，悲哉！慘哉！

我們台灣的愛國革命領袖，和無數的革命烈士，不忍卒睹日本帝國主義如斯的殘虐作風，即時徵募革命軍，與我們的仇敵日本帝國主義者決一死戰。在過去三十多年間，這些革命軍曾發動十六、七次的流血革命，為革命而犧牲者已達上萬之眾。當每次革命失敗之後，革命同志便被帝國主義者搜捕、投獄和殘殺——被宣告死刑。茲舉日本帝國主義者自行發表的兩件代表性革命實例，以供各位之參考。

革命時期	革命領袖	革命犧牲人員（日本臨時法院判決投獄慘殺統計）
一九〇一年	詹阿瑞先生	一千六百五十三人
一九一五年	余清芳先生	一千九百三十五人

親愛的同胞們！

這個統計，是經過日本政府發表，最少限度的革命犧牲者的人數。除此之外，台

灣革命黨員殉難者的數目到底有幾十萬？實在難於推測。不過，我們可以看看一九〇一年的那次革命，被日本宣告死刑的革命同志竟有一千九十五人之多。而一九一五年的那次革命，被宣告死刑的同志也多達八百六十六人。如此龐大的數目，可說是世界革命審判史上未曾有的大事件。

看到這些事實，思及我們的革命同志犧牲流血的慘史，我們心中感到無比的悽愴和悲痛，不禁潸潸淚下。

在東亞的革命史上有所謂：「台灣三年一小亂，五年一大亂」的說法。換句話說：「台灣三年便會有一次小革命，五年便會蜂起一次大革命」。這充分說明了台灣充溢著革命的氣息，而台灣民族一向富於革命精神。這寧可說是可喜的現象。台灣民族革命運動，也可以說是中華民族光輝的革命運動史的一頁。

親愛的台灣愛國同胞！

農工商學各界的同胞！我們的前輩革命同志，反抗日本帝國主義而流血——犧牲——殉難的種種慘史，是我們永遠不可或忘的。我革命烈士雖在九泉之下，但相信其革命的精神則永遠不死。我們除了不能忘卻前輩烈士之外更要加倍努力奮鬥，進行組織，聯合邁向革命之路。這就是我四百萬農工商學界的中華革命民族應負起的重大責任和無限使命。

我們既然明瞭我們的責任——使命，故而必須起來進行革命。我們也認清了革命的必要，故而必須研究革命的策略和方法。但要研討這根本問題之前，我們須要探究台灣四百萬中華民族被壓迫階級，為何會遭遇日本帝國主義的壓制、虐待、剝削、作

踐等的種種根源，並了解其實際慘狀，然後，研究如何進攻敵人日本帝國主義者，以決定對抗敵人的戰術和策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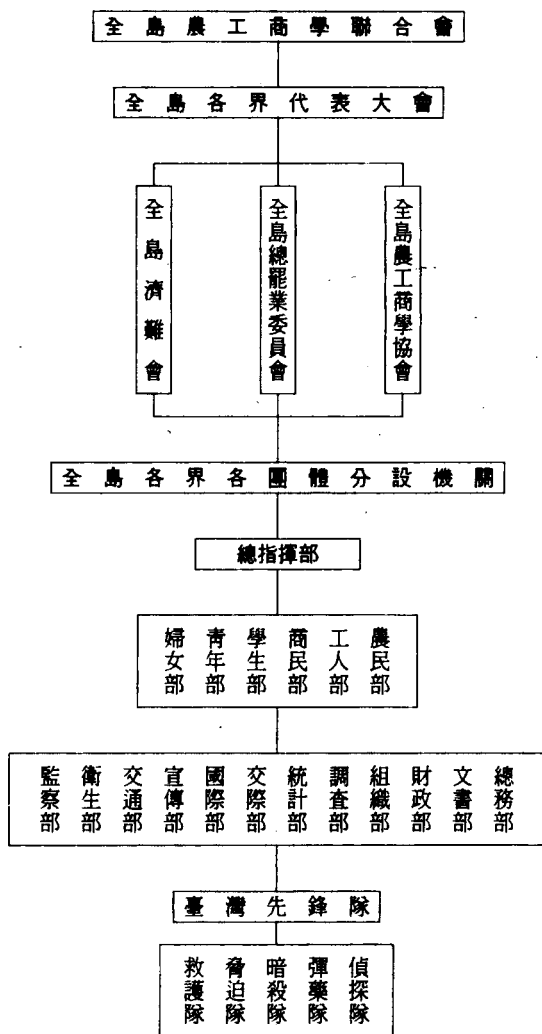
壹、農工商學界的慘狀

- 一、農界同胞的慘狀（內容省略）
- 二、工會同胞的慘狀（同）
- 三、商界同胞的慘狀（同）
- 四、學界同胞的慘狀（同）

農工商學界聯合應採取的戰術

台灣農工商學界的同胞們。各位要聯合組織起來從事革命。我們已經確認革命的必要性。因此，必須研究革命的方法各策略。我們在革命的過程中，當然要建立相當的組織，適當的訓練，有規律的聯合，堅固的基礎，否則，很難達成成功的目標。想要建設革命的堅固基礎，至少限度要趕快把左列的聯合團體組織起來，做為台灣革命的武器，以統一台灣革命的總戰線。

農界	農民協會	統轄團體	罷農委員會	統轄團體	農民濟難會	統轄團體
工界	工人協會	全島農工商學協會	罷工委員會	全島總罷業委員會	工人濟難會	
商界	商民協會		罷商委員會		罷學委員會	商民濟難會
學界	學生協會	罷學委員會	學生濟難會			



這一類的團體組織，只不過是對抗日本帝國主義者最低限的策略方針而已。「全島農工商學聯合會」是最高機關。各界所設置的秘密團體是全島罷業委員會及台灣先鋒隊。至於它統轄下的偵探隊、彈藥隊、暗殺隊、脅迫隊、救護隊，則是我們被壓迫

的無產階級對抗日本帝國主義者的唯一武裝隊伍。各界組織的救濟會則為我們的救世軍。當我們台灣革命同志因反抗日本帝國主義者而蒙受種種災難、壓迫、投獄、慘殺或發生其他意外不幸事故時，我們可以立刻分配全島濟難會的財產進行救濟扶助；或如我們為反抗敵人而實行全島總罷業時，也可以動用各界團體成員聚集於濟難會的會員基金或援助金，充作支援的後勤補給，來維持統一戰線，以便向壓迫階級宣戰開仗。

最親愛的台灣農工商學各界的諸位同胞，由如上的種種事實來觀察，我們四百萬台灣民眾的慘狀，完全是日本帝國主義者的政治、經濟、文化上的全面侵略所造成的。台灣同胞所受的痛苦，不外是日本帝國主義者的壓迫、剝削、蹂躪、慘殺等行為所帶來的。嗚呼，我們的民族任人踐踏，我們的民權無從伸張，我們的民主不克實行，儘管我們已經遭到這種忍無可忍的萬重痛苦，但為何還不起而進行革命？難道我們不要自由？不要解放嗎？

敬愛的台灣同胞們！自由，解放，是諸位的目的，是諸位的目的。為何躊躇而不革命？組織吧，聯合起來吧，台灣四百萬的農商學諸位同胞，趕快聯合，以擴大我們台灣的革命勢力，集中台灣的革命力量，組成統一陣線，立刻把刀尖對準仇敵日本帝國主義，下達總攻擊令吧！

最後，讓我們來高喊口號：

台灣農工商學組織聯合起來！

打倒日本帝國資本侵略主義！

打倒一切壓迫階級！

打倒一切反革命！

打倒一切走狗派！

實行台灣民族革命！

取消不平等的馬關條約！

台灣人主張民族自決！

向國民政府請願收復台灣！

台灣民族自由解放萬歲！

中華被壓迫民族自由解放萬歲！

台灣革命成功萬歲！

中國國民革命成功萬歲！

世界被壓迫弱小民族解放萬歲！

世界革命成功萬歲！

世界和平萬歲！

《台灣先鋒》創刊號的執筆者和目次如左：

發刊詞

林文騰

慶祝台灣先鋒出版

雲 彬（林文騰）

孫中山與台灣

戴天仇

台灣革命與中國革命

方鼎英（軍校學生）

台灣同志的責任

安體誠

台灣同志應如何參加革命

陳日新

台灣為什麼要革命

紅草（張深切）

台灣青年的使命

任卓宣

台灣革命和婦女

李勵莊

打倒日本帝國主義的目標和策略

剛軍（郭德金）

勸台灣

韓麟符

台灣是台灣人的台灣

赤劍（林文騰）

台灣民眾起來革命吧！

施存統（張月澄筆記）

台灣農工商學聯合起來

叛逆兒（張月澄）

一個韓國青年致台灣革命同志書

李英駿

一個中國同胞致台灣學生會

李潤祥

對台灣先鋒的期望

懋其

從此目錄來看，創刊的執筆者包括左派和右派。據張深切說，〈台灣先鋒〉不分左右，只要有人願幫助他們的革命，一律歡迎。當時熱心支援〈台灣先鋒〉者有戴季陶；中大校長，右派。李濟琛；留守總司令，右派。周樹人；中大教授兼教務主任與文學院院長，筆名魯迅，左派。任卓宣；由左而右。方鼎英；由右而左。

就當時中國國內各個政派的屬性來看，廣東台灣革命青年團的性質基本上應較接近國民黨左派。

蔣介石「清黨」

一九二七年前後，由於蔣介石軍事獨裁的日益發展，嚴重威脅到國共兩黨的合作關係，中共中央決計對蔣介石的權力予以限制，於是在「迎汪復職」，「汪蔣合作」的策略不變之下，將原來的「以汪促蔣」改為「以汪限蔣」。

為了進一步限制蔣介石，國民黨二屆三中全會在共產黨員和國民黨左派的努力下，於一九二七年三月十日在漢口開幕。會議實際剝奪了蔣介石原先擔任的中央常委會主席、中央組織部長、軍委會主席、軍人部長、中央軍事政治學校校長等職務；但保留了國民革命軍總司令、中央執行委員會常務委員、中央軍事委員會主席團成員等職務。

事實上，蔣介石根本不理國民黨二屆三中全會的決議，在會議召開的前夕，他已開始破壞和鎮壓工農運動。一些農會和工會的幹部遭到吊打和槍殺，支持工農運動的國民黨黨部則被搗毀。為了避免「遠東第一個國際市場」——上海成為「武漢之續」，蔣介石於三月廿六日抵達上海，加緊準備「清共」。三月底，他向帝國主義表示，「國民革命軍是列強各國的好朋友，決不用武力來改變租界的現狀」，取得了帝國主義及其附庸江浙財閥的支持。

從四月一日開始，蔣介石、李宗仁、白崇禧……等召開了一連串的秘密會議，制訂「清共」計劃。四月二日，吳稚暉、張靜江等五名中央監察委員在上海召開不夠法定人數的「國

民黨中央監察委員會緊急會議」。會議一致同意吳稚暉所提〈查辦共產黨函〉的反共意見，並向蔣介石等發出了〈咨中央執行委員會檢舉共產分子文〉，為蔣介石等進行「清共」，作好了思想準備。

另一方面，在國民黨二屆三中全會時為了達到「以汪限蔣」的目的而被抬高地位，選任中央執行委員會常務委員、中央組織部長、中央軍事委員會主席團成員、國民政府常務委員等職的汪精衛，終於在四月一日從法國經蘇聯到達上海。隨即同蔣介石、吳稚暉、李石曾、李宗仁、白崇禧……等展開多次的秘密會談。蔣介石為了發動「政變」，急於同汪精衛合作，乃於四月三日發表「擁汪」通電，表示汪精衛復職以後，「所有軍政、民政、財政、外交事務，皆須在汪主席指導之下」，他本人則「專心軍旅」。但是，汪精衛在反共的方法和時機上卻與蔣介石不盡相同，因此，直到五日與蔣等密談時，仍然主張在四月十五日召開國民黨二屆四中全會來解決國民黨與共產黨的關係問題。當天，汪精衛還與陳獨秀會晤，發表〈汪陳聯合宣言〉，要求國共兩黨黨員站在革命觀點上，開誠合作。當天晚上，他就匆匆離開上海去武漢。

史家認為，汪精衛當時之所以未與蔣介石等人達成「分共」協議，是因為他要利用在武漢的國民黨中央和國民政府的正統地位，同時憑藉國民黨左派和共產黨人的支持，進而與蔣介石爭奪權位。

蔣汪密謀完成後，蔣介石即著手準備「清黨」。四月九日，蔣介石公布了〈戰時戒嚴條〉，禁止集會、罷工、遊行等，並成立「淞滬戒嚴司令部」。同一天，吳稚暉等人又聯名發表攻擊共產黨人的「護黨救國」通電。蔣介石組織一批流氓打手，成立了「中華共進

會」，由帝國主義者及買辦資本家資助金錢、槍械，指派流氓兵痞設立所謂「上海工界聯合總會」，對抗中共領導的上海總工會。

這樣，蔣介石發動「清黨」政變的一切準備均已就緒，他於是離開上海，前往南京，在幕後指揮這場中國現代史上著名的「四·一二」政變。據不完全统计，從四月十二日至十五日，上海工人、共產黨員三百餘人被殺，五百餘人被捕，另有五千餘人下落不明。

「清黨」後的衰蹶與再起

廣東方面，留守總司令李濟琛早在四月一日就應蔣介石電召，從廣州到上海，「開督軍團會議，決定通緝各團體的革命領袖」。隨後，李濟琛即電留守人員，告以「清黨」的決策，並「囑所部防範共產黨的暴動」。四月十五日，廣州也開始進行「清黨」運動，掃除共產主義勢力。

在這樣的政治情勢下，廣東台灣革命青年團儘管在機關〈台灣先鋒〉的創刊號上曾經刊登李濟琛的題字，仍然不免於遭受鎮壓，而致「一蹶不振」。但進入五月以後，廣東台灣革命青年團又在蔣介石的「國民政府」（四月十八日在南京正式成立）允許的範圍之內，再度展開反對日本帝國主義的活動。

首先，他們於五月九日，參加在廣州市東較場舉行的國恥紀念日示威遊行，當場散發數千份〈台灣革命青年團國恥紀念日宣言〉。六月十三日，為了聲援島內台中第一中學校學生的反日罷課事件，它以「廣州台灣學生聯合會」的名義，在廣東〈民國日報〉發表宣言，批判日本帝國主義壓迫台灣學生而引發罷課事件（宣言內容詳見第一章第四節）。

六月十七日，一年一度的台灣恥政紀念日當天，它又在廣東《民國日報》發表〈台灣革命青年團致中國民眾書〉，讓中國民眾及革命同志們明白「六·一七」紀念日的由來及經過，並提醒他們不要忘了：「現在的台灣民眾無一日不受日本帝國主義者的殘忍剝削和屠殺，在重重的壓迫下，過著牛馬不如的慘憺生活！」

七月十二日，它又在《民國日報》發表一則〈告同胞〉為題的記事，鼓勵在廣東的台灣同胞，反抗日本帝國主義，獻身解放台灣的革命。據日警調查資料顯示，以上這些文章都出自張月澄、郭德金及洪紹潭等人的手筆。

同年六月，國民政府廣東當局卻認定台灣革命青年團也是左傾團體之一，於是逮捕一、二名首謀者，發出解散命令，開始嚴厲的取締行動，團裡的會員、學生因而四散，活動從此停頓下來。不久之後，日本帝國也在台灣島內針對廣東台灣革命青年團的關係者展開全面的檢舉。

檢舉、處刑與瓦解

事實上，日本帝國台灣當局早在張月澄於廣東《民國日報》發表〈台灣痛史〉（一九二九年六月十六日至十八日）一文後，即密切監視張月澄及其他在廣東的台灣籍民的活動，並且逐漸發現他們組成台灣革命青年團的事實。一九二七年七月廿四日，正當台灣警務當局對廣東台灣青年團進行蒐證，以便逮捕關係人物之時，張月澄卻於上海被日本領事館逮捕。台灣警務當局立刻委請該領事館將張月澄移送台灣，同時在草屯將平常和張月澄保持聯絡的簡錦銘拘捕。

八月六日，台灣當局大舉搜捕六十四名廣東台灣革命青年團的關係者；然而，由於其中有四十一人行蹤不明，實際只抓到廿三人。後來又再抓到李君德等九人；共計卅二人。一九二八年二月廿一日，預審終結，蔡萬（鹿港人）、林塗（南投人）、張金昌（大溪人）、黃仔冠（基隆人）、楊春松（大溪人）、李春哮（南投人）、張文進（豐原人）、張煥珪（豐原人）、蔣麗金（嘉義人）、王騰本（新高人）、詹金水、李國獻等十二人，以及後來被捕的李君德、郭裕謙、劉金普、劉永洛、林玉鳳（女）、楊金泉、李肇基（友邦）等七人，以「證據不充分」之由，無罪開釋。十二月四日，第一審宣判。結果以違反治安維持法第三條起訴，判決如下：

林文騰 四年

郭德金 三年（第二年四月十五日控告書減為二年）

張深切 三年（同上）

張月澄 二年（緩刑五年）

林仲節 一年六個月（緩刑四年）

林萬振 同上

簡錦銘 同上

林如金 一年（緩刑四年）

吳文身 同上

溫幸義 同上

盧炳欽 同上

另外，洪紹潭於一九二九年十二月五日在日本福岡被捕，翌年二年瘐死獄中。至此，廣東台灣革命青年團的反日組織與運動，完全瓦解。

小 結

大體而言，日據時期在中國大陸的台灣學生運動，在中國國民黨一九二七年的「四·一二」清黨政變的衝擊下，已經瀕臨組織潰散、無以為繼的困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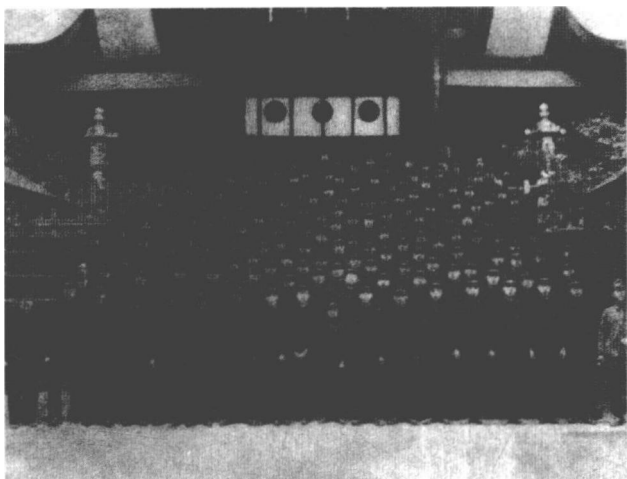
到了一九二八年四月，依共產國際命令，在日本共產黨及中國共產黨的指導下，作為日本共產黨台灣民族支部的台灣共產黨，在白色恐怖籠罩的上海秘密成立。大會通過組織綱領與政治綱領，另外在組黨準備會中已由林木順、謝雪紅、翁澤生等人協議，在中共黨員彭榮協助下成有關勞動運動、農民運動、青年運動、婦女運動、赤色救援會及國際問題等決議文件。

在〈青年運動綱領〉〈關於各種青年組織及運動的整頓與開展〉一節，台灣共產黨特別針對在中國大陸的台灣學生運動的組織與策略，提出指導原則。它指出：「對於在中國的台灣青年，我們應促其加入學生會及讀書會，同時引導他們參與中國革命運動和台灣國民運動。整頓學生會組織且注意各校支部之組織，在各地組織聯合會及全華聯合會，並加入島內學生聯合會，使成為其中組織之一。」另外，「讀書會盡可能使其公開化，並在可能範圍內成為學生會的一部門。若環境不允許時則保持半公開狀態。中國的台灣青年運動

必須與日本的台灣青年運動和島內的青年運動發生密切關係。」在其〈青年運動當前的口號〉中，更特別提出：「廢止渡華旅行券，優待台灣留學生」的要求；鼓勵更多的台灣青年學生到祖國大陸留學。

然而，台灣共產黨針對在中國大陸的台灣青年運動所提的運動指導原則，還來不及具體實踐便遭檢舉，而致黨員四散，同時也將中央機關移回島內。這樣，在中國大陸的台灣學生運動，除了由具有中共黨員身分的翁澤生、林木順領導的上海、閩南兩地的共產主義系統反帝組織與運動之外，就再也看不到其他什麼比較具體的組織與實踐了……。

尾聲 日據末期北部學生大檢舉



● 日據末期，台灣學生在日本軍國主義的高壓下自然燃起一波波的抗日運動。



● 抵死抗日的台北高等商業學校學生——雷燦南。

一九三七年祖國人民的抗日戰爭爆發，台灣人民的抗日民族革命運動也隨著進入一個新的歷史時期。在這個新的歷史時期中，台灣人民的抗日民族革命運動已擺脫了長期以來孤軍作戰的狀態——對內它已經通過霧社的蜂起抗日而聯繫了原住民的抗日運動；對外則有日本和中國人民的支持；在性質上，它也不再只是台灣一地人民反對日本殖民統治，要求民族解放的運動而已！基本上，它已經納入國共兩黨重新合作的中國抗日民族統一戰線，並且成為世界反法西斯統一戰線的一個組成部份。

在一九三六年抗戰爆發前夕，台灣詩人連橫移家上海，並在其臨終遺囑中預言：「中日終必一戰，台灣光復，此其時也。」大體而言，當時廣大同胞的共同願望和心聲，都把殖民地台灣的解放寄託於祖國抗日戰爭的最後勝利。在一九三七年抗戰爆發後，許多愛國的台灣人民紛紛冒著生命危險，間關萬里，潛回大陸，積極投入祖國人民的抗日戰爭。如：就讀日本明治大學的鍾和鳴即放棄學業，與台灣帝國大學醫學部第一屆畢業的蕭道應等人組團，要到重慶加抗戰；就讀日本京都帝國大學醫學部的吳思漢（本名吳調和，台南白河人），也放棄醫科學業，從日本經朝鮮，穿越鴨綠江，經北平到達重慶，要求參加抗日工作；此外，有些青年學生則克服各種困難，進入另一個抗日根據地——延安，參加抗日革命，他們是楊誠、沈扶、董克及兩個女學生黎舒林和馮志堅（翁澤生之妹）。

除了個別的抗日行動之外，黃埔軍校出身的台灣革命活動家李友邦，也在東南地區組織了「台灣義勇隊」，集中居住在福建、浙江的幾百個台灣人參加抗日工作，隨後又成立了「台灣少年團」。另外，在後方重慶的台灣人士；李純青、謝南光、宋斐如、李萬居、李友邦、謝東閩、連震東、黃朝琴、游彌堅……等人，也於一九四〇年三月廿九日成立「台

灣革命大同盟」(一九四一年改名為「台灣革命同盟會」)，長期進行號召抗日、台灣復省的運動。

另一方面，日本帝國對台灣的殖民政策也隨著一九三一年「九·一八」事變以來的侵華政策而進行所謂的「皇民化運動」。它的第一步就是廢止漢文：一切學校、商業機關都不准使用漢文，同時台灣各報章雜誌的漢文版也一律撤廢。相應於「漢文撤廢」，它同時強迫推行所謂的「國語普及運動」，台灣人民不分男女老幼都被迫在日常生活中使用日語。據統計，一九三七年四月底止，全島能解日語者，不過三七%而已；但到了一九四二年四月底便躍增至六〇%左右。台灣總督府用來推行日語的機構——國語講習所，在一九三七年度共有一萬六千三百七十七所，講習生達一百〇四萬八千三百四十一名。台灣人的就學率在一九四二年時，也從一九〇二年的二·二一%激增至六四·八一%。可以說，這個時代的台灣青少年都受過日本帝國主義的麻醉教育。而這種所謂「皇民意識之發揚」的教育，同時也會使台灣人民的民族解故意識消沉。

台灣總督府為了使台灣人民在「皇民化」下變為日本帝國主義的「順民」，從一九四三年起又實施義務教育制度，使台灣人民的就學率由一九四二年的六四·八%增至八五%。按照日本當局的預定，到了一九四五年，台灣人的就學率，男子為九三%，女子是八四·七五%；平地須達九〇%。

在這樣的時代接受日本帝國主義教育的台灣青少年，果真日後被教育成「皇民意識發揚之一代」的話，也不是什麼教人意外之事吧！然而，儘管客觀的歷史條件是那樣嚴苛，台灣本土有組織的社會運動又已經被打壓下來了，殖民地台灣的青年學生卻如同其他抗日

志士一般，在缺乏領導的組織的條件下，經常自發地發動零星分散、各自作戰的反日鬥爭。他們在軍警密佈、特務如毛、敵我力量懸殊，白色恐怖嚴重威脅形勢下的鬥爭，不得不採取隱蔽的方式，因而也就不大見於文字記載中，以下所舉的幾個事件是通過口述採訪與當年報紙所載的幾個典型。

一、台北二中學生抗日思漢事件

一九三六年（昭和十一年）二月廿六日，日本皇道派（因鼓吹皇道精神而得名）軍官安藤輝三、村中孝次、栗原安秀等，率領一千四百餘名士兵在東京舉行叛亂，襲擊政府首腦官邸或私宅，殺死內大臣、大藏大臣和教育總監，並占領首相官邸、陸相官邸、陸軍省、警視廳及附近地區。企圖通過陸軍大臣，要求實行「國家改造」，建立軍部獨裁政權。但因各方面均表反對，陸軍首腦經過一度躊躇後，於廿九日正式下令鎮壓叛亂。大部叛軍頭目均被憲兵隊逮捕，參加叛亂的士兵也都相繼歸隊。史稱此一日本法西斯軍官策劃的武裝政變事件為「二·二六事件」。事後，陸軍當局一面通過「肅軍」徹底清洗皇道派，確立統制派（主張依靠合法手段，自上而下建立軍部獨裁）對陸軍的支配地位，一面迫使在軍部支持下於三月組閣的廣田弘毅內閣恢復軍部大臣現役武官制，加強軍部對政府的干預和控制。此後日本迅速走向全面侵華戰爭和軍部法西斯專政的道路。

在殖民地台灣，台北二中以李沛霖、顏永賢、楊友川等為主的一部份台灣學生，因為受到日本內地「二·二六事件」的行動刺激，於是共謀組織以「台灣脫離日本」為目的的

秘密結社。四月廿五日，李沛霖、顏永賢、楊友川及其他加盟的該校台灣學生，大約共十人，在太平町國昌食堂舉行結社成立典禮。會上議決：「茲依革命手段，將台灣脫離日本帝國統治之下，樹立以排除日本於台灣的統治權，變革日本國體為目的的秘密結社組織——列星會。」同時決定以「排斥日人為當前的方針，且為訓練鬥志武力，要常與日人打架」。此後，列星會即按照共同的決議，在每個月月底集會一次，並且對外廣求會員。五月廿三日前後，列星會在太平町高砂食堂舉行第一回例會。會中議決：招集更多的會員加入列星會，以擴大強化組織的力量。為此，六月中旬左右，李沛霖（列星會的事實會長）在大橋町淡水河畔說服同校學生周世英加入，並獲其承諾。另外，為了實踐「列星會」的行動方針，李沛霖與楊友川等人先後於六月十日及七月四日左右，在太平町第三世界館附近的路上毆擊台北國民中學校的親日學生。

與此同時，林獻堂參加由台灣新民報社董監事所組織的華南視察團，在上海接受華僑團體歡迎時，因在席上致辭有「林某歸來祖國」云云的話，而惹起後來所謂「祖國問題」的舌禍事件。台灣軍部先於五月在總督府所養的《台灣日日新報》揭發此事，連日以頭條新聞撻伐林獻堂為「非國民」（日奸）；然後又於六月十七日，亦即日本帝國台灣始政紀念日當天，嗾使日本浪人賣間某，在台中公園的紀念會上毆辱林獻堂。

台北二中的台籍學生林水旺，在報上看到這則記事以後，一方面對作為台灣資產階級民族改良主義者領導人的林獻堂深寄同情；一方面更加激起其潛藏的抗日決心，並且思慕中華民國為祖國，懇望台灣復歸於中國。同時決意組織在中國援助下，台灣脫離日本帝國的統治，復歸中國為目的的結社。林水旺於是與列星會的主要幹部李沛霖、顏永賢、楊友

川三人串連起來，共同作成組織草案，內定結社名稱為「中國急進青年黨」。同時組成研究會，研究該黨的綱領，並著手組黨的準備工作。然而，這個急進的抗日學生組織還來不及成立，就因為李沛霖和楊友川傷害日人的事件，而與「列星會」一齊被檢舉。

據日本當局的說法，一九三六年十月三日，台北二中的兩名台灣學生李沛霖和楊友川，在台北市建成町二丁目二番地道路上，恰好碰到一名日籍的鐵道部見習塗工市塚元克迎面走來。由於在日本帝國「差別待遇」的歧視教育下，台灣學生時常被日本學生欺負，因而心懷反感，總想找機會討回受傷的民族尊心。就在這樣的心理作用下，李沛霖和楊友川於是堵住市塚的去路。

「你是不是日本內地人？」

「是。」市塚回答。

李沛霖和楊友川於是把市塚狠狠地揍了一頓。

這次的鬥毆事件因為市塚的受傷而驚動了日警當局。後來，它又發覺在台北二中的一部份台灣學生之間存在著以「台灣復歸中國」為目的的秘密結社——列星會，以及有人正準備組織「中國急進青年黨」。日本當局深恐這樣的組織活動蔓延開來，重起另一波的台灣學潮，因而就封鎖新聞，以免驚擾這些日的台灣學生；然後再循線檢舉關係人，並將李沛霖等四人以「首謀者」起訴。

一九三七年（昭和十二年）二月十九日，預審終結。李沛霖、楊友川以治安維持法違反及傷害，林水旺、顏永賢則依治安維持法違反，各裁定有罪，付予公判。四月三十日，

在禁止榜聽的情況下，在台北地方法院刑事合議部，由宮原裁判長宣判：李沛霖處有期徒刑三年六個月，林水旺、顏永賢、楊友川三人，各處有期徒刑三年；未決拘留的二百四十日算入。

日本帝國台灣當局唯恐沉寂已久的台灣學潮經此星星之火的點燃而再度燎原，因而遲至一九三八年五月一日才對外公開此一學生思漢情急的抗日事件及其內容。儘管這樣，這個事件對台北二中的台灣學生而言，無疑是上了反日、愛國的一課。在民族純血的脈動下，台北二中有更多的熱血的台灣學生，經此抗日事件的教訓，終於也在日本帝國皇民化運動高壓的時代，找到一條抗日救國的路——畢業後渡海回大陸，投入祖國人民抗日戰爭的陣營。

二、台北二中學生與謝娥的反日事件

一九四三年十一月下旬，中、美、英三頭會議在開羅舉行，確定「日本竊取於中國之領土，例如東北四省、台灣、澎湖群島等歸還中國」是三國共同對日作戰的目的之一。為此，台北二中的台籍學生唐志堂（汐止人，一九五〇年十月十四日與基隆中學校長鍾浩東同時犧牲）特地去找低一級的學弟陳炳基討論。他們一致認為：「依據開羅會議的聯合公報，終戰後，台灣即可以回歸祖國懷抱，那時，我們即可出頭天，當一等公民了。」因此，他們決定投入實際的反法西斯戰爭的行列，貢獻個人的力量來加速勝利的來臨。他們於是找來同校的郭宗清、黃雨生及台北工專學校的劉英昌，並通過劉英昌而認識了留日歸來的外科女醫生謝娥；她告訴他們她之所以學外科，是因為她一直抱有回大陸為負傷的戰士服

務的志願。從此，他們六個人即開始為回祖國參加抗日行列的計劃而經常密談。

當時，美國的潛水艦經常在台灣近海出沒；一般認為，美軍正計劃登陸台灣。由於局勢的變化，謝娥認為，他們六個人沒有必要統統都到大陸去抗日，畢竟島內的工作還要有其他人做。其他人都沒有異議的採納了謝娥的意見。同時，因為唐志堂與劉英昌即將畢業而被徵去當兵，因而決定他們兩人一畢業即偷渡大陸。此外，他們還討論了一旦盟軍登陸時該如何響應的問題。劉英昌是學工的，因此就負責搞炸藥；謝娥是醫生，她的建議則是在日本人飲用的自來水中放毒。

一九四四年（昭和十九年）春天，唐志堂和劉英昌畢業了，謝娥於是提供一筆錢，讓他們從新竹海邊偷渡大陸。大約是在四、五月左右，六人抗日小組成員之一的郭宗清，因為曾在謝娥家的牆壁上題了一首反日的漢詩而遭人檢舉。郭宗清被捕後，日警便以他誘捕了謝娥；陳炳基和黃雨生來不及逃也陸續被捕了。這時，他們才知道，唐志堂和劉英昌兩人的偷渡行動也因為有人密報而失敗了。除了他們六人以外，台北二中還有一些台籍學生，如：王志旭、王子英、傅賴會、謝全益……等也受到牽連；總共有十來個人被捕。

被捕以後，他們都分別遭到嚴刑拷問。最後，謝娥、唐志堂、劉英昌三人因為已有實際行動而處刑較重，一直要到光復以後才能出獄。其他人則因為尚未成年而判「起訴猶豫」，關了兩個來月就出來了。

三、台北帝大蔡忠恕抗日事件

就在台北二中牽連謝娥反日組織的學生陸續被捕的前後，日本憲兵隊也因台北帝國大學醫學部學生蔡忠恕等密謀響應祖國，反抗日本，而加以逮捕。

蔡忠恕，台北人，台北二中畢業後，即考入集台灣全省青年精英於一堂的台北高校第十四屆理科甲班。當時全班共有廿八名學生，其中日本人廿四名，台灣只有四人；其中一人即是郭琇琮（一九五〇年十一月廿九日犧牲）。另外，同屆的理科乙班有當今泌尿科權威江萬煊醫師；死於二·二八的王育霖則在第十三屆的文科甲班；第十六屆較名者有文科甲班的王育德、邱永漢（邱炳南）及理科乙班的陳國珍；再下來的第十七屆則有文科甲班的李登輝先生。

一九四一年（昭和十六年）三月十日，蔡忠恕與郭琇琮同時畢業於台北高校；並先後進入台北帝國大學醫學部就讀。

同年十二月八日，美日太平洋戰爭爆發。蔡忠恕評估時事，預料隨著太平洋戰爭的發展，祖國軍終會登陸台灣；於是密謀響應祖國，企圖糾集同志，發動武裝起義，並煽動台灣人民共起反日。

自一九四二年（昭和十七年）四月以來，蔡忠恕即先後兩次對同班同學陳國興（大稻埕某齒科醫師的兒子）展開說服的工作，企圖勸誘他加入他們的行列。但陳國興並沒有答應。

後來，陳國興由於經濟拮据，於是出賣蔡忠恕等人，將此密謀透露給充當日人密探的倪克祥。倪克祥隨即將此密謀通過日本憲兵候補江萬達，傳到日本憲兵思想股股長——桑畑准尉的耳裡。在桑畑准尉的利誘之下，台灣人陳國興於是允諾出賣自己的同胞，潛入抗

日學生的結社中，充當日本憲兵的細胞，進行暗中調查的工作。

隨後，陳國興即定時向日憲報告蔡忠恕等的言行舉行。其中，蔡忠恕曾經預言：「一九四三年義大利一定會戰敗。盟軍將在一九四四年冬天大舉襲擊德國，一九四五年春天，德國就會屈服。那時候，日本就不得不投降了。」陳國興密報了蔡忠恕的這段話後，日本當局於是更加緊密的注意蔡忠恕等的動靜。

接著，陳國興又向日憲密報，蔡忠恕日前煽動同志們說：「祖國軍就要來了。當祖國軍登陸時，台灣人要準備隨時起來灑熱血。」

這時候，日本當局感到事態嚴重，於是命憲兵隊直接接在北部一帶的校園內安置大量的日本學生間諜，開始著手調查、蒐集台灣學生反日的計畫內容及證據。

此後，每當美機轟炸的空襲警報響時，這些充當日本憲兵隊間諜的日本大學生，立刻跑到憲兵隊，報告調查本省學生的狀況。當時醫學部的候補學生主任天士，同時也是日本憲兵少尉；他的學生課（主管學生訓導事宜，相當於今日的訓導處。通常，該課的主事多由深得學生信仰的教授充任）也經常有日本憲兵出入。

除了日本憲兵特務機關的學生課外，日本學生間還有個擁護日本侵略主義的秘密團體——「興亞會」，負責暗中調查抗日學生的行動；另外帝國大學醫學部內還有個同窗會性質的「東寧會」。

「東寧會」的日本學生委員們經常公然壓迫本省學生，煞費苦心設法讓台灣學生臣服於日本帝國主義的統治。「興亞會」的內部核心則處心積慮，想把帝大醫學部的本省學

生全部趕走。他們把所有激進的本省學生看成民族主義者，對他們採取武力彈壓的態度；校園內偶爾因本省與日本學生間的敬禮問題而爆發糾紛、爭鬥時，往往就助長日本學生的氣燄。

一九四四年，先是日本學生間諜西山光世向憲兵隊報告說：「帝大醫學部學生候客室內的日本天皇及皇太子的照片，被台灣學生故意從頭切斷，然後丟掉。」

「台灣學生的結社集會場合，輪流在每個人的家裡秘密舉行。」

接著，另外的日本學生又報告說：「謝娥等幾名醫生，在河石外科的地下室，與英、美軍秘密會面、互通聲息。」

因此，日本憲兵隊學生課的監視更加嚴密了。然後，在「興亞會」、「東寧會」與陳國興、江萬達、倪克祥等人內外配合策動下，於一九四四年四月十五日起，以研讀漢文、習國語、抗日的名義，在北部地帶的校園展開連續三天的檢舉行動。台北帝大醫學部的台籍學生蔡忠恕、郭琇琮等，以及其他高校具有抗日民族意識的台灣人學生近千人先後被捕。一時之間，監獄人滿為患，日本憲兵隊還不得不大量增建拘留所。

大檢舉後，日本憲兵當局為了儘速完成台灣要塞化，而對這批學生進行非人道的刑求、拷問。而被日本憲兵以「大學內抗日民族運動首領」之名逮捕的帝大生蔡忠恕，雖經嚴刑拷打卻依然頑強抵抗。

然而，就在台灣光復前夕的一九四五年六月，恰巧落在台北監獄的盟軍的炸彈，竟使得蔡忠恕無緣再見耀眼的陽光，於獄中結束了他短暫的一生。

終戰第二年（一九四六年）的四月，台灣長官公署所屬的《台灣新生報》，終於得以〈民族純血的脈動〉為題，報導了二年前北部學生大檢舉的真相，以及頑強抗日而死於獄中的蔡忠恕的事蹟。

七月七日上午十點，國立台灣大學醫學院特地在台大醫學院大講堂為蔡忠恕舉行公祭。追悼會由與蔡忠恕同時入獄，倖免於死的郭琇琮主持，醫學院院長杜聰明宣讀祭文：

維中華民國三十五年，歲次丙戌，七月七日，主祭官國立台灣大學醫學院院長杜聰明，僅以庶饅香楮之儀，致奠於蔡型士忠恕君之靈前曰，嘗思宇宙之正氣，多賦於吾人魄力，吾人之魄力，能發揮民族精神，民族之精神，輒自壓迫奮鬥中出，此古今來，忠臣義士，多從險阻艱辛磨礪而成也。惜乎，烈士素具民族精神，忠肝義膽，生於日本統治時代，目擊同胞，陷於殖民政策之苦辛，不勝其忿，因是而懷革命思想，奈宏志未曾酬，大禍已臨身，乃自民國三十三年四月，當日政府暴威之下，為其所忌，風聞逮捕，陷落囹圄，慘遭殘酷暴刑，指為密圖作敵內應，迨翌年六月，遂瘞死獄中。嗚呼痛哉，凡我同人，至今興言及此，疇弗為之傷心，而潛焉隕涕也乎。然烈士身雖為民族死，其心永不死，而一段精神，長留於天地間，煥發幽光不滅，何幸我最高領袖蔣主席，領導抗戰，盟邦鼎力援助，獲收最後勝利之功，如今本省同胞，重歸祖國懷抱，河山光復，人物翻新，隔絕聲教五十年，復見漢官威儀，君之英魂有知，亦可含笑於九泉耳。且君之大志，雖屈於生前，而獲伸乎身後，雖重壓其生前，而弗能湮沒於身後，雖折翻於生前，而獲收功乎身後；則君生雖不幸，而死可謂有幸，君之不昧英靈，羞堪告慰矣，君之愛民族心，可無遺憾矣，君之奮鬥精神，庶幾不泯矣。庸

是同人等，邀集諸同志，謹陳薄奠，藉表哀忱，剪紙招魂，望雲天而憑弔，臨風灑淚，增師友之悽悲，統祈雲軒來馭，神降帝鄉，載歆載格，默鑒馨香，魂兮歸來，伏惟尚饗。

除了台大醫學院的公祭，蔡忠恕生前的同志們也紛紛召開追悼會，以弔蔡氏之英靈。據當時的台大人所云，蔡氏為人溫厚篤實，胸中懷有滿腔的熱情，為了達成民族解放的心願，不惜解除婚約，奉獻自身。蔡忠恕死後，家中獨留老母空守蓬門，日日夜夜在緬懷愛兒的回憶中，在戰後混亂的台灣社會孤寂地度過殘年。

四、台北商校雷燦南抗日事件

一九四四年六月廿五日，在四月的北部學生大檢舉事件中被捕的台北商校學生雷燦南，因為寧死不出賣同志，終被刑求至瘋而死。可以這麼說，雷燦南是在日據末期最後一波學生抗日運動中最早犧牲的烈士。

雷燦南，生於殖民地台灣的滬尾（今淡水）。他父親早年從大陸來台灣經商，為人溫 and 謙恭，是台灣光復前極少數保留中國籍的人；慈祥的母親雷氏玉葉，畢業於日據時代第三高女，當時在滬尾山頂小基隆（今三芝）的公學校教書。雷氏生有二男四女，其中兩個女兒自幼就給人當童養媳，長男十九歲時不幸病死；雷氏因而非常疼愛雷燦南。因為這樣的家庭背景，雷燦南矢志渡海回祖國抗戰之後，就在日記中的一頁寫道——

我的爸爸是中國人，媽媽是台灣人。所以，將來我要帶爸爸回大陸，媽媽則留在台灣，讓兩個妹妹奉祀百年……。

雷燦南先是就讀淡水公學校，然後轉學至台北市日新公學校；一九三七年（昭和十二年）三月，畢業於該校第十七回（屆）一組；同年又與同組同學李蒼降（蘆洲人，一九五〇年十月十四日與鍾浩東、唐志堂同時犧牲）考上州立台北二中（今成功中學）。在台北二中時期，雷燦南因為受到同校學長林水旺等人抗日事件的影響，對異族的統治、迫害，感到憤慨不已！中學五年級（當時學制為五年）的他在題為〈我的抱負〉的日記中便立誓：

余之理想要渡海回大陸。台北二中畢業後再讀高商，然後整理家業，做為在台的
最後一名日本人，領導本島民族，大力展開活動。

此外，在他的日記簿的空白部份，處處寫著個人／家庭／社會／民族／祖國等一連串
思慮的文字。可以想見，他當時思想成長的軌跡。

一九四二年（昭和十七年）春天，雷燦南於台北二中畢業後如願考上台北高等商業學校。該校創設於一九一九年（大正八年），原名台灣總督府高等商業學校，最初祇收日本人；一九二六年（大正十五年）八月，改稱台北高等商業學校；一九四三年（昭和十八年），又改稱台北經濟專門學校，直到日本投降為止。（光復後，該校始而改為省立台北商業專科學校，旋又改為省立法商學院；最後併入台灣大學，成為該校的法商學院。）

台北高商設有本科（修業三年）及貿易專修科（一九三六年為培養對華與南洋的貿易人才而設，以配合日本帝國的侵略政策。修業一年）。兩科招生的對象均為中學校畢業生。一九四〇年（昭和十五年）三月，該校的本科再分為第一、第二兩部。第一部係培養一般商業人員；第二部則專為造就對華貿易人才而設，亦名「支那科」。每學期除了有中國語八小時之外，並設有中國經濟地理、中國資源及重要商品、中國近代史、中國法制、中國

貨幣及金融、中國財政諸科目。

該校的師生，以日本人為主。台灣學生多半祇能進入專修科；能夠進入本科的寥如晨星，雷燦南即為其中一顯閃亮之星。由於他是第一部的學生，無法在課堂上學到中國話及有關中國的種種知識；他於是利用課餘時間向祖國來的中國話老師徐征（二·二八事變時犧牲），學習中文與普通話。也就在這個以學習中文為主的讀書會上，他結識了帝大醫學院的學生蔡忠恕與郭琇琮。後來，他又因為常到天水路、迪化街一帶，江精衛政權派來的交流學生的學寮——興亞寮，找這些大陸學生聊天，因而結識了畢業於新竹中學校，正就讀台北帝大預科（校址為今國安局）的客籍青年李薰山。他們兩人都對祖國的抗戰關心，也都深具反日的民族意識，因而彼此一見如故，談得非常投機。同時，通過雷燦南的介紹，李薰山也認識了台北二中畢業後，為了準備到大陸抗戰而暫時在蘆洲當公學校老師的李蒼降；以及淡水街上的牙科醫生王昶雄昆仲。王昶雄的弟弟王榮洲畢業於泉州培元中學校後，即回台灣充任其兄的助手。

雷燦南一直想到大陸，參加抗戰。為此，他每隔一天即與王氏兄弟從淡水對岸的八里，沿著海邊的小路，跑到桃園海濱，再跑回來。他認為，鍛鍊體力是當時最要緊的事。此事，作為孫中山信徒的他，竟也敢冒禁忌，公然在房間牆上掛了一幅孫先生的畫像，並在抽屜裡擺了一本《三民主義》，隨時翻閱。有一次，他們幾個人一起去爬觀音山，一上山頂，雷燦南立刻就揚起一面青天白日旗，迎風招展。

一九四四年春天，李薰山在帝大圖書館偷了兩本重慶版的白話本抗日禁書，其中一本《清算日本》，他看完後就拿給雷燦南看；雷燦南看完後又再拿給李蒼降看。然而，李蒼

降卻不小心讓擔任日本人密探的同事發覺，而去密告。蔡忠恕與郭琇琮於四月十五日被檢舉之後，剛剛取得許可，就要以「通譯」的身分渡海到祖國大陸，實踐抗日夙願的雷燦南，以及李蒼降，也先後被捕。他們兩人咬牙忍受日本憲兵慘無人道的拷打，始終沒有把李薰山和王氏兄弟供出來。

在獄中，一向崇拜文天祥氣節的雷燦南，只把獄中生活當作一個活生生的歷史舞台而已。為了表示不屈從於北人（日本在台灣之北）之淫威，他在押房裡總是南冠而坐，從不面北；同時不斷地吟誦《正氣歌》，激勵自己。這樣，雷燦南終因每日都在暗無天日的獄中承受種種酷刑的壓迫，精神終於因為過度緊急而逐漸遲鈍，乃至於逐漸喪失正常的意識；鮮血也從肉體中被一滴一滴地榨出；最後，終於陷入「精神錯亂」的狀況。儘管這樣，他的口中仍不時喊著反日的民族主義口號，並且喃喃唸著受難同志的名字。

同年的六月九日，雷燦南終因「精神錯亂」而被釋放回家。一回到淡水米市街的家，雷燦南就光著暗紫色的笞痕猶存的上身，在市場裡頭媽祖廟前的廣場，面對熙來攘往的民眾，意識清楚的批判日本帝國主義在台灣的殖民統治。他那演說的架式一點也不像是個「精神錯亂」的人。淡水街的日本憲兵都被他那專注的反日演說嚇壞了，不到三天就把他又拉回監獄。

六月廿五日，雷燦南終於刑死獄中；死時仍雙眼圓瞪，頑強不屈。

終戰第二年（一九四六年）的三月廿四日下午二時，烈士雷燦南先生的追悼會在淡水舉行。那天不管以前認識雷燦南或不認識的淡水居民，都齊聚一堂，領受烈士的遺芳，並為雷燦南祈求冥福。追悼會的悼文由雷燦南的受難同志李蒼降祭讀。悼文嘆曰：

嗚呼！烈士一去，昔日的堂堂風采不復可見，口若懸河的論辯聲亦告消失。在世廿年，天賜蘭蕙之質，卻囚於荊棘之中。千金之玉問世，卻為了魔鬼之手所擊碎。未見光復而身先死，誠為千古恨事。

追悼會最後以全體高呼如下的口號而結束：

台灣的革命青年團結起來！

徹底完成民族革命！

建設民主統一的國家！

建設三民主義台灣！

大中華民國萬歲！

雷烈士革命精神萬歲！

小 結

日本帝國主義在日據末期針對台灣北部校園裡頭展開的檢舉行動，不但逮捕了近千名具有反日意識的台灣學生，而且造成學生領袖雷燦南與蔡忠恕的犧牲。然而，從運動的觀點來看，這次的檢舉事件也為這些組織分散的、不同學校的學生，提供了擴大串連與團結的機會。終戰後，這些學生運動的活躍份子再度以郭琇琮為中心集結起來，投入新民主主義革命的陣營，為台灣的再解放與中國的統一而奉獻、犧牲！

[G e n e r a l I n f o r m a t i o n]

书名 = 民族纯血的脉动：日据时期台湾学生运动
1913 - 1945

作者 = 蓝博洲编著

页数 = 380

SS号 = 13028467

出版日期 = 2006 . 08

出版社 = 海峡学术出版社

原书定价 = 350 . 00

主题词 = 学生运动 台湾 日据时期 (1895
1945) 历史

参考文献格式 = 蓝博洲编著 . 民族纯血的脉动 日据
时期台湾学生运动 1913 - 1945 . 海峡学
术出版社 , 2006 . 08 .